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9 字数 246,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25,000

统一书号: 11094·109 定价: (平)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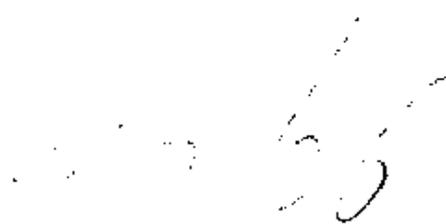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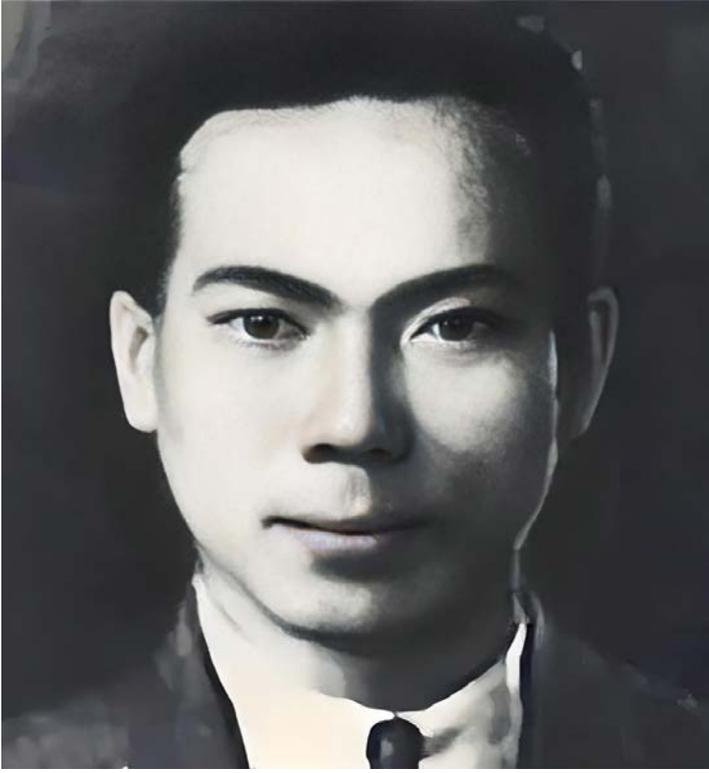
会 长：何长工 副会长：李 新 胡 华

主 编：胡 华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成员：胡 华 彭 明 陈志凌 杨世兰
郭洛夫 卢 权 肖效钦 方大铭 唐纯良
任武雄 季之华 林代昭 陈文秀 张广立
廖开助

责任编辑：郭洛夫

A large, stylized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It appears to be a personal signature or a large checkmark.



陈延年



王荷波



金佛庄



宣中华



马 俊



吴 丽 石



刘天章



韦拔群



贺 昌



谢 维 俊



古 柏



何 宝 珍



李 林



李 中

目 录

陈延年	孙其明	(1)
王荷波	黄启权	(39)
金佛庄	叶炳南	(65)
宣中华	赵子劼 徐绍全 李维加	(79)
马 骏	肖 华	(114)
吴丽石	罗占元 许庆昌	(140)
刘天章	梁星亮 张守宪 董建中	(157)
韦拔群	陈欣德	(183)
贺 昌	陈文秀 雒春普 张志强 李 吉	(217)
谢维俊	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248)
古 柏	夏道汉	(273)
何宝珍	吕芳文	(293)
李 林	穆 欣	(303)
李 中	罗绍志	(339)

陈 延 年

孙 其 明

(一)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县人，一八九八年诞生在安庆城里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

陈延年的祖父陈衍中，字象五，以教书为业，一八八一年病逝。叔祖父陈衍庶，字昔凡，清末举人，曾在奉天（今辽宁省）任过县官、州官。陈昔凡还是安庆著名的国画家之一。陈氏家族从怀宁乡下迁至安庆城居住后，家境逐渐富裕。延年出世时，陈氏家族已成为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了。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字仲甫，性格刚强，才能出众。年轻时就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母亲高晓岚，安徽霍丘人，亦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高晓岚共生子女五人，延年居长，其妹玉莹次之，三弟乔年，四妹幼年即殇，五弟松年。

陈延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庆度过的。其间，他也曾随叔祖父陈昔凡去过东北、北京等地，但为时甚短。大约五、六岁时，祖母和母亲便送他入私塾读书，十二三岁才进新式学校，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延年浓眉大眼，皮肤粗黑，平时沉默寡言，大人们都说他不象一个读书

人。实际上，他不但学习用功，而且十分聪敏，记忆力极强，凡先生规定的书，都读得烂熟，师友们常夸他能“过目成诵”。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借书来读。当时，有一个名叫汪洋的老先生，是陈家的近邻，家中藏书甚多，延年便常去他家借书。经过短短的几年，陈延年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典籍。

一九一三年，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回安庆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当时，为响应孙中山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的号召，陈独秀协同安徽都督柏文蔚举名讨袁。不久，讨袁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攻占安庆，下令通缉柏文蔚和陈独秀。柏文蔚和陈独秀被迫亡命日本。倪嗣冲抓不到陈独秀，便派人到陈独秀家搜捕其子。这时，延年刚满十五岁，乔年才十一岁。幸好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急忙逃往怀宁乡下，才未遭逮捕。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久，他把延年、乔年兄弟接到上海继续求学。延年和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二十一号。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延年和乔年仍留在上海读书。

起初，陈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专攻法文。两年后，考入震旦大学。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法语水平提高很快。据陈独秀的朋友吴虞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日记记载：陈独秀的长子“法文恁佳”^①。

① <<吴虞日记> 摘录>，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0期。

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父亲赴京以后，延年和乔年的生活十分艰苦。父亲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兄弟俩作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他们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据延年的同乡潘赞化后来回忆，当时延年兄弟曾一度“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絮，夏不张盖，同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①潘赞化还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寒冬的一天夜晚在马路上遇见陈延年的情景，他写到：“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的小羔羊。我以手抚其肩背，仍服袷衣。”^②陈延年早就立志，要“自创前程”。他认为，艰苦的生活是对自己最好的磨练。延年的这种志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也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③当时，延年在安庆的老家尽管几次遭劫，但接济他们上学还是有能力的。有一次，延年的叔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找到延年兄弟二人。谢氏见他们衣着破旧，生活艰苦，十分疼惜，甚怪陈独秀没有照顾好自己儿子。谢氏当即要给他们添置衣服用具，并提出以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延年兄弟却谢绝了叔祖母的好意。

陈延年在上海的那几年，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在全国蓬勃展开。年轻的陈延年也很快被各种

^{①②③}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载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辑。

新思想、新学说所吸引。他怀着探求真理的急切愿望浏览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新书刊。他读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天义报》、《新世纪》等。由于陈延年的法文较好，他还直接阅读了不少法文版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如《巴枯宁全集》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而无政府主义却已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因其标榜反对资本制度的黑暗统治和实现一个所谓人人幸福的新社会，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陈延年十分憎恨旧社会，也有志于创立新世界。因此，当他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后，便受其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特别崇信《互助论》一书中阐述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把它当作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他还先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将他们引为自己的“同志”，常与他们交往。

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和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创办了《进化》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该杂志由陈延年任主编，郑佩刚负责印刷和发行，黄凌霜等则是主要的撰稿人。《进化》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互助论》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著作。陈延年也以“人”的笔名，先后在《进化》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编辑余话》，又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较长的专论，题为《为什么我们要发刊“师复纪念号”？》^①在这些文章中，陈延年一方面推崇无政府主义

^①师复即刘师复，中国早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学说，驳斥各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议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则对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号召人们起来“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陈延年还强调革命必须“排患御困，勇往直前”，即使“进了黑屋子，上了断头台”^①也在所不惜。他严厉地斥责某些所谓的无政府党人以“主义”为幌子，实则钻狗洞，谋官发财的可耻行径。这表明，陈延年虽然在探求真理的漫长征途中走了一段弯路，误信了无政府主义，但他毕竟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立志改造黑暗社会的青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军阀政府查禁《进化》杂志，仅出了三期，便被迫停刊。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延年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他却热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时，他曾对潘赞化说：“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②五四运动中，他父亲在北京因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后，潘赞化问他：“你有无恐怖？”陈延年回答说：“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在革命斗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份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③

(二)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

①陈延年：《为什么我们要发刊“师复纪念号”？》，载《进化》1919年第3期。“黑屋子”指监狱。

②③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

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作工，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议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仲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备加赞扬，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①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予以帮助。

同年十二月下旬，从黄浦江启锚的一艘法国邮船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于次年二月初到达法国马赛港。二月三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二十二号。他和乔年以每月一百二十法郎租了一个房间。当时巴黎的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陈延年到巴黎后即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该校教员多系巴黎大学的教授兼任，每天上课四小时，所学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和法国文明史等。陈延年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他除认真听课并完成作业外，还充分利用该校的条件，博览群书，决心在半年或一年内修完该校规定的课程，争取投考巴黎大学。然而一年后，因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

^① 《吴稚晖致上海华法教育会沈仲俊先生的信》，复制件存本文作者处。引文中的“弟”，系吴稚晖的自称。

生脱离经济关系，不再予以资助，陈延年再也无法筹集学费以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业，不得不另谋生路。他时而到里昂，寻找机会做工，时而回巴黎，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处境十分困难。

陈延年初到法国时，仍参与了留法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派的活动。他曾编辑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工余》，与法国早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儒常有往来。但此时的陈延年对某些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华法教育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已有不满，认为他们“都无头脑”，对科学“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①。

从一九二一年起，陈延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法国是资本主义建立较早、发展也较快的国家之一，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反动，社会的黑暗，使陈延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相当的势力，但它不仅没有对改造法国社会起任何积极的作用，相反却愈来愈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这使陈延年大失所望。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②

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促使陈延年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他开始摒弃无政府主义的偏见，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陈延年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

①② <陈延年君由巴黎致本校同学丁肇青君函>，载《北大日刊》，1920年4月14日。

级专政的学说有了较深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他震动更大。他开始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一九二二年，陈延年曾颇有感触地说：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①这是他走了弯路以后所获得的宝贵认识。

然而，促使陈延年对无政府主义信仰发生根本动摇的，还是实际斗争的严峻考验。一九二一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共产主义者蔡和森、赵世炎等人领导下，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斗争，即二月底的“二·二八”运动、六月的拒款斗争和九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在这三次斗争中，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及当时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人，不但不支持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行动，反而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对勤工俭学学生加以残酷的迫害，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人强行驱逐回国。这对于曾经天真地崇拜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陈延年来说，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陈延年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无耻行径愤慨至极，毅然和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站在一起，同吴、李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与继续坚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断绝关系。据当时在法国的陈公培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同吴稚晖等的斗争，考验了无政府主义派。该派平日和我们不作正面斗争。这次运

^① 《同志凌霄的一封信》，载《工余》第16号，1923年4月。

动，则使他们起了分化。陈延年、陈乔年等在斗争中认识了吴稚晖的面目，从此脱离了无政府主义派”^①。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活动时，获悉陈延年、陈乔年的思想有了转变，便满腔热忱地争取他们参加即将成立的团组织。这年四月，赵世炎给陈公培写信说：“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②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③。在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参加了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设法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推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的中国书报社。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延年和陈乔年出席了旅欧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的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被选为“少共”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会后，“少共”的领导机构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里。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移住在这里。当时，周恩来经常往返于柏林和巴黎之间，李维汉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回国内，因而专职作“少共”领导工作的，主要是担任“少共”书记的赵世炎和担任“少共”宣传部长的陈延年。

①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载《“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7页。

②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二陈即陈延年和陈乔年。

③赵世炎：《致吴明的三封信》，复制件存清华大学党史教研室。吴明即陈公培。

在“少共”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出版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该刊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和刻写钢板，王若飞、陈乔年等晚上作工回来后协助印刷、装订。尽管当时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但《少年》不但按时出版，而且内容丰富，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秋，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肖三（肖子璋）等五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少共”的工作。

（三）

一九二三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三月十八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四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陈延年到莫斯科后，入东方大学学习，住在普希金广场特维尔斯卡雅街五十三号东大宿舍。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培养东方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而设立的。该校开设了唯物

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职工运动史、自然科学、俄语等课程。教师授课主要用俄语，有时也用法语。陈延年对所有这些课程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由于他不懂俄语，学习上困难颇多，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地克服困难，认真刻苦地学习。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他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陈延年、赵世炎等到莫斯科前，我党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领导人为罗亦农、彭述之等。陈延年、赵世炎抵莫后不久，即参加了支部的领导工作，赵世炎任支部委员，陈延年为支部干事，负责组织工作。据和陈延年在一起的饶竞群老人回忆：陈延年既能热情帮助别人，又严格要求自己。他发现同学有一点好的表现就当众表扬，有错误或不正当的言行则当面予以批评。他这种对人的诚恳态度是深得人心的^①。在法国时，他曾因张申府的某些缺点，在团的代表大会上坚持要求开除张的团籍。到莫斯科后，旅莫支部作出决议，明确指出开除张的团籍是不对的。陈延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即在支部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因此，同志们都称赞他是“善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榜样”^②。

^{①②}饶竞群：《陈延年革命英姿正气磅礴》（1980年7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一九二四年夏，因国内革命形势渐趋高涨，党急需大批干部领导革命斗争。党中央决定分批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七、八月间，陈延年和部分旅俄同志离开莫斯科，借道海参崴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九月下旬回到阔别了五年的上海，不几天，即奉命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四）

一九二四年十月上旬，陈延年抵达广州。当时，周恩来也从巴黎回国，先延年一个月到广州。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陈延年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他们同住在东山恤孤院路的一幢楼上。

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区委的一些负责人多数因兼做党的工作，无暇过问团的事务，加之经费缺少，团区委的活动无形中陷于停顿状态。陈延年到广州后，立即根据团中央的训令，物色干部，筹集经费，为改组团的区委、恢复广东团组织的活动而积极筹划。经过他的努力，粤区团区委兼地委干部的人选便大致确定，并计划于十一月初召开粤区团的改组大会。十月二十八日，陈延年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报告了粤区团组织下一步的工作设想。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协议，派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调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一九二五年春，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后，

不再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仍兼区委军事部长）。中央又任命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正式接替周恩来主持区委工作。陈延年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离开广东时为止。

陈延年认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打开广东地区工作的局面，必须首先将广东区委建设好，将区委领导机构健全起来。经陈延年建议，成立了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后叛变）、邓中夏、穆青、杨匏安、蔡畅和谭植棠等人组成的区委主席团（即常委会）。接着，又建立了区委的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处理区委的日常事务。此外，还设立了区委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等领导机构^①，以分别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及武装斗争，并在广州文明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作区委机关的办公处。

在加强区委领导机关建设的同时，陈延年还领导区委大力发展党员和扩大党在广东的各级组织。他坚持在斗争中考察和吸收新党员，认为：“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②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多次在区委有关会议上强调，要在重大的革命斗争中物色发展对象，将真正经得起实际斗争考验，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吸收到党内来。

^①广东区委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又称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②陈延年：《告同志》，载《我们的生活》创刊号，1926年9月。

陈延年还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学校，亲自介绍先进分子入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一九二六年九月，广东区的党员中，工人党员达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八，农民党员则达到百分之三十点一四^①。

陈延年还派了许多同志奔赴香港、广西及福建南部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春，陈延年派黄平到香港，组建了直属广东区委的香港支部。同年四月，在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陈延年又派彭湃去海陆丰，建立了海陆丰特别支部，并于同年底在海陆丰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汕头地委。陈延年还派人分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了中共琼崖地委、北江地委、西江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到一九二六年年底为止，广东全省都有了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陈延年又委派谭寿林、龙启炎、钟山等人先到广西的梧州、怀集等地开展活动，并于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随后又在南宁、桂林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底，陈延年派罗善培、罗扬才、李觉民等去福建厦门、漳州等地，发展党员和筹建党的组织，成立了党的支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进军福建后，陈延年再次派罗善培到闽南，组建了中共闽南特委。

经过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的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有的几百人增加到五千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②，而党的各级组织则遍布广东全省、广西和闽南的重要地区，初步改变了党组织不适应

^{①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

陈延年也很重视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他常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党员思想状况定期举办学习报告会。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彭湃、肖楚女、邓中夏等许多党的著名活动家都轮流在报告会上作报告。这些报告联系实际，针对性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受教益。当时在广东工作过的许多党员至今还记得，陈延年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问道：我们大家都立志要做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但是，列宁式的共产党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呢？接着，他又以生动的事例阐述了列宁式共产党员的标准及如何努力的具体途径。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以后，党内有些同志，甚至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因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产生了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动向，陈延年及时地在报告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怕死？然后，他又十分严肃地说道：“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①这些话铿锵有力，使许多同志懂得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六年春，广东区委决定在广州举办党课训练班，以培训党的干部。参加学习的除广州市部分党的干部外，还有西江、东江、北江、南路以及海南岛等地党的干部。每期学员数十人，学习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由区委组织部长穆青主持，陈延年负责上第一课——《党的建设》。此外，还有《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目前革命形势》等课程，分别由

^① 《袁振英的回忆》，载《“一大”前后》（2）第477页。

区委其他同志讲解。这样的党课训练班大约办了三、四期，训练了一大批党的干部。

同年九月，在陈延年的关心下，广东区委又创办了一所党校，以训练基层支部的干部为主。党校校址设在省农会内，由区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共同主持。党校第一期于九月一日开学，正式学员六十人，分二班上课，每班还可吸收一些“旁听生”。第一班每周上课一次，每次三至四小时。第二班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三小时。每期学习两个月，学习内容分为理论、党务、政治、工作方法等。学员们经过短期学习，思想觉悟都有显著提高。这对搞好党支部的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二六年二月，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陈延年、张太雷创办了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人民周刊》的编辑出版事宜，具体由区委宣传部和张太雷负责，但每期重要稿件都经过陈延年审阅和修改。陈延年还经常为该刊撰写社论、评论和署名文章。

同年九月，区委又创办了仅供党内同志阅读的 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陈延年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告同志》，指出：“我们的党现在广东领导一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为求工农群众生活之改良及民族解放运动之巩固与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奋斗”，“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这不是因为我们同志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①《我们的生活》也同《人民周刊》一

^①陈延年：《告同志》。

样，成为教育党员和干部的重要阵地。

广东区委在陈延年的坚强领导下，成绩卓著，迅速成为广东地区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陈延年亦被大家誉为广东党“开疆辟土的拖拉机”^①。

（五）

陈延年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的工作，首先是黄埔军校内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一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入学后，党员人数增至四十多人。陈延年和周恩来便及时将原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②，直属广东区委领导，直接向周恩来或陈延年汇报工作。同年二月，根据区委的指示，黄埔军校又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左权、王一飞等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校内外的左派革命军人，与右派作斗争。陈延年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十分关心，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他以“民族解放协会”的代表陈东的名义列席了在广州大沙头举行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陈延年和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决定组建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了确保党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陈延年、周恩来特意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了共产党员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又从别处调来熟悉军

^①赖玉润：《陈延年烈士的革命风格》，原件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

^②陈延年：《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信》（1925年1月5日），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事的共产党员廖乾五、曹汝谦等，具体负责铁甲车队的工作，还动员了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到铁甲车队当兵。铁甲车队建成后，车队的党组织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该队的一切事情，包括军政工作和干部的调动、配备等，都直接向陈延年和周恩来请示汇报。这样，铁甲车队实际上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铁甲车队建立后不久，陈延年又对“飞机掩护队”进行了改造。飞机掩护队驻扎在距离大沙头铁甲车队不远的地方，原属广州革命政府航空局领导。但原飞机掩护队队长是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经常暗中与帝国主义及滇桂军阀勾结，进行阴谋活动。一九二五年三、四月间，陈延年征得广州革命政府和航空局的同意，派共产党员周士第（时任铁甲车队队长）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派共产党员赵自选任该队党代表，并将原队长调离。当周、赵二人准备去飞机掩护队接任时，陈延年反复叮嘱他们，要做好工作，力争和平接管和改编，注意不要引起武装冲突。陈延年还从铁甲车队抽调一批队员到飞机掩护队充任班排长。他还指示周、赵二人在飞机掩护队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小组。由于陈延年和去飞机掩护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飞机掩护队很快被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又一支革命武装。

一九二五年夏，在广州发生了滇桂军阀叛乱。六月初，杨希闵、刘震寰叛军控制了广州市区及广九、粤汉铁路，革命政府已完全处于叛军的武力威胁之下，随时有被倾覆的危险。陈延年力主采取紧急措施彻底剿灭杨、刘叛军。他针对广州政府中的右派企图与杨、刘妥协的软弱态度尖锐地指出，如不彻底解决杨、刘反动武装，势必养虎贻患，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陈延年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促使广州革命政府决定火速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歼灭叛军。陈延年亲自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坚守大沙头，以掩护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机关顺利撤往广州市珠江南岸。同时，他派刘尔崧、杨殷等去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及各重要工厂，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切断叛军的交通；发动电报工人罢工，以阻碍叛军各部之间的通讯联络；发动兵工厂工人罢工，使叛军的枪枝弹药得不到及时供应；发动自来水厂、电厂工人以断水断电给叛军制造困难。还派了阮啸仙等人到广州市郊，组织各地的农民自卫军配合革命军作战。当平叛战斗正式打响，回师的东征军主力和黄埔在校学生军一起向杨、刘叛军发起总攻时，陈延年又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从猎德附近渡河，攻击敌之背后，给叛军以突然袭击，打乱了叛军的阵脚，使叛军大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当亲率东征军作战的周恩来身穿戎装，佩着红布臂章赶到区委机关向陈延年报告平叛战斗获得胜利的消息时，陈延年连忙迎上去同周恩来亲切握手，并且兴奋地说：“这是第一个武装斗争的胜利，可喜！可贺！”^①

杨、刘叛乱平定后的第二天，广东区委在陈延年的主持下，及时发表了《对于广东时局宣言》。《宣言》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不仅依靠了革命军的奋战，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工农被压迫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战斗，作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的坚

^①赖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强后盾，这是平叛战斗迅速获胜，广州革命政权得以巩固的最主要的原因。《宣言》还向革命政府提出了反映人民利益最低限度的二十条要求，敦促革命政府予以实现。

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革命政府又调集革命军南讨反动军阀邓本殷，以彻底扫除广东境内的反动武装。为确保南讨战斗胜利，陈延年派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张善铭担任南讨军主力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以加强第四军的政治工作，还派共产党员黄学增、韩盈、王文明、杨善集等人分赴粤南、琼崖等地发动群众，扰乱邓本殷部的后方，以配合革命军作战。

同年十一月，广东区委决定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独立团。陈延年、周恩来商定以原铁甲车

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①。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曾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象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象一个道地的苦力。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五卅”惨案。五月三十一日，惨案的消息即传到广州，激起广东的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慨。当晚，陈延年主持召开了广州全市的党、团员大会，详细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和广东的时局。大会决定，为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帝斗争，党和团的广东区委联合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六月二日，临时委员会联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省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六大团体在广东大学广场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声援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斗争。参加大会的一万多群众一致通过了组织广东工农兵学商援助沪案大同盟（后改名为广东对外后援会）、组织讲演队、宣传抵制英货、日货等决定。大会以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进一步在广东掀起反帝斗争的新高潮，陈延年又主持召开了广东区委会议。会议决定发动香港和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会议还决定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冯菊坡、刘尔崧、周文雍等人去沙面和东山，分头发动工人，秘密建立罢工领导机构。六月十五日，即平定杨、刘叛乱的第三天，广东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布了《告广东人民书》，号

^①参见梁养吾：《广东区党委革命活动回忆录》，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召广东全省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参加反帝罢工斗争。六月十九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正式揭幕。罢工实现后，香港的罢工工人冲破了英帝殖民当局的封锁和阻挡，纷纷离开香港返回省城。

六月二十三日，为进一步扩大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等领导广州市的工人、士兵、学生、郊区农民以及返回省城的香港罢工工人十万多人举行集会。陈延年、周恩来等先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地谴责英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号召广大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会后，出席大会的数万群众再一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陈延年、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次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一带时，英帝国主义者竟再一次命令水兵、巡捕用机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群众死伤甚众，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沙基惨案”。走在队伍稍后的陈延年得到前面出事的消息后，无比愤慨，立即带着区委工作人员郭瘦真赶到出事现场，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迅速指挥群众撤退，并及时调查群众死伤的情况。当日深夜，陈延年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继续扩大罢工。会后，他又连夜找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磋商，力促广州革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支持革命群众。广州革命政府根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要求，正式向英、法帝国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对英经济绝交。

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下，进一步扩大。截止六月二十九日，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五万（其中十多万人陆续回到广州）。罢工工人成立了武装的工

人纠察队，开始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使香港的经济活动很快陷于瘫痪，“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陈延年十分重视工人纠察队，他从黄埔军校抽调了好几名懂得军事的共产党员到纠察队工作，担任队长和教官，并亲自检查工人纠察队的训练。有一次，他检查了工人纠察队训练后回到区委高兴地说：“我们的武装队伍真好，又精神，又熟练，比之萎靡不振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①

为了加强党对罢工的领导，广东区委决定在公开的罢工委员会内建立一个秘密的党团特别委员会，由邓中夏任党团特别委员会书记，李森任副书记，直属广东区委领导，向区委和陈延年汇报工作。罢工中一切重大决策，都经陈延年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商量，或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后作出，再通过特别委员会予以贯彻和实施。

罢工初期，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行了全面封锁香港的策略，禁止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出入广州，这对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这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不加区别的做法不利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孤立当时最顽固的英帝国主义，也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广州经济的发展。据此，陈延年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商议，并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及时地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将原来“禁止任何国家轮船出入广州”的规定改为“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结果，那些不愿和英帝一起直接与国民政府为敌的美、日等国商船便纷纷向广州政府申请领取“特许证”，直接开来广州，从而打破了英帝

^①梁养吾：《回忆陈延年》，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拼凑反革命联合战线的企图，也改善了广东的财政经济状况。起初，有些罢工工人对改变策略不理解。陈延年便热情地向他们作解释。他对工人们说：我们从前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现在“只单独对英”，这“譬如打仗有时要进攻，有时要退守”，“要看政治情形来决定我们的进行”，这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以退为进”^①。

在领导省港罢工的过程中，陈延年十分关心罢工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教育。他认为，安排好工人的生活，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这是将罢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当时，许多香港工人回到广州，生活上困难很多。为解决他们的吃住，陈延年派了许多党员协助罢工委员会开办罢工工人食堂。为加强对罢工工人的思想教育，他选派了得力干部为罢工委员会办起机关报《工人之路》，办起罢工工人训练班，还邀请党的负责干部到工人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在第三十三次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亲自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的名义，向工人代表们作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以通俗的语言阐明了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罢工工人不仅是为工人阶级自身谋利益，也是为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他还强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尽管暂时还很强大，工人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暂时还比较弱小，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敌人的力量就会逐渐削弱，革命的力量就能逐渐强大，我们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②。

^{①②}参见《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陈东先生政治报告》，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09期，1925年10月11日。

省港大罢工共坚持了十六个月，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宣告胜利结束。同日，在陈延年主持下，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热情地赞扬和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宣言强调指出：罢工工人的英勇事迹和不朽功绩“将永远不会被中国民众所遗忘”^①。

(七)

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极重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就在致莫斯科诸同志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非常重要，现只有广东在做。”^②他在区委设立了农民部，以彭湃、阮啸仙等有丰富农运经验的共产党员负责农民部的工作，并不断地选派优秀的党、团骨干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分赴广东各地农村，进一步发动全省农民，组织各级农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区委领导下，彭湃首先在海陆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使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总结和推广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全省的农民斗争，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的出版在广东和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农民部领导召

①中共广东区委：《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1926年10月10日），存广州市博物馆。

②陈延年：《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信》（1925年1月5日），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开了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农工联合、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七个重要决议案。大会以后，区委又选派了几十名党、团员充当农运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地，并在全省增设了六个农运办事处（东江、北江、南路、西江、中路和琼崖），领导各地农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陈延年还热情支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农讲所开办的初期，缺少必要的理论课教材，陈延年便写信给当时仍在莫斯科学习的王若飞等人，要他们设法将东方大学的听课笔记“整理好寄回来使用”^①。一九二五年底，区委派罗明到福建为农讲所招生。罗明临行前，陈延年反复叮嘱说：农讲所很重要，这对发展各省的农民运动，将起很大的作用。你们去招生，要招收符合条件的，要拥护党的，要注意政治条件，要愿意下农村同农民一起斗争的^②。为了提高农讲所的教学水平，陈延年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亲自担任农讲所的兼职教员，多次到农讲所给学员作报告。他还提议农讲所开设军事知识课，并选派唐澍、赵自选等军事干部到农讲所指导各届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使他们结业以后能担负起创建和领导农民革命武装的重任。

一九二六年八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了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幕时，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表了致会议的公开信，详尽地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

①陈延年：《给旅莫支部的信》（1925年2月19日），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②《访问罗明记录》（1973年），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农民解放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①。区委的信还针对农村中反动势力对农民革命进行反扑、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号召各级农会和农民革命武装“要镇压摧残农民之武装团体”，“抑制反革命的势力，实现农民最低要求的目的”^②。

为了回答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陈延年还以“林木”的笔名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忍不住了！》的文章，指出：“广东最穷苦的农民，只希望有裤子穿，有粥喝，起来要求减租，但这对于地主残酷剥削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因此，在朝的人便骂他们为土匪。”^③然而，“一切劳苦群众，为稍稍改善其惨苦的生活而起来斗争，这是客观必然的事实，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需要不需要，为他们自身利益，为整个革命利益，即为推进整个革命运动，即为增加整个革命力量，他们必须做这种斗争，并且谁也限制不住”^④。陈延年还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农运的叫嚣，表明了真正的革命党人对农民运动的鲜明立场：“革命党只应而且只能领导这种斗争，不应而且不能反对这场斗争、不要这种斗争。”^⑤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已经开始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陈延年对此完全支持，并开始呼吁全党同志予以重视。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近来鲍罗廷同志的讲演常常提到

①②中共广东区委：《致广东省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信》（1926年8月），存广州市博物馆。

③④⑤林木：《忍不住了！》载《人民周刊》第32期，1926年11月26日。

土地问题，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土地问题无疑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对于这问题的疏忽，是很错误的，我们应该唤起同志来注意这一问题。”^①

(八)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陈延年很注意维护我党的独立性。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讲：“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②他坚决反对当时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处于帮助国民党的地位，只能充当革命的苦力的错误观点。他曾严肃而气愤地说：“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③！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前夕，陈延年同周恩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决定在会上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打击右派势力。他们计划在大会上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及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时，使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陈延年将上述计划报告上海党中央，待中央复电同意后，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

^①筱林，〈陈延年印象记〉，载〈社会新闻〉第7卷第20期，1934年。

^{②③}〈饶卫华谈陈延年〉（1979年12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占绝对多数，因此，实现这一计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却不赞成这一正确主张。他们在上海与孙科等右派分子举行谈判，将戴季陶、孙科等人“请”回广东参加“二大”。为使戴、孙等人能赶上“二大”的召开，陈独秀、张国焘还特意要求广东的同志将“二大”开会的日期推迟，并派张国焘到广州担任我党出席“二大”代表的党团书记，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作出让步。陈延年对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国民党“二大”以后，他又以区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强烈要求抛弃退让政策，改取向右派进攻的正确方针。但陈独秀、张国焘却再一次拒绝了陈延年的正确意见。

国民党“二大”开过不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新右派就在广州发动了“三·二〇”反革命事变。事变发生前两天，陈延年从上海刚刚回到广州。当时，毛泽东主张由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并联合所有反蒋的军事力量坚决反击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陈延年与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立即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与苏联顾问进行磋商（鲍罗廷此时不在广州）。陈延年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提高警惕。党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仍不同意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的意见。苏联顾问也不赞成反击。陈独秀又派张国焘赴粤，强令广东区委和陈延年执行退让政策，结果丧失了反击蒋介石新右派势力的大好时机。

同年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党中央代表张国焘再一次强迫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提案。对此，陈延年和广东区委的许多同志纷纷指责张国焘等人向右派投降，并领导广东的党组织予以抵制。当

时，黄埔军校的同志曾请示陈延年，是否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陈延年坚定地回答：凡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决不能将名单交给国民党^①。广东各级党组织都遵照陈延年的意见，没有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

陈独秀还经常指责广东区委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是“胡闹”，批评广东的农民运动是“轻举妄动”。对陈独秀的这些右倾错误观点，陈延年都坚决反对并采用各种办法予以抵制。他曾在一次区委会上对同志们说：“老头子（指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要他来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依靠组织和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不仅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左派，而且会使现有的革命左派不敢跟共产党走，不敢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②他还强调指出：“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③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出师北伐。陈延年积极地领导和动员群众支持北伐战争。北伐军出师前后，陈延年日夜奔忙，亲自筹划，动员和组织了几千名省港罢工工人随军出发，担任北伐军的运输队。

（九）

一九二六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随军北

^①饶竞群，〈陈延年革命英姿正气磅礴〉（1980年7月），原文存本文作者处。

^{②③}罗明、谭天度等，〈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伐，陈延年便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提议，邀请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先生来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根据陈延年的意见，向中山大学提出了邀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任职的要求，并争得了同意。随即，中山大学向鲁迅发出了正式邀请电。鲁迅先生复电同意赴粤。陈延年获悉鲁迅接受邀请、即将来粤的消息后，亲自召集有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任卓宣（后叛变）、李求实、徐文雅（彬如）、毕磊、施存统等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欢迎和团结鲁迅先生。会上，陈延年首先对鲁迅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鲁迅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人”，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进行着不调和斗争的“自由人”。陈延年强调指出：“鲁迅过去是一贯面向真理，站在革命方面；根据他的发展趋势，是完全应该争取，而且一定可以争取过来的。”^①与会者一致同意陈延年的分析。会议决定，一定要好好做鲁迅的工作。为此，陈延年亲自指派当时任广东区委学委书记的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公开出面与鲁迅先生联系。他指示毕磊和徐文雅，对鲁迅最好的帮助和支持，就是将中山大学和广东的情况如实地介绍给鲁迅。陈延年认为，鲁迅先生只要真正了解到广东和中山大学的真实情况，他自己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

鲁迅到“中大”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

^①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事实〉，载《光明日报》1961年9月21日。

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①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一九二七年三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得到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的秘书任曙。

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临行前，他又特地召集毕磊和徐文雅等人开会，指示他们继续支持和帮助鲁迅。他说：“前一段我们对鲁迅的工作做得有成效，以后还要继续做好。”^②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蒋介石已在加紧准备公开背叛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对鲁迅不了解，担心鲁迅的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陈延年却十分坚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③

（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会议（时陈独秀仍在上海，未参加），研究上海及江浙区的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赶赴上海，组织一个特务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决议案，讨论江

①② 《徐彬如谈陈延年》（1980年5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③ 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事实》。

浙区委执行中央决议案的具体办法和计划^①。

陈延年等人接受中央委托后，立即分头从武汉动身去上海。四月十三日，陈延年等途经南京时，即已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于是，他连夜乘火车赶至上海，几经周折，辗转多处才找到江浙区委罗亦农、赵世炎等人。

四月十六日和十八日，江浙区委两次召开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尹宽等人。会上，李立三首先说明了中央派他和陈延年等来上海的目的和任务，宣布了由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接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反蒋的新方针及江浙区党组织如何执行中央方针的问题。讨论时，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陈延年在发言中，着重阐明了中央决议中决心反蒋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反蒋打蒋，必须乘蒋的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稳固时迅速进行，才有胜利的希望。他还认为，对上海的工作，最要紧的是使此地同志了解中央的决议案，集中力量准备反蒋。其他同志的发言也都就反蒋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对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一致推选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致党中央意见书》。该意见书通过后，由与会者陈延年、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分别签字署名^②。《致党中央意见书》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

^{①②}参见殷子贤：《〈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的由来及有关资料》，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罪恶，分析了“四·一二”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促使当时武汉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①，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

四月二十二日，李立三、罗亦农离开上海去武汉参加党的“五大”，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四月底，党的“五大”开幕，陈延年因上海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但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蒋介石在江浙和上海地区疯狂“清党”，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上海的党和工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陈延年和赵世炎等冒着生命危险，为迅速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而日夜奔忙。环境越是险恶，他愈是显得沉着、冷静。当时，陈延年住在赵世炎家里，每天利用早饭前的时间和赵世炎商量工作，饭后即分头外出活动。他时而去党的秘密机关开会，部署工作；时而找失散的同志谈话，恢复和重建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由于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和不懈努力，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在白色恐怖中不畏艰险，坚持斗争，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逐渐恢复，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

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党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六月二十六日上午，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一百零四号（现山阴路恒丰里九十号）召开干部会议。会上，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省委秘书

^①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

长兼宣传部长。会议正进行时，有人报告，说有一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地址。于是，王若飞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宣布散会，与会者陆续离去。下午三时左右，陈延年、郭伯和和韩步先等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又一起回到恒丰里探视。他们见机关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不料，他们刚坐下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反动军警包围。陈延年、郭伯和等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便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冲入房内的反动军警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入狱^①。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衣，与一般做粗活的工人无异，故敌人信以为真。党组织得知他被捕和尚未暴露身份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济难会的同志与敌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八百元将他赎出，敌方亦已答应。与此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也在设法营救陈延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是世交，与陈延年也很熟悉。汪得知陈延年被捕后，便天真地请求胡适帮忙。不料，胡适立即将此消息报告了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②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贺函”中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巨憨就逮，佩贺之至，……。”^③吴稚晖还恶毒地毁谤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

①参见《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载《申报》1927年7月7日。

②胡允恭：《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载《红旗飘飘》第23辑。

③《铲除共党巨憨》，载《申报》1927年7月5日。

倍”^①，并竭力纵容杨虎对陈延年下毒手。本来，杨虎并不知道捕到了陈延年这样重要的共产党人，接到吴稚晖的信，也惊喜万分，便立即严加审讯。结果，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叛变，当堂供证了陈延年，并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致使赵世炎也遭逮捕。吴稚晖的告密和韩步先的叛变，使党组织的一切营救活动失效。

陈延年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妄图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他始终如钢铁一般坚强，宁死不屈。敌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需要的东西，遂决定杀害他。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行刑时，刽子手们喝令陈延年跪下，他却傲然挺立，根本不理会敌人的嚎叫。几个刽子手上前用强力将陈延年按下，然而，当刽子手们刚一松手，挥刀欲砍时，陈延年却突然乘势一跃而起，使刽子手的砍刀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狂叫着一拥而上，再一次将陈延年强按在地，以乱刀将他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极其壮丽的。他的英名和伟大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朝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① 《铲除共党巨魁》，载《申报》1927年7月5日。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张湘炳：《陈独秀家世叙略》，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 1980 年年会资料。
2.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1 辑。
3. 《进化》杂志，1919 年第 1—3 期。
4. 《陈延年君由巴黎致本校同学丁肇青君函》，《北大日刊》1920 年 4 月 14 日。
5. 方坚白：《回忆烈士陈乔年片断》，未刊稿，原件存安徽省博物馆。
6. 汪原放：《回忆陈氏兄弟——延年、乔年二烈士》，未刊稿，原件存安徽省博物馆。
7. 肖三：《极大的悲痛，极大的愤怒》，《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8.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9. 饶竞群：《陈延年革命英姿正气磅礴》，未刊稿，1980 年 6 月 17 日，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10. 《陈延年致团中央的信》，1924 年 10 月，复制件存本文作者处。
11.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各项政治事件发表的宣言、公开信》，广州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12. 《陈延年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广州市博物馆馆藏资料。
13. 《陈延年烈士革命史略》，《羊城晚报》1964 年 6 月 14 日。
14. 赖玉润：《陈延年烈士的革命风格》，广州农运讲习所纪念馆资料。
15. 周济：《梧州埠喜见周恩来》，《广西党史研究通讯》第 6 期，1982 年 1 月。
16. 栖梧老人：《回忆陈延年烈士》，《新观察》1957 年第 2 期。
17. 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事实》，《光明日报》1961 年 9 月 21—22 日。
18. 殷子贤：《〈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的由来及有关资料》，

《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19. 夏之栩：《回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中国工人》1958年第9期。
20. 张维桢、苏爱吾：《上海三次暴动、“四·一二”事变及事变后牺牲者》，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21. 《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申报》1927年7月7日。
22. 《铲除共党巨魁》，《申报》1927年7月5日。
23. 《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卷第1期，1927年10月24日。
24.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市政协编印。
25. 《赵世炎生平资料》，《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26.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7. 黄逸峰：《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经过和牺牲经过》，《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上海市政协编印。
28. 胡允恭：《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红旗飘飘》第2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29. 访问陈松年、石原皋、岳丹秋、汪原放、彭健华、郑超麟、黄平、何长工、肖三、罗章龙、陈钧、徐彬如、饶卫华、饶竞群、肖隽英、谭天度、罗明、夏之栩、黄逸峰、张维桢、黄阶然、苏爱吾、孙诗圃等人的谈话记录。

王 荷 波

黄 启 叔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时，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①。

(一)

王荷波原名灼华，化名满玉纲^②、彼得洛夫^③、汪一喜^④。一八八二年五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父亲王犹允，原籍山西太原，清末在福建布政司衙门当书办，职微俸薄，难以养家糊口。王荷波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就到闽江

① <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1927年12月26日），载《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11期。

② <胶济铁路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7年9月版。

③ <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

④ <十八烈士死难始末>，中共中央组织部烈士档案。

边石船馆参加拣石子劳动，挣点钱帮贴家用。一九〇一年，母亲病故不满百天，他便离乡背井，去江苏江阴投靠在海军鱼雷营当营长的姨父，经姨父介绍到海军里当水手。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到东北进工厂做工，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①。后来，又进入关内，由华北辗转华东。一九一六年夏，他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直至三十五岁时，才娶妻成家。浦镇机厂是一九〇八年春由中英合资建起的一座机车车辆修理厂，而津浦路南段的建筑权全属英帝国主义。因此，这个厂实际上是英帝独办的。英籍厂长奥斯頓和总监工布拉克在厂内耀武扬威，为所欲为，培植爪牙，压榨职工。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自由劳动和生活的权利。王荷波看到这些，对工头和洋人无比痛恨，心中燃烧着革命的火苗^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王荷波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逐步地认识到唯有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唯有共产主义才有光明的中国。

长江北岸的浦口，是津浦路与沪宁路的中转站，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加上当时长江没有大桥，只靠单船轮渡，通行缓慢，许多旅客都要在这里逗留。因此，浦口附近的浦镇曾经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连，给浦镇工人以很大的影响，王荷波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六月七日北京大逮捕的消息传到南京，南

^①1979年11月21日、1980年元旦访问王介山记录。

^②浦镇机车车辆厂厂史：《江畔红星》（1959年9月）。

京人民激于义愤，罢市一天。次日，王荷波等参与组织浦镇机厂工人要求去南京声援罢工、罢市。可是，由于反动军阀的重重阻挠，渡江不成。王荷波愤慨地说：“工友们！耻辱不能忍，亡国奴的日子不能过。我们要抱紧一团，和全国人民一条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江已被军阀封了，他们架着枪不准过去。我们就在浦镇游行！”于是，他带领着怒火满腔的工人们，在浦镇南门街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支援南京人民罢工、罢市的斗争^①。

浦镇机厂工人对奥斯顿和布拉克定下动辄罚款、开除的苛刻条例，早就十分不满。一九二〇年五月，布拉克又下令拆除厕所，不让工人上班时间大小便，这就更激起工人们的强烈反抗。王荷波对大伙说：“英国鬼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经过工人们商议，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取消所有罚款制度、重建厕所、普遍加薪一成和要布拉克赔礼道歉等四个条件，在厂方未答复前，全厂实行罢工。这时，布拉克发了慌，急电报告机务处。第三天，机务处一个姓蔡的处长赶到，要求工人派代表谈判。王荷波、李永福等参加谈判。通过说理斗争和几百名工人在门外的声援，蔡某和布拉克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王荷波还在谈判中补上“罢工三天中工人的工资照发”的条件，蔡某也不得不答应了。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②。

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厂里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渐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光靠结拜几个兄弟力量太小，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

^{①②}浦镇机车车辆厂厂史：《江畔红星》（1959年9月）。

头的欺压。从一九二〇年底起，他开始忙于筹办工会，并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①。那一年，工头张裕妄想侵吞工人的年终“花红”（即年终双薪）。王荷波找他理论：“俺们工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年关时节发一点‘花红’，完全是大家的劳动应得；而你们衣食富足，不干活，不流汗，还想刮工人的油水，这是什么道理？”张裕抵赖不过，表面上满口答应要给工人发“花红”，但一再拖延，想分文不给。王荷波识破了他的诡计，眼看年关一天天地临近，就带领着七八十个青壮工人冲进他的院内，再次提出要求。张裕见势不妙，只好硬着头皮给工人发了“花红”^②。工人们看到斗争有了成果，对建立组织的要求更加迫切。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四日浦镇机厂的工会正式成立了，王荷波先后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会长。在工会成立的那一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全家喜笑颜开，他就把女儿取名“职工”^③，这就是王荷波的大女儿王晓珍。

工会除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外，还注意教育工人懂得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兴办了工人浴室和工人夜校，把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英国资本家和工头作斗争。那时，英国人为了诱骗工人，虽然每年也给工人增加微薄的工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绝大多数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一天天在下降。对此，王荷波有着切身的感受，因而深知工人生活的痛苦，曾代表

①李素英：《大哥引导我们参加革命》，载《纪念王荷波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专刊》，1982年5月。

②1979年11月21日访问王介山记录。

③《品重柱石》，载《浦厂通讯》1982年5月9日。

工人向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御寒棉衣等十一条要求，可是路局一直置之不理。一个星期日，王荷波带领着浦镇厂的几十名工人，趁津浦铁路特别快车进站之时，赤身露肘，卧轨请愿。武装护路队长下来问话，王荷波代表工人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们生活有倒悬之急，交通部不能坐视不理。”铁路当局为了不误火车正点，答应让工人派代表进京谈判。王荷波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浦镇铁路工人的重托，只身前往北京。工人们看到王会长御寒衣单，暗地里凑钱为他买了一件皮毛大褂。送行时，王荷波感激地说：“弟兄们，我带着你们的心愿，穿上你们送的寒衣，浑身充满力量。此去决不辜负大伙的重托！”到北京后，他进入交通部面见交通总长叶恭绰。叶和他的谋士们百般刁难，王荷波大义凛然，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军阀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王荷波带着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北京返回浦镇。这一天，浦镇站就象传统的节日一样，广大工人及其家属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回厂后，王荷波又依靠工会监督路局兑现十一条条件，办起了合作社和崇意学校。此后，浦镇机厂的工会更加兴旺起来^①。

(二)

一九二一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为了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当地的“交通系”人员所获，几遭毒手。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解围。从此，王荷波与中共北京地方

^①1979年11月21日访问王介山记录。

执行委员会发生了联系，经常到北京大学充慕义斋汇报、讨论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春，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分^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主要力量开展各地铁路工会的工作，并派了共产党员王振翼（即王仲一）到南京浦镇机厂协助王荷波进行工会活动，开辟党的工作。当年六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不久，组成浦口党小组，由王振翼和王荷波两人负责^③。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很快地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建立起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连搬运工人也要求加入铁路工会，王荷波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一起斗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收他们集体加入。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我们铁路工人、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有时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他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帐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的一文钱，深得群众的信赖^④。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亲昵地称呼为“王胡”。当他四十诞辰时，工人们送他一块大红匾，题上“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敲锣打鼓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这四个字体现了工人们对于王荷波的崇敬和爱

①罗章龙：《回忆王荷波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载《纪念王荷波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专刊》。

②王荷波入党的介绍人，一说是王仲一。

③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④《王荷波同志传略》（王凯口述，温济泽整理），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戴^①。接着，王荷波活动在津浦路上，先后组建了徐州、济南、天津等三大站的铁路工会。有一次，他带着紧急任务，从南京北上济南，引起敌人的注意。火车刚过浦口，就从小报上看到了反动军阀通缉他的消息。他冷静地找工人商量应急办法。铁路工人象保护自己的亲人一样，把化装后的王荷波藏进列车员工作间的一个香烟柜里。当列车进入徐州站时，反动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车上车下整整搜查了四个小时，结果还是毫无所获^②。

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达二千多人，使津浦路南段火车停止通行^③。反动军阀政府惶惶不安，慑于工人的力量，被迫再次作了让步，答应工人的要求，“两浦”罢工斗争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一月底，王荷波离开浦镇，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去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一月三十一日，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和来宾纷纷来到郑州。二月一日，帝国主义走狗、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派重兵阻挠。王荷波见此情景，即与代表们一致表示在敌人的武力威胁面前决不退缩，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如期开会。上午八时，各地代表和来宾从郑州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反动军警的刺刀，勇敢前进。十时多，大会在普乐园剧场举行。刚

①浦镇机车车辆厂厂史：《江畔红星》（1959年9月）。

②1979年11月21日访问王介山记录。

③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反动军警就冲进会场，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百般威胁，大会被迫停止。接着，反动派又封闭了郑州会所，封锁代表住宿的旅馆，不许自由行动，并勒令限期出境。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李震瀛等连夜召集党员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宣布三点决定：（一）各地代表、来宾立即离开郑州；（二）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三）二月四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与各界同胞起来声援。会议一结束，王荷波马上到郑州西关外钱塘里姚家大院，向各路代表做了传达，并要求坚决贯彻执行^①。翌日凌晨，他就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地，传达会议决定，组织津浦沿线工人响应京汉铁路大罢工^②。王荷波赶回浦镇后，六日夜晚召开党组织秘密会议，介绍了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经过情况，抓住南京港务处长吴梦兰无故开除工人李金台的事件，决定发动“两浦”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王荷波强调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声援阶级弟兄的政治性大罢工，一定要严密组织，保证胜利。七日晚上，王荷波发动工人首先瘫掉 252 号车，堵住机务段的总道岔，阻拦机车出库，造成罢工之势。八日上午，浦口站乱作一团，机务段长张殿气急败坏。不料，这时恰有一辆 266 号机车牵引着一列煤车从蚌埠方向开到浦口，张殿象捞到救命稻草一样，急叫这台机车牵引着客车保证正点北上，并派十几名武装警察保卫。列车刚开出浦口站，浦口工人就打电话通知浦镇机厂。事态十分紧

^①1981 年 11 月访问原陇海铁路代表凌必应记录。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急，王荷波手执红旗，率领几百工人冲向浦镇车站南首，站在铁轨中间，挡住列车的去路。眼见机车快速逼近，王荷波一声令下：“坚决不让火车过去！”老工人鲍三立即脱下大衣，扑向冰冷的钢轨。随着，几十成百个工人一涌而上，卧在轨中。机车被迫停下后，很快为工人所包围。与此同时，浦口港务所的工人也将南岸所有的船只开到北岸，并卸下船上的重要零件。顿时“两浦”的水陆交通全部陷于瘫痪。南京军阀头子齐燮元恼羞成怒，把驻扎在浦镇东门老营盘的一千多官兵调来弹压。王荷波从容不迫地向工人们进行了动员，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两浦”二千多工人严阵以待^①。敌人见势不妙，派第四混成旅旅长吴洪赞带着车务处长“刺李”（绰号）前来找王荷波问话^②。工人纠察队长买雨田出来答话时，一伙荷枪实弹的军队趁机冲向工会，而早有准备的工人当即把他们围困起来。工人英勇斗争，吓得吴贼、“刺李”只好同意到工会办公室来谈判。在谈判中，王荷波义正辞严地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并提出了撤掉吴梦兰职务，恢复李金台工作，增加工人工资一成，年终“花红”提前发给，保障工人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要求。敌人迫于形势，只得答应上述要求。这时，“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荷波为了保存实力，果断地决定复工。事后，尽管上述条件反动当局并没有全部履行，但这次斗争却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③。

敌人为了扑灭革命斗争的火焰，暗地里策划对王荷波下毒手。上级党得到了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转移前，王荷

^{①③}浦镇机车车辆厂厂史：《江畔红星》（1959年9月）。

^②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王荷波（初稿）》，未刊稿。

波在浦镇后河上租了一只小船，召开党支部大会。他对同志们说：“这次罢工斗争，我们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党的威信，标志着我厂工人已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上了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会上，选举了张振城为浦镇党支部负责人兼工会会长。最后，王荷波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后的重担要靠同志们来挑。不过，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不论天大的困难，只要我们依靠工人兄弟，都能得到解决。”会后，王荷波通过老乡的关系，乔装海军士兵，乘军舰离开浦镇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他的妻子也回到南京武定门东小心桥娘家^①。他们把唯一的男孩王夏林送回福州老家（长大后在江南造船所做工，“八一三”抗日战事中上前线当救护队被日机轰炸牺牲）；又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处（后于一九三九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其五弟王凯送到延安）。由于王荷波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愈加困难，工人们经常捐款资助他。他曾对妻子说，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②。

当时，铁路工人总结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正筹备组织五路（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联合会，这就是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前身。王荷波先到济南津浦机车厂，帮助他们在工人俱乐部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展工会。随后，又秘密地去青岛与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的工人联系。过去封建习俗，木匠、铁匠、油漆匠都有祖师，每逢祖师生日，工人们就请戏班唱戏敬祖师。那时，四方机厂的钳工郭恒祥利用这个机会联络

^①李素英的回忆（1982年4月座谈会记录）。

^②王晓珍、王修竹的回忆（1982年4月座谈会记录）。

厂里工人，取名为“圣诞会”。王荷波到时正赶上这“圣诞会”。他对工人积极分子说：“‘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这是迷信思想；但不管通过什么形式，能把工人组织起来也好。”他在青岛的二、三天中，找了好几个“圣诞会”的头头谈心。他说：“现在你们组织了‘圣诞会’，这里有铁匠、木匠、油漆匠，行不同心相同，好比三兄四弟，应当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他还说：“你们制会章、戴银牌、唱戏，可是，千条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现在别的城市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你们搞起了‘圣诞会’，不论名目如何，都应当为工人谋利益，同统治者抗争。”在他的教育下，进步分子郭恒祥、傅书堂、丁子明等团结群众，把原来带封建色彩的组织“圣诞会”改造过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图书室，为四方机厂建立工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①。

王荷波在山东活动后，刚回到南京，就被反动军警盯住，军阀齐燮元立即派人把他逮捕，并勒令押回原籍办罪。他路经上海时，机智脱险，很快地又和中国劳动组合总部上海分部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经过几年的革命锻炼，王荷波日益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

(三)

一九二三年六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

^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汇编：《青岛革命史料》。丁子明的回忆材料（1960年8月10日，李兰英整理）。

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七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九月至年底，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半年中，他与邓中夏、徐梅坤等，共同负责杭州、宁波、松江、无锡等地区的建党工作；还继续关心浦镇党的组织，决定浦镇党支部与南京党支部联合，以加强领导力量。他经常参加群众性的活动，利用双十节、十月革命节等节日，撰写文章，参加演讲，向群众进行宣传。他负责组织铁路、船厂的活动，举办无锡、上海吴淞和高昌庙等工人夜校，并协助他们成立工会。有一次，吴淞铁工厂监工蛮横殴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工人谭学厂，激起了公愤。王荷波赶到工厂，以谭学厂师父的身份参加工人会议，支持工友们争人权的斗争。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因势利导地发动大家组织工会。他说：“我们工人要有组织，如果没有团体，很难保将来不再发生殴打工人的事。”大家都赞同他的话，争相讨论成立团体的办法。在一个月內，王荷波多次深入吴淞厂，加紧发动工作，并积极筹备成立工会和建立团支部。吴淞铁工厂、张华浜铁路工厂工人和同济学校艺徒等近百名主动要求加入工会^①。同年九月，党中央迁到上海后，王荷波任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中兴路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②。这期间，他还兼任中央工委书记，负责抓工人运动，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纪事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黄少群：《为〈王荷波烈士斗争历史简记〉补正几个材料》，载福建《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工会工作^①。第二年“二七”周年纪念时，王荷波以劳动组合总部上海分部的名义参加筹备委员会，主持编印“二七”纪念册，印发《京汉工人流血记》等文章，进一步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在工作中，他总是首先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沉着地考虑问题，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决断。

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任调查干部及办事员^②。他们为坚持我党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逐渐扭转了不利于革命的形势，使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在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时，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右派企图抢主席台，制造武斗，破坏选举。我党派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工人纠察队，站岗放哨，把会场控制得十分严密，使流氓、打手无法进来，挫败了右派的捣乱阴谋，保证了选举圆满成功^③。

同年五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王荷波同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从上海到达北京，与同行的代表会齐后，乘三等客车飞驰关外。他们按指定的地点在哈尔滨集中，一起到满洲里。然后，经过七昼夜的旅程，终于来到了红色的首都莫斯科，住在卢克斯大旅馆。六月，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他认真阅读文件，积极发表意见，并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

①③罗章龙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1980年）。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简介。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由于他们的日夜操劳，紧张工作，保证了代表团任务的胜利完成^①。接着，王荷波还同罗章龙、姚佐唐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②。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和孤儿院，看到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尽管战后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但人民的福利事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回国后，王荷波学习共产国际的经验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后改为互济会，救济因罢工失业的工人和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③。后来，每当他进行这一段苏联生活的美好回忆时，总是兴奋地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象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一九二五年一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四大”，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根据中央的决定，他与罗章龙共同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同年二月，他在郑州主持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他积极主张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教育训练工会干部，保护工人切身利益。三月，王荷波来到南京，同恽代英主持召开国民运动大会，发表演讲，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反对段祺瑞政府。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从北京传来，王荷波又参与组织追悼大会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五月初，他

①③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浦镇机车车辆厂厂史：《江畔红星》（1959年9月）。

②罗章龙：《亢斋春晓，北方风云——记早期的北方工人运动》，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①。

会后，王荷波继续在南京、上海一带领导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二十五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那时，在英、日两国资本家工厂做工的工人几乎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的浪潮也接踵而至。整个上海到处都在游行、演讲，规模空前，马路上也贴满反帝的标语、口号、漫画。在这期间，王荷波还常到南京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他在鼓楼广场召开的反对英货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起来斗争。他到宝塔桥英国人办的和记洋行的工人中去，开展组织工会、发动斗争的工作。那里食品厂的英国厂长蓄意挑拨江苏、广东、湖北工人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工人队伍。王荷波识破英国资本家的阴谋，深入到工人家里，向群众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阐明无产阶级团结一家的道理，揭露英国人的罪恶勾当，正确地解决了工人内部的意见分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使那里的工人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和记公司工人坚持长达四十天的罢工，成为南京工人运动的中心^②。

为了加强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并集中精力抓好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同年六月，王荷波带着妻子、女儿来到郑州。王荷波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他与王若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②1979年11月21日、1980年元旦访问王介山记录。

飞、张昆弟、李震瀛等一起，共同领导河南省的工人运动。那一年，郑州有一家中日合办的五万纱锭的豫丰纱厂，由于经理穆藕初对女工进行搜身，又在月薪上制造新老工人的矛盾，激起了工人的反抗。工会召集了全厂五千余工人参加的大会，提出十二个条件，厂方置之不理。王荷波组织工人开展罢工，再增加两个条件，即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不得开除热心办工会的工友，要求十四个条件全部答应，才能复工。罢工从八月七日开始，工人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三天后，王荷波发动京汉、陇海两铁路全路工人参加罢工，郑州各商店也罢市声援。罢工持续了十几天，厂方去安阳、淇县雇来流氓二百余人，并以重金收买厂丁一百余人，企图用武力强迫工人上工。二十日下午，流氓、厂丁四处毆击赤手空拳的纱厂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伤七十余人，重伤九人，打死韩玉山、王长保二人，并捣毁纱厂工会，劫取各地捐款二千余元。王荷波同王若飞等同志领导京汉铁路工人通电全国及赤色职工国际，要求声援；并决定对豫丰纱厂实行煤、棉、纱、布“四不运”，坚决要穆藕初答应十四个条件，赔偿工人损失。由于京汉铁路工人的团结战斗，卡住了豫丰纱厂的脖子，终于迫使穆藕初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并给被害工人每人抚恤金三千元，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①。

这时候，河南已经成立了三个铁路工会（京汉、陇海、道清），三个煤矿工会（焦作煤矿、安阳六河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和三个纱厂工会（郑州豫丰纱厂、安阳广益纱厂、卫辉

^①马文彦：《回忆王荷波同志在河南的革命活动》，载《纪念王荷波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专刊》，1982年5月。《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

华新纱厂），它们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此外，还有开封兵工厂、铜元厂和全省各地的一批小工厂，也都成立了工会。因此，完全具备了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王荷波分析了上述工运形势，召开多次会议，积极进行筹备，终于在九月十八日在郑州举行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王荷波以全国铁路总工会来宾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省总工会成立后，王荷波又提议把工会的牌子挂在开封，因为开封是河南省会，是全省的政治中心。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省总工会就设在开封南关外省邮政局对面。王荷波常到开封检查指导工作，并同当时在这里主编《中州评论》的肖楚女研究刊物问题。《中州评论》曾专门出版过职工运动专号。王荷波还多次到焦作、安阳、卫辉、信阳、洛阳等地了解工运情况，提出了许多正确意见。他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下去，和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到铁路沿线的道班，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①。

（四）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王荷波的主持下，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全国十八条铁路、十四万铁路工人的代表齐集，盛况空前^②。三月，王荷波来到大连，在大连工会委员长傅景阳的陪同下，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各站的工作，了解了南满铁路工会的组织发展情况，表示同意召开铁路工人

①马文彦：《回忆王荷波同志在河南的革命活动》。《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②罗章龙：《回忆王荷波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

代表大会，成立南满铁路总工会^①。四月，王荷波回到上海，党中央决定由他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同年五月一日，王荷波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制定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总策略，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会上，他连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荷波与李维汉、项英、王若飞等，在上海闸北区横滨桥附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做准备。王荷波全家以“乔迁志喜”，掩护了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②。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王荷波参加了党的四届中央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听取了陈独秀的《中央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决议，在国内时局急剧变化之际，为党作出重要的决策^③。八月，王荷波任全国铁路工人运动中央特派员，常驻铁总。

一九二六年秋、一九二七年春，他接受党的委派，先后多次回到福州，指导福建党的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在此期间，王荷波协助整顿了福州地委，加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他还和同志们商讨过成立福建省委的问题，由于时机不成熟，暂时作罢。他指导福州地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发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遴选优秀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小组”，主动参加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工作，并积极争取国民党左翼分子的支持、合作。他十分重视发展福州地区的工运和农运，曾指导地委同志派人把东、西、南、北门外四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又协同地委同

① 《大连党组织向北方局的报告》（1926年5月），存中央档案馆。

② 1980年12月、1981年11月访问李素英记录。

③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四）》，《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志，深入基层，发展工会组织，建立电报工会、店员工会和人力车夫工会等，同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王荷波此行的特别使命是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做马尾海军的“策反”工作。他经常来往于福州、马尾之间，出入马尾“海军联欢社”，通过海军政治部主任林植夫做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一舰队司令兼马江要塞司令陈季良的工作，以取得海军实力派的配合。他还利用其四弟王大华、五弟王凯在海军中工作的有利条件，联系下层水兵和造船厂工人，启发他们觉悟，吸收他们入党，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一九二六年十月，何应钦率东路军入闽，盘据在福建的军阀周荫人节节败退。十一月下旬，周部张毅看到福州守军单薄，企图乘虚而入，凭借着万余兵力，从漳州向北推进到乌龙江边。在这关键时刻，王荷波代表我党出席了国、共、海军三方在马尾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大好形势，开展政治攻心，对马尾系海军当局进行保卫桑梓、为民造福的思想工作，与会三方终于统一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于是杨树庄、陈季良调动海军主力，配合北伐军，把张毅部队堵截在闽江南岸瓜山一带，并乘胜将其消灭。然后造成犄角之势，迫使省防司令李生春就范，迎接国民革命军进入福州城。根据当年与他会面的同志回忆，北伐军入闽前后，王荷波曾在福州剑池后义务小学参加过两次会：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个夜晚的党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全体党团员必须在地委的领导下，做到“三个统一”，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他要求在北伐军进入福州之前，应做好统战工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种组织中、各条战线上要起领导核心作用；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等等。这都给到会同志以很大的鼓舞。另一次是一九二七年春，他出席拥军联欢大会。在这次会上，他兴致勃勃地庆贺人民的胜利，并提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希望。他还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接触群众，和同志们亲切交谈。他尤其关心青年，向青年学生了解学校的情况和同学的思想，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特别提醒大家，在好形势面前要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要看到我们道路的曲折、任务的艰巨，千万不能丧失警惕。那时，他经常戴着眼镜，身穿长衫，脚踩布鞋，徒步出门。他说话刚劲有力，思考深邃周到，处事沉着果断，对福州党组织的工作帮助很大。北伐军进城后，王荷波还协助福州地委组织领导了柴井医院罢工、控诉“万童坑”事件和教会学校进一步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三次反帝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罪行，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一九二七年三月，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地委，带领革命人民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三月九日，福州四十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反动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三月十八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①。

北伐时期，王荷波仍然是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经常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中央军委所在地开会、研究工作，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

^① 《白色恐怖下红黑分明的福州》，载《福建评论》第7期，1927年3月12日出版。郑乃之、吴徽谦、王劲民的回忆（1980年10月23日座谈记录）。

周恩来常亲切地称他“大哥”。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负责南市区的工作，特别是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通过“新海军社”这一士兵群众组织，在海军中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争取海军支持起义，并为上海工人提供大批武器，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他说服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脱离北洋军阀，指挥参加起义的“建威”、“列字”等军舰炮轰孙传芳的龙华司令部和高昌庙兵工厂。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王荷波刚从福州赶到上海，就在周恩来、罗亦农等的统一领导下投入战斗。他始终亲临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作战，终于赢得了重大的胜利^①。二十四日，王荷波在南市市民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庆祝这一胜利。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军舰的武装干涉和北洋军阀渤海舰队的南下袭击，王荷波随即奉命前往吴淞，帮助已经站到革命方面来的驻沪海军加强吴淞口的防务，以保障上海的安全^②。

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搞阴谋诡计。三月二十三日，他密令白崇禧加速进军上海。四月十一日，又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四月十二日，刽子手蒋介石以冒充工人的青红帮流氓突然袭击工人，接着就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上海总工会武装纠察队的枪枝。这时，一部分工人发觉，起来反抗，遭到了杀害。当天凌晨，枪声大作，王荷波急从“新海军社”赶到上海总工会，中途被国民党士兵扣住，幸好遇上他的表弟、海军副营长黄桐藩，巧妙

^①1979年11月21日访问王介山记录。

^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纪事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地把他释放。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①。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提出发还枪械、肃清流氓和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号召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几万工人奋勇夺回上海总工会会址，并向司令部请愿。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蒋介石命令反动军队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革命群众扫射，顿时血染大地，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大屠杀。

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相继离开上海。四月二十二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去汉口^②。

（五）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上旬，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六月，在汉口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③。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荷波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王荷波在长期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策略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受党内同志的信任，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①1979年11月21日访问王介山记录。

②郑超麟的回忆（1980年11月，史晋闽整理）。

③廖鑫初、李良明：《林育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北方局下辖顺直、山西、满州、内蒙和山东等省、区党部^①。八月中旬，王荷波跟随党中央回到上海，九月，动身前往华北。九月十日，蔡和森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知。二十二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以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当时，玉田的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省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组织冀东农民武装暴动。所以，王荷波途经唐山，于九月底来到玉田。经过了解，当时玉田全县党员已发展到近二百人，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半，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新党员多，缺乏斗争经验，不懂得怎么干。王荷波立即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在冀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印发了“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他指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使北伐战争和南方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这除了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反革命力量强大之外，还由于我党的力量尚弱，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所致。他在列述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新军阀。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①黄少群：《为〈王荷波烈士斗争历史简记〉补正几个材料》。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

力量，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他还针对玉田的情况，提出了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玉田等县的意见。他的讲话虽然未能清醒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强调打城市，但他的革命精神教育了到会同志。特别是使大家认识到，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了新阶段的方针任务，以及革命走向胜利的前途，对发动武装暴动充满信心，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深恶痛绝。当时，有人提出要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又作了耐心的解释。他说：“我们革命不能单纯靠感情办事，否则就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革命造成损失。你们要求枪毙他，是根据党章的哪一条？党章上面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他边说边问，同志们冷静一想，思想也就通了。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首先打下玉田。会后，王荷波到郭家屯、果各庄、珠树郭等村庄去，召开农会干部会或支部党员会，宣传南方革命形势，要求掌握枪枝武装，扩大农民自卫军，打下京东四县，为建立工农政权作好准备。十月十日，根据王荷波的意见，利用纪念国庆的名义，在县城东关高搭讲台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玉田以及邻近的遵化、丰润、蓟县等县万余农民，携带各种武器示威游行，既壮大了声势，又检阅了力量。王荷波看到如此整齐雄壮、斗志昂扬的农民武装力量，感到十分高兴。他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你们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不容易。这里真有点海陆丰和湖南的景象！只要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去做，相信你们的武装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在玉田前后住了一个多星期，帮助中心县委研究、制定了京东四县武装暴动计划，并要求加强对党员和农民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他走后，玉田农民暴动即于十月下旬爆发了。一万四千多人参加

的武装队伍，很快地攻克了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县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玉田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终于暂告失败。然而这次暴动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了先声^①。当时，党中央在指导思想要求各地党员武装暴动，攻打城市，存在“左”的急躁情绪，冀东暴动计划的失败，不是王荷波个人的责任。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与晋系军阀阎锡山展开火并。王荷波回到天津后，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荷波于十月十八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陷入敌手^②。

在初审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也只承认自己的姓名、籍贯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③。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④。反动军阀张作霖深怕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下令杀害王

①李运昌、李楚离、张明远、李中权：《忆冀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张明远：《纪念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

②③《十八烈士死难始末》，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④《王荷波同志传略》（王凯口述，温济泽整理）。

荷波等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①，北京城阴霾蔽空，军阀政府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几辆刑车，从南向北而去。刑车刚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就猛然煞住。王荷波等十八人从车上下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他瘦骨嶙峋，目光炯炯，面对敌人的枪口，视死如归，屹立不跪，而且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慌忙行刑^②。王荷波壮烈牺牲了，时年四十五岁。

一九四九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就想到了王荷波烈士，说他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纪念，要求重新安葬他的遗骸。当时，北京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根据当年目睹者的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他的忠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自主祭^③。

作者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李维汉同志的关怀，并得到盖军、查秉枢、薛国愿、王峰、连尹、柳名理、孙碧如、林萱治、简泉印、刘汝为等同志的帮助。

①②黄少群：《为〈王荷波烈士斗争历史简记〉补正几个材料》。

③《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2日消息。

金佛庄

叶炳南

金佛庄，一八九七年生，浙江东阳县横店良渡村人，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军事干部，浙江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的成员，历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队长，教导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团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

(一)

金佛庄的父亲金本兰，是一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中医，在东阳横店的四乡颇有点名气，但家境却很清寒。母亲施玉英，生育了四男二女，金佛庄是长子，乳名为文，以下还有为武、素琴、为周、祖禹、梅琴等五个弟妹。他家里从祖父那一辈起，三代不分家；祖父二十八岁时在太平军入浙的战争中死去，父亲由在镇上开设南货店的叔祖父扶养成人。金佛庄从小也由叔公带养在南货店里，六岁进入老贡生金洪锦的私塾启蒙；金洪锦去世后，又跟随老秀才吕松贵课读。吕老先生见金佛庄聪敏好学，文章写得好，十分喜欢他，亲自给他取了“金灿”的学名和“辉卿”的号，意思是称赞此子日后前程

远大，光辉灿烂。后来，扶养他的叔公去世，家境更加贫困，母亲施玉英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出去采桑卖叶，补贴家用，“遗儿求学，吃尽艰辛，佛庄亦深感其痛苦”^①。因此更加刻苦用功地攻读。他十六岁时到湖溪忠清书院（现东阳县湖溪一中）读高小。一九一五年，考进东阳县立中学，和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②。严济慈后来在回忆他对家乡东阳的印象时说：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在东阳县立中学时，同金佛庄两个人，每次考试时都要互相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至今念念不忘。

就在金佛庄进县立中学那年，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登基称帝，无耻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个举国悲愤的消息传到“性刚直，然富于感情”的金佛庄耳里，使他大受震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痛心疾首，拍案而起，明确表示：“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对“科学救国”的理想发生了动摇，“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③。

一九一八年，他从东阳县立中学毕业，决心投笔从戎，以身报国，因而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这以前，由家里父母作主，给他订了亲。他听说未婚妻严瑞珍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表示反对，还专门写了一篇《论婚姻问题》的文章反驳父母的意见。他父亲气得要拿旱烟筒打他，并且告诫他说：“你不要嫌她没有文化，只要人品好，等你将来出去做了事、有了钱，难道不好培养她读书吗？”他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就

①③ 《金佛庄自述》（1926年3月20日于汕头洪家花园）。

② 《东阳县立中学同学录》（1918年6月）。

遵从父命和严瑞珍结了婚。婚后夫妻感情很好。所以当金佛庄到保定军校去学习时，就带了妻子同往，让严瑞珍去上蚕桑学校。

金佛庄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目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和旧军队内部的黑暗腐败，使他又对自己所选择的“从军报国”道路产生了怀疑。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更使他的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

“‘五四’运动起，思想大变，厌恨军阀并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①正在他思谋另找出路时，恰逢一九二〇年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一度停办。他趁机把妻子严瑞珍送回家乡安置停当后，就转而考进了福建厦门大学，改而“研究教育与文学，而要求改造社会之心甚切，祇思想浪漫，近于无政府主义者。”^②

在厦门大学读书，虽然比在军校时思想上大为开放，得以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但生活上却困难得多：不象在保定军校那样一切都享受公费，还发给一些生活津贴费可以资助妻子上学，现在却连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家庭来负担。父母实在无力供他读大学，只好请同村十几户亲邻友好共设一个“银会”，每户拿出十块钱的份子钱，借给他做学费^③。这样勉强供养了一年，他觉得实在不行，又听说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因受家庭催促及朋友以‘新军人’相敦劝，重回保定军校求学。”^④

①②④ 《金佛庄自述》。

③金佛庄家里借债供他上厦门大学，以及在此之前的有关经历，除引自《金佛庄自述》中的记载外，均引自他的三弟金为周、少年时代同学金樟木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回忆记录。

(二)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日，金佛庄离开厦门，乘海轮去天津，转道北京，重返保定军校求学。这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金佛庄和当时国内许多爱国的先进分子一样，满腔热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风起云涌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探求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一回到保定军校，就挥笔写下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的《佛庄日记》，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①。

金佛庄在再进保定军校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的陆军学生时代，“即从事研究社会政治等学，而尤信仰马克思主义”^②。一九二二年，他在保定军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③，开始投身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他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和校内四十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壬戌社”（因为他们将于农历壬戌年——一九二二年暑假毕业，故以此命名），准备通过这个组织，“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④。

①《佛庄日记》原本后半部分已受虫蛀鼠噬严重残损，现存东阳县民政局。

②张宝琛：《金佛庄同志事略》，载1926年12月22日《黄埔日刊》第221号。

③《〈杭州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3月12日），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徐梅坤（行之）1961年1月的回忆。

④《金佛庄自述》。

他考虑到“壬戌社”的成员“不久就要分散各处，不能聚首一堂互相亲口研究对付社会的方法了”，便主张“不能不先有一个准备”。因而提出了一个分成三个阶段，逐步掌握军事实力以改造中国的方案：“第一步是个人的方法，其历程自〔初级军〕官至中级军官。第二步是部分的方法，其历程自中级军官，至据有势力之中坚人物。第三步是全体的方法，是中国改造的实现。”他还殷切地告诫自己的同志们，日后如果当真掌握了军事实权，决不能忘却和背叛革命的宗旨^①。金佛庄的这些宏论，是他已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所提出的改造中国的蓝图。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这些方法，总有不完备的地方”，甚至是行不通的。但是，却充分显示了他以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封建军阀旧势力，彻底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为己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三）

一九二二年七月，金佛庄以优秀的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旋即被分配到浙江，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一九二二年秋天，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负责人徐梅坤（现名徐行之）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了解，介绍他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金佛庄就成为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

^①金佛庄：《从我们的方向和精神所产生的一种方法》。按：此文写作时间稍后于《佛庄日记》，约在1922年上半年，原本残损状况与《佛庄日记》同，现亦保存于东阳县民政局；引文中括号内的字，系原本因蛀蚀缺字，而由引者按上下文意增补的。

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最初的三个党员之一；并在一九二三年夏，和杭州小组的另一个党员于树德，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去广州列席了党的“三大”。

这时，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自觉地“从事革命，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应用唯物观察一切。”^①他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委所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杭州青年协进会和编辑出版《协进》半月刊的活动，以“宣传主义，鼓吹青年”，“吸收同志，向外活动”^②；并由杭州地方团组织安排，为公开发行的《浙民日报》负一部分编辑责任，利用这个公开的舆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有一次，因同志间通信泄密，他曾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和“社会名流”蒋百里（蒋方震）、殷汝驷等出面，致函浙江督军卢永祥讲情，说“中国二十年来无此人才，公宜爱护之”^③，才获释放。

因为金佛庄能文能武，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他在军中当排长不久，就被提升为连副；接着，又很快担任了营长。他的杰出才华，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徐梅坤就曾在当时的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面前极力推荐过他，说这是个很有用的人才，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调他出来^④。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

① 《金佛庄自述》。

② 《团杭州地方委员会（半年工作）之总报告》（1924年3月15日）。

③ 1932年编修的《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武功》。

④ 《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载《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5期。

次会议，在讨论当时正在酝酿之中的江、浙军阀混战的军事问题时，除决议“上海、杭州两方同时做反对战争运动，以‘反对战争，武装民众’为口号，由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办理”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密令“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①，以便尽力设法保存自己在军队中的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金佛庄曾代表杭州的党组织去上海，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报告杭州情形”^②。

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事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金佛庄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六月十七日，他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保定军校所学得的丰富军事知识。“平日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因此，深受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器重^③，在广大师生中颇有威信。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他就被推选为特别党部的五名执行委员之一^④，为贯彻党的“三大”决议，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和这个青年军人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 1923 年 8 月 5 日第 6 次会议记录。

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 1924 年 2 月 21 日会议记录。

③张宝琛：《金佛庄同志事略》。

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 6 篇《党务》：第 1 章《本校党务之发轫》。

等一起，同军校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所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①。

在此期间，金佛庄还在上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深刻揭露旧式军队内部腐败黑暗的上下级关系和军官们的不良心理，鼓吹彻底改造旧式军队，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三个方面，详细地剖析了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以至支配那些掌握着枪杆子的旧式军队中各级军官们的心理。他指出：“军队是时代绵延中的一件产品，是不能不依时代潮流而形成某种物质的。自佣兵制而征兵制，自征兵制而民兵制，都有时代的基础——经济的基础——为其基础”，“中国因受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二重压迫，已达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不安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下，旧式军队里的军官“的性质日习于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当时局变动的时候，他们的野性便一起爆发了”，这就使他们成为“内乱的主要分子”。他认为，从旧式军队本身组织的因素来看，主要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压迫关系，而根本缺乏内部民主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和官兵关系：“现在军队组织的第一毛病是各级军官的隔离，使他们遂各不相顾，甚或互相妨害，上，下，同事，各怀恶意。为什么军队各级间会发生隔离呢？大半因为军队是阶级制度”。金佛庄这里说的“阶级制度”，是指旧军队里的军阶等级制度。他认为，军队内部必要的上下级指挥系统和秩序、军纪，在于求得精神上的上下一心和形式上的有条不紊，

^①覃异之：《黄埔建军》，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以整齐的形式而济之以融和（不分上下）的精神，才名为精练的军队。这是现在的军队组织的真意”。然而，由于在旧式军队里，浓厚的封建意识“占据了他们的充满了旧习惯的头脑”，“中国军官每每谬用阶级的地位和权力”，“威临部下”，“发生压迫的心理”。他用鲜明生动的笔调描绘说：这种“阶级的军队里面无所谓是非和公理。一个昏愚的军官统率圣哲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你孔子虽然有慧敏的天才和明决的判断，有何处可容你发挥？明明错误，但你须〔服〕从错误走”。他又从旧军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物质）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于军官们心理（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在精神上，“军队生活原属机械式的生活”，“是偏枯的和乏味的”；在经济（物质）生活上，“军人生活是很清苦的”。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革命理想和宗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尽心尽职安于这清苦生活的军官究有几人？”虽然不能绝对地排除极少数的正直军官“也有热心为国，不冀求名利的”；但绝大多数的军官“经了一回二回无数回的金钱势力压迫以后，大有非发财不可的心理”，“大半的都昏醉于这种发财的梦中”。因此，初级军官“遂患了一种病——混的心理”；中级军官“团营长多半混入政客的一途”；而“到了上级军官径直是放纵生活”，“他们为所欲为，把中国闹得现在的田地”。其结果便是：“中国无目的而黑良心的军官的捣乱，已经由少数变为普遍的骚动了。”^①通过这样透辟的剖析，他帮助读者们更加深刻地认清北洋军阀所统辖的旧式军队

^①以上引文均见金佛庄：《军官的心理》，载1924年7月20日上海《新建设》第2卷第1期。

的黑暗和腐败本质，并进而痛感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必要性。

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六年三月，金佛庄历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党代表和团长等职。为了巩固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他率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两次东征。“历次战役，冲锋陷阵，无不身先士卒。作战计划，尤为周密，盖金君智勇兼备，〔不〕特能决胜疆场，且能运筹帷幄也。”^①第一次东征时，在淡水、鲤湖、兴宁诸役中，他所指挥的第三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第二团获得党军荣誉旗。回师广州时，龙眼洞、观音山诸役，第三营常为战线之中坚者”^②。因此，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他以战功卓著，擢升为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旋即改任团长。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阴谋刺杀后，他又率部参加坚决镇压反革命势力的行动，“解散梁张郑莫，拘留熊克武及第二次东征诸役，莫不参与”^③。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强迫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当时，正率领第二团的部队驻扎在汕头前线的金佛庄，也被强迫解除军事指挥官的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一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

^①张宝琛：《金佛庄同志事略》。

^{②③}《金佛庄自述》。

“埔校法规从此立基础”^①。蒋介石虽然知道金佛庄是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但很赏识他的才华，企图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来拉拢他，曾不止一次地暗示要他脱离共产党，即可予以重用。但金佛庄忠于党的事业，毫不为所动^②。蒋介石并不死心，一九二六年七月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时候，又重新任命金佛庄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部出发湖南，兼临时指挥官，军进汉皋，留守长沙，遇事精勤，蒋中正倚之如左右手”^③。不久，又任命他为总司令部警卫团的少将团长。此时，金佛庄把蒋介石拉拢他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报告，中央指示他佯装被拉拢过去，以便秘密监视蒋介石^④。

金佛庄统率总司令部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在北伐战争前期，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主要负责保卫总司令部指挥机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安全。一九二六年秋，中路江西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军，遭到孙传芳军阀部队三个主力军的顽强阻击，省会南昌城得而复失，战局呈僵峙状态。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增援部队从两湖转入江西“督师”。在进攻南昌外围的蛟桥、牛行车站战役中，由于第三军攻击正面太宽，兵力不足，蒋介石就把金佛庄的警卫团作为总预备队的一支突击主力，并把补充第四团的第二营也临时拨归他指挥，增援右翼作战。金佛庄率领部队来到前线，指挥冲锋，身先士卒，以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之

①③《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武功》。

②聂荣臻办公室1982年4月3日复严济慈的信。

④徐行之1983年2月14日给本文作者的信。

势，直扑敌军，很快将敌军击退，并乘势冲过蛟桥，压迫敌之侧背，会同各友邻部队，齐向南昌城进发。十一月八日，北伐军再次攻克南昌，受到南昌人民的夹道欢迎。金佛庄的警卫团奉命警戒及维持城内秩序。“南昌底定，任检查司令，设司令部于贡院，更自策自励，接受民众怨诉，除暴安良，视民如子，故当时南昌民众于官吏只知有金司令。”^①《东阳县志》的这些溢美之词，虽然未免有所夸大，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之说。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部的“五省联军”仍盘踞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蒋介石急于早日占领南京，以取得江浙地区作为自己的立足根基，便加紧策划对孙传芳所部的分化瓦解工作。有一次，总司令部首脑开会商议此事，金佛庄也列席参加。在以孙传芳为代表的旧军阀势力这个共同的大敌仍然当前的情况下，金佛庄从争取北伐战争早日胜利的大局着想，在会上主动提出，愿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以前在浙军中服务时所熟识的上、下级旧交关系，秘密策划浙军等部迅速起义。他虽然明知此去深入虎穴，任务极其机密、重要而又危险，稍有泄露就会立遭杀身之祸；但还是自告奋勇地说：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皆所不辞！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不愧是最忠实、最积极、最勇敢、最富于牺牲精神的先锋战士^②。与会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

① 《东阳县志（初稿）卷十四：武功》。

② 据当时在中共上海（江浙）区委工作的徐行之（梅坤）1983年2月14日复本文作者信中回忆说：金佛庄的这次主动请命，除了为要分化瓦解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外，还有乘机“到上海来找我联系工作”的意图；当然，在总司令部的会议上，这是不能公开说明的。

以及金佛庄在保定军校的一些老同学们，都十分赞赏并热烈支持他的这个建议。于是，蒋介石就给住在上海、专门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和对敌军进行策反活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写了一封密信，决定派金佛庄带领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为助手，秘密去上海，进行策反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金佛庄身穿西装，化装成上海的洋行买办模样，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的官舱，顺流东下。不料上船后，行踪即被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孙传芳部驻南京的卫戍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已在下关戒严，并派稽查上船搜查，当即将金佛庄和随从的顾名世二人逮捕。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和同志们闻悉此事后，都十分震惊，多方设法营救，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托“沪上某君”，电请金佛庄的老上司、当时尚归附孙传芳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请从优处置”。到十二月十三日，陈仪答复说，营救不及，金佛庄已被杀害了^①。

（四）

金佛庄在南京不幸被捕牺牲的噩耗在上海报纸上披露后，很快就传到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并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哀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日刊》第二二〇号，在头版以显著地位刊登《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道说：“〔十〕九日接上海来电大意称：孙逆传芳残忍成性”，“竟将金佛

^①1926年12月14日上海《申报》。

庄等二同志执行枪毙”。“查金佛庄同志系本校第一期第三队队长”；“忆本校第一期队长四人，李队长炜章于杨刘之役，因做秘密工作，死于乱军枪下；茅队长延楨于二次东征时被派赴河南，死于郑州刺客之误击；金队长佛庄同志，又继死于南京；此三同志皆在第一期负担军事基本工作”，“金、茅二队长俱 C·P 同志，为国民革命而牺牲，死亦无所遗憾”；“其死难详情及生平事略，自有待于史乘”，“吾辈后死……唯有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继续先烈牺牲之精神，为先烈复仇，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白色恐怖，完成我国民革命工作！以慰先烈于地下也！”广州、武汉等地军民，都纷纷为金佛庄举哀，颂扬他“创造黄埔军校深资臂助”，“随军北伐功在党国”；“身殉主义壮烈可风”^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金佛庄的名字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他不但是北伐战争时期为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献身的烈士，还是浙江建党初期的一位革命先驱者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他。

^①1926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

宣 中 华

赵子劼 徐绍全 李维加

宣中华，原名钟华，字广文，乳名洪霖，笔名伊凡，是“五四”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卓越的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为国共合作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中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爱国少年 筹策救国

宣中华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农历戊戌年五月十六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牌头中央宣村的一个中农家里。那时，家中有水田六亩，房屋三间，生活尚能自给。不久，因弟妹增多（四个弟弟，五个妹妹），吃用逐年加重，入不敷出，开始押田负债，生活日趋贫困。父亲宣雷锋辛勤劳动，性格刚强坦率，他不惜忍饥受贫，竭力支持宣中华入校读书。宣中华一九〇五年入本村日智初等小学，一九〇九年初小毕业后，再入本区同文公学^①，至一九一三年毕业。

^①同文公学是四年制高等小学。

宣中华在同文公学念书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继续推行媚外卖国、独裁专制，使人民仍处于贫困之中。中华民族危亡之状，激发了宣中华爱国之心。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四十六篇作文^①，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剖析，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憎恨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人民贫苦”，是封建统治者“凭权借势，率意妄行，苛政苛法，层见迭出，民脂民膏，尽剥削自奉”^②而造成，指斥袁世凯军阀政府“费用浩大”，致使中国“人民之贫苦，财政之困难，至今已达极点。”^③他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并力求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悟出救国救民的“良策”，探索中国“自强”的道路。

宣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思索如何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在题为《筹防满洲策》、《法并越南英据缅甸论》、《论甲午之败》等作文中，集中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宣中华还有好几篇作文，反映了他要求“权力在民”的思想，如《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义》等；有的作文，则直接赞扬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

①46篇作文由宣中华的小弟弟宣洪文珍藏至今，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宣中华：《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论》，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宣中华：《今中国财政困难已达极点，除借外债外，究有良策可国用否，试熟筹之》，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如《苏武使匈奴论》。宣中华的这些作文，都得到老师的好评，除赞扬文章“畅达”、“清思浣月爽笔佳风”、“精言明理笔曲而达”外，还特加赞赏地写下了“小子可造”的亲切评语。

学生领袖 锋芒初露

一九一三年宣中华于同文公学毕业以后，在本区桥头王村初等小学任教半年；一九一五年夏，考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期间，他学习刻苦用功，善于思考，加上记忆力特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新派校长经亨颐和进步老师陈望道、刘大白的赏识。他生活上严谨朴素，虽经济十分困难，也从不用他人分文，有同学知道他困难要给予助济，总是婉言谢绝，深受同学们的尊爱。他性格豪爽耿直，平时说话很有鼓动性，极守信用，为人光明磊落，乐于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同学们也乐意与他亲近，读书期间，与同学相处，关系甚好。

宣中华渴望学习，特别是能在省城——杭州求学，更感到应该珍惜秒阴。然而，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杭州，却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蹂躏和摧残。尽管西子湖畔的山山水水，依然是那样妩媚清秀，而宣中华所见到的，却是灾难深重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受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凌辱。因而，他更关注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宣中华不再是一个人冥思苦想，而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拯救中国的真理。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立即投身运动，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成为杭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宣中华等指导下，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并与各省学联建立了关系。继“五四”运动之后，宣中华还先后组织领导了杭州学生声援“津案”^①、“闽案”^②等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杭州学生联合会接到天津学生联合会紧急呼吁后，宣中华等组织杭州学联评议会讨论通电北京国务院和广东政府参众两院。电文赞扬、支持天津学生的爱国热忱；谴责反动当局丧心病狂地“摧残团体，是直接和民意宣战”，是“滥用职权，草菅人命”；要求“严加惩办”^③。“福州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宣中华一方面建议和组织杭州学生会全体停课三天，举行示威游行，揭发日寇的横暴行为；另一方面，又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向浙江省督军卢永祥请愿。他强烈地提出了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日军限期出境；行凶日警及主使长官移交中国官厅审判；赔偿损失及抚恤；日本政府向我政府谢罪等六项反映中国人民利益的严正要求。此后，他还兼浙江省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全省学生运动^④。

宣中华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一员，他宣传打倒孔家店，

① “津案”，一九一九年十月，天津学生为庆祝“双十节”举行游行演讲，宣传反帝，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殴打。

② “闽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数十名日本暴徒，在福州持械打伤、打死中国人，造成“福州惨案”。

③④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破除旧礼教，反对读经，提倡新思潮和白话文。为此，他从校园到街头，到处演说，散发传单。

正当新文化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之际，却遭到了浙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一师”被浙江省官厅称为“赤化学校”；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四位进步教员被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反动当局在伺机以恐怖手段来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非孝》的文章，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等乃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是“非孝”、“非礼”、“共产共妻”，污蔑进步分子是“大逆不道”，犯了“弥天大罪”，责令经亨颐校长予以查办。经亨颐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于是，他们先是转来所谓“社会的责问书”；接着就是由省议员多人提出所谓查办经校长的议案；到一九二〇年二月，省教育厅乘“一师”学生放寒假之机，下令撤换校长经亨颐，任命封建顽固分子金布为校长。消息传出后，留校师生哗然。宣中华、徐麟书等组织部分留校同学，一面给放假回家的同学发信，通知他们立即返校，以便团结一致，与齐、夏等反动势力作“最后之决战”；另一方面，向社会发出宣言书，揭露反动当局妄图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宣告“一师”师生“为贯彻本校改革精神”，坚决“挽留经校长”；要求当局请经校长“复职”。同学陆续回校后，他又一道提出不让经校长离校，同时拒绝新校长到任。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事态发展至此，反动当局竟于三月十三日悍然决定解散“一师”，改组学校。当晚，宣中华等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学

生大会，议决“维持文化运动坚持到底”、“非至军警押回原籍，誓不离校”等五项公约，并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表示了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选出宣中华、徐麟书、石樵、徐仁四人为学生代表，从三月十五日起，多次赴省教育厅请愿，均遭无理拒绝。“一师”学生忍无可忍，于三月十九日以快邮通告全国各省、市、县教育界以及全国各重要民意机构，揭露浙江反动当局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呼吁全国各界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三月二十七日，宣中华发动杭州学生联合会向省公署请愿，遭反动军警野蛮镇压，致使请愿学生多人受伤，酿成“三·二七”流血事件^①。

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全省、全国人民的公愤，各报纷纷刊登了“一师风潮”的动态和评论，如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了《告夏敬观》等时评，《新闻日报》也发表了题为《革新教育》的评论。声援学生的请愿信和抗议反动当局的电报，象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斗争在继续。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于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出动军警七百余名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以武力解散“一师”。手无寸铁的师生聚集在操场，在宣中华等领导下，团结一致，与反动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军警的逼迫越来越紧。正在危急时刻，杭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女生为前导，赶到了“一师”，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校门，与“一师”学生汇合，并肩斗争，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学生们的浩大声势和社会上的强大舆论，使反动当局陷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只好指使杭州地方绅士蔡谷

^①以上史料均见1920年出版的《浙潮第一声》。

舜出面从中调停，经过与“一师”学生会领导人宣中华、徐麟书等会谈，达成协议，规定：当局收回解散第一师范学校的命令；撤回“一师”新任校长金布；鉴于经校长已经辞职，新任校长的人选问题必须与“一师”学生会共商解决，并经学生会承认方可任命等条款；反动军警也在深夜撤离学校。至此，“一师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宣中华在这次学潮中，起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他“宣言四方，力护新机”，“从事社会运动甚力”。诸暨《民报》有一记载：“邑人宣中华、徐白民（徐麟书）向为同学所重，至是推为代表”，“中等学生为革新运动之先锋者，皆推宣中华与徐白民也”^①。

当年，鲁迅对“一师”师生的壮举，曾经给予热情的赞赏和支持。“一师风潮”发生时，他在北京任职，当他看到“一师”斗争胜利后，曾十分高兴地对人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他还风趣地把“一师”斗争叫做“木瓜之役”，赞扬“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比他们十年前反夏震武的斗争声势和规模都“要大多了”^②。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齐、夏及浙江教育界的旧势力仍然十分嚣张。他们不仅逼迫经亨颐和陈望道等四位进步教师相继离开了学校，还命令各校开除参加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这一事实，进一步教育了青年学生，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齐、夏是破坏浙江新文化运动和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①诸暨《民报》5周年纪念册，1924年。

^②转引自沈鹏年1961年、1962年访问周作人的纪录。

首；要革新教育，必须与齐、夏继续开展斗争。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下，于一九二〇年四月进一步发起了驱逐齐耀珊和夏敬观的运动。

担任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宣中华，与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负责人具体商讨了驱逐齐、夏的斗争策略和步骤。宣中华说：

“拔掉齐、夏两个反动根子，要靠人民的力量，就是要浙江人民来‘开除’齐耀珊和夏敬观”^①。为此，宣中华一方面派出二十名“学联”代表，到浙江十个府（每府二人）进行宣传，揭露齐、夏罪状，并准备等待省议会开会时组织各校学生请愿，争取省议会提出弹劾齐、夏，达到驱逐之目的。另一方面，各校于四月十二日一致实行总罢课，并组织了五、六千学生举行驱逐齐、夏的示威游行。四月十三日，“学联”又向全国各界、各团体发出通电和宣言，列举了齐、夏十大罪状，提出了“驱逐齐、夏，以削贼党”的口号。四月二十一日，“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开会，抗议反动当局封闭学生联合会和逮捕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后游行时，遭到一千多名反动军警的镇压，当场有八十多人受伤。这一流血事件，更引起了全省各地学生的义愤，纷纷以各种形式声援杭州学生的斗争。驱逐齐、夏的斗争规模愈来愈大。

五月十九日，省议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召开临时会议来审议齐、夏问题，并于六月十六日通过了弹劾省长齐耀珊案。六月十七日，齐耀珊辞去了省长职务。这场斗争，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①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

有志青年 投身工农

宣中华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常与学联评议员说：“爱国反帝只靠学生不够，还要联络工人和各界群众”。他认为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斗争有力量^①。他为发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与印刷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利用印刷刊物的机会，同工人们聊天，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工人的觉悟。在宣中华的带动、帮助和影响下，“一师”不少先进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于工人群众中，走上了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②。

一九二〇年夏，宣中华在“一师”毕业后，即被母校附小聘为教员。在附小，宣中华除了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外，仍经常到印刷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人，给工人夜校上时事课。据老工人回忆说：他讲的“为什么要反对‘二十一条’，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激发了工人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③。宣中华还与其他先进分子一起，帮助印刷厂工人倪忧天等人创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和工余补习学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又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这期间，他还积极为《浙人与世界》周刊撰文，宣传革命道理。

^①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

^{②③}倪忧天：《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1958年回忆稿，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二一年春，由陈望道推荐，宣中华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具体进行工会组织工作。陈望道回忆当年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时说：这个研究会一成立，就一面着手编辑出版了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和其他进步刊物，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些核心人员都经常深入工厂区，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配合工人着手筹建工会组织^①。宣中华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期间，一方面为因有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对他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有了深入到上海工人群众中去的机会，使他更坚定地走上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虽然当时的“政治工作和工运工作，都还是启蒙性质的，我们在研究会工作的同志是边学边宣传”^②，宣中华在“研究会”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对他的锻炼和成长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夏，徐白民、宣中华、唐公宪与杨之华等应沈玄庐的邀请，到浙江肖山衙前创办农村小学。农村小学于九月二十六日开学，宣中华任教员。他认真教育农民子弟，经常深入农民群众，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数说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破除农民世代相传的所谓“命中注定八字苦”的宿命论；向农民群众介绍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启发农民群众认识只有组织起来与反动官府、地主豪绅、奸商作斗争，才有

^{①②}邓明以：《陈望道传记》（初稿），1981年1月油印本。

出路等道理。这年，农业遭遇自然灾害，官府捐税不减，地主奸商乘机残酷掠夺农民，使农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沈玄庐（当时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徐白民、唐公宪、宣中华、杨之华、刘大白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农民组织了衙前农民协会，于九月二十七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布《协会宣言》和《协会章程》，推选李成虎等六人为协会委员。会后，数千农民手执义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向米店奸商、地主豪绅发起攻击，开展平糶米价、实行减租缓税的斗争。这一风暴很快波及诸暨、绍兴一带，四周几十个村庄的成千上万农民，相继奋起^①，组织农协，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肖山衙前农民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人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中指出：“一九二一年，肖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②宣中华本人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而迅速成长起来。

革命战士 坚信马列

一九二一年十月，宣中华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③，与工人协会代表倪忱天同去苏俄参加

①《越铎日报》1921年9月27日。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苏史料选集》第3期（1981年12月）。

③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俩巧装华工，几经艰险，终于通过了国境，于年底到达大会原定地点伊尔库茨克^①，受到留在远东局工作的华林（华挺生）的接待。宣中华迫切希望能学习、研究苏俄革命经验，因而勤奋学习俄语。

一九二二年初，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在列宁的指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幕，二月二日在列宁格勒闭幕。会议期间，宣中华认真地听取和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的宣言。他还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理论的教育；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是协同宰割中国的分赃会议，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现阶段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还懂得了完成民主革命必须有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革命道理。会议期间，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等。这期间，他还曾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大会结束后，许多代表陆续回国，宣中华还留在苏俄考察，至一九二二年四月回到祖国。

在苏俄期间，宣中华目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后短短的五年来的巨大变化，接触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内心激起了无限的革命热忱。他从苏俄生机勃勃、蒸蒸向上的景象中，憧憬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思想境界大为开阔，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因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参加大会期间，就曾向中共代表提出入党申请，由于他对张国焘

^①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

专妄虚夸的坏作风提出过批评意见，“结果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和反对”^①而未获通过。宣中华虽然遭此打击，但丝毫没有削弱他投身革命的意志，仍然积极靠拢党，坚信马列。回国后，他向亲朋挚友宣传马列主义，热情叙谈自己对苏俄之行的观感，他说：“过去对革命意义，只在书报上看到一些，耳上听到一些，精神实质上是相当模糊的”^②，经过苏俄之行后，认识大大加深了。他还谈及当时苏俄人民的精神面貌，说：“当时经济尚未恢复，生活尤感困难，而党团员和工人们艰苦劳动的精神是见所未见的，毫无我国上海的腐朽气象，人民在严重的困难中却都很乐观。”^③他把这次苏俄之行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视为“平生最光荣，最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并取了“伊凡”（苏俄人民中常取的名字）的笔名，以表示自己的志向，在撰文投稿与好友通信时署用^④，如在《责任》周刊上所发表的十八篇文章中，有九篇是署名“伊凡”。

这时，宣中华一方面在革命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认真地从事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广泛地发动和团结更多的人来进行革命工作，与原来在“一师风潮”时期共同战斗过的同志结成“任社”，在肖山县龛山创办了命名为《责任》的周刊。该刊问世前，在《新浙江》上发表了《任社同人广告》，说：

①《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7月29日。

②③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④徐白民：《宣中华烈士事略》（1958年6月），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共同生命开口说‘人底发现’，个性开口说‘自我实现’，总合一切我的‘人’，各人做‘人’的事，无论谁都有人和己的责任，本社同人，基于这个广大愉快的意义，出一种小小的周刊，就取名‘责任’。”这就不难看出，创办《责任》周刊的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奋起，负起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拯救中华的责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责任》周刊第一期创刊，作为《责任》周刊主编之一的宣中华，为了该刊能按期出版，经常通宵达旦伏案赶写文章，审编稿件，在十五期中，刊登了他十八篇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宣中华经“五四”运动、“一师风潮”的洗礼，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在苏俄的考察，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

十八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深刻而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号召人民不受“宰割”，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他说：帝国主义者“把工业后进国天然的富源都略取了，吮吸到自国里，再以制造品来盘剥被压迫的民众底膏血”，掌握“被压迫民族的经济权”，并与中国的封建军阀勾结起来，“攫取政治上种种重要权利”^①。宣中华在文章中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说：“国民能一致奋起，群力共争，那便足以寒侵略者的胆。”^②

（二）提出了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办法来救国的主

①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②宣中华：《收回旅大》，《责任》周刊第13期，1923年3月5日。

张。他在《怎样救国》^①一文中写道：“坏的分子去了，黑暗势力消灭了，一切事情，自然有法可以整理了，这种救国法，我认为最好没有的。——换句话说，就是革命。”

（三）对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作了阐述。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工人最受压迫，又有许多优点，所以是革命的力量。他说：“资本家就利用资本，经营大规模的工厂，出低微的工资”，雇佣大批被迫“贱卖劳动力”的工人，迫使他们“做了机器底附属品”，使“劳动力价值也越便宜，而劳动时间及一定时间里底劳动，资本家更设法延长、增加，直到劳动者为生命所驱使”，“出死力发出一个反抗的喊声”，必然起来斗争^②。其次，他认为要反帝反封建，还必须开展农民运动，他不仅认为农民是“工业后进国的第二个受损害者”^③，而且认为，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还是个“负维持中国底重担”者，他说：“中央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地方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也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每年输出到欧、美、日本，聊抵欧、美、日本所输入的，又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底生产品。”^④但是“农民却受了国家所赐给的各种祸害。”“强盗般的军阀，他们为自己争地盘，给农民以许多惨酷的蹂躏，他们为预备争地盘，要农民负极大的军饷；官僚则无微不至的剥削；地主则如愿的取求；市侩则刺心刻骨的收吸。名为保护人民的法律，

①《责任》周刊第6期，1923年1月1日。

②③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④宣中华：《农民和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成了敲诈农民的武器，名为处理民事的政府，变做执行敲诈的机关。”使农民“怨恨之心”，“满藏胸腹”。因此，他认为，只要加强教育和训练，农民则如“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迎风施威，将不能或遏了！”^①再次，宣中华指出革命知识分子是工农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认为一批大中学校的爱国知识青年，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知识，有能力，又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到民间去”宣传与组织工农革命力量，是实现革命“最妥当”、“最有力的方法”。特别是乡村里的小学教师，要做“农民运动的中心人”^②。宣中华还认为除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之外，工业后进国的小商人，也因受侵略者压迫而破产，“不久佢〔他〕们不能维持生计，而补入无产阶级队里”^③。“后进国底国民，无论游牧、渔猎，强大国家的资本家，均能以生产品的销行力去剥夺佢〔他〕们，使佢〔他〕们成为被损害者，使佢〔他〕们转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④因此，这些人都将是“解脱外国人的羁鞭”^⑤的巨大力量。

（四）围绕召唤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命题，宣中华强调了对那些还不觉悟的人应该进行教育，使他们认清一切“新生机”的到来，是要靠自己努力的，“要享受新幸福，还是赞助孙先生。不把这点先弄清，东拥西推，结果是得些病

①宣中华：《农民与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②宣中华：《中国的教育者》，《责任》周刊第5期，1922年12月25日。

③④⑤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苦，形成了对方人地位、权利的增进，把生命空交托给他们。”^①宣中华还警告了那些改良主义者，切勿再陷入妥协的泥潭。

宣中华这些文章是当时沉寂而黑暗的社会里怒放的一朵革命火花。这些文章使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胞弟宣中禅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反动当局赶忙实行镇压。宣中华遭反动当局通缉，《责任》集稿发行负责人徐白民和魏金枝等被反动警厅拘禁一月余，后被驱逐出境，《责任》周刊只出了十五期就遭反动当局的查封而夭折。

一九二三年秋，杭州党组织根据宣中华一再申请入党的迫切要求以及他为党的纲领奋斗的一贯表现，由徐梅坤（徐行之）等两人介绍入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②。从此，宣中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崭新面貌，更积极勇敢地走上了新的征途。

先锋战士 致力统战

一九二四年初，宣中华服从党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在杭州做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中华作为浙江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①宣中华：《新生机形成的新幸福》，《责任》周刊第7期，1923年1月8日。

^②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会后，他以国民党筹备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和国民党“一大”精神，来回于上海、杭州之间，奔波于浙江各县市，认真负责地进行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各级党部的工作。在宣中华等努力下，临时省党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宣告成立，宣中华被选为九个临时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宣中华等便着手领导各县市开展建立党部的工作。杭县、肖山、宁波、绍兴四县市临时党部先后成立，平湖、海宁、临海、永嘉等县筹备员也先后派出。但筹建省党部的工作因遭到沈定一^①的破坏，使正式省党部迟迟不能成立。至于建立各县党部的工作，由于宣中华团结国民党左派，克服种种阻力，故仍陆续成立。到国民党“二大”时，浙江已有二十三个县有国民党的组织，大量的工农分子和青年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员人数约二千”，这就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②。

为了加速革命的步伐，宣中华对宣传工作也极为重视。临时省党部一成立，即以《杭州报》为机关报；并办了《浙江周刊》，每期印发四千份，逢“五一”、“五四”等纪念节日或重大集会时，则印发上万张传单，唤醒人民，鼓动人民起来奋斗^③。

^①沈定一即沈玄庐，原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的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②③}宣中华在国民党“二大”上所作《浙江省党务报告》（1926年1月），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4期。

《浙江周刊》自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第一期出刊到八月十七日第十一期停刊止，共发表了宣中华撰写的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批判时政，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的短文。如《外国人送给我们的好处》^①一文，谴责了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让“中国海关的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凡是他们所愿意加给我们的祸害，都任它进来，凡是我们可以得到利益的一切，都受他们阻碍。”文章号召国民起来，“我们运动海关收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计，也当奋勇兴起的收回租界地，以保全领土与国权！”

宣中华还善于演说，深入浅出的说明革命道理，给人以鼓励。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到会者“不绝于耳”的“鼓掌之声”，被认为是一篇“对国民革命意义，发挥尽致”^②的演说。

宣中华不仅是推进革命的优秀组织者、宣传家、鼓动家，而且也是发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实干家。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卢永祥，他是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的人，而皖系军阀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击溃后，实力大大削弱，卢永祥所部也就成为一支极为孤立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广东政府有所妥协，使浙江的国民党有公开活动的条件。一九二四年五一节的纪念活动，是统一战线形成后第一次用国民党旗帜公开进行的。纪念大会在宣中华主持下召开。这一天，浙江省各工厂及各日报馆、各印刷公司一律停工，下午一时半在湖滨运动场露天召开大会，各团体工人到会者二千数百人，每人拿着纸

① 《浙江周刊》第6期，1924年7月6日。

② 《越铎日报》1924年6月24日。

旗，旗上书写着“打倒军阀、消灭帝国主义、倡造世界和平、工人参政、男女工资平等、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会场内散发了传单，说明纪念活动是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筹办的，会上的报告向工人宣传了五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劝告劳动同胞，为五一纪念之运动”。会后举行了游行^①。九月七日，是“辛丑条约”签字的日子。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这一天在公众运动场举行“九七”国耻纪念暨浙江人民反曹（曹锟）、吴（吴佩孚）大会，由宣中华主持。会后，宣中华、安体诚、查人伟、俞秀松、王贯三、倪忧天等率领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前进。经过金沙港时，由于对北洋军阀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大臣王克敏的家祠捣毁了，“将栗主^②七块取出，抛弃湖中，随波流去”^③。

正当浙江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之际，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在全国反曹、吴的浪潮中，原孤立于浙江的卢永祥也趁机打起了反曹、吴的旗帜。曹锟、吴佩孚遂指使江苏的齐燮元向浙江的卢永祥发起进攻，九月爆发了江浙的齐、卢战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混战，以卢永祥失败而告终。浙江的政局在孙传芳的控制下极为反动，宣中华及其他革命党人均遭通缉，国民党党务工作也只好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我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一次号召召集国民会议。在党的号召下，全国更广泛地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

① <申报> 1924年5月2日。

② 古代用栗木做的神主，后世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

③ <申报> 1924年9月10日。

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十二月四日宣布成立，宣中华、安体诚等都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①。一九二五年三月，宣中华与张秋人到绍兴视察党务，要求国民党党员广泛地积极地宣传孙中山北上为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两大政纲的目的和作用^②。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宣中华这时既是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又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交际科的交际员、中共杭州地委党团书记，还担任上海海员工会党团支部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区委正式成立后，他又担任闸北区委书记。这期间，他时而接受上海地委的指派搞调查工作；时而又回杭州指导工作^③。他根据党的“四大”精神，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不畏危险，即使在到处都张贴着对他的通缉令的情况下，也泰然处之，继续频繁地来往于上海、杭州及浙江各县市。宋云彬怕他出危险，曾劝他“不要太冒险了”，他却笑着说：“什么叫危险呢？我们如怕危险，何不回家去做垂堂的千金之子，何苦挂着革命的招牌来自欺欺人。”^④他到肖山视察党务工作时，他的老同学张柳生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休息，他说：“他人在流血或在牢中受磨

①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浙江地方革命史大事年表》，1961年12月。

②中共绍兴县委党史资料研究小组编：《中国共产党在绍兴地区革命斗争大事年表》，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③《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7、9月几次会议）。

④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难，我能休息吗？消瘦点算什么。”^①宣中华的个人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据当时与他家同住上海闸北联威里的吴文祺回忆说：“冬天他们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躲在被子里。”宣中华也有过孩子，但由于他和爱人吴先清都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管而夭折了。

一九二五年，震惊全国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地委当晚召开会议，决定宣中华回杭州工作。六月一日，宣中华在杭州省教育厅召开的教育会联席会议上报告惨案经过情况后，指出：“此次斗争并非为个人”，而是“为救国而牺牲”，号召学生及各界“应多起来救国，起来援助上海被惨杀的同胞”^②。到会者情绪个个异常激动，对帝国主义制造惨案无不愤恨万分，当即成立了杭州学生援助上海同胞反抗外人惨杀会，选出了临时委员，起草通电及宣言，并与总商会等团体接洽。二日上午继续开会，制订了行动口号：“支援‘五卅’惨案，为顾正红报仇，实行‘三罢’，反对帝国主义”，并决定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在我党推动下，青年协进会立即响应，召开紧急会议，“省议会亦以此事开谈话会，决定浙江三千万人民为后盾，援助一切。”^③三日上午，在公共运动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的有九十余所学校，一百多个团体，人数在三万以上。大会发言一致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以保国体，藉平众怒。”认为“声援不仅是学生与工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局问题。”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

^①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②③}《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到午后四时才散会^①。

宣中华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不辞劳苦。国民党决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中华仍被选为浙江省的三个代表之一，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委托，负责做长江流域的代表们的联络工作。经子渊（经亨颐）也是浙江代表之一。他见国民党派系林立，左右派矛盾日趋尖锐，原想不去参加大会。宣中华请张柳生劝其参加，未得同意，便亲自前往相劝。张柳生对宣的作法不理解，宣中华说：“革命本来要自觉，他犹豫可不必相强，但经先生在教育界有威望，对青年的号召能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他平素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得拉他过来。”^②经过工作，经子渊决意去广州，但到了上海又被戴季陶、刘大白拉住，国民党组织部知道后，拟以宣中华接替经子渊做中央执行委员，但宣坚决不同意，仍推经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宣中华的行为是对的，在宁汉分裂时，经子渊在武汉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经曾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共产党也得到过他的帮助。

革命左派 反对右派

浙江的国民党组织一开始就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左派是工农人民大众利益的代表，以宣中华为首；右派是地主、买办利益的代表，以沈定一为首。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沈定一在肖山衙前镇自己家里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

① 《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② 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

行委员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参加的除了委员之外，还有嘉兴、肖山等十几个县的代表。会议名义上是“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①；并选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质上是企图通过会议来“统一”委员和代表的思想，以达到在组织上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确立以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领导地位，使浙江临时省党部倒向逐渐形成的“西山会议派”。因此，在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戴季陶、沈定一从会议环境一直到会议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戴、沈为了控制会议，对参加会的左派搞突然袭击，临时通知到会，企图造成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毫无准备，难以对付局面的窘境。他们还以安排生活为借口，把到会者混在一起睡统铺，集中在一个饭厅同时进餐，甚至对会议以外的休息时间也加以控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并主持会议的戴季陶，表面上装出一副特别可亲的姿态，集合大家听他讲故事、唱日本歌，妄图对到会者进行拉拢。他们这些做法，给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议期间进行联系、商讨问题确实造成了困难。但是宣中华等毫不畏难，仍然用巧妙的方法交换意见，然后分头联系；在会议上对突然提出的问题，作主导性的发言，以作为同志们进行斗争的依据，所以，即使遇到突然袭击的问题，也能应付自如，斗争得非常有理、有力。

在讨论大会宣言时，对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要不要坚持三大政策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戴季陶等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仁爱本性”，反对阶级斗争学

^① 《肖山月刊》第1号，1926年10月20日。

说；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等等。对此，宣中华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坚持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由于戴季陶和沈定一对会议的控制，特别是他们组织了肖山等代表在会议上帮腔，再加上沈定一专横的组织手段，停止驳斥他们谬论的代表的发言权^①，致使会议上的正确意见均遭否定。有的代表忍无可忍，中途退出会议。后来，恽代英、瞿秋白等著文批判了戴、沈等人的谬论。

会议在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人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阴谋排挤宣中华，企图代之以自己的侄儿沈肃文，以便在组织上控制浙江省党部。为此，沈在会前就散布宣中华“不可信”的论调，说“你们再也不要相信宣中华了，他是共产党，他受第三国际指挥，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②当宣中华由上海赶到肖山衙前参加会议时，沈定一就派人监视^③。当讨论代表人选时，沈定一说什么“要熟悉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问题，谈一两个钟点的话没有一句重复，才是代表的人选。”接着，毛遂自荐地说：“这种人选有没有？有——沈定一。”这时，宣中华态度从容，但又毫不妥协地说：“我同意沈定一同志对他自己的提名，但我们要选出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注意各个方面的条件。”^④到会者均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意见，一致表示赞同。这一来就制止了沈定一企图包办选举代表的阴谋，也缓和了对立面对宣中

①潘念之：《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2），1980年1月出版。

②③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④顾作之：《大革命时期浙江革命运动回忆琐记》（1977年1月），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华提名的抵触情绪。结果会议按党团提名，选出宣中华等三人为代表，沈肃文落选。

但是，当时浙江临时省党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沈定一的手中，他仍以首领自居，与北京的“同志会”（即“西山会议派”）取得联系，同广州的国民党左派对抗。继七月五日“衙前会议”后，沈定一又于九月四日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复选国民党“二大”代表的会议，千方百计要挤掉宣中华，换上沈肃文。他采取了事先对支持宣中华的县市党部施加压力，停发选举活动经费^①等卑劣手段，但目的仍未达到，复选结果，当选者依然是原来所选的宣中华等三人。

沈定一等的阴谋破产后，又生一计，将临时省党部迁移，在报上公布“省议会前一号（原省党部办公地点——引者），非本党机关，希各界注意”的启事，并大肆攻击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十月，沈定一与邹鲁等接洽妥当后，公然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宣中华在党的指示下，组织浙江省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同志进一步推动反右派的斗争，以阻遏反革命逆流。

自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沈定一开始向右转以来，宣中华即坚持不渝地与其斗争。“衙前会议”上的斗争结束后，在自肖山回杭的船上，宣中华又与同舟的代表共同揭发了戴、沈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有同志担心他与沈定一过去的关系，乃问宣中华：“你和沈玄庐（沈定一）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玄庐决裂。”宣中华当即斩钉截铁地说：“我为革命和玄庐合作的，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

^①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9月8日），存上海档案馆。

党。”“他敢于反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①九月八日，宣中华出席了中共上海地委全委会，在会上详细汇报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内左派与沈定一为首的右派斗争的情况，以及各县市党部要求成立正式省党部问题。全委会对浙江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宣中华回浙后，按地委指示，“以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和组织各种会议，广泛地进行工作，积极联合各县市党部，与沈定一的右倾活动作斗争，并揭露其个人丑史，以削弱他在青年中的影响。十二月初，宣中华等以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名义发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破坏统一战线之种种阴谋活动，电文指出：“沈定一把持浙省党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非法会议通电，且遣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引者）十四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党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②

十二月十五日，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在海宁硖石镇东山公园召开。宁波、镇海、慈溪、绍兴、诸暨、金华、海宁、平湖、湖州、嘉兴、永嘉等县市派出了代表，只有肖山、浦江在右派把持下，没有代表。两天会议均由宣中华主持，通过了两个决议：（一）自联席会议具名发出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二）否认被沈定一所把持的原有省党部，成立浙江省各县市

^①华林：《烈士宣中华传略》（未刊稿），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②《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

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准备浙江省代表大会，以便成立正式省党部。“东山会议”不仅动摇了沈定一的势力，也使西山会议派企图以上海和江浙两省为基地来对抗广州的计划成为泡影。“会后，立即筹备经费，设机关于杭州头发巷十五号，并出定期刊物——《浙江周报》为机关报，以指导各地同志努力于发展党员，以固根基，于是浙江党务幸得保持。”^①这些措施不仅给右派以沉重打击，而且在实际上宣告了浙江西山会议派的垮台。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中华作了《浙江省党务报告》，叙述了浙江国民党左派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全过程。国民党“二大”命令解散沈定一把持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批准了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代行省执委会职权。至此，浙江的西山会议派在组织上也被解散了。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沈定一等右派分子并不罢休。他们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非法召开浙江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企图成立所谓“正式”省党部。针对沈定一等人的非法活动，在国民党中央批准下，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沈定一向军阀当局告密，迫使宣中华离会暂避，但会议仍顺利进行，并选出宣中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查人伟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宣中华、潘枫涂、丁济美为常务委员，领导省党部工作，王贯三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仍设在头发巷十五号。这时沈定一虽仍在小车桥挂着“省党部”的

^① 《浙江省党务报告》，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4期，1980年7月20日。

牌子，但这个右派机关，上面被国民党中央所否定，下面得不到基层组织承认，没有群众支持，没法活动，仅是一块空招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对于宣中华在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曾将他与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相提并论，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赞扬^①。

坚强战士 迎韧而上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宣中华为推进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力量，致力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群众工作，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根基扎实，为日后北伐军在浙江省的胜利进军铺平了道路。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共同筹划，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掀起了浙江人民自治运动的高潮，促使浙江省长夏超举兵反孙（孙传芳）。后来夏超独立虽告失败，但仍给孙传芳以沉重打击，促成了江西战场上孙传芳主力的溃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分二路入浙：一路由福建入浙，经温州北上；另一路由江西入浙，沿浙赣路经衢州北进。在北伐军进军浙江的过程中，宣中华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他布置一部分人从上海回到杭州进行地下工作；派张寅仲、童志沂等组织

^①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宣传慰问队，沿途发动群众；自己则组织省党部代表团从宁波赴温州接应北伐军。他到温州的当天晚上，就与永嘉县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党务工作和迎接北伐军事宜。此后，他随北伐军由金华到杭州，所到之处均号召各地党部组织群众支援北伐，使北伐军沿途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一九二七年二月，东路军十七军军长曹万顺（共产党员）率领政治部熊士超抵温州，由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盛大欢迎会。二月十七日，东路军政治部主任胡公冕先进杭州城，隔了二、三天何应钦也到杭州。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据《浙江民报》报道：“近月来，杭州各工会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怒茁丛生”^①。

正当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向前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际，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活动也日益加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东路军开始由闽、赣两路进入浙江时，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与各地省党部商定省政府名单，宣中华专程赴南昌与蒋介石面洽省政府设施和人员安排问题，决定省政府设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浙江分会，作为决定政策方针和重大工作计划的机关，张静江为主席，暂由蔡元培代理；一个是政务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主席张静江，暂由褚辅成代理；一个是财政委员会，作为管理财政金融的机关，陈其采任主席，暂由周枕琴代理。由于浙江是江浙财阀的基地，也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老巢，又紧靠帝国主义侵华势力高度集中的上海，因

^① 《浙江民报》社评，1927年3月14日。

此国民党右派集团千方百计地在浙江安插党羽。蒋介石委任老右派张静江为省主席，周凤岐为军事厅长，任黄埔同学会骨干王俊为宁台温防守司令等等。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阵势摆开。宣中华早就估计到，浙江是国民党右派必争之地，“他那时（指一九二六年十月——引者）已经看出蒋介石必叛，老朽昏庸的张静江一定要做革命的叛徒。”^①面对这一严峻的斗争，宣中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出席了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后，在上海区委指示下，更坚强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宣中华立足于发展、巩固左派力量，争取地方绅士、中间派，以国民党组织为工具，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与右派集团搏斗。当时尽管国民党右派集团竭力夺取浙江省各个部门的权力，但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均以左派力量占优势。正如马叙伦所说：“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指宣中华、潘枫涂——引者）许可就成了决议”^②。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杭州克复后，原来设在宁波的临时省政府、省党部均由宁波迁回杭州。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省党部于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会议，重选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宣中华仍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主持省党部工作。这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进一步猖獗起来，他们以军队来控制局势，特别加强了军队对政府机关的控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浙江增设了两个反动机构，一为东路军总指挥部杭州行营，主任罗为雄；一为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驻杭办事处，

①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②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转引自潘念之著：《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2）1980年1月出版。

主任葛武梁。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三月十日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他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在开幕词中尖锐地指出：“目前普遍之现象，是许多投机分子来附和革命，这是很危险的，假使我们若没有毅力继续奋斗，我们的党便要破产，辛亥革命之失败，便是先例，希各位同志注意此点。”^①此外，省党部办了党务人员养成所，由各县、市派出几百名青年集中受训，以提高战斗力。省党部还派出党务特派员和政治监察员到各县进行工作。所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都起了积极作用。三月中旬，金、衢、严、处四府工界同乡会（原为沈定一组织）的头目杜震梦在公安局指使下，组织所谓杭州职工联合会，与杭州总工会对抗。为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这一组织的成立。三月二十八日，宣中华根据省党部的决议，函请省政府转令杭州公安局，解散这一组织。二十九日省政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宣中华的提案。三十日，职工联合会以省党部函请解散该会为借口，在当局支持下，集会闹事，他们直奔城头巷杭州总工会驻所进行挑衅捣乱，打伤数十名工人；后来又转到省党部，企图捣毁省党部。宣中华刚强果敢，指挥工作人员集合在机关大门内，严阵以待。由于早有防备，暴徒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事后，杭州总工会连夜邀请学生联合会、总商会、律师公会、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开会，决定自三十一日起罢工、罢市、罢课。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于三十一日上午，集会游行，抗议当局支持职工联合会的暴行。罗为雄、章烈（公安局长）竟下令向游行的工人队伍开枪射击，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死伤多人，并抓去二三十人。事态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宣中华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并派王贯三（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秘书长）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报告。他在杭州也作了一些安排，要求工会、农协、学生联合会加紧发动民众团体，与反动当局斗争。

三月底四月初，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集团更加紧其叛变革命的活动，把一军内有“左倾迹象”的各师调离，而把亲信调驻南京和沪杭、沪宁路上，叫嚣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①，并下达了“东南已光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②的密令。三月底，张静江突然来到杭州。他名为主席，却不到省政府办公，连省党部派人专程看望也不接见，住在西湖的新新旅馆和一些右派分子策划反共活动。四月六日，本来驻在淞江的松沪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兼浙江军事厅长的周凤歧也赶到杭州，并于八日调遣两营士兵进抵杭州。九日，杭州职工联合会在公安局指使下，发出“有第二次举动”的叫嚣。至此，国共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不朽烈士 血沃中华

四月上旬，杭州公安局长章烈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的“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后，于十日回到杭州，深夜宣布戒严。十一日上午，他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偕同职工联合会的流

①《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②浙江医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浙江“四·一二”纪实》（1981年4月）。

氓打手，分路向省党部、总工会、市党部、学生联合会、杭州《国民日报》等机关团体和一些预先侦知的活动分子的住宅进发，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整个杭城顿时陷于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和损失。

“四·一一”事变发生时，宣中华在家中及时得到潘枫涂（潘念之）的通知，立即隐蔽到华挺生家中，得以脱险。宣中华虽身避华家，却一心想着革命。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上海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杭城事变详细经过。中共杭州地委仔细地讨论了宣中华提出的要求，认为宣中华平素都出头露面，留在杭州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离开杭州是必要的，决定同意他的要求，并派专人秘密护送他去上海。

四月十三日夜，宣中华来到沪杭甬铁路工会负责人薛暮桥家，共同商讨了赴沪具体安排。十四日清晨，宣中华去掉眼镜和两颗假门牙，乔装打扮成铁路列车长，在沈乐山（共产党员，铁路总工会纠察队长）、方仁郎（共产党员）两人护送下，由艮山门车站乘坐货车赴沪。当天下午，他所乘货车抵达龙华车站装卸货物。此时，龙华也处于蒋介石反革命大搜捕中。由于宣中华找组织心切，决定下车步行去上海。就在他穿过桃树林，向租界区走去时，不幸被特务逮捕。

宣中华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以为可以从宣中华身上打开缺口，一举破获中共江浙各地党的组织。四月十五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等迫不及待地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提审宣中华。在受审时，宣中华态度从容，不时发出蔑视敌人的笑声。反动法官审问说：你是宣中华，是浙江共产党的头子，是国民的祸首，应该交代党组织的情况和这次去上海的目的。宣中华坦然答道：“你们既然知道我，也不必多罗嗦，你们喜欢怎么

就怎么。至于国民的祸首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是中山先生的叛徒！”^①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从没说过一句有损于党的话。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手段，他声色俱厉地说：“还是收起你们这一套吧，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于度外。”“既入恶魔手中，听凭处置，不必多说。”^②敌人对宣中华进行了整整三天的轮番“审讯”，但在宣中华身上始终一无所获，于是决定杀害宣中华。宣中华宁死不屈，正言厉色地说：“你们杀了我无非只不过一个宣中华，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会来杀你们的，走死路的是你们。”^③他还正气浩然地说：“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④四月十七日深夜，宣中华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他的生命虽然如此短暂，但他那“煤块”精神^⑤，永远在激励着革命者勇敢地投身于革命的大洪炉。

①③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

②④徐白民：《宣中华烈士事略》。

⑤意思是说，“煤块”如果埋藏在矿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燃烧成熊熊的烈火才有价值，人也只有投身于社会的大洪炉，燃起革命的烈火，才能发挥人生的价值。（见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马 骏

肖 华

叛逆旧世道的回族青年

马骏，又名马天安，字通泉，号准台，绰号美髯公。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二日，出生在原吉林省宁安县城宁古塔（现属黑龙江省）的一个回民家庭里。在一兄一弟三个妹妹的同胞六人中，马骏排行第二。母亲是个农村妇女。父亲马喜贵是个一字不识却颇有办事能力的农民。早年，马喜贵曾因摆弄机器受到当地绅士的申斥，后来，自己办起了火磨坊（机器米面厂）。清末民初，马喜贵又在俗称东下洼子的宁古塔二百多户回民中，领头办起了清真两级学校。到了马骏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比较富裕，号称“元和盛”的马家烧锅已颇有名气。为了生存、竞争和不受排挤，马喜贵决心培养一个能继承家业的孩子，因此，积极供养次子马骏上学读书。

一九〇三年，马骏入私塾读书，后来，入清真两级学校。少年时代的马骏聪颖好学，谈吐流利，功课极好，很受师生的钟爱。亦因宁安地邻海参崴，靠近中东路，常有俄人出入，所以，马骏从小就能说些俄语。借此，他常送乡亲们去搭乘俄人管理的火车，自己也经常出没在铁路沿线，从而，较早地接触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他又从自身的家世和农民贫困的景况

中，看到了民族的不幸，目睹了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和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所有这一切，都在马骏幼小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少年时代的马骏，对现实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当时旗务学堂只收满族的子弟入学，马骏主张清真两级学校打破民族界限，招收汉族等各族子弟入学。

一九一二年，马骏去省城吉林一中读书。第二年，十七岁的马骏在家乡宁安参加并领导了有名的抵制日货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已表现出了他的讲演天才和组织才能。一九一五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那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难当头，群众激愤，马骏和周恩来等同学奋起抗争，成为南开中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该校第十三次毕业班同学录中，有马骏身穿制服的半身像，下注：“马君骏，君性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本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他给南开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度假期间，马骏回到家乡，在清真两级学校、清真寺等处召集群众，宣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领着学生在街头巷尾高唱《勿忘国耻歌》，还穿上长袍马褂，亲自导演了新剧《一念差》，讽刺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很受宁安群众的欢迎。他还在省立四中的毕业式上，作过题为《中国现代青年学生出路》的讲演，把中国比作一只老绵羊，列强们都来宰割。反动政府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送给外国人，要想收回这些土地，就得人人爱国，青年学生念书求知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中国，指出青年为国为民挽救社会的责任。事隔几十年后，当年听过马骏演讲的人，回忆起来“仍感

人声俱在，深受教育。”^①

青年时代的马骏就对封建礼教甚是反感。他曾在回族的“尔代节”时成立一个“节俭会”，以马家“元和盛”的“债台高筑，入不抵出”的前后变化，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工业的存在和人民生存的不易，号召人民破旧立新，废除婚丧嫁娶中的陈规旧习。他结婚时，就采取了文明结婚的新仪式。马骏这种反封建礼教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力支持。马骏夫人杨秀蓉回忆说：一九一九年我和马骏结婚，“周恩来送给我们两个镜框，两条毛哗叽的被面。马骏还带来了‘老同学’恩来的嘱咐，婚礼从简，破旧立新，不行大礼，不讲排场，废除宗教礼仪。我们都照着办了。”^②举行婚礼的那天，他们没有跪拜，只对证婚人、教长和男女来宾三鞠躬。马骏说：“清朝灭亡了，我们不再受气了，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还保留下来？跪拜礼是对我们人格的一种侮辱。现在的中华民国，许多制度都在改变，诸位也许不相信，将来整个世界也要变，社会也要变。”他还以古今服装变化为例，生动地论述了事物变化和人们习惯的形成得有个适应过程。马骏的言行，使得有守旧思想的人目瞪口呆，而给同时代的青年人树立了移风易俗的榜样。

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东方革命的进程。在世界革命的

^①韩伯璋回忆录，未刊稿。

^②杨秀蓉：《情深似海 恩重如山》，《宁夏日报》1977年1月7日。

号召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斗争。这就是永垂史册的五四运动。

当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天津学生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五月七日，十五所中等以上的学校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马骏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①。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中等以上学校举行总罢课。六月五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了数千人爱国运动大会，马骏在会上带领大家高声宣读《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会后举行了示威请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

六月九日，马骏领导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学生斗争的公民大会，天津各界民众二万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天津“河北公园”，公园的中心亭子为中心会场，两侧的明柱子上贴着“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的大幅对联。马骏在中心亭子会场致开幕词、报告了大会的意义，要求天津商界罢市，配合全国的“三罢”斗争。接着，二十多个分会场分头进行讲演活动。马骏作为公民代表，率众赴总商会，敦促商人罢市。天津总商会立即召开行会董事紧急会议，“决定于六月十日罢市，同时通电北京军阀政府，并布告全体工商业罢市。”^②

^①白眉：《五四运动在天津》，《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67页。

^②夏琴西：《天津商业两次罢市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4月版，第171页。

这时，亲日派军阀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闻讯出来破坏。他亲自打电话责问天津总商会秘书长夏琴西，还威胁说：撤出岗警不负责治安。马骏得知后，亲率“童子军”出动，担任义务警察，使敌人的威胁未发生作用。于是，十日开始罢市。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说：“栖息于津埠之劳动人民，不下数十万，已有不稳之象”。军阀政府见到传来罢工信号之电文，慌忙“派参议曾毓雋星夜来津，持大总统徐世昌罢免曹、陆、章职权命令到商会宣布”^①。在省长曹锐亲自陪同下，曾毓雋说服商会。这样，在一些亲日分子的鼓噪下，商会董事召开紧急会议，公布十一日开市。

开市的布告刚刚发出，马骏便闻讯赶来，随后，青年学生和商民万余人迅速包围了商会。马骏当场质问商会为什么出尔反尔？指出曾毓雋、曹锐宣布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罢市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绝不应罢休。在马骏义正词严地斥责下，商董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马骏列席。会上，马骏首先发言，他说：“公民大会公决罢市，为的是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曹、陆、章及通令保护爱国学生，今仅免去曹、陆、章等职务，对于他们的卖国罪行则未依法惩办，关于通令保护爱国学生中央并无明文发表，因此，我们的罢市目的未能达到，即行开市显然违背公决原案。应再罢市，非达到目的不能罢休！”^②对马骏的罢市理由，会场上的人多表同情，惟有一姓张的董事在旁讽刺说：“马先生，你是贵处人？”“天津有否财产？”然后，又微微讥笑说：“莫怪马先生不知道罢市商业损失太大！”马骏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愤然痛斥说：“鄙人是吉

^{①②}夏琴西：《天津商业两次罢市纪要》。

林人，天津固无财产”，“现在外交紧迫，一发千钧，国家将亡，那还能说到个人财产。我在天津固无财产，但我有生命，情愿牺牲，以谢国人。”^①说完，便起身离席向会议厅的明柱子撞去，幸而被秘书长夏琴西当场抱住，才免出危险。马骏不怕牺牲生命，表示爱国，使在座商董甚为感动，全场起立，说：“马先生莫急，我们赞成第二次罢市！”于是，秘书长赶快起草布告，再行罢市。

六月十六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天津选派马骏为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六月二十日，马骏写信给周恩来转达沪上情况和学联的中心任务，嘱咐天津学联誓死斗争，坚持到底。不久，马骏复返天津，和周恩来一起积极筹备创办天津学联日刊，还热情地邀请和委托周恩来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当时，办报经费紧张，马骏和周恩来等便带头演新剧募捐。

鉴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马骏为总代表，率天津代表郭隆真、刘清扬等十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三十余人，于六月二十七日晨五时，到新华门前，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不肯接见，马骏气愤地对大家说：“如果徐大总统一天不接见，我们的队伍就一天不散，十天不接见，我们就在这等十天，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②他们的请愿斗争接连进行了两天。在学生代表的压力下，徐世昌不得不于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接见了请愿代表。代表们由新华

^①夏琴西：《天津商业两次罢市纪要》。

^②仲草：《冲破黑暗的雄鹰——马骏同志》，《北京日报》1980年5月3日。

门前，“被带进怀仁堂大厅里，围着一张大方桌子坐下，只留下北面的一个空位子，身后团团站着森严的警察。不一会，徐世昌摇把扇子，穿一身纺绸短褂阴沉沉地出来，在空位子坐下。”^①马骏沉着地站起来，非常严肃地指责徐世昌，说：“你身为大总统，就有责任保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你必须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全国学生和人民都愿意作你的后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全国人民誓必斗争到底！”^②“我们绝不允许肮脏的巴黎和约，把我国的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尤其是所谓二十一条密约。必须否定，……在国际会议上绝不能签定任何密约，以免丧权辱国……。”

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工人的积极斗争下，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不久，传来了山东镇守使、山东戒严司令马良，杀害回教爱国会会长马云亭等领导人，并捕去大批学生的消息，使马骏极为愤怒，痛斥“马良真是回族中的败类！”于是，他联合回族同学刘清扬、郭隆真等一百多人，到天津最大的清真寺——清真北寺，集合阿訇和回族民众，宣讲马良的罪行，并就国家、民族、宗教等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使大家听了心悦诚服。

八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山东惨案，派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十人为代表，汇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十五人，于清晨齐聚总统府前请愿。代表们递过请愿书，要

^①刘清扬：《忆马骏》，《民族团结》1958年第2期。

^②仲草：《冲破黑暗的雄鹰——马骏同志》，《北京日报》1950年5月3日。

求惩办马良。经过一天的斗争，支持学生请愿的群众越来越多。但是，反动政府也开始了镇压。在太阳西坠的时候，军警和穿黑大褂的便衣，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晚，代表们被押到京师警察厅，送进了拘留所。

正当天津各界人民和天津学联焦急地等待着代表们请愿的情况时，长途电话里传来了代表们被捕的消息，马骏立刻抓住电话耳机，急得当场跳起来。这时，周恩来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好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①马骏和周恩来商量，准备组织队伍，赴京营救被捕同学。《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发了号外，鼓舞大家起来斗争。当时，反动政府已更加露骨地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第二次请愿代表全部被逮捕，反动政府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还扬言，要全部枪杀这些代表，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巨大愤怒和强烈抗议。马骏深知这次责任之重，便亲自带领代表千余人再次赴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纳得下这些人。”^②

八月二十六日，马骏被津京等地学生代表公推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率领津、京、鲁和唐山、烟台等地请愿代表五千多人，直逼总统府，在天安门前，展开了学生请愿大示威。马骏向大家表示：“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准备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反动政府面对爱国学生，心惊胆颤，如临大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新华门前，

^{①②}刘清扬：《觉悟了的天津人民》，《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535页。

道道防线，一片杀气；总统府内，四门紧闭，虎视眈眈。由于反动当局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几千名学生云集在新华门前不散，前来助威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反动军警开始镇压了，学生、群众被赶到天安门金水桥一带。马骏把几千人的队伍编成若干个讲演分队，分头在指定的地点讲演。刹时，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座、华表座等一切高台，都变成了人民爱国斗争的讲坛。马骏在人丛中高喊：“同胞们，我们要誓死奋斗！不当亡国奴！”群众高呼：“绝不屈服！”“释放被捕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请愿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天三夜，学生、群众情绪激昂。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决定逮捕领导人马骏。军警“在天安门内循环三圈，亦未拿获马骏”^①，便恶狠狠地用皮鞭和枪托殴打学生，威逼大家交出马骏。大家为了掩护马骏，忍受着毒打，谁也不肯说出自己的领导人。马骏不忍心同学挨打。他挺身而出，站在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面前，高声呼喊：“我就是马骏，你们不要打人！要逮，逮我好了！”敌人扑了上来，当场将马骏逮捕。

“警察把马骏拉到天安门门洞，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要他宣布解散学生队伍。马骏泰然自若地对同学说：“我们此次来，就是抱定牺牲决心的。我虽然被捕，不必恐惧；坚持斗争，一定会胜利。逮捕一个，便会激起十个、百个、千个爱国者。爱国者是逮捕不完的。”敌人又对学生们威胁说：“你们的队伍如果不解散，立刻就枪毙马骏。”学生们坚决地说：“我

^① 《杨华俊等关于在天安门逮捕马骏强行解散请愿团的经过报告稿》，载中国第二档案馆主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1980年2月出版。

们是马骏带队来的，如果不是马骏带队回去，我们一个也不走！”

这次斗争的消息传开，全国震怒，抗议书纷纷飞向北京。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等为营救被捕同学，也来北京。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反动当局终于在八月三十日，释放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从此，他那身穿长衫、激昂讲演，五四运动中大闹天安门的光辉形象，便镌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称颂他为“马天安”。

九月二日，天津请愿代表胜利而归。前来营救二次被捕代表的周恩来等人，也同车返回天津。一路上，郭隆真、张若名、关锡斌、周之廉、李锡锦、郑漱六、谌小岑等欢天喜地地谈论着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斗争情形，又讨论起爱国运动的方向问题。大家商量着“学联”和“女界”的合并，孕育了觉悟社的雏形。九月十六日，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二十名男女青年，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了觉悟社的正式成立。

觉悟社出刊了《觉悟》杂志。在《觉悟》第一期上，刊登了马骏写的署名“廿九”的两首寓言诗——《他们为什么不去？》和《一个小蜘蛛》。他以蜘蛛织网“永远不息地努力！努力”等诗句，赞美蜘蛛不知疲倦的顽强精神，鼓舞人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坚信未来一定会胜利。

这年九月，马骏“代表京津学生到上海进行活动”^①，参加了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十一月一日，在上海北

^①刘清扬：《五四运动中的马骏同志》，《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吉林师大1980年编印。

四川路青年会内，举行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马骏当选为该会驻沪常务理事。会后到租界地游行示威，马骏被推选为总指挥。他还曾几次在阅马场举行三、四万人的大会上，发表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给上海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指使歹徒，枪杀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福州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声援“福案”成立了国民大会委员会，马骏被选为委员，由上海调回天津。翌年一月，天津学联在天津东门内“魁发成”杂货铺调查出私运来的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反动当局竟为虎作伥，于一月二十四日出动军警逮捕了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十二人，又下令查封各爱国团体，禁止检查日货，并到处搜捕革命学生。这时，周恩来领导觉悟社成员积极开展斗争，集合了一千多名学生去见曹锐。结果，周恩来、郭隆真、于诸兰、张若名等四位代表也遭逮捕。先后被捕的二十六人都押在一个狱中。为了配合狱中的斗争，给反动当局以压力，邓颖超等学生代表到警察厅要求轮换被押。五月初，斗争初胜，被捕人员被转到检查厅。周恩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翔实地记录了他们在狱中进行的各种斗争。敌人为了离间马骏，曾利用马骏父亲马喜贵探监的机会，引诱马喜贵劝儿子回去读书，放弃斗争。马骏对父亲说：“国家将亡，谈何读书，……倘大家同为救国，理应奋斗到底，如中途止步，必成爱国大众之罪人。我想家父也不愿意我成此罪人。”马喜贵被儿子大义凛然的精神所感动，欣然支持了儿子的行动。敌人还把马骏安排在较好的房间里，企图软化他，但这些并未有动摇马骏的斗志，却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为了争取难友们的自由往来，马骏和周恩来等领导大家进行了绝食斗争，还组织大家

有计划地学习政治、外语、数学和历史。马骏的《演说学》、《警厅拘留中的批评》和《研究问题的方法》等，都是当时在狱中讲演会上的专题报告。五四运动一周年那天，他们在狱中组织了纪念会，周恩来主持会议，马骏报告了天津学运一年来的斗争情况，晚上还演出了《新村正》等文艺节目。为了革命斗争，他们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起来，马骏带领大家作体操。他性格开朗，很少忧愁，“还是谈笑自若，充满胜利的信心。”^①

经过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坚决斗争，反动当局终于在七月十八日释放了全体被捕学生。“这时‘觉悟社’余下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拍了一张照片，就分散到各地活动去了。”在狱中被拘留半年之久的马骏，“释放时胡子长得老长，大家都称他为‘美髯公’。”^②后来，他常以胡须化妆，巧妙地开展革命工作。

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和锻炼，马骏很快地成熟起来，一九二〇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③。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活动在吉林最早的共产党员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即派党员到东北地区工作。一九二二年二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④，从事地下工作。他曾在哈尔滨利用《晨光报》开展

①邓颖超：《回忆马骏烈士》，《民族画报》1963年第2期。

②仲草：《冲破黑暗的雄鹰——马骏同志》。

③谌小岑：《觉悟社及其成员》，《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④安振泰、王子文、张广恩、施玉春：《中共满洲省委组织演变概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0期。

活动，又和韩铁生等人组织救国唤醒团。他是党派到吉林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来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①。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②。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革命的统一战线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这年，孙中山曾派王秉谦、管涤之来东三省宣传他的主张和国民党“一大”宣言。马骏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曾在家乡宁安县领导乡民对汉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当时，宁安地痞孙彦卿、何兴甲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当地森林和镜泊湖瀑布，成立了“旭东伐木公司”和“富宁造纸公司”。牌子刚刚挂出，就被马骏领导的乡民砸碎，并在宁安县戏园子召开了群众大会。孙彦卿吓跑了，就狠狠斗争了何兴甲，实现了群众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从此，宁安县的汉奸、劣绅对马骏既怕又恨，便联合起来贿通了一个姓温的县长，对他横加迫害。

一九二四年九月，马骏离开了宁安来到省城吉林市，在私立毓文中学任教。吉林私立毓文中学，是吉林籍南开学生仿照南开中学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它“毓秀钟灵文明乎地，中材上士学殖其人”，被誉为“吉林的小南开”，曾吸引着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来此活动。毓文中学是私立的学校，当时的反动当局控制的比较松一些，因而，这里就成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

^①参见李廷禄：《艰难旅程》，《上海文艺》1978年第4期。

^②宁安县马骏烈士纪念馆。

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又因这所学校和南开学校的关系密切，校长韩子扬就是马骏在南开时的前期同学，教导主任李光汉也是马骏的同学，这些关系都为他在南开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马骏在毓文中学的活动可分为二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前，他作为毓文中学的校友常来逗留；一九二四年后，他作为毓文中学的教员，担任英文、数学课，兼作训育主任和舍监。马骏的职业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开展革命工作的掩护。他在毓文中学义务任教，不领薪水，后来只领饭费。他常从家里拿钱买书给大家看，组织秘密的读书会，还常带领毓文革命师生，登上风景秀丽的吉林龙潭山和吉林北山等处，借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之机，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畅谈国家大事，把鲁迅、李大钊等人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大家，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以及五四运动的具体情景等。这种“读书会”后来也流行在公立学校中去。马骏不仅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介绍给大家看，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书。当年毓文中学的书店内就卖过他写的革命书籍——《狱中地》^①。针对当时军阀混战的现实，马骏还和学生同台演出了自编新剧《闺里月》^②。

“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句，取材唐诗，描写汉匈打仗时，出征人在战场上死去，老母和妻儿在家中仍思念征人的悲惨情景。马骏成功地扮演了剧中的老妇人，少妇人则是毓文学生田成玉扮演的。他们演得形象逼真，哭得真切动人，以致台下有的看剧的观众也因自己的亲人为军阀混战所征而痛哭失声。那时条件很差，没有

^①李迺庚回忆录，未刊稿。

^②孙宗尧回忆录，未刊稿。

灯光、布景和道具，可是它以情动人，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这种冲破师道尊严的师生同台演戏，和借古讽今的反对军阀战争的内容，在当时的吉林都是创举。马骏还利用周会、节假日和深入学生宿舍的机会，向大家讲解十月革命的道理，传播马列主义；并曾领导师生反对日人修筑吉敦路和天图路的斗争……。他生活朴素，深入群众，很受师生的爱戴。马骏还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开展革命斗争，他曾领导吉林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东京华工运动领导人——王希天（马骏的同学），于吉林斯美茶园召开纪念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①。马骏非常注意作回族同胞的工作，常到吉林清真寺去看望沙海轩老人等，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共合作，南北统一，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等。

一九二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举世瞩目的“五卅”惨案。在党中央领导下，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上海二十万工人展开大罢工，消息传开，全国响应，史称“五卅”运动。马骏领导吉林人民投入了这一运动。

“五卅”前的吉林人民，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吉林地处边陲，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所谓“大陆政策”，妄图通过长大（长春——大连）、吉会（吉林——朝鲜的会宁）两路和大连、清津两港，把吉林变为实现其“两港”、“两线”计划的前沿阵地。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把吉长铁路延长到会宁，中间连接韩国铁路而达日本海”，“吉会间路线，由于日本海有对岛、清津两海峡扼守着，非常安全，由此可以从满洲安全地

^①孙宗尧回忆录，未刊稿。

输入军需物资”^①，以达迅速侵略东北，近而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所以，这里的殖民地化程度尤深。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吉林，在这里筑路、开矿、设厂、增警，很快地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所以，吉林人民仇恨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吉林声援沪案的斗争，便如山洪一样地爆发了。

六月七日，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出宣言，指出：“吉林父老兄弟姊妹万急鉴：沪上同胞，惨遭屠戮。凡我同胞，奔走呼号，以求公理之战胜。查英日两国，号以文明自居，其实外假文明面具，内具蜥蜴之心，其残忍较之毒蛇猛兽有过无不及也……。此次我沪上同胞游行演说，并无额外行为。詎料万恶之巡捕不问情由，公然开枪射击，竟将我同胞击毙七十余名，伤者百有余名。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六月八日，马骏首先领导毓文中学学生起来罢课。接着，他又多方联络，积极发动，为广泛开展沪案后援活动而酝酿成立沪案后援会。他有时电请各校代表，有时骑着自行车亲自前去鼓动，曾先后在省教育会小讲堂、江南农业试验场、公共运动场和江南花园等地，多次召开会议。

六月八日晚，马骏电请各校教职员代表二十多人在教育会馆小讲堂开会，商量联合各界人士为声援沪案死难同胞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六月九日晨四时，马骏联合各校代表在江南农业试验场开会，决定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并以学生会的名

^①参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3—515页。

又发表宣言；还决定十日在公共运动场召开示威讲演大会，下午在江南花园露天开会，酝酿成立沪案后援会事宜。当晚五时，在“省教育局议场为申案交涉特开紧急会议……其后讨论多时议决组织‘吉林教育同人申案后援会’。”^①出席代表四十九人，省教育会长韩石青主持会议，马骏作了讲演，然后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酝酿沪案后援会正副会长。因为韩石青百般推脱会长之职而遭到与会人员的唾骂，马骏和张乃仁被提名为正副会长。当即拟定武鸣周、张乃仁、何利唐等人为起草委员，决定起草章程，发表宣言，还为十日召开成立大会作了四项决定：（一）九日为预备，十日召开成立大会，选正副会长；（二）动员更多的学生参加大会，注意指挥，以免发生意外；（三）争取工商界支援；（四）成立大会召开之日，各校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以示哀悼上海死难同胞。

六月十日，吉林沪案后援会在公共运动场宣告成立。会上选出了马骏、张乃仁正副会长和评议、文书、宣传、调查、交际、庶务、会计七个部的二十二名委员；宣读了章程，通过了宣言。十时许，马骏指挥省城与会各界人士开始示威游行。省立法政学校、职业学校、一师、一中、五中、毓文、女师、女中、各小学及各人民团体共四千多人，手持白色标语旗，以数十辆自行车为先导，浩浩荡荡地走出了公共运动场。经河南街、出大东门到商埠地，由大马路赴省议会；复由省议会入新开门，顺粮米行到交涉署，又到商务总会和省长公署，要求援沪；沿途马骏曾不断讲演。示威游行持续两天之久。对此，当时很多家报纸都做了报道。六月十三日《东三省民报》曾报道

^① 《东三省民报》1925年6月13日。

这天散发的传单上写着：“弱国人民无外交，强权世界无公理。”“希望我国各省各界之同胞急起直追，呼号奔走，以表彰正义与人道。”六月十七日《泰东日报》报道游行人们手持小旗上写着：“英日惨无人道”、“收回裁判权”、“抵制英日输入货物”、“打倒帝国主义”、“同胞起来反抗呵”等口号。报道说：“数十年未有如此之大规模示威运动也。”六月十七日《满州日日新闻》报，咒骂领导“五卅”运动的马骏，是“五四”运动中大闹天安门的“极端赤化运动的元凶”。可见马骏的影响之大了。

六月十一日，天下起毛毛雨，沪案后援会组织学生冒雨举行街头讲演。各校学生遍布全市，每隔一、二百米就设一个讲演点，学生们情绪很高，直到很晚才散。当晚，沪案后援会再次举行会议，作出了十条决议：（一）省教育会为本会事务所；（二）通过第二次宣言、商量募捐；（三）向各县团体发出通知，要求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四）决定本会与省议会、工务会、农务会、教育会、律师会，总商会等联合起来，于十四日召开市民大会；（五）举行遇难者追悼大会，于各街道张贴传单和漫画；（六）动员尚未加入本会的教职员入会；（七）预定发行不定期刊物《奋斗》五百份，送往各地以作宣传鼓动；（八）委托各报进行宣传；（九）借用省教育会附属讲演所；（十）十二日午后七时继续开会^①。

六月十二日，“吉林沪案后援会”以吉林省议会代表五法团和九学校的名义，向吉林省长公署发出公启：“迳启者自沪案发生各界悲痛，本会于本月十一日约集省城农工商教暨律师

^①下亩荣吉：《吉林学生运动今昔》（日文版）。

公会五法团开联席会议，公因于十四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假城内丹桂茶园为此次沪上死事各同胞举行哀悼会，届时务请……维持秩序，实纫公宜”^①。

六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沪案后援会联合各人民团体、学生会在省教育会开会，“决定于十四日午前十时在福绥丹桂茶园，召开对上海遇难人员的追悼会和市民大会，会后在市内各街道举行示威游行。”反动当局闻悉，非常害怕，“熙参谋长与郑政务厅长特将此次运动的领导人马天安请到公署殷切加以警告”^②。马骏当场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反动当局不得不同意了沪案后援会的行动。

六月十四日，吉林沪案后援活动进入了高潮。这天，省城各校师生、各人民团体、爱国人士、市民和长春、哈尔滨等地的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在预定的时间内来到丹桂茶园剧场。因为人来的特别多，致使这样一个大剧场也容纳不下，很多人不得不站在场外。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面主席台上设有祭坛，四周挂满了无数条标语和挽联，远远望去，人山人海，非常悲愤、壮观。

上午十时，马骏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用一口流利、纯熟的北京话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又讲解了召开市民大会的意义。他说：“今天除对死者追悼外，同时在这里召开市民大会。这里对外表达我国民之意志，对内唤起一般社会之注意。从来我国外交的失败，都是由于人民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因此，外侮日益加深，为了促使政府以强硬的态度对

^①吉林省“五卅”档案，存吉林省档案馆。

^②下亩荣吉：《吉林学生运动今昔》（日文版）。

外进行交涉，则我人民必须努力为之后援。”^①他还义正词严地向军阀政府提出十项要求：判处凶手英国巡捕死刑；撤出上海英日领事并给予处分；英日两国登陆部队必须撤退；取消领事裁判权；优恤死亡同胞；收回租界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后此类暴行保证不再发生；赔偿损失；向我国政府正式道歉。大会通电略称：“上海英捕惨杀徒手工工人、学生之事，调集兵舰，如临大敌，惨无人道，举国惊骇，似此横暴，人道何在？公理何在……若不急谋抵抗之法，何堪设想！敝省会除电政府严重交涉外，各团体之联合一气，协力进行，为外交后盾，至我所要求各款不达目的不止。”^②宣读通电后，在哀乐声中举行追悼仪式，向“五卅”惨案中死难烈士英灵三鞠躬，并宣读了祭文。接着，马骏宣布市民大会游行开始。为了免遭军警毒手，马骏当场剃掉胡子，化妆走出了会场。在他的指挥下，省议会各团体的旗帜为先导，各团体代表、教职员和学生几千人的队伍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福绥门、北大街、粮米行、新开门到商埠地，再经岔路香、大东门、河南街，最后到达公共运动场，沿途高呼“为上海被难同胞复仇”、“与英日绝交”、“抵制日货”、“共同奋斗”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千余张。到公共运动场后马骏大声疾呼：“要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号召青年学生，不要因爱国参加政治活动而放弃学习，号召市民共同奋斗，号召商人要增强国家观念。

这次活动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吉林“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它进一步动员了广大群众，推动了

①下亩荣吉：《吉林学生运动今昔》（日文版）。

②《盛京时报》1925年6月18日。

全省的运动。此后，吉林沪案后援会的活动便转入了有组织的募捐和抵制日货运动。

六月十六日晚，沪案后援会在省教育会开会，马骏、张乃仁轮流主持，主要商量为华工募集义捐金和经济绝交问题。会议决定：教育界同人，以月薪五十元上下为界，分别捐助义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其他各界和省议会联合进行，形式上也要活跃，不仅讲演、演戏、跳舞，还结合庙会、端午节等民间节令组织活动。

六月十八日，是阴历闰四月二十八，沪案后援会利用北山庙会之机组织募捐。这天，省城各界爱国群众和青年学生，早早来到北山附近的斯美茶园，马骏带领各校讲演团，在群众之中开始讲演。他以“不牺牲则不成功，不破坏则不建设”为开始，语气逐渐加深，情绪愈加激昂。在他的带动下，学生用演说、演戏、跳舞等方式组织募捐，山上山下到处讲“五卅”之惨状，听众甚为感动，纷纷向募捐的大筐箩里扔钱。据当时《盛京时报》载：“教育界后援会同入募捐款万余吊、一中学生募得两万吊，毓文学生募得万吊左右，省模范学校募得万余吊，总计募得五万余吊，合现大洋三百余元。”^①马骏有个小本子，记下募捐的钱数，然后寄往上海。很多钱是通过《大东日报》社寄出的。《大东日报》是毓文中学办的，社址在长春。当时办这个报并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为了有个说话的地方。《大东日报》起初的总编张云贵是马骏的好朋友，他们曾一起积极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在列宁逝世后，《大东日报》曾发表了纪念列宁专刊。除专刊之外，又发表了《列宁

^① 《盛京时报》1925年6月23日。

之死》、《论出列宁专刊》等文章，在民间和政界影响很大。后来，张云贵被军阀石友三活埋，中共吉林省第一批党员、吉长地委宣传部长肖丹峰继任《大东日报》总编，于是，《大东日报》成了中共吉长支部的秘密机关^①。

马骏还领着学生到乌拉街、大北窑等地募捐。在马骏的领导下，吉林的沪案后援活动和全国一样，从工人、学生运动开始，迅速的掀起了全民族的反帝爱国声浪。当时，几乎全省各个阶层都卷入了这个运动，就连基督教、长老会等宗教界人士也参加了声援和募捐活动。国内的教徒表示爱国之心，国外的教徒则表示“博爱”、“公道”之精神。旅吉英牧师惠彰德曾发表宣言，要求爱尔兰教会向国会请愿，促英政府公正解决沪案。奉系军阀中的开明将领张学良、郭松龄及其夫人、吉林省长王树翰等人，也参加了义捐。

抵制外货，提倡国货，是声援沪案、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卅”运动形成高潮以后，斗争从一般的讲演、游行、募捐等转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学生们头戴写着“抵制日货，畅销国货”字样的苇草帽，到处检查抵制外货的情况。在轰轰烈烈的抵制外货运动中，各机关、团体接着中华国货维持会发出的宣誓书，组织职工参加宣誓，规定日常生活用品、服装、烟酒等一律采用国货，违者受罚。有的人把洋车、洋货统统烧掉，有的把洋草帽给狗戴上，拴在商号门口。结果，使国货大为振兴、外货多日无市，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当时，有的日商慑于运动，想要逃走，但却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车子乘，弄得他们狼狈不堪。

^①肖丹峰回忆录，未刊稿。

吉林的“五卅”后援活动规模很大，从当时的省城吉林市开始，迅速波及到长春、四平、辽源、怀德、梨树、柳河、延吉、双阳、公主岭、郑家屯、伊通、磐石、永吉、双辽、开通、样子哨、四洮路、辉南和当时吉林省所属的哈尔滨、宁安、双城、一面坡、依兰、呼兰、阿什河等三十多个大小城镇。这是吉林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空前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它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马骏作为吉林沪案后援会的会长，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五卅”运动以后，马骏离开了吉林私立毓文中学，受党的派遣去苏联留学。

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二五年十月，马骏等十余人来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课余假日，马骏常和留学生们一起在列宁山上休息。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每当谈到五四、“五卅”运动时，他是那么的欣慰和自豪，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痛恨。不久，马骏被选为学生团体——中山大学公社的领导人，负责党务工作。

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成分比较复杂。右派分子常常借各种机会攻击苏维埃政权，反对共产党。马骏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原理，团结同志，分化敌垒，组织力量，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展开斗争。

一九二六年五一节后的一个早上，中山大学公社的十几个

同学，聚集在教室对面的小花园里谈天说地。不知谁问了一句，马骏同志为什么不吃猪肉？引起了他对民族问题的风趣讲演。他说：“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我当然记得——而且深刻懂得和相信马克思讲的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自从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解决民族问题方法的书籍以后，我便明白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真正途径……在五四运动以后，我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活动，建立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体，而当成立中国共产党运动一开始时，我便热烈地欢迎和参加了。现在我入党已经几年了，但是我还是不吃猪肉，主要地因为我要做一个回汉关系的调剂人，我要把回汉等各民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革命旗帜之下。”^①他指出：民族的命运取决于革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各民族达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才能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他的话使大家懂得了民族和阶级的辩证关系，鼓舞了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屠杀和逮捕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一五”蒋汪合流，革命形势不断恶化，整个中国被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这时，马骏受党的指示，秘密回国。他先到武汉，后经天津抵达北京，在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恢复北京临时

^①陈绍禹：《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吉林师大1960年编印。

市党部的工作。

马骏在革命低潮时期，来到奉系军阀盘踞的京、津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京、津两地是马骏早年从事学生运动的地方，这里熟悉他的人特别多，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危险性。但是，马骏“还是那样热情、乐观，显得更加坚强了。”^①当他路过天津时，很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坚定地说：“党既给我这个任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能知难而退，只有多加谨慎而已”^②。到北京以后，他和崔忠培等人一起，在东城、崇文等区秘密活动，很快把北京市委重新建起来，开展地下斗争。

敌人侦知新任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当年大雨天安门的马骏，更加意在各个学校和教育机关进行搜索。马骏则利用他的胡子等各种化妆，巧妙的躲开暗探的视线。他常常置身于贫民窟、工人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同于苦力，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所以，尽管敌人暗探密布，搜索数日，仍毫无所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在一次市委会议散会后的路上，马骏碰到了一位老熟人。当他俩行至岔路口时，那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这句话被暗探听到了，于是，他被死死盯住，并于三日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马骏被捕后，张作霖曾派教育总长莫德惠前去劝降，说：“只要你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大帅叫你当教育次长！”马骏当场痛骂道：“我不象你们那样卖国求荣，只要我

①邓颖超：《回忆马骏烈士》，《民族画报》，1963年2期。

②刘清扬：《五四运动中的马骏同志》，《中国共产党烈士传》。

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①敌人见软的引诱不行，就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着他写《意见书》，妄图从中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机密。“但马骏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从他口里没有说出党的半件事”^②；他在敌人强制下写的《意见书》中没有供出党的机密。敌人毫无办法，便在军阀混战吃紧之际，决定杀害他。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马骏“上衣被剥，双手背绑，两脚加镣。但是，他挺身端坐在黄包车上，昂着头，睁着眼，他那六、七寸长的黑须迎风飘逸”^③，“唱着《国际歌》”^④，大义凛然地被押往刑场。“沿街の千万民众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有的流下眼泪”^⑤。马骏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马骏牺牲后，回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北京市德胜门外清真寺为他作了洗礼，并在下坡安葬了他。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师生无比悲愤，立即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把莫斯科中山大学俱乐部，命名为“马骏俱乐部”，以资怀念。

党和人民给马骏一生以很高的荣誉和评价。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审定马骏为烈士。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又在北京为马骏举行了公祭仪式，把他的坟从德胜门下坡，迁到北京东城风景秀丽的日坛公园。

①李风奎回忆录，未刊稿。

②③⑤仲草：《冲破黑暗的雄鹰——马骏同志》。

④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10页。

吴丽石

罗占元 许庆昌

吴丽石是我党在东北地区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哈尔滨特支书记，北满地委书记，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时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济南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二岁。

(一)

吴丽石原名吴苓生，曾用名吴丽实、吴丽时、卢一之、张金德。一八九九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颜集乡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腐朽动乱的清朝末年度过了他的童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才十三岁，正在沭阳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不爱多说话，学习刻苦，成绩优秀。高小毕业后考入镇江第十一中学读书，吴丽石在高小、中学读书时接触了一些新书报，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于他的封建地主家庭有了新的认识。

吴丽石的父亲是一个拥有七百多亩土地的地主，还在集镇兼营一爿杂货铺，醉心于封建剥削和招财进宝，对农民、佃户十分苛刻，时常虐待打骂。吴丽石每逢假期回家，目睹他父亲剥削、打骂农民的行为，深为不满和气愤，经常与父亲争得面

红耳赤。

吴丽石在镇江中学读书时，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在我国，正是新文化运动与封建复古思潮展开激烈搏斗的年代，各地学校的爱国反帝运动、反对尊孔读经的学潮不断发生。吴丽石所在的镇江中学也掀起了反对封建教育，要求民主自由的学潮，由于吴丽石在学潮中态度明朗，斗争坚决，深受师友的拥护，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但他的行动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他和几个同学竟被校方开除学籍，同情他们的老师也被株连解聘。为了寻求真理，吴丽石随同几位同学与老师于一九一八年春离开镇江，来到北京。

吴丽石到北京后，先入汇文中学学习。他追求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思想提高很快。“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还进行过平民教育，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理论。

一九二一年，吴丽石转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在这里，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近进步师友，我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就是他在俄专时的同学。参加社会斗争实践和接触马列主义理论，使吴丽石眼界开扩了，阶级观点明确了。一九二三年二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同年暑假以后，由李大钊代表党组织介绍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苏联学习时，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坚

^①吴丽石入团时间，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吴苓生入团登记表”。中共旅莫支部1924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有吴丽石的名字，可见其入党当在此之前，入党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

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他还利用写家信的机会，热情地向家乡父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况，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九二四年秋（八、九月），从苏联回国。

（二）

吴丽石回国后，立即投入了国内革命斗争，他曾在家乡附近连云港市海州中学召集会议，宣传苏俄十月革命，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着，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到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

哈尔滨是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于本世纪初迅速兴起的东北地区大城市之一，是北满的工商业中心。帝俄时代哈尔滨是中东路的附属地，一切权益为帝俄所控制；十月革命后，除仍有帝俄余孽盘踞之外，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也乘机渗透进来。一九二四年中苏建交，中苏共管中东路之后，社会主义苏联的势力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路，而奉系军阀也竭力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权力，加深了对哈尔滨等地工农大众的剥削与压迫。同时各帝国主义继续着对中东路的覬覦与争夺。因此哈尔滨及东北地区就呈现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东北地区的复杂形势极为重视，对东北劳苦大众的斗争给予极大关注，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派党员到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传播马列主义与开展党的工作。在哈尔滨，先是陈为人、李震瀛等以《晨光报》为掩护，进行党团工作。一九二三年末，陈为人、李震瀛被特务监视，无法开展活动，便转向奉天、大连等地，哈尔滨党的工作遂处于停顿状态。吴丽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哈尔滨的。

吴丽石到哈尔滨后的第四天，便写信给在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报告他到哈尔滨后开始整顿党团组织，把五名党团员组成小组，决定了小组负责人，同时又报告了他经过奉天时，组成了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①。接着吴丽石对哈尔滨整个形势进行了调查分析，制定了深入开展工作的活动方案。鉴于以前党在哈尔滨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只限于知识分子中，而且要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来，因此决定首先到三十六棚^②去扎根，从而开始了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北满最早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四年冬，吴丽石以做小工（临时工）的身份到三十六棚总厂机务段上工。他在详细调查三十六棚历史和现状的同时，极力从事和工人建立感情的工作，以便取得信任。吴丽石是南方青年知识分子，身体又弱，而小工都是搬、扛、抬的苦力活，他干起来很吃力。开始工人瞧不起他，说他干活没劲，连瓦都拿不动。但吴丽石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与工人一起受苦受累，并主动与工人交朋友，热心帮助工人，因而很快取得了工人的好感与尊重。

吴丽石首先为工人办夜校。当时中国工人因长期与俄国工人接触，都想学点俄语，吴丽石的俄语很好，工人们敬佩他懂得世界大事，又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就利用这个条件给工

①原信存中央档案馆。

②三十六棚因中东铁路总厂建厂初期中国工人居住的三十六个“人”字形大窝棚而得名。最初棚里住的都是单身汉，每棚之中居住十人至三、四十人，不久工人家属也先后来到这里，又挨着每个大棚盖了不少土坯房，于是围绕着三十六棚形成了中东路总厂中国工人居住区。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总厂及中国工人居住区统称三十六棚。

人办起学俄语的夜校，除讲授俄语外，还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他向工人介绍苏联国内情况，介绍中国的“二·七”大罢工等工运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了促进中苏工人团结，他也请苏联工人到夜校给中国工人讲俄语。原来中东路及其三十六棚总厂，白俄工人工资比中国工人工资高出一倍多，白俄厂长、工头和白俄工人对中国工人经常打骂欺凌，中国工人非常痛恨他们，统称他们“老白党”。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几年，白俄势力在中东路沿线仍然很强，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中苏共管中东路，增加了苏联职工，成立了苏联工会，中国工人状况有所改善。但白俄势力仍然存在，有些白俄被东北军阀给变成中国国籍，继续留在中东路各厂做工，他们与反动官厅勾结，阴谋进行反苏活动。那时候在工人中有一个印象，总认为凡是“老毛子”都不好，分不清帝俄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界限。吴丽石利用夜校教育中国工人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反对“老白党”和中国反动官厅。他耐心地向工人宣传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倒了帝俄“老白党”，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将来我们中国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就使一批积极分子提高了阶级意识，改变了对苏联职工的看法，对马列主义和革命有了初步信念。

三十六棚总厂中国工人有一个叫工业维持会的黄色工会，原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当时这里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早就有了工会组织，它在领导俄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帝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这对中国工人影响很大，有许多中国工人加入了俄国工人的工会，广大中国工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反动的铁路当局为了控制中国工人，便由官方

派人给工人组织了工业维持会。这个工业维持会成立后完全成了官厅的御用工具，会长、副会长都是由官方指派工厂里的帐房先生、工头、监工和流氓无赖充任的，他们听命于官厅，欺骗工人，多多“捞钱”，还常常勾结官厅借裁人和招工的机会，敲诈勒索工人。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早就开始同工业维持会进行过斗争。吴丽石利用夜校教育三十六棚工人，很快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以他们为骨干建立了东铁中国工人自己的工会——三十六棚东铁青年协进会。它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组织青年工人上夜校，帮助工人向厂方交涉工帐，也开展各种业余活动，教育团结工人。协进会与苏联工会发生联系，并取得了他们的帮助与支持，特别着重于揭露工业维持会勾结官厅、欺压工人的各种反动行径。由于它的积极活动代表了工人的要求，许多工人退出工业维持会，加入协进会，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斗争。

吴丽石在领导三十六棚青年协进会活动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察，发展了三十六棚的第一批党员，吸收了青年工人张有仁、姜文州等人入党，接着即成立了三十六棚第一个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后对三十六棚工人斗争加强了领导。这时，工业维持会更加不得人心。有一次工业维持会派人到货车分厂催收会费，工人阎海林号召大家不交会费，工业维持会会长勾结警察把阎海林抓去，说他惑众闹事定要惩办。党组织知道阎海林被抓后，立即组织货车分厂的工友前去营救，不到一小时，货车分厂工人聚集百余人来到工业维持会，怒斥无理抓人，坚决要求放人。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阎海林被放回来了。

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三十六棚党支部积极领导了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参加党领导下的青年协进会的工人最为活跃，他们不仅在厂内张贴五颜六色的反帝标

语，组织讲演队和募捐团，而且还到家属区，到其他工厂区，到商业集中区，开展反帝宣传和募捐活动。他们在三十六棚总厂召集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的雪耻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三十六棚总厂俄国工人工会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并宣布了总厂俄国工人一律捐款工资的百分之五，支援上海工人，激起了到会的中国工人的热烈欢呼，表现了中苏工人团结战斗的情谊^①。

(三)

吴丽石在三十六棚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根据党的北方区委李大钊的指示，着手创办《哈尔滨日报》。

在当时，办报是有很多困难的。首先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出面向官厅立案，办报不立案是不准出版的。吴丽石通过进步青年韩铁生的介绍与帮助，费了很大周折，才在一九二五年春请到一位曾经是《晨光报》的编辑为办报的承办人，到官厅立案时把报名定为《哈尔滨日报》。然后，在哈尔滨道外二道街北头租了一栋小楼，楼上是报馆，楼下是剧院。这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不致引起敌人注意，便于掩护，进行党的活动。根据党的任务，考虑当时的政治情况，确定报纸的方针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揭露官僚政客各种卑鄙无耻行径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思想言论。报纸把反日斗争作为重点，经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把持南满政治经济特权，扩大侵略势力，妄图染指北满和吞并整个东北的阴谋；同时也不放松揭露英、美、

^① 《三十六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22页。

法等帝国主义向北满侵略的阴谋活动；对于当时一般无耻文人传播反动思想，也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据韩铁生回忆：一九二五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欧讲学，准备在途经哈尔滨时讲学，鼓吹他组织“好人政府”等反动观点。吴丽石除了嘱托韩铁生写文章加以揭露批驳外，还亲自写了《追击胡适》的文章，使胡适讲学不成，迅速收拾行装悄悄地离开哈尔滨。当年同吴丽石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讲，他在主办《哈尔滨日报》时，还写了其他许多文章，对北满地区传播进步文化，揭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吴丽石为书记的哈尔滨特支成立。根据中央指示，一九二六年初，吴丽石召开了哈尔滨、北满地区党的干部会议，成立北满地委，吴丽石被选为第一任北满地委书记，高洪光任组织，海涛（赵子安）任宣传。地委领导下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同时还建立了团北满地委，吴晓天任团书记。北满地委刚成立时，下有三十六棚支部、大学支部、皮鞋工人支部、警察支部和双城、安达、长春、牡丹江等八个支部，共有党员四十余名。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吴丽石派苏子元、王纯一等到绥芬河开展工作，在那里成立了绥宁特支。它所领导的光华小学，实际上成了当时北满地委与海参崴的交通站，这里经常有“客人”从哈尔滨来，住几天就到苏联去了。

北满地委提出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要是在工厂、学校中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工人、青

年学生、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是党的工作基本对象，对敌斗争的方法是宣传、鼓动，散发传单。

吴丽石这期间很重视让知识分子党员到工人中去，促使他们与工人结合。一九二六年春，哈市道外一些工厂中有十余个工人夜校，都有知识分子党员去当教员。据苏子元回忆：一九二六年春，他在哈尔滨参加知识分子党支部，吴丽石经常让他去参加哈尔滨铁路工人党组织的生活会，使他了解了许多工人的斗争情况。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自称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已经到了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地步。当时上海《申报》有段消息报道：浙江召开群众大会响应北伐军，并提出打倒军阀张作霖、孙传芳的口号。

《哈尔滨日报》编辑人员一时不慎，在十一月一天的报纸上将这条消息原文刊登了。吴丽石、韩铁生等发觉后，因当天报纸已全部发出追收不及，只好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将有关重要文件、文稿焚烧或掩藏，编报的几个负责人暂时躲避。刚刚处理完毕，人员已撤走，军警包围了报馆。他们大肆搜查，但却一无所得。几天之后，反动官厅通辑报馆负责人，有些人无法在哈市坚持，纷纷离开。但吴丽石没有走，他在道外十六道街圈楼北找个住处（这里有个地下室藏东西，搞油印），继续在哈尔滨搞宣传和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

吴丽石领导北满地委下属各支部党员及可靠的积极分子，进行过多次散发传单，宣传党的主张，揭露敌人统治的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一九二七年春节利用送贺年片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

过去，东北各地每逢腊月三十晚上，有一种穷苦人向地

主、官绅、商户铺面送财神码子、讨些吉利钱的传统习惯。吴丽石从中受到启发，通过内部关系印制了一大批新式贺年片，正面是“恭贺新禧”四个大字，背面是一封由吴丽石起草的宣传信，内容是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号召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落款是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这封宣传信实际上是北满地委的一篇宣言书。

大年三十晚上，寒风凛烈，飘着雪花。街面上一些官绅之家和工商店铺早已红烛高照，香烟缭绕。那些有钱的男男女女打扮得花团锦簇，正在饮酒吃年夜饭。此时，吴丽石组织了党团员和可靠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装扮成送财神码子模样，把贺年片分路送出去。有的直接送到小门小户和穷人手里，对那些深宅大院的人家就从门缝里扔进去。大年初一清早起来，到处是这样的贺年片，敌人见了惶恐万状，群众则拍手称快。

一九二七年旧历正月十五，吴丽石又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张贴标语，把预先写好的标语分头贴在道外各大街小巷的墙上、房头、电线杆子上。滨江警察署发现后，动员警察往下揭，但因为贴的牢实，用手揭不下来，只好用水往下冲，搞得敌人非常狼狈。

吴丽石领导北满地委还办过两种短期训练班。一个是理论教育训练班，即进行党章、党纲和共产主义知识教育；一个是军事训练班，有七、八个党员参加受训，讲些军事知识，学习如何拿枪、放枪，如何使用手榴弹等。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吴丽石早在“五卅”运动后就曾亲自为赵尚志写介绍信，并为他筹备路费，送他进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①，使他后来成为

^①金宇钟：《民族英雄赵尚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北满地委遭到了破坏，使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哈尔滨党组织发展了几个警察党员，吴丽石得知后曾指示要慎重，并决定以后不要在警察中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停止，又陆续发展了几个警察入党，其中就混进了一个特务。有一次约定他们在某地开会，那个特务即向官厅告密，使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地委负责人高洪光全部被捕。其时，吴丽石代表北满地委去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到上海，便得知了北京李大钊等被捕和北满地委遭到破坏等严重情况。他按照上级指示，委派另一位同志代表参加“五大”，自己立即返回哈尔滨，着手整顿和恢复组织。五月初，在哈尔滨南岗召开地委扩大会，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成北满地委，吴丽石仍任地委书记，继续领导哈尔滨和北满群众进行斗争。同时，吴丽石与南满大连党组织关系特别密切，他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时，常经过大连，给大连党带去党中央文件并交流工作经验；一九二七年七月大连市委遭到大破坏后，大连许多党员到哈尔滨投奔吴丽石，恢复了党的关系。

（五）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党的“八七”会议后，纠正和结束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统一东北各地党的领导，再次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委^①。一九二七

^①成立满洲省委原是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五大”期间决定的，当时确定以在大连的邓和皋和在哈尔滨的吴丽石为主要负责人。但不久因邓和皋被捕，未能实现。

年九月间，党的北方局派陈为人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同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协商成立满洲省委。吴丽石较为熟悉哈尔滨及东北地区的各方面情况，积极协助陈为人筹建满洲省委。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组成了第一届满洲临时省委，统一管理奉（辽）、吉、黑三省党务，陈为人任临委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管农运。第一届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在奉天（沈阳）建立了秘密省委机关。吴丽石也离开了战斗、生活近三年的哈尔滨，随省委转移到奉天，致力于满洲省委的组织领导工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满洲省临委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了临时省委；一九二八年九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改满洲临时省委为满洲省委，吴丽石仍然担任组织部长兼农运工作。这两届满洲省委主要都是陈为人、吴丽石两个常委主持工作，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与革命低潮的形势下，艰苦地整顿、恢复和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尽管这期间东北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但省委总是不断地抓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二八年底，省委领导下的东北各地党员达到二百六十二人，其中哈尔滨党员人数最多，有九十五人。

为了整顿恢复党的组织，这期间省委曾先后办过三期短训班，吸收各地党团组织的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等问题。马列主义由陈为人主讲，党的建设由吴丽石主讲。

吴丽石对人和蔼可亲，平时沉静寡言，无论和知识分子，还是工农群众，都能打成一片。一位老同志评论他说：“群众见之，说他是群众之一，但他是群众中的先觉者；知识分子见之，说他是知识分子之一，但他又是知识分子中的工人阶级战

斗员。”^①吴丽石对党员要求严格，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肃耐心地帮助，但从不发火或训斥。他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在哈尔滨工作时，冬天很冷，他把陈为人留下的皮大衣交给另一位一起工作的同志穿，自己不穿。据楚图南回忆：一九二七年十月，北方局派陈为人来召开成立满委的会议之前，吴丽石与陈为人换衣服穿，楚图南问吴丽石为什么？他说：万一发生问题我就替他，陈就会逃脱。吴丽石生活俭朴，从不追求安逸舒适，在哈尔滨工作时，通常住在普通工人住宅里，睡在一个折叠式的小床上，吃着黑面包和咸菜。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苦。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一个党员家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陈为人、吴丽石等十四人参加，研究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及省委工作。由于事前没有进行周密的布置，会议进行中，警察突然冲进了屋内。吴丽石趁敌人刚进屋内混乱之机，将手中的文件扔到小孩的尿桶里；然后机智地对另一个人说：“怎么不把小孩尿桶拿开，放在屋里怪臊的！”于是尿桶被拿到屋外，使文件没有落到敌人手里。但参加会议的除一位团省委书记逃脱之外，其余都被逮捕了。

警察对被捕的人都搜了身，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从吴丽石身上搜出一个手戳，上面刻写的名字是“赵云容”。

警察问：“这是你的手戳吗？怎么象个女人名字呢？”

吴丽石回答：“这是我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小时候家长说我的容貌长得象三国时的赵云，所以我就叫赵云容。”

吴丽石巧妙、诙谐地嘲弄了愚蠢的警察。敌人弄不清他的

^①韩铁生 1960 年的回忆，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真实身份，相信他就叫赵云容。在狱中，敌人施用各种酷刑拷打，但吴丽石以坚强的毅力忍痛拒供，还照顾和关心同狱战友，鼓励大家坚持斗争。由于敌人找不到证据，又没有问出口供，被捕同志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党通过“互济会”营救出狱。

(六)

吴丽石在奉天出狱后，于一九二九年八月间去上海找中央汇报了情况。他的父亲得知他在上海，便从家乡赶来看他。这时的吴丽石，因在奉天监狱受酷刑折磨，已是满身创伤，异常瘦弱，组织同意他随父亲回家疗养。吴丽石在家期间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阅读大量书报。他还常抽出时间给妹妹和妻子讲点苏联的生活，讲点革命故事。吴丽石的妻子叶铭玉，是一位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五四运动时丽石在京读书，进行平民教育，她也曾随丽石在京并上平民夜校。以后吴丽石去苏联学习，她回到家乡。吴丽石回国后，长期在东北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夫妻再未见面。这次她看见刚出狱的丈夫回来，心里充满辛酸和喜悦，竭尽心力照料他的生活，使他休息好，快点恢复健康。二十几天过后，吴丽石身体稍好，就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亲人，奔赴上海。

吴丽石到上海后，中央立即派他去山东工作。时值山东各地党的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等先后被捕，敌人气焰嚣张，环境极端险恶。吴丽石（化名卢一之）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到达青岛，帮助恢复组织。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鲁临委关于组织恢复后的工作情况向中央的

报告》中说：“一之于十二月十日到青岛，十二日与青市委书记见面，本意要召集市委全委会并巡视市属（各）支部，然后赴济。无如等候五、六日，终因市委各同志接不上头，CY书记亦无法约会，以致没有开成，仅根据市委书记简单的报告及本地报纸新闻而提出对青岛工作意见书，留给市委详细讨论，自赴济南而去了。”^①

吴丽石到济南后，与前临委部分负责同志取得联系，立即重新组建了山东临时省委（鲁临委），吴丽石任书记，王进仁、曹克明为常委。临时省委组成后，吴丽石不畏艰险，深入几个市、县了解情况，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并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与策略。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山东省委作出了吴丽石起草的《山东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主要在青岛、济南、淄博等中心区域加紧开展职工运动的时候，要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要尽量用各种公开的合法斗争形式去组织和团结工人群众；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从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道路。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上午，吴丽石和共青团员李志英外出赁房子，路经工整会时，遇上了李志英同乡王明智。王明智原是党员，被捕叛变，现已是济南反共委员。他知道李志英是共青团员，当即拿出手枪将李志英和吴丽石一起逮捕。李志英被捕后自首，供出了他的住址和吴丽石的住址，致使党团省委机

^①山东省档案馆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3页。

关遭到破坏。^①

吴丽石被捕后，临时化名张金德。敌人弄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逼他招供，但他坚贞不屈，未向敌人吐露任何党的机密，敌人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只知道他“加入红匪”。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经山东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将吴丽石等二十二二人判处死刑，并且编造了一套什么“加入红匪，居心残忍，杀人放火，罪大恶极”等骗人的鬼话。当天，吴丽石等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一路上，这些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高呼口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向敌人展开了英勇壮烈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吴丽石等英勇就义后，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不仅慷慨就义，而且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斗争，这种光荣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②

吴丽石在狱中知道自己行将被杀害时，曾通过关系向党和家属拍发了电报，大意是：“儿病危，母亲（指党的组织——引者）不要来看我，舅舅（指家属——引者）来，能见一面。”^③当吴丽石妻子叶铭玉与父亲来到济南时，丽石已于日

①关于这次吴丽石被捕经过，本文主要依据1930年2月20日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牟修五《关于党团省委机关被破坏经过情形的报告》（见山东省档案馆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151页）；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当时济南捕共队队长王天生1953年供词：1930年2月8日上午王明智逮捕了李志英，李志英供出了他的住址和张金德的住址，致使张金德等八人被捕（见山东省公安局存《反革命犯王天生案卷》）。

②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③据吴丽石之子吴以京提供的材料，存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前牺牲。山东省党的地下组织向他们传达了烈士的生前遗嘱，要他们好好抚育后代，继承烈士的遗志，同时帮助他们将烈士的遗体送回家乡。全国解放后，烈士家乡的党和人民把吴丽石的遗体安葬在沭阳县革命烈士陵园。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满洲省委文件有关部分；
2.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
3. 山东省档案馆所存 1930 年前后山东地下党受破坏的有关资料；
4. 在满洲省委工作过的王鹤寿、韩光、赵毅敏、楚图南、胡岁三、韩铁生、张有仁、高洪光等的回忆录；
5. 吴以京：《碧石洒大地，丹心照千秋》，打印稿；
6. 山东省公安局存 1930 年捕共队长王天生在 1953 年的供词。

刘天章

梁星亮 张守宪 董建中

刘天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建和发展北方党团组织，领导陕西、河南和山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创建红二十四军和晋西游击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四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在斗争中成长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高刘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伟堂终年勤耕苦种，仍不能养活全家，后到外地经商，光景稍有好转。刘天章十四岁时，才到三原县城一所小学读书。

刘天章早年在家乡劳动期间，目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现实，就开始产生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思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为了显示皇帝和太后的所谓“勋业”与祭奠的隆重，清政府强令全国学校一律公祭七天。每逢学校举行祭奠活动，刘天章总是不去，为此屡遭校方斥责，但是他不仅不屈服，而且还鼓动同学进行反

抗。

一九一四年春，刘天章考入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备科。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他除了学习各门功课外，还阅读了谭嗣同的哲学著作，康有为的《大同书》等作品。

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陕西，刘天章义愤填膺，团结校内外的进步师生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上街讲演，声讨袁世凯及其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祸害陕西人民的罪恶。

面对逆转的时局，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刘天章在三秦公学毕业后，与陕西许多求学的青年，奔赴北京。一九一八年夏，天章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一九一九年三月，南北军阀政府在上海召开“和会”，但陕西省内战事并未止息，在陕的各派军阀兵力逾二十万，他们勾结土匪，横征暴敛，弄得地方不靖，人民备遭涂炭。刘天章和李子洲、杨钟健、杨明轩、魏野畴等串联北京各校旅京的陕西籍青年学生，组织起学生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并通电“和会”，要求停战和驱逐陕西军阀陈树藩。为了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他们还编印了《秦劫痛话》刊物，痛陈陕西人民的疾苦，以图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年五月，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刘天章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中坚骨干。在五月四日的游行中，刘天章和其他同学冲入赵家楼，痛殴国贼，火焚曹（汝霖）宅。他还负责主编北大学生会会刊，虽然身患疾病，仍坚

持编好每一期刊物。在运动中，刘天章领导进步学生与罗家伦等人向军阀政府妥协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多次组织同学上街讲演，宣传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和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五四运动后，刘天章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为了更有利于斗争，必须广交师友，建立团体，开展宣传。一九二〇年一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秦钟》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和妇女解放；反对封建迷信、尊孔读经和早婚、缠足等旧习俗；向人民揭露反动军阀的祸陕罪恶。这一年的下半年，陕西教育厅长郭希仁强令教育界人士在孔庙行跪拜祭，当时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王授金，因坚决反对这种倒退行为，被郭希仁下令撤职。刘天章得悉这一消息，遂与陕西旅京的杨钟健、魏野畴等同学联各上书郭希仁，表示抗议，坚决支持王授金的正义行动。在陕西和旅京进步学生一致强烈的反对下，郭希仁被迫在一九二一年春下台。

一九二〇年春，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刘天章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踊跃参加该会组织的读书会、讨论会和辩论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研究会里，刘天章与李大钊常有接触，向他请教疑难问题，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年冬，刘天章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进社的“元勋”

《秦钟》杂志出刊到第六期时，因反动军阀的压迫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内部分化而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等商议，决定创办《共进》（半月刊）杂志，继续向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和深入探讨在陕西进行革命的问题。刘天章和杨钟健负责《共进》的编辑工作。他们在《共进》上刊出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各国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李大钊、陈独秀、武止戈等人的文章。在编辑《共进》的同时，刘天章还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全国和陕西的实际，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特别是陕西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改造社会、革新陕西政治和教育的主张，向旧世界宣战。一九二二年六月，天章在《去刘之后》一文中写道：直系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土匪一天一天的加多，军队一天一天的横行，人民一天一天的涂炭，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惨无人道的情况了。”要解决陕西危局，驱逐刘镇华才是“唯一第一步的方法，此疮不去，我们的什么都是幻想、梦想，一无希望。”为了使苦难的陕西人民获得解放，刘天章大声疾呼：“磨快我们的钢刀，热沸我们的心血，去刘！去刘！！”^①

在《共进》杂志创刊一周年时，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为了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共进》的行列中来，刘天章

^① 《共进》第16号，1922年6月25日出版。

和杨钟健、李子洲等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共进社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刘天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任主席兼《共进》杂志的编辑主任。在《共进》杂志周年纪念特号上，刘天章以《培养时代的共进生活》为题，赞扬共进社“是我们自己的娇子”，是“为人类争自由而出世”，“为助人类达到完满的幸福而出世”^①。同年十月，他在《复张树森君函》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好，非先打倒军阀不可。”^② 这年冬天，刘天章经杨钟健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协助杨钟健编辑出版学会会员通讯录。

一九二三年二月，震撼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发生。在党的领导下，刘天章积极联络进步学生上街游行，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斗”^③的口号，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并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一起顽强地向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二七”惨案后，他深入实际，调查了惨案中工人伤亡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残酷的斗争，使刘天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为共进社起草的《宣言》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唯一的的第一步方法，而对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① 《共进》第23号，1922年10月10日出版。

② 《共进》第24号，1922年10月25日出版。

③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①

一九二四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社也吸收了大批新社员，但他们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活动缺乏了解，加之原来老社员中的骨干相继离京到外地工作，新任领导又缺乏工作经验，互不团结，造成共进社一时的组织涣散。面对这些问题，刘天章和魏野畴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组织和思想整顿。他们同新任领导和新老社员谈心，交换意见，传授工作经验，增强社内团结。还为共进社起草了新的纲领，修改了社章。新的纲领和社章放弃了原来比较空泛的“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宗旨，而把政治问题看作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认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必须更彻底地实行经济的改造，“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②这些论述，对后来共进社在思想和组织建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年四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使共进社和《共进》杂志更富有战斗力，成为我党得力的外围组织。尔后，共进社又设立了党支部，刘天章先后介绍李子洲、魏野畴、武止戈、邹均、屈武、耿炳光、王子休、方仲如、潘自力等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① 《共进》第33号，1923年3月10日出版。

^②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经192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共进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曾作为单行本印行。

刘天章在编辑《共进》的同时，还翻印了《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澄清了一些人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刘天章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同志，能不断提出新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元勋”。

投笔从戎

“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刘天章初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九二四年夏，他在给杨钟健的信中，曾明确提出了建立武装的主张：“在石头上下钉子，要为中国前途辟新门庭”，“光说不算，要拿实力干，非入军队不可！”“我理想的途径是：如果得到了机会，入到军队之中，至少新成一营，军官尽为同志；专门从事培植。”“如果实力可用，便不客气起来，打起鲜明的旗帜。”^①

这一年六月，刘天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北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秋，刘天章通过李大钊和邹均、屈武等人的关系，结识了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胡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倾向革命，在他率部入豫兼任河南省督办时，特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共同商讨创办学生军、聘请苏联顾问等事宜，借以发展军事，扩充势力。在刘天章和屈武的陪同下，李大钊亲往开封与

^①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胡景翼就上述问题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党组织和胡景翼的同意，由刘天章在国民二军负责创办学生军，并担任陆军训练处学兵队大队长（又称营长）。

刘天章投笔从戎，在北京招收士兵时，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非议。党内有些同志觉得他是大学生，有学问，不同意他从军，有人甚至再三劝阻。刘天章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毅然带领新招收的士兵前往开封就任。学兵队在北方党团组织和胡景翼的支持下，先后招收士兵五百多名，编成四个连。这些士兵多系出身贫苦的中学生。学兵队设在开封南关马二营。刘天章以黄埔军校为榜样，通过党组织和胡景翼、于右任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杨家乃、王泰吉和进步军官严云生、郭仰芬担任连、排长；聘请国民二军中的进步军官与教官。刘天章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教唱革命歌曲，教育官兵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他还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亲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党团员就发展到近百名，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团员担任，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亦发展到近二百人。就这样，学兵队在刘天章的言传身教下，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大部分都分配到国民二军担任下级军官，成为二军的中坚骨干，也是开封地区一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刘天章还积极从事开封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他到开封不久，就同冯品毅等人先后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二中、中州大学和艺术学院的进步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建立了由他负责、同北方区委和团中央直接联系的团的组织。到一九二五年夏，团员发展到近百人。刘天章又协助当地

团组织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①，将一批优秀团员及时转为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后改为地委）。党团组织建立初期，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缩衣节食，拿出自己的薪金，作为活动费用；一些同志经济困难，他四处借债，设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曾受到党组织的表扬。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河南省党组织负责人唐际盛在给中央的信中曾说：“目前在开封负责者如马文彦之生活，以及我或晨因等暂时来开封工作者，一切用费，均累刘天章（队长）私人，但他收入亦甚困难，负债颇多，长此靠他个人维持，殊非妥当办法，罗思危在此住闲，生活亦多赖天章。”^②

一九二五年夏，中共豫陕区委成立（陆沉和王若飞先后任书记），刘天章任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他同王若飞、彭泽湘（时任军委书记）等积极帮助国民二军继续办好陆军训练处军官队，通过李大钊聘请了苏联顾问担任教官，吸收了大批党团员来军官队工作和学习，并在国民二军和军官队里秘密发展党团员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散发传单和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在王若飞、刘天章和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的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军运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被誉为“华北的广东”。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在同奉系、直系军阀作战中失

①共青团开封地委成立的时间是1925年7月8日，马文彦（书记）、冯品毅（宣传）、韩沉波（组织）、徐焕生、江常师为委员，刘明佛、刘国璋、李星美为候补委员。

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晨因即李震瀛，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后任河南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罗思危时由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南，尚未分配具体工作。

利，被迫退出河南。刘天章亦因患病，回到家乡陕西高陵休养。

主办陕西《国民日报》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刘天章任区委候补委员，与魏野畴共同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不久，刘天章又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该报是共产党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的，总编辑杨慰祖，编辑白超然、童志道、冯润璋、袁禾生、谢幼石等都是共产党员。由于西安刚解围，城区物资奇缺，给办报带来了许多困难，纸张、经费缺乏，和外地的往来还未完全恢复，消息闭塞，通晓编印、采访工作的人员也很少。二月十五日，刘天章来到报社，面对重重困难，与报社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迎难而上。经费缺乏，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筹集；人力不足，编辑就兼任记者、发行人员，有时还当印刷工人；印报的纸张缺乏，就用有光纸代替新闻纸，保证了每天报纸的出刊。

为了办好报纸，刘天章事事身体力行，处处作出表率。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还把伙食费节省一部分，用于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常常白天出外采访，晚上回来写稿、改稿、组织编印，直至深夜。当时，有的同志初来报社，对办报的业务生疏，他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指导，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业务。为了扩大宣传，刘天章亲自组织报社人员去车站、街道、学校和公共场所销售发行《国民日报》，到工人、农民、学生中去宣传讲解，组织阅读，充分利用一切形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界人民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作了热情的宣传报道。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伐军将从武汉进发中原，冯玉祥正准备率国民军联军出师东征。刘天章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题为《江南肃清后中国革命的局势》的文章，为新的北伐大造舆论，指出国民军联军誓师东出，“真算是‘兵以时动’，其奋斗的意义在谋中华全民族的解放，在拥护民族的利益”，其任务是“促进灰色军队的革命化”；“协同豫南和苏皖革命军三面夹攻，歼灭奉军”^①。同时，勉励国民联军官兵们要真正在行动上表现出“革命”，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己奋勉，自己训练，自己努力，努力争上革命的火线”，“在党的主义和政策下面，担负革命工作，切不要辜负了光荣的环境”^②。文章最后指出：豫皖大战“是我们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最后的一个战争，我们为主义所驱策，更应竭尽全力以参加以下最后之胜利。”^③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西安，引起了各界革命人士极大的义愤。从四月中旬起，《国民日报》每天都集中宣传报道陕西人民反蒋斗争的怒潮。为了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罪行，四月二十五日，刘天章为《国民日报》撰写了题为《护党运动与蒋介石背党》的社论。他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文词，揭露了蒋介石等新右派自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以来，任意“变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决议案”，“变更总理所留给全国同志的革命政策”，

①②③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3—14日。

“独揽本党政权；包办外交，把持财政”，“任意破坏本党组织，戮杀本党同志”，“压迫上海工人，解除其武装”的罪恶事实。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国民党应是“全体党员的党，是集权民主制的党”，“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专制制度的党”，“对于党内的，不幸的腐化现象，要是坐视不去纠正，便无异于我们卖了主义，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投降”！社论号召人民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站在党的纪律之下，努力护党，努力反对背叛党的蒋介石，”“消除党与革命的障碍”。最后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就是护党”的口号，号召人民坚持战斗。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北京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噩耗传来，刘天章悲愤交集，即夜挥泪疾书，撰文哀悼，怀念他在李大钊的谆谆教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怀念他曾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的难忘的岁月，控诉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残无人道的兽性行径。文中写道：“你已为革命而牺牲，今后割贼头，饮贼血唯有我们。”^①并以此作为《国民日报》社的挽联，送到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的大会上。为了悼念李大钊，《国民日报》连日辟专栏，出特刊，报道陕西人民追悼李大钊的情景，寄托哀思，启迪后人。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在革命高涨的时期成为陕西人民的喉舌，它团结、教育了人民，为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每日销售达两千余份，是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报纸。正因为如此，《国民日报》也遭到新旧军

^①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阎和反动分子的恶毒攻击和诽谤，诬蔑它犯了“不会走就想跑”的过激“错误”，攻击刘天章、白超然等是“投机跨党分子”，限制和刁难报社的正常工作。对这些，刘天章都嗤之以鼻。他为了办好《国民日报》，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但仍然坚持工作，直到六月初，身体实在难以支持，经组织和同志们再三劝说，才回到原籍高陵休养。

身陷囹圄，坚持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六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豫陕地区进行“清党”反共，同时强令《国民日报》改变宣传方针，不准宣传共产主义和反蒋言论，报社工作处境困难。为了指导社务，同敌人进行斗争，刘天章不畏艰险，抱病从高陵返回报社。当晚，即得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图谋逮捕在西安的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消息，报社又接到第二集团军总部要报社全体人员于七月八日晨去西安留守司令部接受“训话”的通知。刘天章觉察到政局恶化，立即请示陕甘区委，研究对策。区委指示报社继续坚持拥共反蒋的宣传方针，并决定由刘天章和白超然、童志道去西安留守司令部交涉。刘天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抱定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挺身而出，果然被拘禁起来。刘天章据理痛斥敌人的法西斯行径，严厉地说：“我是报社社长，我负报社一切责任，可叫他们回去！”迫使留守司令部释放了童志道。由于刘天章和白超然被扣，党组织更加认识了时局的恶化，很快决定改变工作方针，由公开转入地下，使党的力量

免受更大的损失。

刘天章与白超然被捕后，即被解赴河南洛阳。在洛阳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继续进行斗争，把囚室当作锤炼革命意志、陶冶革命思想的场所。在敌人监视十分严密的情况下，他们仍设法秘密联系，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总结分析西安半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刘天章的身体不好，加之天气炎热，监牢中空气污浊，又有沉重镣铐的折磨摧残，体质越发变坏，但他革命意志却越来越坚强，每次出庭审讯时，总是坚定沉着地对付，敌人对他毫无办法。他经常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在法庭上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同狱的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说：“在反动社会里，坐监牢是革命党人的平常事”^①，教育大家不要讲不利于党的话，不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不做可耻的叛徒，“绝不为敌人的威武所屈服，也绝不被他们的利禄所诱”^②。鼓励大家“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③，同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同年十一月，刘天章又被押解到郑州内防处。

郑州内防处是敌人关押共产党的“大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敌人的看守更加严密，刑罚更加残酷，这就给刘天章他们在狱中斗争带来更大的困难。尽管如此，刘天章设法与狱中的三十多名共产党员秘密联系，组织起监狱党支部，由刘天章担任支部书记，侯宗骏、贾大庸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为了提高狱中党员和非党难友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他们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刘天章亲自与外边党组织秘密联系，在一九二七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报

①②③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

送了《在狱同志调查表》^①，将狱中三十三名党员的编号、年龄、籍贯、被捕的时间、原因以及在狱中的现状等作了详细汇报，还准备组织越狱。

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同志传阅总结文件时，由于麻痹大意，将文件丢失在地上，被守卫士兵拣去。敌人在文件上发现刘天章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便大施淫威，给他在手铐之外，又加上两付七斤重的铁镣，不许放风，严加防范。每次审讯时，刘天章泰然自若，坚不承认。敌人施用酷刑没有达到目的，便派伪军法官进行劝降，同样遭到刘天章的严厉斥责。狱中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绝食斗争，反抗敌人的压迫，要求给刘天章和狱中难友一律下镣，改善伙食和延长放风时间。

当时，刘天章的身体虚弱。大家恐怕他参加绝食斗争会更加损害他的健康，劝他不要参加。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横下一条心，要和敌人斗争下去。敌人一次次送来的食物，他全都断然拒收。就这样，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饥饿和病痛同敌人进行斗争。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敌人慌了手脚，被迫答应解除手铐，改善狱中伙食待遇。但是，刘天章身上的铐镣依然没有解除，仍受到严密看守。从此，他的身体更加瘦弱。经过狱中难友的精心照料和医治，随后又逐渐好转。不久，郑州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又被押解到开封第一监狱。敌人的阴谋屡遭失败，认为刘天章不易对付，到开封后，便把他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屋里，以隔绝他和外边的联系。在敌人每周一次向政治犯进行诱降宣传时，他总是乘机向难友远望点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头，以示要坚持革命到底。一九二九年夏季，冯玉祥与蒋介石分裂，开封监狱的政治犯先后获释，刘天章才恢复了自由。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和斗争，象熔炉一样，把刘天章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出狱不久，便立即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党组织先派他在中共顺直省委做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报纸出刊数月，被迫停刊，刘天章又负责领导北方书店。这时，国民党的密探时刻监视他的行动。环境险恶，党组织派他去负责互济会的工作。刘天章埋头苦干，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巧妙地同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监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使狱中的难友得到了党的指示和物质上的接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他还历尽艰辛，秘密地举办小型的短训班，提高互济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曾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表彰。这年秋天，刘天章代表北方各省市党组织出席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互济会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会后，他继续深入京、津地区的工厂和基层单位，开展救济死难烈士家属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春，刘天章在天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和摧残，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组织机密。敌人抓不到证据，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六个月徒刑。后被转送到“自新院”，他仍坚贞不屈，继续同敌人斗争。是年九月，奉系军阀入关，晋军退出天津，“自新院”的政治犯乘机出狱，刘天章又一次重见天日。

在山西白区的艰苦岁月里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

“立三路线”。会后，中央又对山西地区的形势作了周密的分析，认为山西地区群众斗争的力量对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作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北方局于十月在天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同时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

在此之前，由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太原仅有党团员二十余人，河东^①有党团员五十余人，党的组织涣散，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刘天章到任后，先以主要精力传达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调整和恢复了省委、太原市委的领导机构。接着，他深入到太原兵工厂、纱厂、东山煤矿、商震的军官教导团和晋军李服膺的十七团进行调查研究，整顿加强党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省委派李志敏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驻平定的高桂滋部整顿地下党组织；另派党员到汾阳、运城、侯马、晋城等地驻军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对在太原狱中的党员，派互济会负责人高克亭到狱中转送物资，生活上给予救济，还批准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狱中党支部。刘天章亲自给郭洪涛写信，指示狱中支部教育党员既要坚持斗争，作好武装越狱的准备，也要注意修养，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那怕来日无柴烧”。

经过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山西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太原市党员

^①河东，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闻喜、夏县、解县、猗氏、（今临猗）、绛州（即新绛）和绛县。

发展到一百零五人，团员三十一人。全省共有党员二百六十八人，建立了五个地方党部和二十一个支部；还设立了秘书处和“并州养蜂场”，作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机关。

在白色恐怖的太原，环境险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得一点费用，均全部交组织统一使用，而他自己领取的生活费却很少。一次，一位同志因吃饭问题发愁，刘天章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送给了这位同志，而他却饿着肚子，一连十多天，每天只吃一顿饭。尽管生活这样困难，他仍坚持夜以继日地工作。驻平定的陕军高桂滋师长得知刘天章在太原生活境况很艰难，写信劝他去该部，并许以高官厚禄。刘天章当即回信谢绝，表示：“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和王明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张召开紧急会议，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山西省委曾接待了“筹备处”所派的代表。为此，北方局派主要负责人来解决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的问题，并将山西省委改为特委，将刘天章的省委书记职务降为特委组织部长，强迫他承认反四中全会的错误。刘天章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仍以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职务的变动，对新任特委书记阴凯卿非常尊重，阴凯卿也处处信赖刘天章，两人亲密合作，团结战斗，为周围同志一致称道。

^① 《刘天章同志传略》（1946年编写），原件存中央组织部档案科。

组建晋西游击队和红二十四军

刘天章到山西后，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狠抓组织工农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到一九三一年夏季，驻晋军阀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党员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就有党员五、六十人，许多营、连、排长都由党员担任；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千余名学员，党员就有二百多名。据此，刘天章和阴凯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认真分析了新的形势，共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兵变计划，决定拉出高桂滋部两个团组成红二十四军；策动商震部军官教导团和李服膺部十七团举行暴动，组成红二十五军；争取晋西的“武装土客”（即武装土匪），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此之前，刘天章曾派共产党员阎红彦和白锡林打入晋西“武装土客”，作争取改造工作，但因其内部发生分裂，失去了争取的条件。刘天章和特委遂改变计划，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抽调了一批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由阎红彦、白锡林、吴岱峰、马佩勋领导，到晋西山区开展武装活动，筹建红军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一九三一年夏，在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任正副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全部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游击队成立后，刘天章和谷雄一经常以买蜂蜜为名，到并

州养蜂场同游击队负责人秘密接头，向他们传达党的指示，布置任务，转送枪枝弹药。刘天章指示游击队要实行官兵一致、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要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为榜样，加强党和游击队的建设，同地方党组织搞好关系，爱护老百姓，并指示游击队若遭强敌围攻，可以西渡黄河向陕北转移，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公审土豪劣绅，开仓济贫，政治影响迅速扩大，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队员发展到二百余人。从此，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惊了山西的反动统治者。晋西各县政府纷纷向省方告急。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兵万余人前往“围剿”。游击队与敌激战数次，终因寡不敌众，向陕北转移，于九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清涧、安定（今子长县）一带，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了关系。后来，刘天章又与赵伯平联系，将晋西游击队及党的组织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十月，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合，成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九三一年夏季，在平定爆发了高桂滋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刘天章和特委的积极组织下进行的。高桂滋部原属国民二军，官兵多是陕西人，大革命时期驻守河南。刘天章在豫陕区委时与其旧部曾有过较多的接触，并在高部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高部被蒋介石强制参加中原大战，在山东战败，余部退往平定。到平定后，士兵生活困苦，反抗

反动官长的情绪日益增长。

正当高部地下党按照特委的指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的时候，在高部任排长的地下党员刘玉珊^①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高部地下党组织也有被破坏的危险。形势十分危急。地下党支部立即派人赶往太原，向刘天章请示。刘天章仔细分析了突变的复杂局势，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起义前，刘天章昼夜奔忙，除组织平定、阳泉地区一些日常的经济斗争配合起义外，还亲手拟制起义的文告、部队的番号、旗帜和印章。按照上级军委指示，由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谷雄一（又名苏亦雄）携带准备好的旗帜、文告、印章和传单，从太原赶往平定，具体地组织起义。

七月四日午夜，在谷雄一、赫光（原名万锡绂，高部连长，中共党员）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平定武装起义爆发了。次日，宣告成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苏亦雄任政委，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稍加整顿，离开平定县境，转战到河北阜平县城。红二十四军在阜平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还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得悉红军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指示太原市委立即将这个胜利的喜讯传达到党员和群众中去。顿时，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阶级惊恐不安。坐镇北平的张学良，急令军阀石友三旧部沈克配合高桂滋余部前往“进剿”。

^①刘玉珊，陕北人，当时在高部第一团任排长。1931年6月下旬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平定起义后，被高桂滋下令杀害。

老奸巨猾的沈克，设下“假投降”之计，率部向红军“投降”。我军领导人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信以为真，仓促前去接受改编，结果被俘，遭敌杀害。敌军乘机分两路进攻阜平县城，我军被迫撤离，横跨过晋北山区十余县，击退追兵十余次，从保德县境渡黄河到达陕北府谷和榆林一带，后又遭军阀井岳秀所部包围，起义归于失败。

红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心急如焚。刘天章受特委的重托，一面给陕北特委写信求助，一面派马明芳去崞县、大同给党员李志敏、聂鲁质送信，要他们二人尽快前往陕北寻找红二十四军。他也亲自化装成贩牲畜的商人，日夜兼程，前往陕北，准备召拢部队，直接指挥。当他赶至黄河岸边时，得知红二十四军已经失败，又重返太原。这时，由于叛徒出卖，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已遭破坏，阴凯卿^①、任国桢^②等负责同志相继被捕。十月下旬的一天，刘天章刚回到太原，也被敌人逮捕。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刘天章被捕后，敌人将他和阴凯卿、任国桢押解到太原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他都严守党的机密，用化名

^①阴凯卿（1904年—1931年），山西夏县人，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春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同年10月21日被捕，不久壮烈牺牲。

^②任国桢（1898年—1931年），辽宁安东县人，历任中共奉天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1931年10月初，河北省委派他到太原任山西特派员，拟任山西特委宣传部长。10月21日被捕，不久壮烈牺牲。

王慎修，山西蒲州人，是个卖柿子的，来对付敌人。敌人无可奈何，便拉出叛徒张绍武^①、陈伯英^②、孙武^③、张凯^④等出庭作证，供出了刘天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接着，敌人又派出山西省“清共”委员会委员兼审讯员刘冠儒，对刘天章等进行诱降，遭到了失败。从此，敌人对刘天章加紧迫害，坐老虎橙、压杠子、抽皮鞭、灌辣椒水等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都用尽了，但他总是以“不知道！”“没有！”“不明白！”回答敌人，或干脆拒绝回答。一次，敌人用烧红的铁链盘在刘天章的腰间逼讯，刘天章咬牙忍痛，面不改色，一言不发。敌人大为震惊地说：“烧烙铁还要发出响声，何况他是一个人，连口气也不出，共产党人是铁汉子啊！”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刘天章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不屈不挠，使敌人一无所得，束手无策。

叛徒张绍武为了邀功讨好，无耻地向敌人献出由他出面同刘天章对证的苦肉计。敌人如获至宝，先将张绍武光着身子吊起来，假装受刑很重的模样，然后提审刘天章等人。张绍武一见刘天章、阴凯卿、任国桢便大声呼喊，说：“我受毒刑，实在无法忍受，已经供出了特委的全部地下活动，你们也从实说了

①张绍武，原名丁楚源，被捕前任山西特委代理秘书长，被捕后叛变，致使山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壮烈牺牲。

②陈伯英，被捕前系由河北省委派往山西整顿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被捕后叛变，充当国民党特务，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③孙武，原名孙晓幽，又名孙光斗。捕前任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代理书记，被捕后叛变投敌。解放后改名薛向晨，窃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要职，1963年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判刑劳改，1970年12月病死在狱中。

④张凯，曾任晋军驻太原李报膺十七团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后被捕叛变投敌。

吧，如不说，也会和我们一样受各种苦刑。”敌人乘机阴阳怪气地对刘天章他们说：“张绍武已经如实招供，你们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刘天章厉声怒斥敌人，说：“他说什么，是他的。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①“你调来全中国四万万 人证明，我也不是刘天章！”^②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暂时收场，便从生活上对刘天章百般虐待，每天只供给少量发了霉的高粱馍和稀汤。刘天章原来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非人的折磨下，他的病又复发了几次。

在狱中，刘天章和难友谈及那几个叛徒时，十分憎恨，总是气愤地说：“无耻”；对年轻党员和进步青年则教育安抚，提高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指出光明的前途；对自己，他总是爽朗地说：“死何惧之！”^③他绝不提家事和个人的私事，一心惦记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敌太原警备司令部施用了种种酷刑和卑劣的手段都没有使刘天章等屈服，最后将他们移交给新成立的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继续审讯。会审处审判长、大刽子手韩甲三在阎锡山的指挥下，组织了五个审判官进行会审。刘天章把法庭当战场，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逐条据理驳斥，义正词严地质问敌人：共产党人救国救民，拯救民族危亡，何罪之有！敌人被驳得理屈词穷，便依仗反动权势，丧心病狂地判处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等死

①李志敏：《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和一九三一年的大破坏》，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2辑第26、27页，1982年5月出版。

②《刘天章同志传略》（1946年编写），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科。

③太原双塔寺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委员会：《记刘天章同志》，《陕西日报》1979年5月11日。

刑，并报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批准后开庭宣判，立即执行。

出庭前，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要最后下毒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送给狱中的党员，请转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狱中党员睹此情景，无不凄然泪下。

十一月十三日^①，阴森的气氛笼罩着太原。全城交通断绝，布下了严密的岗哨。小东门外的刑场上布满了宪警和匪兵。审判庭杀气腾腾，刀枪林立。敌人对刘天章、阴凯卿、任国桢等要下毒手了。他们在法庭上仍骂不绝口，宣判还未结束，就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棉花将他们的口塞着，在场的群众莫不为他们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连一些押解的卫兵也惊叹不已。下午，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惨遭阎匪枪杀，壮烈牺牲。

刘天章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将光照千秋，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他的战友们缅怀先烈，曾赋诗撰文歌颂他、纪念他：“太原闹革命，潜足亦潜行。义起平定县，血染阜平城。赫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光华开昌运，是慰在天灵。”^②

全国解放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

^①刘天章牺牲的日期，还有二说：一说为11月22日，一说为12月中旬，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②此诗为赵鹏九所作。赵鹏九曾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现任西安市政协常务委员。

遗骸，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永志纪念。

作者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外，还参阅了《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924年），《北京晨报》（1924年），《新中州报》（1924年—1926年），北京《益世报》（1931年7—8月），《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2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版），《平定武装起义专辑》第1辑（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李志敏、阎子祥、曹普：《血染太行播火种——纪念平定武装起义五十周年》（《山西日报》1981年7月10日第四版），《陕西文史资料》第6、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杨钟健、潘自力、杨晓初、杨明轩、安子文、魏文伯、赵伯平、阎红彦、徐彬如、刘国璋、阎子祥、白超然、高克亭、马方庭、姜凝先、陈子毅、赵鹏九、郭洪涛、马文彦、屈武、师哲、田有幸写的回忆材料。编写过程中，还先后访问了方仲如、赵伯平、屈武、张仲实、徐彬如、赵鹏九、吴岱峰、郭洪涛、师哲、高克林、朱敏、吴化之、罗章龙、刘仁静、刘依仁、郑自毅、马文彦、张耀斗、刘尚达、张文华、王子休、曹志麟、杨慰祖、冯润璋、梁俊琪、陈云樵、关中哲、杜松寿、王圣域、韩志颖、呼震西、田有幸、严天明、王带南、张秀逸以及刘天章烈士的遗属刘德生、刘雪琴、胡振家、刘佩茵等同志。

韦拔群

陈欣德

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韦拔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的光辉业绩，象盛开在壮乡の木棉花一样鲜红灿烂，映红了祖国的南疆！

“愤不平”

一八九四年二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峨村东里屯（现东兰县武篆公社那烈大队东里生产队）的一个壮族家庭里。他初名秉吉，后名秉乾，进贵州讲武堂学习时，改名韦萃，字拔群。他祖父名叫韦天宝，原先靠打草鞋和打柴为生，后经营烟叶、甜酒等，逐渐发家置业，富裕起来。父亲的名字叫韦尔章，是前清的例监武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在家贩运布匹和烟叶。拔群共有异母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

当时，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地处偏僻山区的东兰县，更是“军阀、贪官、劣绅、土豪、土霸互相勾结，任意

摧残，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流离转徙，民不聊生。”^①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给少年时代的韦拔群留下深刻的印象。

韦拔群年少时，经常与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下地劳动，一起拣野菜，一起游泳、捞鱼、打鸟、捣蜂窝，耳闻目睹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从小就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好打抱不平，敢想敢做，正直刚毅的品德。一次，他把祖父装钱的箱子撬开，取钱周济贫苦的小朋友，他祖父知道后，揪住他的耳朵，骂他是“败家子”。韦拔群平时特别喜爱听老人讲太平天国、义和团、水浒等故事及古代东兰农民在银海洲山上打土官韦虎臣的传说，对那些打富济贫、扫荡妖气的英雄更是敬仰不已，经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贫富如此悬殊？如何打破这世事之不平？

韦拔群八、九岁时，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十四岁进东兰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时，他极爱好体育活动，经常和同学比赛跳高、跳远、长跑、打秋千，不仅锻炼了身体，也锻炼了意志。

一九一一年，他在宜山县庆远中学读书时，对学校的腐败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后因反对给举人校长送礼祝寿，被学校当局以“不尊重和侮辱师长”的罪名开除出校。同年秋，他由一位亲戚介绍转入桂林广西法政学堂就读。家里很希望拔群能从此打入政界，而他却不以为然，对学校宣扬的那套为官生财之道和那些一心钻营利禄的纨绔子弟非常厌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戴四方顶的法官帽和穿长袍马褂，而他却经常拆去头上的四方顶，脱掉身上的长袍，以示反抗。一年后，他

^①见广西东兰县农民协会：《快邮代电》，现存广西博物馆。

认为这样的学校与自己求学愿望相违背，便摔掉头上的半截法官帽，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毅然离开法政学堂。

韦拔群从桂林回到家里，因父亲已去世，公公要留他在家管理家务。但他认为男儿志在四方，不应在家闲居。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说服家人，筹集路费，于一九一四年，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经过一年多的社会考察，使他扩大了眼界，进一步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社会的黑暗，国家的危亡，激发了他争国权、图自由、求平等的志向。

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复辟。韦拔群愤慨万千，立即回到家乡，招募一百多名有志青年，树起义旗，举戈讨袁。他英姿勃勃地带着这支讨袁义军，投到贵州熊克诚护国军旅部，被编成一个连，韦拔群任连副。但旧军队的腐败黑暗，又使韦拔群的满腔热忱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他曾因反对兵痞出身的连长虐待士兵而遭到诬陷、降职、撤职以至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送到贵州讲武堂学习。

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劳农政府的消息。韦拔群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潮。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韦拔群正在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他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急流中去，热情宣传十月革命思想。在深夜里，他挥笔疾书“拥护社会革命”、“提倡改革军制”和揭露旧军队黑暗的传单标语，在军中秘密散发。为了表达自己“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他取了“愤不平”这一化名，署在传单、标语上，以“愤不平”的响亮名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发出勇猛挑战。同时，他还把自己学过的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赠阅”的印记，寄回东兰给旧友阅

读。

不久，韦拔群在军中的革命活动受到军部军法处的查究，他便弃职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寻访多年仰慕的孙中山先生，但没有遇到。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在广州参加了受孙中山和廖仲恺支持的以驱逐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六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陆被驱赶下台，孙中山委任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韦拔群便随同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马君武见韦拔群是一个刚直不阿、热血有为的青年，先后要委任他当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韦拔群另有抱负，都推辞了。

三 打东兰县城

一九二一年农历八月十五日，韦拔群风尘仆仆从南宁回到了东兰武篆。他“鉴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之横暴，乃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与贪污土劣相奋斗。”^①这是韦拔群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个实践。他当时共联络了对社会悲愤不平、思想进步的陈伯民（陈新图，后牺牲）、黄大权（黄子衡，后牺牲）、黄孟儒（后叛变）、牙苏民（牙玉玠，后牺牲）、黄树林（黄孟衡，后牺牲）、韦命周（韦介新，后叛变）等十多人参加改造东兰同志会，并成立演讲团，发布各种有关社会革命的宣传品。韦拔群同大家一起，拿着白纸旗，

^①见《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现存广西博物馆。

经常到武篆圩场宣传演讲，号召各族群众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

一九二二年初，“陆酋散军骚扰，东兰同志会在武篆区开国民大会，团结一致抵抗捐税。”^①会后，韦拔群与陈伯民二人日夜兼程赶到百色，跟桂系旅长刘日福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迫使刘日福撤销了征收苛捐杂税的命令。

武篆区有一个大土豪杜琨选（又名杜八），是五十多岁的贡生，曾在贵州做过两任县知事，靠放高利贷起家，一贯与军阀、贪官污吏勾结，横行霸道，敲榨勒索，鱼肉人民。他曾以兴建武篆育才小学为名，向群众征捐八百多元的建校款，从中贪污了三百多元，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一九二二年二月，韦拔群带领“改造东兰同志会”会员及农民群众数百人，来到杜八家院，对他进行清算斗争。杜八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其侵吞公款的罪行，并把赃款全部退了出来，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农历三月初三），韦拔群召集“改造东兰同志会”会员，在武篆巴学村北帝岩（一个可容一千多人的大山洞）召开会议。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活动，以适应斗争发展形势需要，会议决定把“改造东兰同志会”改组为“东兰公民会”，继续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作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同年五月，韦拔群等在武篆区那烈乡的银海洲山上举行“东兰公民会”成立大会。到会有东兰各区革命青年共一百多人。大会确定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为“公民会”宗旨，“继续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斗争。”^②韦拔群在

^{①②}见《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

会上用古代农民在这个山上烧毁土官韦虎臣筑的城堡而变成遍地银海的故事传说教育大家。与会者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等口号。最后，大家端起团结酒，在刀架下对天盟誓，表示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在此同时，韦拔群还变卖了部分家产，带头购买枪械，组织国民自卫军。为了发动受苦最深的瑶族群众，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深入到瑶胞居住的西山区上段的弄台、中段的弄京、下段的弄里、弄凡等地，以打老庚（结拜兄弟）的方式进行串联，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不给山主叫相公老爷”“不给山主抬轿、服役、送礼”等口号，深受瑶胞的欢迎和拥戴。他们听了韦拔群的宣传后，纷纷宣誓加入农民自治会，并拿出粉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成立了西山国民自卫军。大家亲昵地称韦拔群为“拔哥”，表示跟拔哥闹革命。

各地农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后，韦拔群根据各族贫苦农民的要求，决定清算东兰县大土豪韦龙甫。韦龙甫是土官的后代、县里六个区的团总，他仗势霸占田地二、三百亩，家里豢养有大批走狗，包揽诉讼，无事生非，无罪加罪，不少贫苦农民被害得家破人亡，群众称他为“阎王鬼”、“第二衙门”，一提到韦龙甫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公民会”成立后，各地来信控告韦龙甫的案件就有数百起之多。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农历五月十三），韦拔群挑选了四十多名强壮勇敢、武艺精练的青年组成先锋队，身藏短刀和手枪，包围了韦龙甫的住宅。为了警告县知事蒙元良和驻军营长罗颂康，要他们不干涉群众的清算斗争，韦拔群亲自到县署找他们联系。但先锋队队员报仇心切，不等韦拔群回来，就冲进屋

里把韦龙甫绑了起来。韦龙甫的小老婆寻隙跑到县衙门报信，反动营长罗颂康当即派兵去解围，放了大土豪韦龙甫，抓走了六名先锋队员。后经韦拔群的抗议、交涉，罗颂康才将抓走的队员放了回来。

此后，韦拔群率领先锋队员回到武篆休整。大家对土豪劣绅、反动军队、贪官污吏的相互勾结很气愤，认识到要打倒土豪劣绅，必须同时把贪官污吏和反动军队打倒。因此，韦拔群立即召集“公民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领导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分头到各地发动各族群众，筹款购置枪枝，扩大国民自卫军力量，准备武装攻打东兰县城。

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准备，同年七月一日（农历五月十八），韦拔群带领三百多名自卫军战士，分四路进攻县城。韦拔群担任攻城总指挥。当时，守城的敌人有一百多人，凭三座炮台顽守。战斗在拂晓打响。四路农民武装把县城紧紧包围了两天两夜，快要破城的时候，天空突然下了大雨，粉枪火药被雨水淋湿，失去效力，加上城南的九曲河水暴涨，南路农军过不了河，故没有攻克县城。黄榜辉等几位农军骨干在冒雨强攻中英勇牺牲。此时，韦拔群命令攻城农军撤回各区，然后召集各区负责人到武篆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发动群众添置枪枝，增强武器装备，并对第二次攻城作了部署。会上，韦拔群自报买枪六支，在他的带动下，当场共报买枪二十多支。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农历六月十八），韦拔群又带领几百名农民武装，第二次进攻东兰县城。农军以手巾围在左手为号，分三路向县城攻击。但这时县城敌人已事先作好防御准备，附近的豪绅地主武装也集中到县城来，结果，县城又攻打不下。

韦拔群并不气馁，他从两次攻城失利中进一步认识到，对敌斗争不能光凭热情，还要有冷静的头脑和武装力量。他一方面教育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另一方面抓紧训练农军，暗中进行准备，并指示各区监视好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来往，封锁一切消息，孤立县城敌人。至同年九月，恰罗颂康营奉命调回百色，韦拔群便趁守城敌人力量薄弱之机，于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率领近千名农民武装，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四路农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县城下，因天亮前县城的炮台没有敌人防守，韦拔群便指挥农军首先攻占县城的三个炮台。拂晓时，韦拔群发出攻城信号，农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进县城。敌人惊慌失措，躲在衙门里负隅顽抗，一直激战至下午时分，敌兵纷纷缴械投降。县知事蒙元良光着脚板，翻墙狼狈逃往凤山。东兰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农军进城后，释放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无辜群众，并宣布没收韦龙甫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各族贫苦农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一连唱了几个晚上的山歌，尽情欢庆农军攻城的胜利。

这次攻打县城的胜利，显示了壮、汉、瑶各族农民团结战斗的力量，揭开了右江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但是，这次斗争仍属于自发性质，农军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当驻百色的匪旅长刘日福伪装调解，撤换东兰知事蒙元良、并吸收公民会会员参加在县城新成立的参事会和议事会时，韦拔群便把攻城农军解散回乡。不久，敌人进行反扑，新任知事黄瑶琼杀害在县城负责宣传工作的公民会成员，并电请刘日福派兵镇压农民运动，革命进入低潮，不少同志遭杀害，韦拔群等被诬为“劳农党”而受通缉。他对此感到苦闷、不解：天下偌多道路，究竟真正的革命出路在哪里？

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

正当韦拔群迫切盼望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的时候，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根据地。韦拔群决定与陈伯民出走广州。

韦拔群、陈伯民此行，本想从东兰到南宁，再乘船下梧州到广州。但他们走到奉议县（今田阳县），遇到三个东兰籍的匪兵，只好连夜潜回东兰，改道黔滇，抵昆明，乘滇越铁路到西贡，转香港，后由香港到广州。时已一九二四年秋。在广州，他看到国共合作后工人、农民、学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深受教育和鼓舞。

一九二五年一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认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共产党员。韦拔群对农讲所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问题等理论课程。教员讲课时，他十分用心听课和记笔记，共记了厚厚的一本。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思考，经常用东兰农民革命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论证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认真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时，他还认真学习外地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并到附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情况。通过短短三个月的学习，他的思想起了一个新飞跃，找到了自己过去之所以到处碰壁、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兰民于水深火热”^①，而要

^①据广西省东兰县农民协会：《快邮代电》，现存广西博物馆。

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时候起，韦拔群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

韦拔群和陈伯民在广州农讲所结业后，被中央农民部委派为广西农运特派员，带着《农会组织法》等文件，从广州先回到南宁。时值滇桂军阀混战，南宁局势紊乱，韦拔群认为在南宁无所作为，他们便步行返回东兰县武篆区。

一九二五年四月，韦拔群和陈伯民回到家乡后，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广泛组织农会、农军，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韦拔群经常同村里的知识青年，秘密到附近的东里潭里的小山洞翻印从广州带回来的文件和革命传单。他还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亲自编写山歌，配上曲谱，向群众教唱、宣传。其中有这样一首《革命歌》：“思想这社会，太不平等，为什么分成贵贱？终日劳苦的人无衣穿。凡我农友，都要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资产阶级，才得幸福。”^①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东兰县各区、乡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东兰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

为了培训农民运动骨干，适应东兰和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韦拔群与陈伯民等商量，决定按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东兰县武篆区的北帝岩（一九三〇年改为列宁岩）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①陆秀轩、黄举平：《韦拔群烈士遗作》。

北帝岩，屹立在翠绿的拉甲山腰上。岩前有一条晶莹的小河，其流水声如轻敲的铜鼓。岩洞平坦宽敞，雄伟壮观，可容纳一千多人，是一个天然的大课堂。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农讲所正式开学。韦拔群任主任，陈伯民任副主任兼管理员。学员来自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今田东）、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都安、河池、南丹等十一个县，共二百七十六名，都是由当地农会介绍入学的各族农运骨干或青年学生。

农讲所内贴着韦拔群亲笔写的标语：“快乐事业，莫如革命”和“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等。这些闪耀着革命战斗火花的标语，成为当时农讲所的校训。农讲所设置的课程，基本与广州农讲所一样。韦拔群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用当地阶级斗争实例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到圩场作街头宣传；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成立农民自卫军；参加清算地主豪绅、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使学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能力。

农讲所的创办经历了艰苦的斗争过程。因它不是官办的，因此，不仅受到敌人的非难和破坏，而且在经费和设备方面也遇到很大困难。为了解决经费困难，韦拔群除了变卖家里财产外，还带领教员和学员，自制课桌、床铺、用具，上山砍柴，开荒种菜，编草鞋，织草席，用稻草编织“革命被”。他同学员一样，穿草鞋，铺草席，盖“革命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农历十月十五日），韦拔群、陈伯民等在县城发起召开国民党东兰县党员大会，成立县党

部,并选黄榜臣为代表到南宁参加省党部成立大会。县党部成立那天,韦拔群组织“育才高小校及农所学生赴会,县署司法科黄德馨、县知事黄守先之弟黄智渊,率警登山拦阻,学生不惧,直到县署门演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劣绅、土霸等口号。”^①黄守先认为“贪官”是有意指他,对农讲所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农历十二月六日),伙同江平乡大土豪龙显仁武装进攻农讲所。

韦拔群早已料到敌人要对农讲所下毒手。他率领学员英勇还击一阵后,便悄悄沿着洞内的“通天坠道”,神速向山后撤退。敌人不见洞内还击,便破门而入,大肆焚灭各种书籍、文具和学员行李,然后得意洋洋地拔队到那禄村驻防,当晚在该村大吃大喝,以庆祝自己的“胜利”。正当他们喝得半醉不醒的时候,韦拔群率领农讲所学员和附近三百多名农民自卫军,突然包围、袭击那禄村,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乱成一团,狼狈逃命。黄守先被农军打伤,连夜逃回县城,连续几天惊魂不定。他立即向省军事署诬告韦拔群“埋伏党徒阻击知事”,图谋叛乱,要求省党部筹备处取消黄榜臣为东兰县党部出席省党部成立大会的代表资格。后因省党部里共产党员的极力斗争,黄守先的诬告被否决,黄榜臣的代表资格不仅有效,而且参加了大会政治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②。

第一届农讲所原定时间为半年,由于敌人武装进犯,只开办三个月,便提前结业,学员被分配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

^①陈协五:《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载1926年9月7日、14日《农民运动》第6—7期。

^②据《“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议材料》。

民自卫军，有力推动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二月，桂系军阀派龚寿仪一个团的兵力到东兰扫荡蒙志仁残部，对农民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黄守先和杜瑶甫，便趁机与龚匪互相勾结，为虎作伥，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敌人在一天内就把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及那烈、板免、那峨、弄内、廷怀、板乐等十个屯全部烧光，疯狂叫嚷“村村要过火，人人要过刀”，“血洗东兰”。据后来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到东兰调查统计材料，全县被烧、被抢、被抓、被勒索的农民有七千四百十八家，损失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达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被杀害群众七百多人。韦拔群家里的房屋不仅全部被烧毁，妻子陈兰芬和刚出生十二天的婴儿也被龚匪抓到东兰监禁。这就是震动省内外的广西东兰农民惨案。

面对匪军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镇压，韦拔群一方面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在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继续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敌人；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机，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和官僚豪绅互相勾结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要求“惩办其惨杀农民烧掳农村之罪犯官僚黄守先”，“惩办劣绅杜琨选……土豪龙显仁、陈儒珍、勒令其赔偿地方所受损失”，“勒令龚寿仪退还农民所被缴去枪枝，以备自卫”，“明令新任知事克日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韦拔群还派陈伯民、陈守和（后叛变）两人到南宁先后向省党部的农民部、青年部和省党部执委、监委联席会上报告东兰农民被焚杀事件。在广州国民政府的责成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省党部不得不派其农民部长陈协五（国民党左派）到东兰进行调查，并被迫将龚

寿仪调回百色，黄守先也跟着龚寿仪逃跑。

当陈协五到东兰调查时，韦拔群在武篆召集五千多人的欢迎会。“是日大雨滂沱，……秩序井然，毫无喧哗纷扰状态，并能提议决议关于农会的善后事宜。”^①会后，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陪同陈协五赴各区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陈协五写了一份比较真实反映东兰惨案的调查报告，题为《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登在广州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南宁市在我党领导下，召开了“南宁各界声援兰农大会”，东兰派来的代表在会上作了东兰农民惨案情况报告，大会发出支援东兰农运的通电，逼使广西当局成立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由陈勉恕、黄若珊、关学参（以上三人均为共产党员）、陈锡均（法官）、陈秉元（第七军副官）、左铸民（省财政厅秘书）等七人组成，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东兰进行调查慰问。十二月四日，陈勉恕写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东兰农民运动“是黑暗政治之反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军阀、豪绅官僚镇压农运的罪行。与此同时，调查组中个别反动分子在桂系军阀黄绍竑授意下，也写了一份歪曲事实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报告一起送省党部执委会，引起了争执，最后决定都送南宁《民国日报》发表。但印刷工人在排印时，抽掉了那份反动的调查报告，并在报上发表了声援东兰农民运动的通电。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东兰知事黄守先“交法庭讯办”，

^①陈协五：《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原载民国15年9月7日、14日《农民运动》第6、7期。

镇压农运刽子手龚寿仪“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而大土豪杜瑀甫则被通缉和没收其财产。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解决东兰惨案的过程中，东兰各地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韦拔群指挥四路农军第二次攻下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迁到县城办公。

为了加强党对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同年十月，共产党员陈勉恕被派到东兰县担任县长。接着，党又派共产党员严敏、陈洪涛到东兰和右江地区领导农运和开展建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东兰农运更加迅猛发展起来。十一月五日，韦拔群等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县革命委员会为县农民协会，陈勉恕被推选为主任，韦拔群被选为军事部长。

一九二六年十月，韦拔群又与陈伯民、陈洪涛在武篆育才小学开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发动各族妇女参加革命，这一届招收了四十二名女学员。韦拔群、陈洪涛、陈伯民、黄书祥等，带头动员自己的妻子或妹妹到农讲所学习。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与第一届基本相同，只是军事课中增加了武术训练，妇女班中增加了有关妇女解放和识字课程。他们结业后，回到农运第一线，领导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奉议县和恩隆县的学员，回县后也按照东兰农讲所的做法，在本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此，右江各地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的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东兰、凤山等县的农民运动更为兴盛，成为当时全国农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一九二六年底东兰县农民协会统计，全县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区农会十一个，乡农会一百三十四个，男会员七万五千六百六十人，女会员二千六百八十五人，农民

自卫军有五百余人”^①，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与评价。当时我党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刊登了《值得注意的东兰农民运动》一文指出：“位于西江上游而偏僻的东兰底农民运动，如果止凭脑海中的理想，任何人都要与事实相违背。……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兰的农民运动，实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东兰农民运动，是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韦拔群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屠刀，毫不畏惧，毫不气馁，仍然率领右江农民坚持斗争。

这年八月，韦拔群正抓紧在武篆举办第三届农讲所时，桂系军阀指派朱为珍部一个师和龚寿仪部一个团、刘日福部黄明远一个营，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攻东兰，妄图血腥镇压东兰农民运动。为了武装反击敌人进犯，韦拔群于八月中旬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东兰、凤山、凌云的农军编为三个自卫团：东兰为第一团，由牙苏民指挥；凌云为第二团，由黄大权等指挥；凤山为第三团，由黄明春（黄松坚）等指挥；韦拔群担任总指挥。

这时，黄明远营首先进犯凤山。韦拔群亲自率领提前结业的第三届农讲所一百多名学员到凤山社更乡迎击敌人，同时命令黄大权率领第二团在平乐担任阻击，特务连、驳壳队在二、

^①陈勉恕：《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原载民国16年4月《农民运动》第22、23期。

三都扰敌后方。据一九四三年编的《凤山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八月，共首韦拔群率党三千余人，至巴里村分路进攻，迫进城郊”；“同年八月十四日，共首廖源芳，率党数百，在长里区属岩腊村山寨，窥伺县城”。黄明远营被围困在县城达一个月之久，第一团农军曾在长洲与敌激战数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因敌人从百色调来援兵，敌师长朱为珍又率部攻打东兰，韦拔群只好指挥农军撤出战斗。为了保持革命力量，韦拔群决定将部队转移到峰峦重迭、地势险要的山，坚持与敌人作长期的武装斗争。他自己也抱病退入西山，设指挥部于平峒。

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一到西山，便与当地瑶族群众打成一片，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禁止壮汉农军战士对瑶胞的不尊重称呼，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徭役，得到广大瑶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西山，韦拔群利用其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十月，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农军驻地的弄美。韦拔群决定诱敌深入，分段歼敌。他先派一支小分队把敌人引诱到我军主力设伏的山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分段猛追猛打，充分发挥土枪、土炮、土地雷和石架的威力，杀伤了大量装备精良的敌人。经过十一昼夜的战斗，歼敌四百多，缴获大量武器。这一胜利，使农军威震四方。

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被农军拖得精疲力尽的朱为珍、龚寿仪等部调回百色，敌人对东兰历时一年多的“围剿”，遭到了破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共产党员余少杰等在恩隆县七里山区百定乡成立了“三南（田南道、镇南道、南宁道）总部”（亦称广

西临时军政委员会)。韦拔群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到“三南总部”联系，接受总部领导。同年冬至一九二九年初，总部两次派组织委员李正儒前往东兰，向韦拔群介绍总部的组织和任务，并与韦拔群谈入党问题。在此前后，中共广西临时省委负责人雷经天也曾派严敏到东兰西山向韦拔群传达党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农历七月初十），韦拔群在东兰县太平区板纳村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动员大会。当时洪水尚未退完，各地到会农民武装共有一千多人。会后，东兰、凤山两县的农民武装斗争又迅猛发展起来。

一九二九年六月，蒋桂军阀混战结束，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掌握广西新政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在我党影响下，比较靠近革命，要求我党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党中央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党员来到广西，利用合法和半合法地位，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从此，广西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和筹备，同年八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韦拔群化名“农友三”，与陈洪涛等秘密到南宁参加会议并向省委汇报工作。会上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雷经天被选为主任委员，韦拔群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二九年八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①。从此，他象加了油的马达，更加起劲地为党、为革命工作。

^①关于韦拔群的入党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26年，有的说是1928年。这里是根据中共广西特委1929年10月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和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组织编写的《烈士英名录》第4、5册说法。

在南宁期间，党组织为了加强东兰农军武装力量，介绍韦拔群与广西省主席俞作柏见面。经协商，俞作柏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韦拔群连夜写信回东兰，抽调三百多名优秀的农军分三路到南宁领枪。这批农军到南宁后，每人领到一支汉阳造的步枪和二百多发子弹，并被编成三个连，在南宁进行短期军事训练。韦拔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有了这些真家伙，回东兰，就可以把敌人象抓小鸡仔一样了！”

同年九月一日，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党中央代表贺昌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精神，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大会作出了关于准备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党代会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好基础，党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成立右江农协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同时，派严敏到东兰筹建中共东兰县委。

九月十三日，韦拔群与上级党委委派的军事教官钟鼎同志从南宁带领这支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了东兰武篆那论村。第二天，中共东兰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论村召开，韦拔群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县委委员。会议作出解放东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决议。

为了贯彻省和县党代会的决议，韦拔群于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十四）下午八时，以军事部主任名义，命令从南宁领枪回来的三个连农军和甲里民兵自卫队，于“十五日上午拂晓，分作三路”，进攻“盘踞中和的反动土劣民团。”^①在韦拔群的

^①此命令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直接指挥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敌人向北败退，武篆大土豪陈舜裔被击毙，中和获得解放。解放中和那天，韦拔群以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名义发出如下布告：

我们这个部队，原为人民武装。
目的实行革命，打倒贪污豪强。
拥护人民利益，是为本党主张。
顽距中和土劣，残暴胜过豺狼。
烧杀掳掠剥削，谁不恨结心肠。
为此开起义旗，要把反动灭光。
希望劳苦大众，大家参加戎行。
消灭共同敌人，我们才见日光。
如有觉悟民团，投诚就认为良。
若能擒来首恶，定予立功授奖。
现在贴出布告，群众切莫惊慌^①。

在此同一天，韦拔群又命令新成立的农军第四连连长黄昉日，带领该连战士攻入三石区，使两地敌人不能互相援助，表现了韦拔群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十月中旬，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我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来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与韦拔群率领的农民武装汇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决定把从南宁运来的枪枝立即发给右江各县农军，韦拔群派农民自卫军战士前往百色领回了一大批枪枝。麇集在东兰县城的数百反

^①此布告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动武装闻讯后，伙同地方民团扑向武篆，妄图抢夺枪枝。韦拔群率领农军，英勇击退敌人，保住了武器。战斗中，韦拔群的左手负伤，仍然继续指挥战斗。

同年十月下旬，韦拔群决定攻打反动巢穴东兰县城。他在巴拉设军事行营，以军事部主任名义向全县农军发出了“实行解放东兰”的命令。命令指出：“麀集在东兰县的反动土劣民团及伪县长邬尘曼所有的警兵，共计千余敌人，我们决定在明日拂晓向该敌进攻”^①。按韦拔群部署，我军分三路从县城背后、那亨和即团进攻，韦拔群亲自指挥迫击炮连占领即团背后五老三，袭击城内敌人据点，守城敌人见农军声势浩大，火力猛烈，乘夜弃城向安箐隘洞方向逃跑。农军猛追侧击，敌军死伤无数。反动县长邬尘曼揣着官印，随着残匪赤脚奔逃，在红河边丢下了行李。

东兰县城解放的第二天，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庆祝大会，公审了武篆、长江和兰木等区的反动豪绅地主。接着，全县一百六十八个乡相继解放。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到县城办公，颁布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②，提出了“废除钱粮田赋”，“实行焚烧契约债券”，“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农”，“严禁虐待瑶民”、“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这个政纲，体现了党的“六大”精神。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邓小平、张云逸和韦拔群等在百色胜利举行

①命令原件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②现存东兰县革命纪念馆。

武装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红七军共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钟鼎任参谋长。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当选为政府委员。

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红军战士越出东兰地界，肃清各地反动武装，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伪司令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城、百色属大新的大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等反动武装。他亲自率领红军战士及盘阳弄凡等地的赤卫军共同攻打，解放了大所，并帮助大所建立工农民主政府。这时，东兰至恩隆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韦拔群还积极动员各族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扩大红军力量。当时，他亲自写了这样一首《青年革命歌》：

劳动群众快快醒，
参加革命当红军。
青年的同志，
应将重任负于肩。
个个练成铁石坚，
才算得真正革命，
一切障碍及反动都肃清！
方不负红军的威名，
唱凯旋①。

①转引自《巴马文艺》1979年第2期。

一九三〇年二月，红七军第一、二纵队经过隆安县和恩隆县马鞍山战斗后，主动撤出右江沿岸县城，向东兰、凤山转移。在隆安激战中，韦拔群率领这支未经过正规训练、刚由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红七军第三纵队，担负了左侧翼进攻任务，与敌人正规部队作战。他沉着、果断，指挥战士们勇猛地向敌阵奔驰杀去，使敌人惨遭痛击^①。当我军主力部队转移到现巴马县亭泗时，遇到四千多匪军的截击，形势很严重。韦拔群立即带领第三纵队战士，组成一个敢死队，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重创。第三天，我军顺利进入凤山县盘阳区休整。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决定第一、二纵队开赴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凤山根据地。

三月初，第一、二纵队出发不久，邓小平恰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武篆。这时，韦拔群便同邓小平一起，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到东里屯、板勉屯、旧州屯等地进行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的调查。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亲自到自己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并动员家人带头入社。该屯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在韦拔群的宣传发动下，全屯一百二十户都入了社。共耕社举行成立庆祝大会时，韦拔群与邓小平、雷经天等一起，佩着红领带出席。韦拔群在会上号召说：“今天的大会是从来没有的大会，我们就是要做过去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成立共耕社，大家要努力搞好生产，拔掉穷根，过幸福生活。”^②邓小平也代表红七军前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共耕社

^①莫文骅：《回忆韦拔群同志》，《回忆韦拔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东兰县《中和公社志》。

“成为一个发展生产的火车头”^①。邓小平、雷经天和韦拔群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深入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思想反映，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他们了解到共耕社缺乏耕牛时，立即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名义，给共耕社送去了十二头大水牛。

东里共耕社在乡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下，按全乡人口和劳动力等条件，分成七个生产队，划分耕作区，耕牛和农具统一使用，土地和种子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生产。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连望天田也犁二次、耙二次、耘三次，还打树木叶子做基肥。六月天，遇到大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与共耕社干部开会商量，决定发动群众挑水抗旱，不准旱死一株苗。军民一齐动手，抗旱保苗，还修了一条几里长的水渠，韦拔群亲自进行测量。结果，寒露还没有到，谷桶就打响了。获得了当年粮食大丰收。据统计，产量比一九二九年增产三成多。粮食按社员年龄分等级分配：十三岁以上的每人分得线谷八百斤，十三岁以下的分得二百至五百斤，全社留下一万二千斤作为公粮，支援红军。分谷那天，歌声和笑声汇成一片，比“三月三”传统节日还要热闹和高兴。秋收后，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共耕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邓小平和韦拔群既有敢于试验和探索的革命精神，也持慎重的科学态度。他们没有因为东里共耕社获得当年增产而全面铺开，除了在其他县个别乡继续试点外，其余都采取“分配农民个别耕种”的分耕制

^①东兰县《中和公社志》。

方式进行。在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条件成熟的乡村，都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更加热爱新生红色政权，热爱工农红军。大家异口同声说：“共产党真好！土地革命真好！”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耕，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

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〇年十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一千多名武装，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句怨言，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韦拔群返回东兰那天晚上，张云逸军长代表军前委，特地给他送行。在银色的月光下，他们肩挨着肩，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送了二十多里路。韦拔群考虑到这一带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张云逸身边只带有两个警卫员，怕他回去路上发生意外，又把张云逸往回送了一程。路上，韦拔群虚心征求张云逸的批评意见，张云逸深情地说：“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长，但我

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你的任务更加艰巨，要紧靠依靠党和阶级同志，坚持斗争到底！”分别时，韦拔群紧握军长的手，激动地说：

“我们一定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①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立即与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等着手研究扩大部队和巩固根据地工作。他们决定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二十一师来，各县则新成立赤卫军常备营。经过很短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现巴马县乙圩召开了二十一师成立大会。部队由原来留下的一个连扩大到三个团（即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和一个独立营，分布在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百色、南丹、都安一带，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主力从河池出发不久，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立即调派十九师师长廖磊（后为第七军军长）指挥近一万匪兵大举向东兰、凤山两县进攻。敌人气势汹汹地分三路进犯：一路由廖磊率队从田州向东兰进犯；一路由韩彩凤率队由河池向东兰进攻；一路由岑建英和贵州军阀黄海平两个团从天峨向凤山进攻，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如蛇蝎出动，猖獗配合，大有一口吞噬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势。

反“围剿”的战斗开始了！韦拔群和陈洪涛、黄明春等率领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的锋芒，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打击敌人。同时，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配合部队，以战斗保卫根据地。韦拔群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舞群众斗志。诗中说：

^①张云逸1962年的回忆。

穷人闹革命，众乡亲，
雄心要坚定。
那时灭土豪，吃穿好，
饭饱衣又新。
今日处恶境，但相信，
雾散天会晴^①。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三，廖磊所部抵达东兰县城。韦拔群命令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县城。撤退前，部署在所有的交通要道、学校、隘口埋下了土地雷，敌人一踩到它，脚下红光一闪，“轰”的一声爆炸，炸得敌人抱头鼠窜，寸步难行。敌人为了保命，常拉群众的耕牛在前头踩雷开路。但是，我军也随之改埋为“活地雷”，等牛群过后才拉引线，牛群听到地雷响声，被吓得掉头狂奔。敌人不仅挨“活地雷”炸，而且还挨牛群撞，死伤无数。

由于各村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每到一处，要柴无柴，要米无米，而迎接敌人的，除了地雷外，还有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工农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对红军毫无办法，就更加残害百姓。他们沿途纵火，烧毁房屋，搜查山洞，奸淫掳掠，见人就杀，见农作物就踏毁。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践踏蹂躏下，变成一片废墟。

三月二十五日（农历二月初七），廖磊率其指挥部进据武篆，分区“搜剿”，以为韦拔群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就是有插

^①转引自《奔腾的左右江》，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翼能力，亦难飞脱。但是，韦拔群却经常率领红军部队，散伏各峒，神出鬼没，寻机袭击敌人。敌人不仅到处扑空，而且时常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击。

有一次，驻武篆的敌人，由于在当地找不到粮食，只好远道从盘阳运粮。韦拔群闻讯后，便派红军战士到中途截击，夺得敌人几十担粮食和蔬菜，使敌人的供给更加困难，士气低落，廖磊一筹莫展。

一天晚上，韦拔群带领马枪排和秘书李正儒从那烈乡来到善学乡附近的弄砦洞，慰问躲在岩里避难的群众，并在洞里等待县委书记和县工农民主政府负责人黄举平、覃联魁等汇报工作。他对洞里的群众、干部说：“眼下，疯狂的敌人可能很快打进来，大家要做好牺牲准备。但是，乌云总要被太阳驱散，白匪军最后一定完蛋，我们要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敌人确实向弄砦洞打来了，群众很担心韦拔群的安全，但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直等到黄举平、覃联魁赶来汇报完工作后，才回西山。临走时，他考虑到洞里群众的安全，留下一班战士，掩护群众坚守山洞。韦拔群离开弄砦洞后第二天，一心想抓到韦拔群的廖磊，便派四个连攻打此洞。洞里的军民，英勇顽强地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一直坚持了十多天。后因洞里缺粮、缺水、缺子弹，洞口被敌人攻破，守洞的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敌人终于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冲进了洞中，但却连韦拔群的影子也未见着。

廖磊抓不到韦拔群，气急败坏，到处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花红七千元。”韦拔群看到布告后笑着说：“我也给他写一张！”说完，便拿起笔这样写着：“谁砍得廖磊的狗头，赏花红一个铜板！”写好后，叫红军战士拿到善学乡的

路口张贴。廖磊知道后，气得狂叫：“立即给我把布告撕毁！”去撕布告的敌兵，脚下又踩响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

战斗在凤山等地的军民，也在党的领导和韦拔群的指挥下，英勇地抗击着敌人。本来，廖磊扬言在三个月摧平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但结果，正如国民党编的《东兰痛史》哀叹的：“军团分山搜剿，计已期月，所捕获者，不过是顽瑶羸汉，毫无伤红匪。”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从香港来到东兰西山，指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作，并传达党中央关于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为了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总结半年多来反“围剿”斗争经验，二十一师党委（陈洪涛、韦拔群、黄明春为常委）在东兰泗孟区的西山丘板屯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陈道生作传达报告，韦拔群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宣布二十一师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韦拔群仍然担任师长，陈洪涛担任政委和右江特委书记，黄明春任副师长。师下设三个团的番号不变。会后，各团分别进行整顿、训练。

同年九月，韦拔群与陈洪涛率领部队东渡红水河，转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九月下旬，红军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十月二十日，攻打都安县九顿圩蒙元彩团局，缴获了一大批枪枝弹药和物资。廖磊部罗活团闻讯，即由河池赶来围攻，妄图纠合地方民团对我军构成方圆数百里的大包围，然后把我军赶到红河东岸，逼我背水作战，前后夹攻，一举消灭。韦拔群得到情报后，认识到情况的严重和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困难，立即率领部队紧急撤

退，乘夜绕过崇山峻岭，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以高速行军，强渡过红水河到达东山苏托。在东山，他们趁东兰县城守敌空虚，突然袭击县城，守城敌人惊慌失措。当红水河的守敌拔营来援时，我军已撤离城郊，又神速地渡过了红水河，回到了西山根据地。

回到西山后，韦拔群和陈洪涛、陈道生对这次向外游击的军事行动进行总结，认识到远离根据地到外线冒险作战，是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从此，他们抓紧进行巩固根据地工作，以迎接敌人新的进犯。

不久，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党在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韦拔群因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三二年，蒋桂军阀矛盾暂处缓和。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其心腹之患，对东凤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大“围剿”，白崇禧曾亲自到东兰指挥。敌人采取层层进逼的所谓“剥笋战”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掳光、铲光的“血洗政策”、“以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妄图彻底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

东兰军民反“围剿”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

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右江独立师党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西山弄索峒召开特别常委会议，决定整顿和缩小队伍，把部队的骨干组成杀奸团，分散到各地进行锄奸肃特活动，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这些精干的杀奸组织，每组十人左右，

佩带短兵器，神出鬼没，四出活动，象一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同年四月，师党委又在西山弄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黄明春、黄举平等分两路到右江上游下游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限制敌人，以减轻西山的压力。出发前，韦拔群鼓舞他们说：“革命斗争是长期艰苦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前途光芒万丈！……你们到新区去工作的同志们，面临着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必须坚定意志，依靠当地群众，为建立千千万万个‘西山’而奋斗！”

四月以后，韦拔群随师部转移到西山弄岩弄统办公。敌人多次对西山进行反复“围剿”，妄想捕杀革命领导人，但“屡搜空回，不能一次奏功”。五月十七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施展金钱收买叛徒的阴险手段，“悬赏一万元购缉”韦拔群，

“五千元购缉”陈洪涛^①。韦拔群看到布告后笑着说：“这是敌人黔驴技穷了才采取的卑劣手段！”他与陈洪涛商议将计就计，派一名警卫队战士向武篆区民团局诈报，卫士队谋反，捉住了韦拔群。民团局长派人去探望，回报说是事实，便连夜飞报反动县长李瑞熊。李信以为真，筹款二千余元送到事先约定的交换地点。交换那天，韦拔群事先埋伏武装，当场击毙前来联系交换工作的叛徒陈守先，夺得了两千银元。这一次行动，既惩办了叛徒，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对此哀叹说：“赔了夫人又折兵，羞愤不可名状。”反动县长李瑞熊发誓说：“不得韦拔群，我终不出兰地也！”^②

同年八月，自命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又增派廖磊率第

^①见民国21年5月21日《广西公报》第32期。

^②《东兰痛史》（下篇）。

七军“围剿”东凤革命根据地。廖磊采取“缩网收鱼”的狠毒手段，逐步缩小对西山根据地的包围圈。为了隔离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敌人还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到一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饿死、冻死、困死红军。敌人逐山逐村“搜剿”，见草用火烧，见松土就挖开，见岩洞就攻击，见水就放毒，见与红军联系的人就枪杀。但是，反革命的屠刀砍不断汹涌澎湃的右江水，劈不倒雄伟耸立的西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韦拔群和陈洪涛始终坚守在西山革命根据地里，领导军民转战在万峰错杂、深菁密布的西山丛林中。他同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以辣椒当盐，以岩洞棲身，以围火过冬，采食的野菜共有一百二十多种。尽管斗争环境如此艰苦险恶，韦拔群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鼓励干部、群众说：“目前的斗争好比攀登高山，越是感到艰苦吃力的时候，也是越接近山顶的胜利时候！我们要象山崖的马樱花一样，顶风傲雪，永不凋谢！”

在党的领导和韦拔群的鼓励下，东凤根据地里的军民涌现了许多坚持革命、宁死不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同年九月下旬，坚守在甘孟山的一个独立营八十多个战士，与敌激战三天后只剩下十五个战士，在营长兰志仁带领下，顽强坚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打，石头打光了，就抡起枪托跟敌人肉搏。最后，他们每人抱住一个或抓住两个敌人，一起滚下百丈多深的悬崖，其中有一位是红军女宣传员兰彩娥。他们用生命的最强音，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忠诚革命的英雄赞歌！

与红军和韦拔群血肉相联的西山瑶族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给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他们宁肯自己吃野菜，也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节省下来，装在粪筐下面借

上山种地的机会，带到山上交给红军和拔哥。碰到敌人来搜山时，瑶胞使用瑶话喊：“诺鸡糯啦”（意思是敌人来啦）！有的为掩护红军和韦拔群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西山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看见敌人来搜山，掩护红军心不慌，瑶族跟党一条命，照顾师长要周全。”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韦拔群等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才能一天天坚持下去。

英 范 永 存

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驻兰坐镇策划”的廖磊，断定韦拔群仍坚守在西山里，便命令所部分七路向西山大小弄京围攻。红军在“沿途峭场，均设有竹钉、石床种种障碍物，阻断要路”^①，敌人在西山折腾了一个月，“几乎靡穴不穿，无孔不索”^②，但仍无所获。

同年十月十七日，韦拔群为了与陈洪涛取得联系，研究转移工作，带了警卫员罗日块，秘密来到东里屯对面山上双茶洞过去曾给他当过警卫员的韦昂家里。第二天，韦拔群在洞里与陈洪涛会见。他们分析当前严重的斗争形势，决定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晚饭后，韦拔群感到头部滚烫发烧，浑身象棉花条似的无力。长期的劳累和饥饿把韦拔群折磨病了！当晚，他与警卫员罗日块留洞住宿。动摇变节已被敌人收买了的韦昂，竟趁韦拔群与罗日块熟睡之机，偷偷抽出韦拔群枕头底下的驳

^①民国21年9月13日《南宁民国日报》。

^②《东兰痛史》（下篇）。

壳枪，向韦拔群头部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壮乡人民的卓越英雄韦拔群，终于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韦拔群同志牺牲后，东里屯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拔群的遗体抢运回来，隐埋在特牙山上。不久，他们还在墓地上盖起一座小庙，称为“红神庙”，以此表示对拔哥的敬爱和深切怀念。

解放后，党和人民无比怀念韦拔群烈士。毛泽东曾多次对广西的同志说：韦拔群是一位好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邓小平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作者附记：本文根据访问黄松坚、黄举平、陆秀轩、黄美伦、覃联魁、陈仕读等老同志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贺 昌

陈文秀 雒春善

张志强 李 吉

贺昌是我党早期青年运动的卓越活动家，也是我党早期的优秀革命家。他为了工农民众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一)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九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出生于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现柳林县）的一个封建士绅家庭。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为人耿直，性格倔强，学识渊博，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生贺昌及妹妹毓秀二人。

贺昌七岁入柳林小学读书。一九一八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并先后结识了张叔平、李燕敖、田开疆等进步青年。当时他的级主任老师叫刘菊初，与其父有笔砚之交，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人士，对贺昌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励着年仅十三岁

的贺昌。他和进步同学王达成、杨逢昌等一起，带领离石县城的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走上街头，用讲演、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揭露卖国贼，宣传抵制日货。离石县长贾占堂是一个依仗洋人鼻息行事的帝国主义走卒，他严令学校当局禁止学生罢课闹事，并亲自带领警宪四出压制。贺昌等同学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同贾占堂进行了一场机智勇敢的斗争。

一天，贺昌手牵一条头戴东洋草帽的小哈叭狗，随着游行队伍来到街头，进行形象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周围吸引了几百名听众。突然，贾占堂头戴东洋帽，领着一群警察闯过来。这时，贺昌机智地指了指贾占堂和自己身边的哈叭狗，并用眼色示意。群众领悟后一拥而上，围住这群丑类，手指贾占堂头上的东洋帽七嘴八舌地嘲骂：“哈叭狗，哈叭狗，东洋鬼子的哈叭狗！”贾占堂气急败坏地连声叫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随即摘下头上的东洋帽，狼狈而逃。在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贺昌又和田开疆、李燕敖、刘有纲等同学回到家乡柳林，深入到田家沟等煤矿，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发动。他们还自编了反映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白瞎子的遭遇》等文艺节目，到穆村、沙曲、杨家港等地演出，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

一九二〇年春，贺昌未及高小毕业，就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到了马列主义。这一时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曾在一中上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一九二一年四月，高君宇从北京回到山西，在同学中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科学救国论”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贺昌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认识

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随后，为了更好地指导青年进行革命活动，高君宇和王振翼等秘密商谈，决定组织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青年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五月一日，以“唤醒工农，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高君宇和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高成哲、梁振、姚焯等八人，成为山西第一批青年团员。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唱《国际歌》。并确定团的纪律为：服从组织纪律，绝对保守秘密，每周开一次小组会。

贺昌入团前后，在高君宇等人帮助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猛烈地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是年寒假，为了实施“唤醒工农，改造社会”的宗旨，贺昌来到汾阳铭义中学，通过在那里上学的同乡同学，向杨逢昌、刘汉生、应如山等青年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他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疾苦，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写成《寒假见闻记》一文，愤慨地质问阎锡山：“吾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由而富？”^①

次年春，贺昌又针对贿选议员的丑闻，写了《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多故，于兹九载，虽其原因甚多，而议员之不良，其多故之病也。”“诸君此届当选，无不搞金钱之运动，而将神圣选政，视为儿戏，选

^①贺其颖：《寒假见闻记》（1920年3月），原件存贺昌中学。

民既无确实之调查，选举又无严密之监察”，“视选举为买卖，国法如无有。而诸君当选非智识之当选，乃金钱之当选。但日中为市，理之当然，而将己之人格，一败涂地，祸国殃民，其害无穷。”^①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贺昌、王振翼等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扩大青年团的影响，带领所有团员，分四路出发，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在太原市内秘密散发了一批《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贺昌还协助王振翼主编《平民周报》，揭露阎锡山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山西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党的指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一年暑假，高君宇根据党的指示，派北大进步青年王昉（孟昭）回太原，采取发动青年入股集资的方式，和王振翼、贺昌等人一起创办了晋华书社。晋华书社成立后，翻印和发行《新青年》、《少年中国》、《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十月，贺昌和王振翼、刘廷英等在太原一中发起组织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出版《青年》刊物，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探求革命真理。

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太原一中学生李毓棠代表太原团组织前往出席。在团的“一大”推动下，太原团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是年九月，团员由八人发展到四十一名，建立了七个团

^①贺其颖：《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1921年），原件存贺昌中学。

的支部，还根据团章规定，选举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年仅十七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太原地区青年学生运动的重担。

随着太原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青年运动更加活跃，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致使“书报往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灭绝个性，纯讲服从”。^①

对于阎锡山的无理干涉，太原团地委领导青年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驱逐一中反动校长魏日靖。

魏日靖是阎锡山的一只反动鹰犬。他担任一中校长以后，一面装出一副“关心青年”的样子，“规劝”学生“要好好读书，不要胡谈政治，不要上赤党的当，以免毕业后考不上大学”；一面则用记过、留级、开除等手段，打击迫害进步学生。贺昌、李毓棠等因担任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有时不能按时上课，均因此受了记过处分。

一九二二年暑假考试，魏日靖为了进一步压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故意出难题、偏题、怪题，致使二百多名学生不能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不能毕业。这一卑劣作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

贺昌和团地委的同志们认为，对魏日靖追随阎锡山迫害学生的反动行径，必须予以反击。他们决定领导一中学生开展驱逐魏日靖的斗争，并由贺昌具体负责。经过一个暑假的积极准备和发动，一场驱魏学潮在一中开始了。

^①《太原的青年团体》，载《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

九月初，开学的第二天，贺昌、李毓棠、刘廷英等召集一中全体学生在礼堂开会，号召大家以罢课来抵制校方的迫害。这一号召立即得到早就对校方不满的同学们的响应，随即一致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当局撤换校长魏日靖。会后，愤怒的学生在贺昌等人的率领下，高呼“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打倒魏日靖”的口号，拥进了校长办公室。魏日靖被吓得目瞪口呆。同学们便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起来，扔出了校门外。全校六十名教职员为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也都停止教学和其他活动。经过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把反动校长魏日靖驱逐出一中校门。驱魏风潮打击了当局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信心，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傅懋功（即彭真）、王瀛和邓国栋等，都在这场斗争中经受锻炼而后入团转党的。

由于贺昌和团地委其他成员共同努力，使太原团的组织不断发展，工作有声有色。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中曾经称赞道：太原是唯一与中央有较密关系的地方团组织。

在此期间，贺昌还撰写了一些文章，强调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他指出：“此时学生运动有一种很大的误谬，就是只知标榜‘打倒军阀’，而不标榜打倒（甚至不敢说）助长封建军阀为恶、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随时勾结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矿山等项）和最廉价的原料等，兼勾结国内的军阀，或明或暗地资助军火与军饷，拨乱是非，引起争战，使军阀同室操戈，互争雄长，战争连年不止，兵匪弥漫全国”。在这种混战中，“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便有机会可乘，得寸进尺地来吞食中国了！”贺昌呼吁：我

们现在的工作“是要集合全国学生于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目标下面，抛弃一切和平改良的观念，采用革命的方法，并且要亲切地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前面而奋斗。”^①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今后的运动应当是：内除国贼——封建的军阀和丧权误国的政府及违法殃民的国会！外争国权——否认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条约和反抗助长军阀作恶的行动！”^②

团的“二大”召开前夕，贺昌撰文论述了“二大”“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他说：“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劳苦少年群众的组织，而学生加入本团的唯一责任，是要努力为了劳苦少年的利益而奋斗，领导青年工人做所需要的经济斗争。”^③

一九二三年八月，贺昌赴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三大”确定的关于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当谈到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贺昌说：“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④他还建议大会“训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要特别注重在青年工人中间的经济奋斗和文化运动，在团的机关报——《先驱》上须多载关于青年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日常的斗争，与工会和工会中党的‘小组’及个人，要发生极其亲密的关系”^⑤。

①《学生运动的使命》，《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18期，1923年3月2日。

②《反抗帝国主义》，《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41期，1923年3月29日。

③⑤《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先驱》第23号，1923年7月15日。

④《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集》(2)，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会的采纳。

(二)

还在山西青年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贺昌就开始注意发动工人群众，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一九二二年，贺昌遵照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的指示，发动全体团员和进步学生进行了一场“学生生活工人化”为内容的活动，要求大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工厂、车间、宿舍和工人群众交朋友，力求在生活习惯、思想气质诸方面都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奔走于工人群众之中，和他们促膝谈心，同餐共宿，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交了不少工人朋友。经过这一活动，初步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扩大了团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既增强了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自觉性，也促进了工人的觉悟。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贺昌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辑发行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五一特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明确指出：“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时，全世界劳动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它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实行同盟罢工”，“改善经济生活条件”，“争取政治权利”。

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活动愚弄群众，散布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滥调，贺昌在“特刊”上撰写文章予以批驳。他在文章中指出，不要相信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人的欺骗宣传，要知道，只有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实

行同盟罢工，才是广大工人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争得政治权利的唯一途径^①。

这期间，贺昌还遵照团组织的决定，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在太原一中开办了业余平民小学，后又增设了平民夜校。通过平民小学和夜校，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及其子女灌输文化知识，宣传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则以此为桥梁，进一步促进学生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加深学生对工人的了解。他亲自到校讲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旬，贺昌和王振翼等一起，发动并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的罢工斗争。太原大国民印刷厂有六十多名工人，工资菲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六个小时，劳动条件极差，厂方实行封建的管理制度，工头彭太仁经常无故侮辱打骂工人。一九二二年四月，这个厂的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赶走了彭太仁。但资本家不顾工人的反对，又将其请了回来，从而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慨。贺昌、王振翼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贺昌和王振翼事先做了周密的布置，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同时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出活动，与全市的印刷工人取得了联系，还在宁化府为罢工工人安排了食宿之处，以妥善解决罢工发动后的工人生活问题。五月十六日，大国民印刷厂工人正式宣布罢工。十七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

^① 《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载《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1922年5月1日。

官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方面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要求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由于阎锡山严令公安局进行干涉，印刷工会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无法实现。在当局的高压下，大国民印刷厂工人被迫复工。

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却教育了工人群众，使他们打消了对阎锡山反动当局的幻想，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幸福。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一部分工人群众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人在罢工后加入了团组织，给青年团增添了新的血液。贺昌也从这次罢工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更广泛地发动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斗争，结成坚强的团体，才能取得胜利。他认为，这次罢工所以失败，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年十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刘明俨到太原指导工人运动。这时，正太铁路工人“因感觉本身的生计困难，与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乃急起组织工会”^①。于是，贺昌配合刘明俨，组织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贺昌兼任区分会秘书。

十二月，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推动下，正太铁路工人实行全线总罢工。贺昌领导太原铁路工人，为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自己的权利”^②而进行罢工。结果工人取得胜利，当局被迫承认工会提出的十二项条件。工人由此，“热度更加增高，一方面联络各地工人，一方面图谋根基稳固起见，

①②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各路代表的报告中正太路代表之报告>，载<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由每一工人特捐洋三元，作工会的基本金。”^①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贺昌又领导太原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实行了同盟罢工，有力地声援了京汉工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

一九二三年七月，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由于贺昌等的积极工作，推动了太原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也越来越引起了阎锡山反动当局的注视。贺昌有时为了摆脱跟踪的特务，一个晚上就要改换几个地方。有一次，他去太原南站散发传单，被特务发现，一时军警林立，把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机智地化装成一名列车长，脱离了险境。后来，团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并送他到上海大学学习^②。在上海大学期间，贺昌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还结识了瞿秋白和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从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学习结束后，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贺昌在平、津一带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的斗争。老工人康清煜回忆说：当时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刚刚开始，许多工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尚未觉悟，对资本家的剥削本质也认识不清。一次，我们纺织工人又被轧死了一个，贺昌抓住这件事，从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向大家揭露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他说：“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穿。我们种的

① <正太工人全体总罢工>，载 <工人周刊> 第 57 期，1922 年 12 月 17 日。

② 黄志荣：<关于 1923 年至 1927 年上海大学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载 <党史资料丛刊> 1982 年第 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谷，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煮饭。我们盖的房子，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居住”，资本家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仗着我们一点一滴的血力来赚钱，而对我们的生命却不负一点保护的责任，我们工人真是连牛马都不如了吗？”他进而向大家指出：“天下是应该我们掌管的，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①这位老工人，就是在贺昌的启发和引导下，逐渐提高了觉悟，成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并在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这期间，贺昌在《向导》、《先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及时总结了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事实证明，和平改良的手段是不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只有集合劳动民众‘革命’呵！”^②他还说，这个工作是需要通国一致努力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水口山矿局局长宾步程勾结军阀，冲击工人俱乐部，无辜打死工人二人，引起水口山工人罢工。贺昌参加了这一斗争。他教育工人说：我们是负历史的使命，从事很长远的斗争，四面八方的敌人没有打倒以前，我们是不会有一天安身的日子。”为此，“现在我们只有紧紧的团结，勇往直前的努力，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去教育工会会员，为的是要发展工人阶级的自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加工减时的经济奋斗，是不能够把我们救出苦海”的，所以“我们工人要做种种争自由的奋斗，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我们决速的要参加政治奋斗！”^③

①康清焜 1963 年的回忆记录。

②《工人运动的使命》，载《先驱》18 期，1923 年 4 月 7 日。

③《军阀屠杀水口山工人》，载《工人周刊》第 79 期，1923 年 12 月 3 日。

(三)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月，贺昌被派往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后被选为团的安源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任秘书兼会计。一九二五年春，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团的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工农部长^①。大会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教训，并通过了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

会后，贺昌以新的战斗姿态，投身于革命的激流之中。他在为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撰写的专文中，对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组织，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团组织“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愿隐瞒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他号召“中国的青年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下，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帝国主义者奋斗，以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②

贺昌非常重视青年学生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他曾专门撰

①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学的信（1925年2月5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中国青年》第93、94期，1925年9月7日。

文，论述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的关系，强调指出：“青年学生离开了民众，便一事无成。”^①他希望革命青年与从事青年学生运动的同志，一定要把自己工作活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希望各地学生团体应很好地向工人群众宣传揭露资本家的罪恶。他还要求政府为工人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并在工人区域设立补习学校，使工人得到一点文化知识和如何进行革命的政治常识，激起他们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

贺昌很重视农民问题。他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是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的重要成分，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凡是忠实民族革命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万无忽视之理。”^②

“五卅”反帝运动中，贺昌在团中央的领导下，与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商店，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宣传讲演，散发传单，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四提案”^③。贺昌参加了这次宣传讲演活动。他向群众大声疾呼：“外国帝国主义横行无忌，视我如殖民地，最近残暴之行为，更是日甚一日。上海工人几十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

① 《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载《中国青年》第91、92期，1925年9月1日。

② 《调查农村经济情况》，载《中国青年》第96期，1925年9月13日。

③ “四提案”指上海的所谓纳税外人会准备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反帝阵线，对前三提案坚决反对，对后一提案则加以揭露。

忍无可忍了！”他还说：“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①那天，英国巡捕大肆逮捕讲演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即关押学生一百多人。下午三时，近万名群众集合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凶残的英国捕头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爱国群众十一人，重伤十五人，被捕五十三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贺昌等积极参加了发动学生投入“三罢”斗争的活动，还深入码头，策动在外轮作工的海员罢工，组织码头装卸工人拒绝装卸英、日轮的货物，并重新组织起海员工会，在原法租界佛照楼旅馆租赁房间办公。

“五卅”运动后，贺昌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又一度去平、津一带，在工人、学生中间开展工作。他以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启发青年的觉悟，并在先进青年工人、学生中发展团的组织，促进工学结合。

这一年，贺昌还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由苏联回国先到北京。一九二六年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贺昌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投入反抗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政策的斗争。他向青年们介绍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经验，带领青年们上街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发

^①徐梅坤1981年的回忆。

表演说，向人民群众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罪恶行径，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敬仰和拥护。不久，贺昌奉命返回上海，担任以罗亦农为首的中共江浙（上海）区委委员及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

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有些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忽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联合。针对这种情况，贺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各阶层的工作，以推动革命运动的进展。江浙（上海）区委各部门工作的范围，过去是按工人区域划分的，贺昌认为这不适应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在区委的一次会上提议，应重新划分地段，既要注意到工人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各方面的工作，如商人、妇女、小资产阶级等。区委根据贺昌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①，对更好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征讨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为了迎接北伐军，我党决定乘盘踞在江浙的军阀孙传芳败退之机，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昌与江浙区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十月二十三日起义开始，由于各区没有统一行动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贺昌出席了江浙（上海）区委召开的临时主席团会议，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讨论善后工作和继续准备另一次起义诸问题。会议通过了要加紧政治宣传、加紧军事训练和组织同志进行秘密活动等决定，并责成何松林（汪寿

^①江浙（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华)和贺昌分头召开会议,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发动^①。会后,贺昌深入到青年学生中,为准备下一次暴动而努力工作。

十一月间,北伐军的前锋已接近南昌,南昌、九江的群众运动迅猛开展。党中央指示江浙(上海)区委立即抽调干部,发动民众,支援前线。区委乃派贺昌和关向应、顾作霖等四人前往负责。

贺昌完成支援前线的突击任务返回到上海后,又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参与了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因为国民党派遣的别动队负责人钮永建的动摇、叛卖,以及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又遭失败。

是年三月,贺昌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他在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共青团和学联组织宣传队,协助党组织选拔优秀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训练,组成纠察基干队伍,并组织学生罢课,实行总同盟罢工。起义中,他又身临第一线,与工人并肩战斗。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终于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贺昌即被派往武汉,就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到武汉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展团的组织,领导团员和青年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他经常深入到基层团组织和青年中间,参加团组织召开的各种集会,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向团员和青年进行思想教育。一次,汉口团组织在友益街总工会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贺昌亲自主持监誓,并就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的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是完全在帝

^①江浙(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国主义卵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坚定地同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要努力扶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聆听他讲话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贺昌“理论水平高，分析国内外形势条理清楚，做报告，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是大家最敬仰的同志之一。”^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贺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革命伴侣的黄慕兰^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召开团的四大，贺昌被选为团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之后，也在帝国主义的利诱下，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而身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仍然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政策，使革命危机日益严重。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后瞿秋白参加）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贺昌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①徐梅坤：《江浙区委活动点滴》，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

^②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山西日报》1981年6月15日。

(四)

在南昌起义即将举行的紧要关头，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九江，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时在九江的贺昌和关向应，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动这场起义的必要性，并且严正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的犯罪。但张国焘固执己见，又赶往南昌活动^①。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贺昌由九江到南昌参加了这次起义。

八月三日以后，起义部队相继离开南昌，南下广东，转战潮汕地区，贺昌亦随部队南下。十月初，起义部队在优势敌人的堵截围攻下，遭到了严重失败。贺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李立三等离开潮汕地区，经甲子港乘船到香港。在香港，贺昌与有关同志一道，想方设法疏通各种渠道，负责接待安排流落在香港的革命同志。十一月十八日，他以广东省省委常委的名义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省委会议，研究发动广州起义的时机问题^②。

十二月上旬，中央成立了一个“查处长江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贺昌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离开香港前往湖北。在此之前，党的长江局主任罗亦农，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

^①关向应 1942 年 7 月在延安的回忆，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潘荣：《共产国际代表与广州起义》，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 年第 2 辑。

的形势，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认为“目前绝非总的暴动时期”^①，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反对罗亦农的意见。他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②。以苏兆征为书记，贺昌、郭亮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就是为查处这个问题而成立的。

特别委员会成员到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不恰当地改组了省委领导机关，对武汉暴动问题也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十二月十四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贺昌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中央和特别委员会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加上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会议承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③。此后不久，贺昌奉调进行短期学习。

一九二八年二月，党中央派贺昌同林仲丹等在安源组建新的湖南省委。在贺昌等的努力下，省委很快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为支援井冈山斗争作了大量工作。不久，贺昌奉调返回上海。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贺昌代表共青团，

①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湖北CY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对湖北问题的报告>（1927年12月13日），载<中央政治通讯>第20期。

③ <罗亦农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信>（1927年12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国内，根据中央决定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赣边巡视工作，贯彻落实“六大”精神，指导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在这期间，他曾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对红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战术，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四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的出路。”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采取游击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还说，“对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如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①这些意见，受到了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的重视。

一九二八年底，贺昌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这时，黄慕兰也由江西省委秘书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经组织同意，他们两人结婚。

翌年春天，贺昌被派往香港，任党的南方局宣传部长。当时香港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工作条件十分艰巨，但他毫不畏惧，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和他一块在南方局工作的柯麟回忆说：“生龙活虎的贺昌象一团烈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和衣躺一会，就又爬起来工作。”^②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贺昌出席了在广州召

① 《中央巡视员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的信》（1928年11月6日）。

② 柯麟1981年的回忆。

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会后，他被派往湖南，任省委常委。在湖南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以主要精力协助省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土地革命斗争，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在《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一文中说：“全世界真正解放了劳动阶级的痛苦，并且还继续在谋求改良他们生活条件的国家，现在只有苏联。”他还说：在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出乎寻常的”长，“尤以童工女工所受残酷的剥削至不可言状。”他号召工农民众在共产主义的“火光”照耀下，奋勇前进^①！

一九三〇年春，中央调贺昌和黄慕兰去北方局工作。由于北方局所在地的天津情况复杂，斗争艰苦，贺昌在接到调令后，决定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贺平托付给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卢永炽（卢德光、卢彪）抚养。黄慕兰舍不得丢下孩子，贺昌耐心地开导她说：“孩子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的枪。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我们把他带在身边，我们应该首先从工作出发，不能被儿女情长缚住我们的手脚。”^②就这样，他们丢下爱子，起程北上。

贺昌到天津后，担任北方局书记兼顺直（河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周天僂^③，宣传部长是余泽鸿，秘书长是陈复。

不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

①《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布尔什维克》第二卷下册，第7期，1929年7月1日出版。

②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

③周天僂不久叛变革命，改由阮啸仙任组织部长。

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地成立“行动委员会”，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在这个错误主张的影响下，北方局也成立了“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被任命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改组了顺直省委，增设了省的军事委员会和保定特委。根据“北方行动委员会”和贺昌的布署，一九三〇年夏秋之间，先后发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五里岗”、博野一带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这些兵变和暴动均先后归于失败。这期间，北方局还指示山西党组织立即发动武装暴动，在太原、汾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以习静波为首的山西特委对此提出异议，遭到贺昌指责，说山西是“例外主义”。贺昌决定要组织十万红军打到北平去，建立冀鲁豫苏区，并为此从组织上调整了山西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从而使山西党的“左”倾盲动情绪有了进一步发展，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失。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贺昌出席了会议，受到了教育，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北方局执行“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会上，他和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炳根、陆文治、邓发等七人，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贺昌赶回天津，于十月初在天津法租界黄家花园附近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中共北方局政治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等文件，决定立即停止进一步组织暴动的计划，并沉痛地

检查了自己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如何改变现行工作的方针与方法。此后，北方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攫取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后，取消了北方局，贺昌的中央委员也被撤掉，调回党中央进行反省。贺昌到上海后，住在原法租界（现陕西南路）一间酱园小店铺的楼上。他联系自己前段的工作，认真学习，反复思考，进一步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对革命的危害，认识到由于自己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他曾表示：“郑重接受历史教训，决心站起来战斗，以百倍的努力来补偿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①他对王明当时那种把同志当作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深为不满，经常与关向应、任弼时等一起交换意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

通过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清算和对自己错误的检查，贺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他请求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兴国县，协助县委书记李坚真进行工作。

就在贺昌准备同爱人黄慕兰离开上海的时候，关向应不幸被捕。为了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黄慕兰

^① 《黄慕兰的回忆》（1981年8月13日）。

全力以赴地营救关向应出狱，他建议组织把黄慕兰留在上海。当同志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我是向组织寄子托妻，心里是踏实的，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我们都是在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放心去前线的。”^①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贺昌由吴德峰护送，到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和李坚真共同领导兴国人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深受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贺同志”。贺昌到兴国三个月内，由于身体力行地努力工作，使得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在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配合主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匪剿”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兴国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介绍了兴国县长岗乡和福建才溪乡的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一九三二年二月，贺昌被调回中央军委，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工作繁忙和受伤有病，贺昌几乎承担了政治部所有的日常事务工作。他办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并且在一天忙碌工作之余，挤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恩列斯的原著，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他还经常给红军大学讲课，作形势报告，给《红色中华》、《红星报》、《战斗报》等苏区报刊撰写文章。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虽然撤销了毛泽

^①1981年8月13日访问黄慕兰记录。

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还没来得及贯彻到红军中去。贺昌积极配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积极防御，声东击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先后歼灭了敌军三个师，到三月底，即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①。

同年九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一百万兵力又向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人这次进攻发动之初，贺昌就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最剧烈的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间。”他要求每个红军战士，“要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要有不怕疲劳的极高度的战斗热情，要采用现代的军事技术来武装我们自己，地方武装应广泛地开展在敌人后方侧翼的游击战争，赤化我们新占领的区域，只有在不断的胜利中，才能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②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首府瑞金召开。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今后的战斗任务，并且具体地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贺昌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二苏”大会之后，贺昌更积极地致力于红军的建设。为了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密切配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他和王稼祥主持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于一

^①张闻天1963年的回忆。

^②贺昌《论红军最近的胜利》，载《红星报》1933年9月17日。

月八日开幕后，贺昌发表了题为《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文，全面地总结了三年来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阐述了政治工作与红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他明确地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目前我们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对红色战士的基本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相信并忠实党与苏维埃，明瞭党的任务与苏维埃的政策”；要把红军指战员培养“成为反帝的土地革命的为苏维埃事业与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自觉的阶级的武装战士”。由于受当时王明“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贺昌在这个报告中，也片面强调了“学习新的堡垒战术”，宣扬了“在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中，争得苏维埃的新中国”^①的错误观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月十二日结束前，贺昌代表红军总政治部致了闭幕词。

（六）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被迫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实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谭秋、毛泽覃等组成党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在项

^① 《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载《斗争》第2期，1934年2月9日。

英、陈毅等指挥下，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掩护主力红军向外转移，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

贺昌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率领一支队伍在会昌附近与敌人周旋，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转移。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说：

“我们一定要积极行动，牵制和吸引敌人，掩护主力远征，保证中央红军安全转移。主力总有一天要打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①当时环境相当艰苦，四周都是敌人，战斗甚为频繁，贺昌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一天晚上，为了摆脱敌人围困，贺昌骑马带队向别处转移。在一处崎岖的山道上，由于马失前蹄，他被摔了下来，右腿受伤，疼痛得几乎昏厥。同志们赶来询问时，他咬紧牙关，站起来翻身上马，然后告诉大家，“没什么，继续前进！”仍然坚持指挥战斗。

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昌等一再向中央分局建议，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但是，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不承认反革命力量的暂时强大，不承认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仍然坚持要集中兵力和敌人死打硬拚，因而使形势更加紧张起来。到十一月下旬，敌军先后攻占了宁都、瑞金、于都和会昌四个县城，至此，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尽陷敌手。

十一月底，中央分局召开会议。贺昌在会上坚决支持陈毅关于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在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坚持下，会议决定分局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都分散到各个游击区开展活动，分局机关和一部分部

^①陈丕显 1963 年 8 月 7 日的回忆。

队，转移到仁风地区，一边进行整顿，一边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在紧张的形势下，贺昌常拄着拐杖，拖着伤腿，深入到干部、战士和伤病员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家甘心为革命接受最严峻的考验。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过分的乐观是脱离实际的。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有准备迎接大风暴到来的思想，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准备打他三年、五年的游击。”^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二月二十三日，党中央打电报给中央分局，对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明确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②。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和中央的重要指示使贺昌大受鼓舞。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迅速将这一喜讯告诉给周围的其他同志^③。

这时，情况更加严重：敌人采取拉网战术，步步紧逼，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团团围在狭小的仁风山区，妄图一网打尽。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准备突出敌人的包围。贺昌和项英、陈毅等认真分析了周围情况，

①陈丕显 1981 年的回忆。

②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 页。

③陈丕显 1979 年 8 月 23 日的回忆记录。

提出了分五路向群众基础较好的粤赣边突围的方案，并制定了周密的突围计划。按照计划，贺昌随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一起行动。

就在我军一切准备就绪、二月中旬开始突围的时候，敌人已对仁风山区形成了密集的包围圈。先一步突围的三路人马，除少数冲杀出去外，大都被敌人打垮。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还没有突围的贺昌所在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两支队伍，处境更加险恶。干部、战士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为了给突围的同志们充饥，贺昌不顾自己腿伤行动不便的困难，带头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送给他代步的马匹。

三月三日下午，剩下的两路也开始突围。贺昌带领七十团的两个营（实为五个连），作为中央分局一路的第一梯队首先行动。临出发前，他扶着伤残的右腿，向指战员作了简短的动员：“我们现在已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困境，形势确实十分严重，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是考验每个同志是否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①

话毕，贺昌把手一挥，带领部队向外冲杀。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部队冲出重围，脱离了仁风山区，并于三月五日拂晓渡过了会昌河。不料，部队刚一上岸，就遭到了预伏敌人的死命阻击。贺昌指挥大家且战且退，死伤十分惨重。这时，贺昌已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向敌人射击。一群敌军疯狂向他扑来，他使尽全身力气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把最后一颗子弹打

^①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

进了自己的胸膛。年仅二十九岁的贺昌，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次突围中不幸牺牲的，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

三月中旬，两路突围部队在遭到严重损失后陆续到达赣粤边的油山，与赣粤边特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广大指战员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陈毅挥泪写成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五言史诗：

环顾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
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①。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查阅了《中央文件集》、《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8卷)》、《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日文)等文字资料；还访问了彭真、邓颖超、李强、柯麟、陈丕显、王达成、徐彬如、方方、罗章龙、武灵初、叶人龙、黄慕兰、贺毓秀、贺雨峰等，参阅了他们所写的回忆文章。

^① 《陈毅诗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谢维俊

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谢维俊，又名唯俊，字蔚青，化名废若、非若，湖南耒阳人。一九〇八年十月九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出生于耒水河畔的肥田乡一个小康农家，大革命时期入党，湘南暴动时入伍。中央苏区时期，他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邓、毛、谢、古”之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①。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的定边附近作战牺牲，年仅二十七岁。他短暂的一生，“对革命事业是忠诚勇敢的，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值得中国青年纪念。”^②

走上革命道路

谢维俊之父谢成甫，生有二男二女，维俊最幼。谢成甫读过“四书”、“五经”，能赋诗作文，且善说算，在当地颇有点名气。谢维俊自幼聪颖伶俐，长得面目清秀，倍受家里珍

* 本文由唐桂生、张继福起草，唐桂生综合整理，沈启觉、刘景行、廖为民、谢先荣、吴立萍参加调查与搜集资料。

① 李维汉给谢孟符的信。

② 1959年彭德怀给谢孟符的信。

爱，成甫公更视之为掌上明珠，希望他长大成材，光宗耀祖，就在他伊伊学语的时候，便教他“子不教，父之过”了。谢维俊七岁那年开始读私塾，八岁入蒋家祠堂初级小学。他酷爱学习，善于思索，能说会道，很受老师器重，连以“书香门第”著称的蒋翥琴老先生也十分赏识他。成甫公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天乐地地连连叹道：古之学者必有师。传道、授业、解惑之高师者，乃成功之秋也。择师而教之，则俊儿之不惑近矣。于是经常拉着维俊到蒋家求教。久而久之，两老订下盟约，结成了亲家。蒋老生长子啸青系中共湘南党的创始人之一，任教于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每每放假回家，利用传授“博物学”的便利，向乡亲们传播新思想，带回《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启发亲人投入革命。勤奋好学、善于思索的谢维俊，尤敏于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当在衡阳读书的爱国学生刘泰、陈芬等回来组织成立话剧团，到城乡巡回演出时，他便欣然前往，并深深地被新剧所打动。他开始懂得，中国落伍了，自己落伍了，死啃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投入到斗争的行列。不久，他就参加了话剧团^①，逐渐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自从看了《新青年》、《先驱》等革命刊物，更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中国的落后“皆因洋人之欺侮，社会制度之腐败。”“我热血赤子，岂不忧国忧民？”^②从此，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

一次，谢维俊来到蒋老先生家，同往常一样，孩子们都围了上来，要他讲故事。他一不道神，二不言怪，专讲“定伯捉

①《各县党组织》，存湘南学联陈列馆。蒋祥英、雷国基的回忆。

②蒋乐春的回忆。

鬼”。讲完后，启发地说：“你们留这么长的辫子，又裹着脚，当心被魔鬼揪住头发，把你们捉去。”蒋家最小的那个姑娘听后连连叫道：“这可怎么办呀？”他说：“你不知道剪掉呀！”另一个姑娘担心地说：“我们不敢，爸爸不会同意。”为了打通蒋老先生的思想，他同正在家“休假”的蒋啸青一道，与蒋老先生展开一场舌战，气得蒋老先生差点动手打人，高声嚷道：“你们反了，反到屋里来了。”谢维俊和蒋啸青连忙解释说：“我们不是反您，而是反您老人家的封建思想。”他们终于说服了蒋老先生，蒋家姑娘成了当地最早放足和剪发的女青年。此后，谢维俊又给孩子们讲了什么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怎样才能不穷的自编故事，启发孩子们的思想。经过多次交谈，蒋啸青相中了谢维俊这块“璞玉”，决定带他到衡阳加以“雕琢”。一九二一年，蒋啸青介绍他进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附小读书^①。

三师是当时湘南地区影响较大的学校，十余县追求进步的青年荟萃于此。一九二一年冬，这里就建立了湘南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湖南三师支部。党以三师为基地，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附小尤其受到重视。蒋啸青多次来附小启发教师：“不要只埋头搞业务，应该想想能否另外找条出路，以图精神之舒畅，谋国家之繁荣富强。”他还开导学生：“国如灭亡，读书何用？”^②谢维俊一到附小，如同鱼儿得水，很快就活跃起来。他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抵制仇货”的示威游行，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为了武装头脑，他偏重于学习社会科学，

①访问蒋乐春记录。

②访问谷子元记录。

要是弄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至今仍然健在的他的一位附小同学谷子元回忆说：“维俊在三师附小时，常看些《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有时上课也手不释卷，以课本作掩护；有时参加活动，没去上课。”当时，三师附小有些学生非常看重分数，不大关心国家大事。考试张榜，有的面榜而笑，有的对榜而哭，谢维俊则身穿长衫，戴上眼镜，逗趣地说：“后面还有我呢！”当有人问他考分下降的原因时，他说：“君以为当务之急是读书还是报国呢？悲莫大于心死，赤子还当忧国忧民啊！登科非我意，但愿世道平。”这一番话，使那个同学顿开茅塞，表示要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①。在蒋啸青的革命思想启发、熏陶下，谢维俊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也就是他考取蒸湘中学的第二年，被选为湘南学联代表，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为了表达对啸青的革命友谊，他承诺了父亲订的那门亲事，与蒋祥英结婚。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和湘南学联成员一道，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奔赴乡村，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唤起民众，声援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一九二六年，谢维俊在蒸湘中学毕业，适逢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湘南兴办政治讲习所，他毫不犹豫地报考应试，被录取在四队十二班学习^②。同年夏，经政治讲习所任教的蒋啸青介绍，谢维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③。

①蒋仲瑞的回忆。

②《湖南政治讲习所同学录》，存湖南省档案馆。

③雷国基的回忆。

激流勇进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由粤入湘，湘南各县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地处郴衡要冲的耒阳，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谢维俊在政治讲习所结业，被党组织派往耒阳任总工会特派员，与刘泰、刘霞等一道，发动、领导耒阳县的工农运动^①。他风餐露宿，来往于店铺、作坊之间，帮助青年工人组织了青年工友社，深入农村宣传组织群众。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耒阳民报》第七期记载：二十三日午，青年工友社在城隍庙开筹备大会，推谢维俊等为大会指导员；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反文化侵略大同盟筹备会、北伐总庆祝筹备会与反奉运动筹备会，在县党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反文化侵略事宜，筹备大举游街讲演，实现农工商学大联合；谢维俊与刘泰、刘霞分别被推为有关方面负责人^②。随着北伐革命的不断深入，耒阳县革命形势如燎原烈火，迅速从城镇遍及乡村。谢维俊负农运宣传员之重任，到耒阳北乡从事农民运动，与蒋啸青一道组织成立了肥田农会、码头工会^③。

翌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五月二十七日衡阳接着发生事变，轰轰烈烈的耒阳革命运动也随之转入低潮。为保存力量，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凡色彩较浓又公开露面的党员均须转移，分散隐蔽。谢维俊遂匿居岳父蒋翥琴家。

①蒋仲瑞、雷国基、邓见成等的回忆。国民党《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存湖南省档案馆。

②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③邓见成的回忆、访问李选位记录。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谢维俊仍以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地活动于耒阳北乡下四团牛志冲一带，联络骨干，发展党员，很快建立起中共肥田支部。嗣后，他领导当地革命群众秘密组织了游击小组，提出“先捉自首自新，后捉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军阀，再捉挨户团丁”的口号，以梭标、鸟铳等武器，不断打击敌人^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湘南。湘南特委通过宜章、郴县党组织，迅速派人与朱德、陈毅部队取得联系，进一步布置年关斗争。朱德、陈毅在宜章首倡年关暴动后，湘南十余县工农大众揭竿而起，积极响应。耒阳各级群众组织普遍恢复和建立，农民赤卫队迅速建立和发展。谢维俊在北乡将原游击小组扩大为赤卫队，和蒋啸青一道发动和组织北乡广大工农群众举行肥田暴动。农民赤卫队以梭标、鸟铳、松树炮为武器，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匪军、挨户团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衡南廖田烟煤山、桐子山一带游击。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朱德率部攻进耒阳县城，谢维俊参加了耒阳地执委举行的欢迎大会^②。以刘泰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谢维俊以县委特派员身份，负责耒阳北乡新市街及江头一带的政治、军事领导工作，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再次向当地的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展开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工农革命军抗击来自衡阳的桂系军阀李宜煊师的反扑^③。三月下旬，朱德率湘南暴动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国民党匪军在挨

①蒋仲瑞的回忆。

②访问段子英记录。

③蒋仲瑞、雷国基的回忆。

户团的带领下，包围了永吉圩。这时，谢维俊正在永吉圩向赶集的群众讲演。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迅速烧毁文件，率领农军同敌人激战。后在群众的掩护下，且战且退，从万圣庵渡河到姐姐家，再由枫冲经高滩龙庙过耒水，尾随朱、陈部队上了井冈山^①。反动派四处搜索，并以大洋悬赏缉拿谢维俊不就^②，将其妻蒋祥英逮捕系狱，将其胞兄谢凤亭、妻兄蒋啸青、蒋次青、侄儿蒋家绶等杀害。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着耒阳。

踏遍青山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陈毅率湘南暴动后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谢维俊先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做宣传工作，后到二十八团一营当连党代表^③。一九二九年一月，为粉碎湘赣敌人的“会剿”，解决井冈山军民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三月中旬，继大柏地一带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两个团后，又辗转赣南数县，翻越武夷山南麓，进军长汀县城，全歼郭凤鸣两个团。汀州解放了，家家张灯结彩，处处爆竹喧天。谢维俊无比兴奋，于三月十九日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所走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对未来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④。

①访问段茂潘记录。

②国民党清乡委员会表册，存湖南省档案馆。

③访问欧阳毅、王紫峰记录。

④谢维俊给妻子的诗和信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朱德率整编后的红四军离开长汀，经古城西进，在瑞金与红五军第一次胜利会师。会师当天，毛泽东、朱德接到二月九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这封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偏于悲观，主张隐匿大的目标，将红军分成小队伍，散向农村中，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队伍。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认为党中央的二月来信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复信中，一方面指出二月来信的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谢维俊对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完全赞成。当红四军讨论朱、毛是否离开红军时，谢维俊所领导的支部和其它支部一样，极力主张朱、毛留在部队。他们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朱、毛离开部队是不正确的，朱、毛都不能离开战斗中的红军；如果一定要调他们走，也只能调走一个^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但是，这封信给红四军党内造成不良影响，林彪就不赞成“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而极力主张红四军分散在闽、赣、粤三省边界，实行流动游击。

同年夏，谢维俊从一纵队一营连党代表调任二营党代表。“古田会议”前，又调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工作中，谢维俊对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情绪及一纵队其它不良倾向曾多次提出意见。但是，林彪不但不接受其善意批评，反而故意刁难他，视正确意见为“党委内部不团结”，借以排斥异己。但是，谢维俊毫不含糊地同林彪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

^①访问欧阳毅记录。

争。“古田会议”期间，他在与一纵队支队长肖克的一次交谈中，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①。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再次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三省敌军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红四军各纵队在东韶胜利会师后，分兵游击赣南，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吉安地区，袭扰赣州之敌，继而东转于都，向瑞金、汀州、会昌之线发展。三月中旬，红四军继续向南进击，沿途“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被一一推翻，赣西南各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地方政权的建立，急需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去充实领导。是时，谢维俊由前委介绍，到赣西南协助工作。赣西和赣南二特委合并，建立赣西南特委时，谢维俊当选为特委委员；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又当选为工农民主政府委员^②。他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又投身于热火朝天的苏维埃运动。

杰出代表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毛泽东指导下，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两个特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就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分配土地、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肯定了赣西、赣南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实行按

^①访问肖克记录；肖克揭发林彪的材料，均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②曾山：《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1960年），未刊稿，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做法，否定了有些人提出的按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的不正确意见。后根据实际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又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身为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委员的谢维俊，“正确地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积极地宣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①由于赣西南特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二七”会议精神，“赣西南苏区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苏区土地很快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并清查了分配土地的情况。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了，踊跃参军参战，人民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②

一九三〇年夏，谢维俊离开赣西南苏区，来到赣东任特委书记，对于发展新区，领导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贡献。是年十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将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维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③。当主力红军离开吉安，挥师北进时，他奉命回到部队，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秘书，追随毛泽东左右，南征北战^④。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中，有如下记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维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衡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①③曾山：《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

②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访问曾碧漪、胡嘉宾记录。

一九三一年秋，谢维俊跟随毛泽东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瑞金待机歼敌。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维俊，积极推举刚来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并协助他工作一段时间，使全县面貌大为改观^①。嗣后，谢维俊再次调离部队，先后来到永丰中心县委和江西省委工作。这期间，他为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断武装工农群众，加强边区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的建设，为扩大红军、替红军筹粮筹款，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着^②。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土地问题上，他们攻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均分配”的正确政策为所谓“非阶级路线”、“富农路线”，并于同年九月一日给苏区中央局发“指示信”，强令全面贯彻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这时，谢维俊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这样做的矛头所向，“坚决反对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不断地向各种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的倾向作不调合的斗争。”^③他担任永丰中心县委书记时，仍然贯彻执行“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使土地革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永丰、公略、万泰诸县的干部和群众中，他享有崇高的威信^④。

①邓小平：《我在中央苏区三年多》。

②吴德锋、伍云甫给谢孟符的信。

③曾山：《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

④1933年9月22日江西省委关于《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9月10日中共永丰中心县委关于《永丰、公略、万泰、新赣、龙冈五县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均存龙冈纪念馆。

十一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加快推行“左”倾错误的步伐，诬蔑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游击主义”，诬蔑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谢维俊与在江西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等一道，针锋相对地说：“山沟里为什么没有马克思主义？”“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洋房子先生是到苏区来找岔子的。”^①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论点，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英勇善战

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为了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对付敌人的再次进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决定组建江西省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李富春任政委）。不久，谢维俊调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工作^②。同年九月，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在乐安县太平墟成立，谢维俊调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郭天民调省军区后，他又接替了郭天民的职务^③。谢维俊与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和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胡嘉宾密切配合，带领独立第五师、乐安新、老独立团、宜黄独立团和崇仁、谷岗、善

①夏道汉：《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论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1982年《求实》第1期。

②访问危秀英记录。陈漫远给谢孟符的信。

③《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存抚州地区档案馆。

和、竹溪、望仙等游击队，以乐安为中心，积极活动于乐、宜、南、广、永丰等县的广阔地域^①。

乐、宜、崇是中央苏区北线之门户，是敌我拉锯式争夺之要地，敌情十分复杂。第二军分区担负着肃清反动武装、巩固边区、扩大苏区、建设地方政权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谢维俊到任不久，就领导、指挥永丰、乐安两县的地方武装，消灭了反动的“独立勇敢队”，初露军事指挥才能。“独立勇敢队”是原善和游击队队长邱汉七在革命低潮时带领部分队员叛变革命而纠集起来的反动武装，他们既打白匪，又伏击红军，经常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破坏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危害极大。乐安中心县委接到江西省委消灭“靖卫团”首先消灭“勇敢队”的指示后，即派谢维俊率部前往进剿。他们一面展开政治攻势，分化和瓦解敌人，揭露“勇敢队”的真相，争取群众的支持，一面组织五百多人的武装冲锋队，直捣匪巢。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拔除了这颗号称“第三武装”、为害一年多的钉子，从而巩固了永丰、乐安边区^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乐安中心县委为贯彻《新发展区域工作大纲》，制定了开辟谷岗的计划，首先由高武根等六人组成白区工作团抵达崇仁属之谷岗发动群众，随后由谢维俊率独立第五师、万太独立团等武装部队进驻。在武装部队支持下，工作团在谷岗、欧坊、板岭、东家岭、汤山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建农会，成立了谷岗、欧坊等乡苏维埃。不久，又成立了中共崇仁县工作委员会。谷岗新区的开辟，对于推动崇仁县

^{①②} 《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

的土地革命，有着重要意义^①。

一九三二年冬，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先后在鄂豫皖、湘鄂西得手后，逐步调集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十二月，敌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制定了作战计划。以陈诚、蔡廷锴、余汉谋为中、左、右三路总指挥，分别率军从抚州一线向南、从福建自东而西、从广东由南往北，夹击中央红军。翌年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窜到南昌，命令部下抱定“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决心，同红军“硬干、实干、快干”^②，并坐镇南昌，自兼总司令，决定以陈诚为主攻部队，设三个纵队，由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指挥，均集结于赣东地区，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发出《在敌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指出“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红军总攻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命令红军在乐、宜、丰做分兵赤化群众的工作，创造良好的作战地区。但是，“左”倾错误领导不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而排斥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剥夺了他的前线指挥权，使红军在这一时期作战很不顺利^③。为了调动敌人，扰乱敌人的战线布署，配合主力红军，谢维俊率独立第五师和第二军分区地方武装主动出击，两次攻打崇仁县城。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统一指挥了乐、宜、崇

① 《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19页。

③ 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四次反“围剿”的决战》。

三县独立团、游击队二千多人和独立第五师，攻打盘踞在崇仁县城的地主武装“保卫团”。当天将县城包围，次日开始攻城。激战一天，黑夜攻占县城，迫使敌人向抚州逃窜，调动了国民党第九十师吴奇伟部仓促赴援。其后，谢维俊率部主动撤离县城，绕到敌人后方作战。一九三三年元月中旬，他又率部再次袭占了崇仁县城，并下令全县张贴以独立第五师师长谢维俊、政治委员胡嘉宾署名的布告，扩大影响，牵制敌人。崇仁县城的被攻克，使乐、宜、崇三县连成一片，对于配合红军主力在宜黄的激战，打乱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创造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周恩来、朱德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的军事行动^①。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红色中华》这样报导：“我江西地方武装红色挺进队，最近又抄到敌人后方，占领崇仁，并在新淦樟树一带游击，获敌轮船一只，缴获军用品无算。江西红色挺进队这一英勇行动，给敌人以极大威胁，大大调动了敌人，在目前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中，有极大意义。各军区的红色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学习江西挺进队的英勇行为，积极挺到敌人的后方去游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②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央局命令红军强攻南丰。担任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及作战方针，在强攻南丰不克后，毅然改为佯攻，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吸引敌人，主力迅速而秘密地转移到广昌以西

^①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②存江西省档案馆。

的东韶、洛口、吴村一带，待机歼敌。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误把诱敌东徇的红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歼灭中央红军。敌中路军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奉命分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经宜黄，直趋广昌，迂迴黎川背后，截断主力红军归路^①。周恩来、朱德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命令红军提前进入阵地设伏，准备围歼敌人，一面命令地方武装就地监视敌人。正在上下南沅活动的红军独立第五师和乐安独立团等地方武装，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崇仁小山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向谷岗前进，牵制敌人。二月二十六日下午，独立第五师和乐安独立团在扬山亭子边与敌左行纵队五十九师相遇。为了不暴露目标，达到监视和牵制敌人的目的，谢维俊命令部队急速改变行动方向，将先头部队改作后军，后军改作前军，向谷岗方向退走。经过日夜兼程，深夜赶到朱坑，又与敌右行纵队五十二师先头部队相遇。他一面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一面派乐安地方武装与主力红军取得联系。弄清敌情后，他们按照主力红军的意图，于次日配合主力红军在头水嵯歼灭敌五十二师先头部队^②后，疾往登仙桥附近设伏。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围歼敌军的战斗展开，红军左右翼队分别在宜黄南部黄陂地区的蛟湖、大龙坪、安槎、桥头下庄和黄陂地区的霍源、均坪、云路、西源等地，运用山区伏击战歼灭敌五十二师全部，五十九师大部。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③，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驥率其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81页注释76。

② 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我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牵制敌人》。

③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1年1月至1934年1月战绩表》。1933年3月21日《红色中华》第63期。

部窜逃，也于次日晨被早已埋伏在登仙桥东北端螺峰山的红军生擒。四散的残兵一一成了俘虏。至此，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军覆灭，被俘官兵计一万六千人，我缴获敌机枪、步枪一万六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五门，无线电台一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①。

敌两主力师惨遭失败后，陈诚急令其十一师从宜黄出发，驰往增援。红十五军配合红二十二军在佛岭坳与敌激战至午夜，三月一日，奉命撤离转移，独立第五师是夜在张家店以小部到霍源大阮附近，以主力集合于黄陂东北端之张家村附近封锁消息，游击并伪装方面军迷惑敌军，宜黄、乐安独立团是夜在佛岭附近封锁消息，游击并伪装方面军迷惑敌军，胜利地完成了监视、牵制、调动敌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任务^②。

三月二十日，敌中路一纵队司令罗卓英，不甘失败，亲率王牌十一师南犯，到达草鞋岗、徐庄地区，企图与驻守东陂的敌九师合击红军。当周恩来、朱德了解到敌两师相隔约十里，中间又隔着雷公嶧大山，相互间难以策应、联系时，及时把握战机，签发了作战命令。谢维俊接到命令后，即率独立第五师及乐安、宜黄独立团进入草鞋岗及附近地区隐蔽设伏。二十一日拂晓，当总攻的信号弹划破长空时，谢维俊率领第二军分区所属武装独立第五师，“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右翼侧”^③，配合红军主力对草鞋岗之敌第十

①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1931 年 1 月至 1934 年 1 月 战绩表》。
1933 年 3 月 21 日 《红色中华》 第 63 期。

② 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黄陂大捷——登仙桥畔激战歼敌》。

③ 见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68—69 页。

一师发起全线进攻，午后一时，将敌基本歼灭，敌师长肖乾被击伤，俘敌官兵六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①，罗卓英只身脱逃^②。

黄陂、东陂战役后，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败局已定，纷纷撤退。谢维俊奉命率第二军分区所属部队紧紧咬住溃逃之敌，在南丰白沙战役中，又击毙企图掩护敌第二纵队撤退的敌第四军新编三十七师长郭炳生，为主力红军歼敌创造了战机^③。

在不到一个月的黄陂、东陂战役中，蒋介石损兵折将，连丧两个主力师和一个王牌师。他在给陈诚的手令中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在接“手谕”之后悲鸣：“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也叹道：“卓英在今日已成为党国之大罪人”^④。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谢维俊率第二军分区所属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功勋卓著，受到周恩来、朱德的表扬，江西省军区授予第二军分区奖旗一面^⑤。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赞道：“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包围着有许多小游击队”，“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的条件。”

①③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东陂战役——我县地方武装再立战功》。

②④1933年4月20日《红色中华》第71期。

⑤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疾风劲草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领导人不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一路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根据地领导干部。这些人首先在福建开展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中央苏区开展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指责他们执行了一条与“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纯粹的防御路线”。

当“左”倾领导者到瑞金的时候，正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蒋介石杀气腾腾，大有一举歼灭红军之势。而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坚持“进攻路线”，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要求红军不适当的正规化，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正规”战，集一切地方武装于主力红军之中，与敌决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什么“退却逃跑主义”；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掩护下，不顾苏区的财力物力，提出过高的指标和脱离群众的做法。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维俊，最了解苏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十分赞成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实行的正确方针。他经常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征求指导。毛泽东也回过他的信^①。

谢维俊在领导第二军分区和独立第五师期间，按照毛泽东

^①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的指示，紧密配合乐安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乐安少共中心县委书记李树彬，在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当时统计，截至一九三三年七月，仅乐安一县就建立了十二个区委、区苏和两个临时区苏，全县百分之六十的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发展到二千六百八十二人，乡苏维埃政府达六十多个；赤色区占全县总地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加上游击区，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武装力量在发展独立团的同时，还发展了赤卫队和赤少队，还注意抓了儿童团的工作。据记载，少共乐安中心县委为响应少共中央局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号召，保证完成了六百五十名的任务，仅七月一次就欢送五百多名青年加入少共国际师^①；在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等方面，第二军分区和乐安中心县委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第四次反“围剿”时，边区物力、财力十分困难，但为了支援主力红军，他们节衣缩食，一次就从第二军分区后勤部拿去三、四千元银洋交红军总部^②。在军队建设、军政关系、军民团结等方面，谢维俊都模范地执行了“古田会议决议”，自觉地将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据胡嘉宾回忆：“我们经常在一起商谈工作，研究策略。他主持军事工作，但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主持地方工作，他也积极出主意，提建议。我们从来都是商量办事的。他每次带兵打仗回来，都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又归队了’，我就组织开欢迎会，慰劳部队，双方配合得很好。二打崇仁回来，

①访问胡嘉宾、李树彬记录。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关于乐、宜、崇中心县委建立的一些情况》。

②访胡嘉宾记录。

他还把自己打土豪分浮财分到的两套衬衣给了我一套。在乐安工作期间，谢维俊积极按毛主席正确路线办，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谢维俊却遭到了“左”倾领导人的打击。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正当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东陂战役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乐安中心县委的信中，片面地夸大谢维俊领导的第二军分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缺点，指责他“不能充分地动员宜乐地方武装坚决的挺进游击来截住阻碍敌人的行动”，“也未能充分动员宜乐所有的力量来截获敌人溃兵，游击敌人之增援部队”，“一贯忽视赤少队工作，忽视群众力量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上对进攻路线执行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甚至连谢维俊说了句“我再带独五师打崇仁回来布置赤少队工作还不迟”，也被指责为“在左的可耻的词句下，来掩盖他在动员广大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撤销了谢维俊的职务，并警告乐安中心县委认识这个“错误”，责令“乐宜党在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必须紧紧的集中火力克服这种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同时要严厉打击对这一错误的调和和容忍的腐化的自由主义”^①。

对此，谢维俊不气馁，不妥协。在三月二十日省委致乐安中心县委的信宣布撤销他的职务但未调走的情况下，他仍然率领武装部队坚决按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在东陂战役中，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②。

① <省委给乐安中心县委的信>（1933年3月20日）。

②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中央局召开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会上把“邓毛谢古”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胡说他们是“江西党内障碍工作进行这一怪物的代表”，号召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对“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和压力，谢维俊没有丝毫的屈服。他和毛泽覃一道，在会场上与“左”倾领导者进行公开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他在总结会上所写的两次声明书中，和邓、毛、古一样，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除了简单的申述三条新区工作政纲外，其余均无可奉告^②。五月五日，经苏区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但他们“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③。

谢维俊被撤职后，调到中央组织部。这以后，他无论是当巡视员，还是被派去筹粮筹款、扩大红军，仍一直“遵守纪律”，任劳任怨，“积极工作”^④，正确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⑤。

①②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6日。

③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斗争》第12期。

④李维汉给谢孟符的信。

⑤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壮烈捐躯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没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谢维俊随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到达贵州以前，他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地方干部队。抵贵州境内后，第二纵队改编为三个梯队，他被编在其中一个梯队^①。横跨滚滚湘江，鏖战赣湘桂黔。一路上，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宣传红军政策，组织地方武装，积极筹粮筹款，为扩大红军竭尽全力^②。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为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谢维俊也从此翻了身。遵义会议后，三个梯队再度改编分散，谢维俊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协助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工作。他不居功，不骄傲，“态度端正，积极工作，吃苦耐劳”^③，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骨干作用。

部队到达四川的大小凉山时，藏族同胞受反动头目的欺骗和国民党特务的挑拨，开始对红军不了解，阻碍了红军的行动。为了打开局面，谢维俊不顾身体多病，拄着棍子来到藏族

①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信。

②钱希均：《忆谢维俊同志点滴》。

③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信。

同胞中间，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启发藏族同胞的阶级觉悟，为红军顺利通过该地区创造了条件。到达甘肃境内，在艾民区，遇到很多一丝不挂的穷苦百姓，他及时报告了上级，研究了帮助解决的办法，尽可能地发些粮食、衣服等给他们。结果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戴，使他们积极参加红军^①。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转战，终于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伟大壮举。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西大门吴起镇以后，中央率主力红军东进，决定留支队长谢维俊和支队副李坚真等在吴起镇一带剿匪。一九三五年底，陕西省委任命谢维俊为三边特委书记^②。

谢维俊接受任务后，即率部向保安进军。在保安，再度分组，决定李坚真带一连人向东，谢维俊带三百人左右向西北方向同时进击。

当时的陕北，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国民党部队，又有地方土匪，还有反动的“哥老会”，它们互相勾结，进攻、骚扰红军。谢维俊率部在进军途中与匪军遭遇，展开了一场激战。

谢维俊一马当先，带领全体干部战士，抢占有利地形，固守战斗阵地。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黑压压的一片。谢维俊再度紧缩部队，组织抵抗，并大声激励大家：“同志们，我们是为中华民族而战，为民族的翻身解放而战，只要我们不怕牺牲，团结一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敌人的进攻一次一次被打退，英勇不屈的战士也一个个地倒下

^①钱希均：《忆谢维俊同志点滴》。

^②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信。三边指靖边、定边、安边。

了。眼看着穷凶极恶的敌人，望着朝夕与共的战友，谢维俊怒火满腔，高声大呼：“英勇战斗，决不做敌人的俘虏！”匪兵们蜂涌而上，为首的大声嚷道：“抓活的有赏！”谢维俊端起枪，几个敌人应声倒下，为首的见势不妙，举枪对准谢维俊的胸膛^①。

维俊壮烈牺牲了。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悲痛欲绝。林伯渠一九四三年在陕北作诗：“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这首诗表达了对先烈的缅怀，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

作者附记：

本文在编写前，先后访问过肖克、何长工、胡嘉宾、曾三、欧阳毅、王紫峰、郭洪涛、郭化若、曾碧漪、钱希均、李树彬、危秀英、钟平、谷子元、段子英、李坚真、罗明、赖太超、夏道汉、何大铭和谢维俊烈士的亲属蒋祥英、蒋乐春、谢孟符等；参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原内务部优抚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干部部、海军司令部等单位 and 董必武、彭德怀、李维汉、黄克诚、粟裕、曾山、伍云甫、谭冠三、吴德锋、李卓然、赵尔陆、陈漫远、钱希均、马文瑞、宋任穷、杨梅生、刘宁一、叶季壮、李聚奎、邓子恢、薄一波、贾拓夫等的信件以及邓小平、林伯渠、江华、曾山等的有关回忆诗文；还走访了湖南、江西、福建、陕西、北京、湖北、广东等省、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得到了江西、湖南等省档案馆、江西抚州地委档案局，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井冈山、弋阳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乐安、瑞金、古田等县革命纪念馆，江西烈士纪念馆，湘南学联等单位 and 林天乙、刘仁荣、谢维俊烈士的儿子谢孟符提供的资料。

^①访李坚真记录。另据刘景范回忆，谢维俊是在“赤安事件”中被叛军杀害的。尚待进一步查证。

古 柏

夏 道 汉

古柏，是江西寻邬苏区和红军第二十一纵队的创建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寻邬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苏维埃政府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等重要职务。是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之一。

“愿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

一九〇六年，古柏诞生在江西省寻邬县黄乡塘背村。父亲古光明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由于家境贫寒，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好把古柏送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梅洪馨，是寻邬大田乡的大地主。古柏天资聪颖，外祖父很喜欢他，让他和几个继孙一起进小学读书。在学校他非常厌恶阔表兄弟的那种纨绔子弟习气，而对那些节衣缩食、勤奋学习的穷学生，则极为亲近。他虚心好学，才思过人，每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有次村里迎神赛会，大家请他给庙门口写副对联，他略加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

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①。

这副对联，表达了少年时代的古柏对豪绅恶霸的深恶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一九二〇年，十四岁的古柏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广东梅县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古柏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他和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邬籍先进知识分子，创办了《寻邬》期刊，宣传先进思想，痛斥反动势力，抨击时弊，对穷乡僻壤的寻邬青年起了革命启蒙作用。一九二四年，古柏参加了梅县广益中学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古柏等二百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为了继续学业，古柏和一些进步学生采取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的办法，创办了学艺中学。除学习文化课程外，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学艺中学成了梅县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这时，古柏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便拒绝了外祖父的资助，认为那些钱是剥削穷苦农民的血汗。为了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一九二五年，他领导梅县学生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当时广东是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党的基础很好，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古柏在梅县参加了中国共

^①曾碧滴：《忆古柏同志》，《红旗飘飘》第19集。

产党。

年轻的共产党员古柏，英俊奋发，是梅县和寻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联络在广东读书的寻邬青年，在梅县成立了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这个校友会的一部分富豪子弟大叫“工农运动过火”，起来反对革命，古柏又挑选那些经过考验的革命青年，组织寻邬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并把这个组织发展到寻邬许多地方。尽管大革命的形势日趋恶化，但古柏仍然不避艰险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假期回家，他抓紧时机积极地向农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个“好心”的长辈劝告他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里有康庄大道可走？”长者惊讶地望着他，接着又问：“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更坚定地回答：“信者不惧！”^①

领导寻邬“三·二五”暴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到寻邬开展革命工作。

寻邬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县，山高路险，地瘠民贫，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有着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的良好条件。当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寻邬籍共产党员，先后回到了家乡。其中有年轻的共产

^①曾碧漪：《忆古柏同志》。

党员刘维钐、刘维锷兄弟，有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的邝才诚，他曾给古柏赠诗明志：“离京南下，投笔从戎，寄身黄埔，军政兼攻，粗衣恶食，锻炼我躬，誓心革命，志在大同。”邝才诚于一九二六年在黄埔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冬，古柏同这些共产党员在寻邬城外潘茂修花园秘密集会，建立了寻邬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邬支部，以潘叶煌为支部书记，古柏、刘维钐为支部委员。

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古柏等利用合法形式，在寻邬城南的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不久改为中山中学），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自带柴米，担任中山中学的教员。他们利用教员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并在校中组织中山社，团结革命学生。古柏对文学有很好的素养，尤其是爱好话剧，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演白话戏，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土豪劣绅虽然对中山中学不满，但因校长曾有兰是寻邬伪县长的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以中山中学为中心，古柏等还在黄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设立中山分校，派遣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在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古柏等创办的中山中学和各地中山分校，成了大革命失败后寻邬党组织掩护革命活动的据点，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党发动寻邬暴动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为了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古柏在农村中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当时的寻邬农村，“三点会”有很大的势力。古柏等利用这个迷信组织的外衣，争取合法地位，把“三点会”作为组织农民的公开形式，并在其中发展秘密的农民协会。凡是入会的都要斩鸡头，喝血酒，宣誓遵守“十大条规”，齐心反对

土豪劣绅。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三点会”为掩护的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就发展到全县的许多地区。

由于古柏善于利用矛盾，讲究斗争策略，采取合法形式，广泛发动群众，使寻邬的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得以重新聚集和发展起来。

一九二八年春，中共寻邬支部根据赣南特委的指示，决定举行全县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寻邬的反动统治。古柏冒着生命危险，为组织和领导暴动日夜奔走，紧张地工作。

正当暴动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三月二十三日晚，党派在留车张官寨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邝世芬，在草鞋渣子形地方开会时不幸被敌人捕获。党的组织和暴动计划，面临被泄露的危险。古柏等当机立断，决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凌晨提前暴动。

古柏等对暴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全县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刘维铲为总指挥，古柏、刘维铿、钟锡球、何家常为副总指挥。暴动分六路同时发动，分别成立六路指挥部。其中，县城直属指挥部由古柏、潘叶煌负责，指挥城郊四乡农民及中山中学学生攻打寻邬县城。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寻邬城南一声枪响，轰轰烈烈的寻邬暴动开始了。古柏提着短枪，站在城南的营盘山上，指挥中山中学的学生和四乡农民攻打寻邬县城。暴动队伍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童子军棍，冲开南门，占领县署和电报局，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同志。反动县长弃城而逃，县城的暴动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留车、牛斗光、黄乡、龙图、吉潭等地也举行了暴动。全县参加暴动的革命群众达四、五万人。古柏在群众祝捷大会上兴奋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

了，但这胜利还只是开始。我们要彻底翻身，还要继续斗争。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三·二五”暴动后的第三天，寻邬、会昌、安远三县的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联合向暴动队伍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古柏率领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寻邬县城。各地暴动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到县城集中就遭到反动派的进攻，被迫在原地抵抗，受到不少损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古柏等在鹅子湖新村召开各路暴动队伍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有些参加暴动的群众，出于对敌人屠杀政策的愤恨，主张继续同敌人硬拼；有的害怕回去遭到反动派杀害，主张全体上山隐蔽。古柏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全副武装的敌人联合进攻下，同敌人硬拼，只能招致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数万人的暴动队上山，不但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而且因为给养无法解决必然不攻自破。根据这种分析，古柏提出了化整为零、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恢复革命的建议。经过一番争论，大家同意了古柏的意见。最后决定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暂时回家，学生回校，采取白皮红心的方式坚持斗争；领导同志和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则分散隐蔽，待机恢复革命。在分散隐蔽的途中，刘维铲、刘维锷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坚强的古柏不禁失声痛哭。根据党的决定，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县，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

创建红军二十一纵队和寻邬苏区

一九二八年夏，古柏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寻邬，恢复革命斗争。

古柏回寻邬后，联络在“三·二五”暴动后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整革命队伍。他写信给出走新加坡避难的邝才诚，要他回来共图革命大业。他和邝才诚等在大田、兰田一带秘密恢复农协组织，扎实地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正值夏收时节，地主们都到田间向佃户逼租，群众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禾头鬼”。为了保护群众利益，鼓舞群众斗志，古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斗争。大田的地主见佃户们不交租，带着武装家丁到田间抢谷。贫苦农民在秘密农协的组织下，手持镰刀、禾杠、土枪、土铳，把地主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寻邬全县。这就是寻邬有名的打“禾头鬼”运动。经过古柏艰苦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三·二五”暴动失败后被摧残的革命力量重新聚集和恢复起来了，被压抑的群众革命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了。

古柏从“三·二五”暴动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要战胜全副武装的强大敌人，光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挑选“三·二五”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武器的来源，一是收缴地主零散的枪枝；二是抓地主罚款，到广东五华等地买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发展到六十余人，拥有枪枝二十余支。这支队伍以阳天嶂大山为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地主武装，机智灵活地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邬葛蒲圩。古柏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邬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情况。毛泽东指示寻邬党组织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

土地革命，并从红四军中留下了部分同志帮助寻鄂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

古柏从毛泽东的谈话和“三·二五”暴动的切身体验中，深刻地明瞭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他将原来的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扩编为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以阳天嶂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和打土豪活动。

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鄂的地主武装对红二十一纵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妄图把这支诞生不久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古柏为了及时掌握敌人进攻的情报，从阳天嶂到龙廷、雁洋、李坑、留车，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站，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敌人的军事行动。只要敌人一出动，游击队就能及时转移，或者伏击敌人。反动派见围攻不成，于是又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在阳天嶂周围驻扎军队，把上下山的通路堵死，企图切断山下群众与红二十一纵队的联系，把红军困死在山上。敌人还到处张贴布告，以高达千元的赏格，五次悬赏通缉古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山下的联系被切断了，山上又只有十五六户居民，红二十一纵队的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交通站也受到了损失，有的交通员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杀害。古柏的六弟古松，在同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困死不如拚死，干脆下山跟敌人拚了”；也有少数人悲观失望。古柏耐心地教育大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启发那些有急躁情绪的同志，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形势。敌人正因为我们在山上，无法实现他们军事“围剿”的计划，所以才采取长期围困封锁的办法；如果我们下山拚命，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他教育那些有悲观思想的同

志，要正确地看清革命前途：“三·二五”暴动遭到那样大的损失，我们又干起来了；今天虽然遭到新的困难，但只要坚持斗争，将来一定能得到新的发展。不要怕跌跤，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总有成功之日！古柏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战胜困难。没有粮食，他领着大家打野兽，采野菜、野果。晚上山里蚊叮、虫咬，战士们睡不好觉，他和一些同志轮流值班，用树枝给露宿的战士驱赶蚊虫。他还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军事知识，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好准备。游击队员感动地说：“古柏同志都这样，我们还说什么！”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革命路上的新的挫折，人间罕见的生活磨难，不但没有把古柏压垮，反而使他锻炼得更坚强。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对革命、对生活充满信心。就在那最艰苦的日子，他同在战斗中结下了深情厚谊的曾碧漪由相爱而结婚了。在古柏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在阳天嶂的红二十一纵队，度过了一九二九年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邬。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许多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地主武装受到了打击，红二十一纵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阳天嶂成立了寻邬县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邬县革命委员会），古柏任主任委员；中共寻邬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寻邬县委员会，古柏任县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冬，古柏决定利用有利形势，率领红二十一纵队消灭大田的地主武装据点，扩大以阳天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创建寻邬革命根据地。大田，是寻邬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寻邬地主武装的顽固堡垒，大田反动民团的团长就是古柏外祖父梅洪馨的继孙。战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古

柏突然收到大田民团团长送来的一封信，说是“梅老太爷”死了，请古柏去大田吊丧。对这个幼时曾经同窗读书，长大后死心塌地反革命的表兄的来信，古柏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这是敌人看到红军势力日益强大，企图用这个办法和红军取得暂时的妥协，作为缓兵之计，以便伺机反扑。为了减少攻打大田战斗中的伤亡，古柏决定将计就计，深入虎穴，亲自进大田作瓦解敌人的工作。古柏把二十一纵队布置在大田附近，自己只带着红军战士陈必达，来到大田民团团部。他向团丁们宣传革命的形势，告诉他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烽火连天，地主武装土崩瓦解，你们团长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就是来给他吊丧的。他向团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告诉他们：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你们大都是穷人出身，不要替财主卖命；红军是优待俘虏的，谁顽固不化，只能自取灭亡。说罢，他同陈必达扬长而去。二十一纵队攻打大田的枪声一响，那些听过古柏宣传的团丁们，大部分缴械投降或者不战而逃。二十一纵队胜利地打进了大田，活捉了民团团长。古柏发动大田的农民，分掉了大地主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红军和农民群众都称赞古柏铁面无私，大义灭亲；那些逃亡在广东的梅家地主，却大骂古柏“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古柏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吃人的豺狼倒谈起良心来了。良心，他们的良心就是叫一家饱暖千家哭！我们没有那种良心，我们穷人有穷人的良心。”^①

打下大田后，中共寻邬县委和寻邬县革命委员会即由阳天嶂迁驻大田。古柏又率领红二十一纵队拔除了寻邬境内的一些

^①曾碧漪：《忆古柏同志》。

地主武装据点，使寻邬南北零星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了寻邬革命根据地。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六个区三十余乡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三〇年五月，红军攻克寻邬城，中共寻邬县委和寻邬县革命委员会由大田迁驻县城。同月，在城内刘家祠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寻邬县苏维埃政府，古柏为县苏主席和县委书记。

协助毛泽东作寻邬调查和在总前委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分兵赣南，第三次来到寻邬。这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红军占领了许多城镇，遇到了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和争取城市贫民的问题。为了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寻邬城南门外马蹄岗的褫民医院，召集寻邬各阶层十一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就寻邬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邬调查”。

古柏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这个调查会，不辞辛苦地日夜工作。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邬的政治经济情况，深入各阶层认真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推荐了熟悉寻邬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参加调查会，为调查会作好准备；会上，他担任记录。由于寻邬方言不好懂，有时还要给毛泽东作翻译；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毛泽

东在根据这次调查写成的《寻邬调查》中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邬，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①《寻邬调查》以大量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毛泽东制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的科学根据，批判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打击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的过左政策，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著作，凝聚着古柏的辛勤汗水和心血。古柏从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那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那种从阶级分析入手解剖社会现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那种虚怀若谷、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中，得到了极大的启示。

寻邬调查后，古柏被任命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工作。前委是当时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四、五军党的共同指导机关，后来扩大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总前委的分工，古柏还担任过总前委的宣传工作。

古柏在总前委工作的日子里，无论是在紧急的行军作战还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总是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就连吃饭的时候，有时也要放下筷子来批阅紧急文件。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总是委托古柏去办理，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41页。

古柏对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领非常钦佩，总是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使在同爱人的通信中，也往往是谈论学习问题，交换学习心得。他常说：“现在打仗，将来建设，都要有真实本领，不发愤学习，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古柏身居领导岗位，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件破棉袄，冬天是棉衣，春秋拆掉棉花又当夹衣。有次公家发给他一件新衣服，他却送给了老百姓，并且风趣地说：“旧衣服我穿了好几年，我跟它有深厚的感情，怎么舍得给人家呢？”中央苏区凡是同古柏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其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总前委后，先后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等领导职务，一直在中央苏区工作。

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区党代会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贯彻其“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诬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决抵制立三“左”倾错误而使中央苏区得到蓬勃发展的客观事实，诬蔑中央苏区的工作是“立三路线”，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古柏等对这种无理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左”倾教条主义者鼓吹“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

“解决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古柏等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在经济工作中，古柏关心群众生活，体惜民力，主张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以减轻苏区群众的负担；不同意“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苏区人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在征集粮食、推销公债等工作中所提出的过高指标和所采取的错误作法。他和当时在江西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是江西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因此，他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但进一步对毛泽东进行排挤，而且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开展了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二、三月间，“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闽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四、五月间，又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广到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

对古柏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五月五日，经“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中央局批准，省委作出了对古柏等同志第二次声明书的决议，要他们“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面对着“左”倾教条主义者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打击，古柏并没有放弃原则，在总结会议上和两次写的声明书中，他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再次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他被指责“在他写了整个十五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中，除了说了一些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外，对于反党的小组织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①。同时，“左”倾领导者在组织上以“开除党籍”对古柏相威胁，古柏对此泰然处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模范

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以后，古柏受到“最后严重警告”的错误处罚，并被撤销职务，分配到会昌担任扩大红军运动的突击队长，考验他是否“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古柏在组织上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正确路线而附和“左”倾错误。他在会昌担任突击队长时，仍然按照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办事。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扩大红军运动中，“左”倾分子不

^①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斗争》第12期。

顾苏区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大部分青壮年已上前线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在一个月內扩大两万红军的过高指标，结果只完成原定数字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不但不归咎于自己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指导，反而认为计划不能完成“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古柏到会昌工作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和动员，发现原来下达的扩红计划过高，认为他过去估计会昌能完成计划是“过左的估计”，主张将突击队调回来重新布置。于是他又被错误地指责为“他不是批评自己‘过左估计’，而是（借）批评自己来反对中央与粤赣省党代表大会的估计”，“辩护自己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①。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错误地撤销了古柏的突击队长职务，并且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作出的《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②。

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使古柏气馁，也没有使他放弃原则；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并且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力图减少“左”倾教条主义者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一九三四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担任粮食征集工作。在敌人采取“堡垒政策”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重重包围、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他为征集粮食以保证红军给养作了极大的努力。在这期间，古柏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先后发表了《迅

① 《火力向着在党的紧急任务前面表示机会主义动摇分子》，《斗争》第43期。

② 《斗争》第43期。

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红五月节省粮食运动的检阅》、《瑞金粮食动员总结》等文章，对指导中央苏区的征集粮食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征集粮食对支援革命战争的重要性，指出“摆在粮食突击运动前面的中心紧急问题，是收集粮食问题”，要求中央苏区各县粮食部门和参加征集粮食工作的同志“警觉起来，加紧，加紧，百倍加紧你们的突击，为全部收集粮食而斗争，为充分保证红军给养而斗争！”他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征集粮食工作中的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提出要“不着慌的但是最紧张的进行突击”，要从实际出发和依靠群众去完成粮食收集任务。他指出某些地方粮食收集工作没有搞好，最主要的是由于“没有把‘为粮食而斗争’的列宁的口号，为充分保证红军给养而斗争的任务，最清楚的来教育干部，动员群众说服群众”^①；而是“一动就骂人机会主义”，“这种强迫干部强迫群众的办法，实际妨害了我们的收集工作”^②。由于古柏在收集粮食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动员群众、说服群众、依靠群众的正确方法，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中央苏区的粮食收集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古柏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一六七期《红色中华》上，发表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一文，对中央苏区这段时间的收集粮食工作进行了总结：“自二月一日至三月十日，四十天的

① 《红色中华》第161期，1934年3月13日。

② 《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红色中华》第163期，1934年3月17日。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二十五个县
的统计材料，共收到谷子十九万八千担（约计九十五万元以上），
现款六十四万八千元”。“概括的说来，我们收集粮食突击运
动，已经得到了成绩，公债推销一般的完成了，有许多县份的
突击计划已经完成或将近完成。突击运动的结果，相当的解决
了我们粮食的困难”。

古柏在迭遭错误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工作，坚持原
则，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模范行动，得到了中央苏区广大干
部和群众的赞扬。

为 国 捐 躯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
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主力红
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举行长征。古柏被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
地，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离开了主力红军，要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
下单独地担负起领导游击战争的任务，对古柏又是一次严峻的
考验。他把刚满两岁的孩子寄托在一个乡苏维埃主席家里，离
别亲人，踏上征途。后来这位乡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他的
妻子带着古柏的孩子东奔西走，直到一九三六年找到从九江监
狱出来的曾碧漪，才把孩子交给了她。

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也以“匪属”的罪名被捕入狱，惨死狱中。
为了保护苏区，牵制敌人，古柏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
安远、寻鄜一线，给了摧残苏区的敌人以应有的打击。但是，由

于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以重兵对红军游击队实行包围封锁，战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队的处境也日益艰难，缺乏粮食和冬衣，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疲于战斗得不到休息，部队大量减员，动摇分子不断叛变，游击斗争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古柏依靠他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和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般的联系，率领闽粤赣边的红色游击战士，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第一个艰苦的冬天。

一九三五年春，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的消息传到闽粤赣边区。古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庆幸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终于树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当时中央苏区已经全部被敌人占领，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古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当走到广东龙川的鸳鸯坑时，由于交通站的叛徒出卖，他们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古柏等三人三条枪，同一百多名敌人英勇搏斗，从清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古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实践了他“愿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光辉誓言，时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得知古柏牺牲的消息后，极为哀痛。他在一九三七年曾亲笔题词悼念古柏：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①。

^①曾碧漪：《忆古柏同志》。

附：本文参考资料

1. 《寻鄡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存江西省档案馆。
2. 曾碧漪：《忆古柏同志》，《红旗飘飘》第19集。
3. 作者1961年访问陈必达记录。
4. 《斗争》第12、43期。
5. 《红色中华》第136、161、167期。
6. 《古柏烈士档案》，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

何宝珍

吕芳文

何宝珍（又作葆珍、葆真），湖南道县人，一九〇二年生，家境穷困，有一弟一妹。父亲是一个潦倒的穷秀才，做小买卖维持全家生计。她在十来岁时，被送给一家蒋姓地主的女佣做童养媳，一同受雇于这个地主家庭，备受折磨。由于地主逼债，宝珍的父母先后自缢而死，妹妹被人贩子卖到广西为奴。苦难深重的童年生活，在她的心灵中，留下了惨痛的印象，是鼓励和影响她以后上进的一股内在力量。

何宝珍在陪同地主女儿上私塾的时候，也伴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等幼学读物。她没有纸笔写字，就在地面、桌上用手指练习。塾师被她的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准许她与地主女儿同为正式学童。一年多以后的秋天，宝珍陪伴地主女儿进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读书。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刻苦地学习，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喜爱，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和地主女儿同班上课。小学毕业后，何宝珍在执行教师支持下，准备报考道县女子师范学校。这件事，遭到那家蒋姓地主的反对，要她以其女儿的名字替考，否则，不准再进学校。何宝珍为了求得读书机会，忍辱代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但是，由此地主女儿得以入学，而她却不能继续读书，被排斥在学校门外。

一九一八年春天，经过一些正直教师的帮助，何宝珍跟那个蒋姓地主及其女佣脱离了关系。这样，她才获得了自由，考入了衡阳市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省立三女师，她勤奋学习，寒暑假也不离开学校，以便做些校务杂事，得一些收入维持生活，同时，抓紧时间坚持自学。她学习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波及衡阳。省立三女师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参加校外爱国活动，挂牌告示，禁止学生外出，并将大门落锁数日。开始，由于消息闭塞，学生们没有反应。后来，其他学校的爱国学生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等宣传材料从墙外抛进学校，学生读后，大为震动。何宝珍将省学联罢课宣言摘抄在黑板上，并邀集几名进步同学，进行宣传活动。一次，她在自修室内听到一些同学正在议论校长封锁校外消息的专制行为，便趁机鼓动大家参加校外爱国运动。在她的带领下，全班学生剪了辫子，梳成短发，每人自制一面三角纸旗，上书“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准备参加全市反帝爱国运动大会和示威游行。开会那天，她们纷纷越墙出校，分几个渡口过江，按约准时赶到雁峰寺会场，参加了大会并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紧接着，何宝珍参加了罢课斗争，随学生讲演团深入街巷码头、市郊农村，演新剧，贴标语，发传单。何宝珍主演了《哀台湾》、《孔雀东南飞》等时事活报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抨击和反对封建礼教。她还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的各种活动，抵制和焚毁日本仇货，大力推销国货。这时，何宝珍成了三女师进步学生爱国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被全校学生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毛泽东等先后多

次到衡阳省立第三男、女师范等校进行社会调查，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意义，指导和组织青年运动，开展建党建团活动。何宝珍接受了这些教育以后，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不久，她在衡阳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的培养下，于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三女师团组织负责人。

这一年，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掀起高潮。为了配合长沙、安源、水口山等地工人的斗争，何宝珍根据衡阳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组织省立三女师的学生运动，声援各地的罢工斗争。其时，三女师校长欧阳骏，敌视学生运动，多次牌示何宝珍等人，到校长室接受训斥。何宝珍同进步同学商量，决定对欧阳骏进行反击。一天，当欧阳骏坐着花轿来到学校礼堂门前刚刚下轿，一群学生，突然将她团团围住，高声嚷叫着：“来来来，大家快来看新媳妇啊！”招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欧阳骏气急败坏地狂叫乱骂，把脚跺得“咚咚”响。学生们给她回答的却是一阵紧接一阵的“哈哈”大笑，并高呼“洋婆子滚开去”、“打倒欧阳骏”等口号。欧阳骏原是一个留美女学生，依仗湖南省长赵恒惕作靠山，把三女师当为私家乐土，横暴压制学生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她又爱打扮，讲排场，校务开支，挥霍无度。她寓居衡阳丁家码头，离校不到三百步。但是，为了摆阔气，每次来往，总要用花轿接送。革命浪潮兴起后，她为了加强对学校的控制，花轿来去频繁，受到训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这次进步学生发动闹花轿的事件。闹花轿前后，何宝珍还率领进步同学在群众中勇敢地揭露了学校当局专制腐败，校务无能，贪污学生校服、伙食杂费等劣迹，引起了学校当局对她的十分忌恨。于是，欧阳骏勾结县衙，串通道县蒋姓地主在衡阳求学的儿子，声言“何宝珍是蒋家人，她在

外犯事，蒋家有权处置”，把何宝珍禁闭在学校楼上的教室里，禁止通信会客，不准外出活动，并用快邮代电，催促蒋姓地主差人把她接回，按“家法”惩办。在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和各校进步师生的帮助下，何宝珍逃出了学校，后被欧阳骏开除学籍。当年湖南《大公报》曾以《第三女师风潮之面面观》为题报道此事，揭露欧阳骏迫害学生的恶迹：

“第三女子师范校长欧阳骏开除学生何宝珍等一事。双方均有传单，互相攻讦。兹又接衡州某君投稿云，第三女子师范校长欧阳骏接办以来，无甚成绩，且多不合之处，早经该校第五班毕业学生宣布其罪状。欧阳仍照例向省署辞职，省署亦照例慰留，欧阳因此恨五班学生刻骨，乃将伊等毕业文凭扣留不发，欧阳又恐为在校学生揭发，乃先发制人，突于前日藉故将该校学生何宝珍、肖腾芳、邓金声开除，该校学生亦噤不敢声，且通信会客，均不自由，学校顿成囚舍，闻何宝珍等业已来省，发表宣言，哀诉于学界并呈请官厅惩办欧阳骏校长云”^①。

何宝珍被省立三女师开除后，带着张秋人给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信件到长沙，以亲友名义投居清水塘毛泽东家里^②。

在这里，她直接受到了湘区党委和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何葆贞这个名字，还经常给她和毛泽覃、毛泽建等讲解革命道理和工人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痛苦。有一次，何宝珍听着听着，联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苦难遭遇，不禁大哭起来，毛泽东、杨开慧爱抚地给予劝慰，并进一

^①湖南《大公报》1922年10月8日。

^②张琼：《在清水塘畔的日日夜夜》，《文汇报》1977年10月5日。

步对她启发教育，使她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一九二三年春，何宝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派人赴安源加强工运工作。毛泽东对何宝珍说：“安源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跟随刘少奇到安源，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进行工运工作。她在路矿子弟学校和补习学校担任教员，并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还在工人夜校初级班兼课。在工运事业的共同斗争中，她和刘少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年四月在安源结婚。

在教学实践当中，何宝珍讲授《工人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等教材，并经常运用参观图象、通俗讲演、化装演说、工人辩论会、研究讨论会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灌输文化和政治知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及思想觉悟，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何宝珍在安源工作和回到宁乡休假期间，十分注重社会调查和研究妇女解放运动，写有《宁乡县城的鬼迷社会》^①、《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造》^②等文章，文笔生动流畅，说理通俗易懂。她用在宁乡调查所见的事实，揭露了当时的湖南是“黑暗龌龊的社会，恶浊腐败的政治。”一针见血地指出：“夺取政权，总是不可免的一种过程。”她还针对当时社会上男尊女卑思想和一些受过奴化教育的女学生，幻想嫁给议员、法官、外国人做姨太太的时病，提出“妇女问题，乃社会问题中的一

①湖南《大公报》1924年1月19日、20日。

②《湘报》、《大公报》副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9、10期，1924年6月11、18日。

部分，妇女问题不解决，剧（实）行社会主义，定要多一层障碍，而支那的妇女，受了男上女奴的虐待，更加厉害。故欲使我们彻底解放，非格外努力，使我们渐渐地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可，且此一番的努力，尤其是非假（手）女子不可”。^①

一九二五年初，何宝珍随刘少奇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了五卅运动。这年冬天，刘少奇因朝夕奔走，积劳成疾，经组织同意，由何宝珍陪送回湘养病。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被湖南反动政府逮捕。消息传出，全国各地工会、各界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何宝珍根据党的指示，沉着、勇敢、机智地开展营救工作。她去长沙长郡中学找到原在衡阳相识的第三男子师范学生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关系找当时的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由宁乡籍的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在各方的营救下，赵恒惕不得已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释放刘少奇出狱。接着，何宝珍便陪送刘少奇到广州，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月，何宝珍从广州来到武汉，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做收发文件的管理工作。同时，经常参加慰问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这时许多党内同志都得到过她的帮助。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先后介绍一些党团员与她共事，她主动替他们解决食宿困难，热情地帮助他们熟悉工作环境和业务。当时，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湖北、武汉地区的广大工人群众同帝国主义、新旧反动军阀作斗争，与省总工会其他三

^① 《湘报》、《大公报》副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9、10期。

位同志，挤住在汉口尚德里四号一幢简朴的小楼房里，开会、听汇报、接待来访、分派内外工作，总是一天到晚忙不赢。何宝珍兼理着一切家务重担，一日三餐，使大家温饱相安，亲密无间。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日益紧张，她又想方设法将这些同志或转移别处，或掩护起来，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随同刘少奇辗转庐山、天津、东北、华北等地，最后到了上海，从事党、工会、妇女和群众工作，任过交通，做过教员，搞过联络，住过机关，守过店铺，进过工厂。为了党的事业和同志们安全，她不顾个人安危，忍着幼儿离散的痛苦，忘我地为党工作，为同志们排忧解难。

一九三二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党决定何宝珍继续留在上海，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她时常要为难友们聘请律师，营救被捕同志。以后，邓中夏任互济总会主任，何宝珍才专任营救部部长。她改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她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一天，敌人把她堵在家里，并且在周围进行了严密封锁。何宝珍意识到将要出事，连忙把小儿子毛毛（允若）推到邻居大嫂怀里，求她给予掩护照看，并嘱咐说：“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逮捕她的敌人。何宝珍被捕后，开始囚禁在上海公安局。敌人审问她时，她说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说：“不对，你是政治犯！”她答：“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没有弄清楚她的真正身份，在公安局拷打了几次，也未能查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多次审讯，她坚不吐实，最后，敌人判她十五年徒

刑，囚禁于南京市模范监狱。

在狱中，何宝珍遇到早先被捕的钱瑛、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同志，她们一起组织难友与敌人展开一次又一次的斗争^①。

一天，从事地下工作的熊天荆，奉命以探监为名，同狱中难友建立联系，当她路过女囚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了一个小纸团，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看，就听见门外看守叫嚷要号子钥匙。何宝珍急忙将纸条丢入便桶内，从另一位难友手中接过她抱着的孩子说：“你去坐在便桶上，我来抱娃娃。”于是，她一面逗着小孩，一面哼着歌曲，装着若然无事的样子。看守闹腾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有搜出来，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走后，何宝珍从便桶中把纸条取出来，打开看过内容，即按纸条上的要求，将一个重要消息迅速转递给了男号子。

当时，女牢的看守除少数人外，大多数是为生活所逼被雇来的。为了取得与外界的联系，何宝珍与帅孟奇等商量，决定做看守的工作，她们以拉家常，帮助女看守做事、绣花等方法，跟女看守们搞好关系，使得放松了看管，趁晚饭后开牢门之便，与其他牢房的同志暗通讯息，取得联系。

何宝珍在狱中，情绪乐观。她擅长言辞，又会演戏，曲艺、唱歌，常常把旧曲牌填上自己编的新词，演唱给大家听。在节假日和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她都要唱上一段，给牢狱里带来了欢乐的气氛，使难友们在精神上得到鼓舞。

何宝珍对敌斗争机智、勇敢，善于应变，不仅掩护了自己，也掩护了同志。她刚到模范监狱时，夏之栩几乎要喊出她

^①帅孟奇，《忆何宝珍同志》，《中国妇女》1980年第7期。

的真名来。她机智地抢先说：“你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巧妙地告知自己用了假名。有一次，帅孟奇正在起草一份职工运动报告，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突然闯进来搜查，发现了这个开了头的报告，连连对帅孟奇进行追问。何宝珍马上挺身而出，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她们识字，这是她们在抄书练字。”她指着旁边的一本《世界知识》，继续说：“那些话不就是从这本书上面抄下来的吗？”^①识字不多的“二科长”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支持遭受迫害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狱中斗争。当时牛兰是职工国际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牛兰偕同夫人范露伊丝（亦有译为汪得莉珍）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不久，租界当局把他们交与国民党法院。国民党高等法院悍然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一直被囚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这时，他们夫妇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进行绝食斗争。何宝珍等决定以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为由，对他俩进行间接声援。她们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允许中医就诊，允许亲友送书报食物，允许通信等条件，最后附加一条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当监狱当局拒不接受时，何宝珍等三十多人便一致宣布绝食。绝食进行到第四天，姐妹们有的吐绿水，何宝珍平日体质较弱，呕吐更加厉害。但她为了斗争的胜利，顽强支持着身体，反复向女看守做工作，说明姐妹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自己的家世出身也跟她们一样穷苦，取得一些看守的同情。看守们纷纷向监狱当局反映“犯人快要饿死了”，使得监狱长亲

^①帅孟奇：《回忆何宝珍同志》。

自到监狱探望，劝说大家进食。何宝珍等回答说：“监狱不答应条件，宁可饿死也不进餐。”绝食到第七天，监狱当局深怕饿死了政治犯，更加恐慌，被迫答应全部条件，并将牛兰夫妇送医院治疗，使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四年秋，有个互济会女干部，前来探监，何宝珍要她帮助一个被释放的干部家属解决困难。不久，这个互济会干部被捕入狱，在审讯中，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敌人了解情况后，对何宝珍施以种种酷刑，逼她招供。何宝珍坚贞不屈，对敌人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①敌人无可奈何，这年冬天一个寒风凛烈的早晨，何宝珍在雨花台从容就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何宝珍牺牲的消息传开，凡是熟悉她的同志，无不感到难忍的悲痛。对于她革命的一生，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赞语：“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②这位杰出的女战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南京雨花台纪念馆、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纪念馆所藏《何宝珍烈士》档案资料。
2.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刘爱琴：《女儿的回忆——回忆父亲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访问李维汉、帅孟奇、夏之栩、易礼容、张琼、曹云芳、屈子健、李治安等的记录。

①帅孟奇：《忆何宝珍同志》。

②刘少奇：《记何宝珍》，藏中共中央组织部英烈档案室。

李 林

穆 欣

在民族忧患中成长

李林，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她本名秀若，又名小峰。原籍福建闽侯，自幼跟随父亲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①。在爪哇她目睹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从小便逐渐形成了浓厚的民族意识。

关于李林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她自己曾经在一封信里作过记述：

我是福建人，因为我父亲在荷属的爪哇经商，所以我便是在该地长大起来的。我能够说那边的马来话，那边的文字我也略为知道些，但现在大都忘了。因为我十四岁的时候，便已经回到了祖国。在那时候，我只带回来一个深刻的不会磨灭的印象，那是：荷兰人对于当地爪哇人专制的统治与残酷的压迫 和中国人在那里的不自由。在一个

^①爪哇，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它和现属印尼各岛统称作“荷属东印度”。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15日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小小的心灵里，老是绕着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爪哇人为什么不会团结？为什么情愿受人家的压迫？为什么受人家的统治不会反抗^①？

她到爪哇不久，就进一所华侨小学读书。那个时候，爪哇和“荷属东印度”的三千多个大小岛屿，已被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相继统治了整整四个世纪。印尼的民族文化，经过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已经濒于危境，学校教育很不发达，而且在学校里只准教荷兰文。当地华侨数量很多，为他们办的学校却非常少，热爱祖国的侨校教师只能瞒过荷兰人的耳目，偷偷地给学生们讲述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她的光辉历史。李林亲眼看到当地居民和华侨所遭受的残酷压迫，过着牛马般的悲惨生活。她在思想上深受刺激，也从这些经历中受到教育，民族意识越发强烈地增长起来。

一九三〇年，李林在高小毕业的时候，正当经济危机的台风袭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地的资本家在“挽回权利”的借口下，疯狂地进行排华，她父亲所经营的商业，在这场风暴中遭到严重打击。十四岁的李林，带着继续求学的心愿，怀着对于帝国主义的满腔愤恨，和她对于故国大好河山的热烈憧憬，由母亲陪同回到阔别的祖国。当她乘坐的轮船驶进厦门港的时候，望着故土的壮丽景色，她激动得涌出了满眶热泪。

回国不久，李林考进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这

^①此处和本文所引李林的话，全都引自1940年8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第2卷第1期所刊《李林同志遗书之一》。这封遗书是她1939年9月30日写给中共中央妇委负责同志的。

里风景秀丽，建筑雄伟，引起李林由衷的喜爱。以后，她曾带着无限幸福的心情，回忆起这一段令人神往的学校生活：

在我回到中国不到半年的工夫，我很幸福地第一次离开了我的母亲，离开了家，我进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校。在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我希望着我能够做一个大文学家，我经常读着屠格涅夫的小说。除了爱文学而外，还喜欢体育。因为学校里有许多和我同样是南洋爪哇来的，能够说同样的话。因此我们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我们经常和外面学校学生比赛。在假期中，我们也跑到粤属的汕头、潮州等地去和那儿的学生比赛，我们常常获得光荣的胜利归来。我们很天真、纯洁，我们不知道痛苦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美丽的国土，无情的炮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也冲破了集美学校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气氛，撕裂了李林这种安适无虑的学习生活。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李林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增长，课堂再也不能禁锢她这一颗火热的心，从此开始献身抗日救亡的斗争。

以后，李林曾到浙江杭州中学读书。一九三五年春天，她又从杭州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转学到上海爱国女中就读。当时，有的同学问她：为什么离开风景优美、堪比“天堂”的杭州？李林回答说：“杭州空气太沉闷了，闻不到一点进步的气息，仅仅风景优美有什么意思！”

李林在生活上一向勤俭朴素，她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爱国女中，那些衣着时髦的“上海小姐”讥笑她们太“土”。据她在这个学校的同学贾唯英回忆：“她们一起三人，一来就引起全校同学的注目：第一，她们不仅未烫发，还剪成男式；第二，她们的脸上无半点胭脂；第三，她们的衣着非常朴素，穿着一件没有曲线的宽大的大袍。这样的打扮，自然要引起一些上海人的讥笑了。可是李林和她的同伴不予理睬，照样在校园中昂首阔步，谈笑自若。我对这三位新来的‘勇士’感到由衷的佩服。”贾唯英问她：知不知道那些“上海小姐”背后议论你们？李林非常愤慨地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不屑理她们就是了。我穿我的，与她们有什么相干？说老实话，那些小姐们妖里妖气的打扮，我才看不惯呢！”

得了一百零五分的作文

校址设在上海江湾的爱国女子中学，原名爱国女学，是蔡元培与章炳麟、秋瑾等在一九〇二年创办的上海较早的女子学校之一，他们曾在这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兴起的时候，校中许多师生曾经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此刻，中国人民面临亡国惨祸的紧急关头，奋起图存的群众运动，正在形成汹涌澎湃的怒潮。这个学校的广大师生，又被卷入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洪流。

李林在爱国女中读书的时间不长，思想上却得到很大的进步。以“冒险家的乐园”著称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她在这里进一步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被伟大的时代洪流卷进了斗争旋涡，也促进了她的觉醒速度，成为思

想转变的关键。她在这个时候丢掉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转向鲁迅、高尔基的著作；突破文学艺术的圈子，进入历史、政治、革命理论的领域，大大地打开了政治视野，提高了她的思想境界，从而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从李林事后所写的回忆中，能够看到“冒险家的乐园”里的丑恶现实，何等激烈地在她头脑中掀起了汹涌的波涛：

在上海，谁也知道是一个最复杂的繁华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洋房大厦；也可以看到烂污狭窄的小土房；可以看到许多穿着西装绸缎长袍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银行经理或公司的老板，也可以看到裸着体，赤着脚战栗着在道旁的穷人；可以看到富人们逍遥自在坐着汽车在柏油马路上兜风，也可以看到汗流满面在街巷奔跑，有时还要挨打挨骂，为了挣几个钱的黄包车夫；可以看到穿着旗袍，高跟鞋，烫头发，擦胭脂，提着皮包，还挽着一个爱人，在马路上散步的摩登小姐和太太们，也可以看到穿着长短不齐，破烂不堪，被煤烟熏黑了脸，提着饭篮，挽着、抱着或者跟着一群肮脏饥饿的小孩子的女工；可以看到在电影院、跳舞场，开着电扇，唱着留声机的阔人们，也可以看到流着汗水，身上压着麻包，木头箱，嘴里哼着：“喂哟，喂哟”的码头工人……。那许许多多小时候的一幕永不会磨灭的印象，更是在脑海里盘绕着，经常的奇怪：“为什么，同样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

但是我终于对于人生了解了，我对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我觉得作一个文学家还不是可以满足的，我还需要充实理论。于是，上海四马路的杂志公司，是我每礼

拜要去的场所；《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大众生活》、《妇女生活》等，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我，开始确定了我应该走的方向。而上海是伟大的，到现在我还不能而且不会，永远不会忘记那伟大的上海！

从此，李林开始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英勇搏斗，在民族忧患里茁壮成长。当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军日日进逼，国民党当局步步退让，民族的屈辱，人民的痛苦，使热爱祖国，刚强正直的李林在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她在这个时候努力探索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思想上有了飞跃的进步。爱国女中距离虹口日本兵营不远，她和同学们经常从它门口经过。每当看到日本士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样子，她都不禁怒火中烧，常把拳头握紧，痛恨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伙强盗赶出去！”就是平日坐在教室里面，也难得有片刻的安静，日军经常演习打靶，把枪口对准上海市民，敌人演习的炮声，经常袭扰学校的教学秩序。有一次，李林正在做习题，虹口方向又传来了日军的枪声。她把笔一扔，用拳头在桌上一击，大声吼道：“这还成什么国家？”报纸上天天尽是丧权辱国的消息，李林有时气愤地把报纸撕得粉碎。有一天，难以抑制的愤慨，激励着她提笔疾书，写了一篇痛快淋漓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读〈木兰辞〉有感》。她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展示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雄心壮志。她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了语文教员，竟然破例地给她这篇文章打了一百零五分。她在爱国女中得到进步同学胡文新、贾唯英等人的帮助，进一步参加了实际斗争，受到进步同学们的爱戴，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这年冬天——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十二月二十日，她和进步同学一起，领导爱国女校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挠，勇敢地冲出校园，迈进上海各校学生抗日游行示威的行列。上海各校几千人的大军，汇成巨大的洪流，聚集到江湾上海市政府请愿。请愿的队伍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提出了严惩宋哲元、释放北平被捕同学、一致抗日等口号和要求。国民党的市长吴铁城躲藏起来，市政府的大门紧闭，激起群众的高度愤慨，直到中午仍坚持不散，还要到南京路去游行示威。这一下反动派着慌了，他们软硬兼施，命令各校当局派人前来，诱骗学生回校。爱国女中的训导主任跑来威胁学生说：“你们千万不要去游行，那是共产党搞的阴谋，上了当，出了事，学校不负责。”李林怒目而视，挺身而出，冲着对方大声问道：“难道爱国就是共产党么？”弄得那个训导主任狼狈不堪。从此以后，在上海，差不多每一次游行示威，每一次大的集会，她都是参加者。不久，她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李林兴奋地说：“我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是整个革命组织中的一个小细胞，我感到有无穷的力量。”

十二月下旬，上海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外白渡桥的时候，大批印度巡捕列队桥头拦阻，游行领队要女同学排队在前头，向桥上冲去，当时她们误以为印度巡捕不致棒打妇女。不料刚刚冲上去，印捕就不分男女，挥棒乱打。李林挺身站在最前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迎着大棒冲上去，被打下来，再冲上去，如此反复多次。她一面鼓动同学们奋勇冲击，一面向印度巡捕喊话：“你们印度人民也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

帝国主义！”个别印度巡捕听到喊话就不再打她们了。

李林的兴趣广泛。她非常喜爱文学，音乐，体育，还会弹钢琴，画油画，尤爱唱歌。正象她这时的挚友贾唯英说的：“高兴时要唱，痛苦时也要唱，经常独自一人引吭高歌”，并且参加了一个上海业余歌咏队，从不缺席。她在学生会里也很活跃。学生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入校的学生大都是住在附近的纱厂女工和她们的子女，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李林是夜校的教员，目睹女工的悲惨生活，非常同情，她每上一次课就难过一次，痛恨自己无力帮助她们解除痛苦。

一九三六年暑假，李林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上海大中學生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沪杭铁路进行宣传。她们的行动吓坏了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出动军警特务镇压。她们刚到松江，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被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起来。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学生，把她们一个个全押上火车，强行送回上海。李林义愤填膺，推开军警，站在一个台阶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阴谋。反动军警不准她讲，强行拖着她走，她一边反抗军警，一边回过头来继续向群众讲话。李林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许多人抹着眼泪谛听。最后，她们全被国民党特务强制押回上海。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学校当局放出风声：将要开除李林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爱国女中读不下去了，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离开上海，来到她们一直向往的、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北平。她在这里举目无亲，便和爱国女中同来的挚友贾唯英住在沙滩大学夹道胡同一个小公寓里，经济贫困，水土不服，两人相依为命，彼此照顾。她想争取早日工作，但是找事十分困难。八月间，李林考进北平民国大学政治

经济系。民国大学是一所官僚办的私立大学，学校当局虽也非常反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人心，党组织在校内广大学生中间播下了火种。一九三五年底，李林的母亲已经病故，这使她非常悲痛。父亲早已同她母女断绝关系，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她就只是依靠母亲为数不多的遗物生活，后来曾被一个骗子拐骗了大部钱物；一九三六年春天，她仅有的一点存款又被盗走，有时要靠同学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因此，她在生活上时常感到困窘，但她从不因为个人的困难而消极悲观，从未放下抗日救亡的担子，依旧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

因为她在救亡工作中特别活跃，到校不久，就引起这个学校党组织的关注。地下党员吕光很快结识了这个热血青年，介绍李林参加了党领导的先进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李林在这时到北平来，正是基于她对这个“一二·九”运动发源地的景仰，出于寻找真理，追求革命的殷切愿望。如今参加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民先”，并且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心情格外愉快。从此，李林参加学生运动越发积极了，经常到学生中、市民群众中、国民党士兵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哪里燃起了斗争的火焰，哪里就会出现李林矫健的身影。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学联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①事件，组织一次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游行队伍的旗手。这天一早，李林冒着隆冬的严寒，来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她站在电车站上装作候车

^①七君子，指当时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

的模样，望着陆续前来的同学，同时机警地观察着警察的动向。时针刚刚指向八点，只见站在近旁商店橱窗前的吕光朝她一挥手，她便从怀里抽出布制的红旗，迅速地套在一个同学递过来的旗杆上，在街中心高高举起。散在四周的同学立即朝她奔来，挽着手臂，排成六路纵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游行。不久，游行队伍遇到了大队警察的阻拦。李林告诉护旗的男同学说：“如果我倒下了，请你们接过去，红旗绝不能倒！”于是，她就摇摆着红旗，发出信号，指挥同学们“化整为零”，迅速地分头朝向马路两旁的胡同散去。警察正在纳闷，刚刚分散的人群，突然又在他们背后聚集起来，照着红旗发出的信号，不断地变换队形，高呼抗日口号，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正在街头指挥镇压行动的伪警长，忽然发觉了红旗的信号，连忙带人扑向李林，把她和游行队伍分开。经过激烈地争夺，旗杆被警察抽走，李林紧紧地握住红旗不放。警察举起旗杆打她，她把红旗抱在怀里抵抗；伪警长又用警棍朝她脸上猛击，她眼前一黑，殷红的鲜血滴落在旗帜上，只因吕光及时把她扶住，她才没有摔倒。经过同学们的英勇搏斗，重新夺回了旗杆。李林又把红旗高高擎起，继续引导队伍前进，直到游行按照原定计划结束。

这次示威游行过后不久，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李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迈进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奔赴抗日前线的太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李林入党不久，就响应中共北平市

委的号召，和许多平津的青年学生一起，来到在绥东抗战的炮声中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她后来回忆说：“大学校的生活引不起我底兴趣，作一个大学生自己不认为是光荣，我迫切要求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我抛弃了我的学生生涯，我离开了那全国的文化中心地故都——北平，来到太原，在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参加受训，也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经过我们党的艰苦工作，阎锡山和我党迂回曲折地建立的特种形式的统战组织。一九三六年秋天，应阎锡山的邀约，北方局派薄一波等来到太原，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接过了这个组织，使它在党的实际领导下，在迎接抗战和抗战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牺盟会在这时候办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开办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招收进步青年，给予短期的政治训练，即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往各县去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发展牺盟会会员，建立各级牺盟会的组织。另一件事，就是扩大和改造原来已有的军政训练班，并且成立民众干部训练团（简称“民训团”），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在原国民师范旧址办的军政训练班，由牺盟会主持，当时北方局派来许多党员干部，都在各连负责政治训练。它的学员，除山西本省的青年学生外，很多是外省来的。这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因在蒋介石法西斯暴政下不准抗日，在本地站立不住，就通过各种关系，争先恐后，成群结队，涌到太原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来到这里的，合计有二十二个省区的学生，尤以北平、天津、上海、河南为多。其中也有不少东北的流亡青年。许多地

区来的学员，大都是由中共地方党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分批送来的。

李林从北平来到太原，就与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工委的同志告诉她，马上参加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她去国民师范报到，编进第十二连。这个连是唯一的男女合编的连队，几乎全是平津、上海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各种活动中都比较活跃。这个连的女学员专门编了一个班（班长也由女学员担任），她们是抗日战争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武装起来的第一批女战士。那个时候，女子当兵是稀罕事。她们都觉得挺新鲜。可是有些人的想法不实际，幻想着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军人生活。正式入伍以后，发下来的军装，却是阎锡山军队替换下来的旧军衣，破烂、污秽，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长短也不合适。女同学们感到有点失望，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心里不乐意穿。李林伸手拿起一件灰色的棉军装，马上穿在旗袍外面试试，高兴地笑着说：“当兵抗日，就得穿军装，不然，不象啊！”经她这么一讲，大家就都跟着脱下学生装，打上绑腿，戴上军帽，立刻成为飒爽英姿、全副武装的女兵了。

李林进入十二连的时候二十岁。她的身材不高，但是很精干。因她一直坚持体育锻炼，体格比较壮实，而在长期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中经受的磨炼，又形成了明朗、坚强的性格。她和当时社会上常见的许多知识妇女不同，在她身上既无那种雍容华贵的闺秀气，也没有那个时代多数女性中常见的腼腆怯懦，而是具有一般女同志所不能及的勇敢和胆识。她的性格比较豪迈，心地坦荡，磊落大方，做起事情来虎虎有生气。她的才智出众，办事得体，同连的男学员也无不衷心赞佩。

当时为了加强军政训练班的党的工作，山西工委决定在这

里成立党的临时组织——特委。李林担任了特委的宣传委员。山西的政治情况还很复杂，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党的活动还是处于秘密状态。山西工委的同志告诉李林说：阎锡山的阶级本质不会改变，骨子里始终是反共的。但在红军东渡以后，他感到了红军的巨大威力，而且抗日、反蒋都得依靠共产党，只得转而联合共产党，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表面联共，不忘反共，就是他们采取的态度。因此应当提高警惕，对他多加提防。李林遵照工委的指示，大胆而谨慎地在学员中开展党的工作。

这个时候，陆续有更多的女青年来到太原。军政训练班专为她们成立了一个女生连——第十一连。这个连成立的时候，李林便被调来，一面学习，一面兼任党的支部书记。这个连的政治指导员是刘亚雄；政治工作人员有陶桓馥、陈应春、戴新民等，都是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负责对学员的理论辅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军事干部都是阎锡山的旧军官，只负责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各班的副班长则由学员自己民主选举产生。刘亚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她在艰苦卓绝的长期地下工作中，磨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李林虚心地向刘亚雄请教，在她的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学会了许多革命的工作方法，经常深入学员，帮助她们解决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她和特委的同志们一道，抵制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大胆吸收不少先进的学员参加共产党。她在这里努力学习政治课和军事课，学射击时连续练习瞄准，直到双肘磨破。有次上操的时候，连里的旧军官发现她双肘一着地，端枪的手不停地抖动，便命令她站起来捋起袖子，只见黑厚的痂痕缝里流出了鲜红的血，使得这个阎

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感到惊奇和敬佩。经过这样勤奋的学习，艰苦的磨炼，她在军事训练中取得了优良的成绩。李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她在学习中的模范作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

第十一连前后累计有女学员一百九十多人，来自全国十六个省份。一九三七年八月，这个连队训练工作全部结束，一部分女学员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战士，一部分分配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去做群众工作，另一部分到前线和后方的医院里去做救护工作，一起热情地奔赴抗日的战场，投入紧张的战斗生活。后来，她们中的许多人，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在牺盟大同中心区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李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提前结束了在军政训练班的军训生活。她先被调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在总会和牺盟太原市委工作过一段时间。

这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枪声开始点燃起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李林的热血沸腾了，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工作。牺盟会和党组织都批准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区。原来在这年五月间，牺盟会已经派了几位同志到大同去，成立了牺盟中心区委会，并且根据中共山西省工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雁北地区工作委员会。李林到达大同以后，担任牺盟中心区的宣传委员，同时也参加党的雁北工委工作。在此前后，牺盟会共向雁北各县派出二十六名特派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坚决抗日的进步青年。

大同靠近晋绥边境，历来是我国北方的边塞要地。牺盟中

心区委会人员开始到达这里的时候，大同和各县的政权、驻军，全都掌握在阎锡山的旧派人物手里。他们的立场极端反动，思想也是守旧的，虽然鉴于当时全省形势的变化，表面上不敢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暗中仍旧百般阻挠、压制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大同当局对于牺盟会工作人员的到来，态度十分冷淡，不但在工作上不给予方便，甚至食宿问题都不帮助解决，直至李林来到大同的时候，牺盟中心区的人员还都暂时住在青年会里。牺盟中心区的同志和派到各县的共产党员，就在工委领导下，利用牺盟特派员的名义，在大同市和周围几个县里进行一些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联系了一部分群众，有些地方先后建立起来一些牺盟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

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在张家口陷落后，一直退到晋东北的广灵、察南的蔚县一线，还无法组织抵抗；守大同的李服膺部直向雁门关以南撤退，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大同受到直接威胁。

八月十日，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会在中共雁北工委领导下，在大同城东南的小南头村召开了各县牺盟特派员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敌人行将侵入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大同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经记述：“晋北最危急的时候，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所派遣到晋北各县做民众运动的前进青年，看到各方面危急的现象，大家在大同开会，讨论挽救危亡的办法。他们是一片丹心，想在抗战中作伟大的努力。然而政权在腐败怯懦的官僚豪绅手中，让他们在满怀悲愤中，看着大同堕入敌人的虎口！”^①

^① 《吊大同》，见范长江：《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大同的形势日益吃紧，敌机随时前来轰炸，到处留下一片废墟。雁北工委领导牺盟中心区委会和它所属各县的特派员，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不停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既要排除国民党顽固政权和旧军队的公开阻挠，又要防止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工委在大同城区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攻势，李林主动承担了印刷传单的任务。在那些空袭警报不断划破夜空寂静的晚间，她用桌布把窗子堵严实，经常点燃起微弱的蜡烛，在震撼全城的敌机狂炸声中通夜不息地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们在学校里组织起来一支人数很多的学生宣传队，在铁路工人中发展了一批牺盟会员。大同城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一天，李林从火车站宣传回来，刚到住处门口，一块石头从后面飞来。石头上绑着的一封匿名信上写着：“……如再妖言惑众，宣传赤化匪言，破坏中日邦交，你等性命不保。勿谓言之不预也。”李林蔑视日本特务、汉奸的恫吓，继续日夜不停地在全城奔跑，向工人和市民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月十二日拂晓，大同陷入敌手。九月十一日午夜，国民党军队撤离这座城市。当时在大同采访，停留到最后才离开的《大公报》记者孟秋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十一日的下午四时，大同城内街上已经死寂得很，只有几个卖西瓜的老汉，在街头上摆摊，维持了一些市面。……将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紧急命令，传到了大小机关。汽车、大车、骆驼、毛驴子、独轮车和洋车，满载着各种各样公的私的东西，潮水般的涌出西门，好象敌人已杀到背后。呜呜的汽车喇叭声，耀眼睛的灯光，吓得骆驼没有躲处。反正不是自己的大车，士兵用着长鞭子雨点般往马身上打，要它和汽车一样快，

跑断了马脚，拆损了车辆，只有车夫心里难过。”^①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这样混乱地撤出一座又一座城市，丢掉一片又一片土地。老百姓眼望着这种可耻的景象，无能为力，只有背后发一些牢骚，编造一些歌谣发泄胸中的气愤。其中的一首说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家属，小兵扔大枪。”正是国民党军队溃败情景的逼真写照。

大同沦陷以后，怀仁、左云，右玉诸城也在九月中旬相继失守。这个时候，中共山西省委（山西工委已改组为省委）发来指示，调李林和牺盟中心区的其他同志转回太原，另行安排工作。李林眷恋着这里的壮丽河山，更舍不得离开雁北地区的群众，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便和大家一起动身返回太原。她们是在大同沦陷时南行的，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溃逃的狼狈相，大量的车辆人马淹没了大同到太原的同并公路，士兵们用枪挑着一路劫来的财物，毛驴子上边骑着披头散发的长官太太，沿途村庄都象刚刚发生了蝗灾一样，全被溃兵抢得净光。……这些悲惨的景象，越发加重了李林的沉重心情。她在途中几次流泪。对于战局的逆转和群众的苦难感到深沉的悲愤。

她人虽然走了，心还留在那里。正象日后她在一封信里所描绘的：“记得我步行到雁门关上的时候，我望着那盘曲的汽车路，那矗立的山岭，我忍不住偷偷的流眼泪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退回来，我什么时候再会出雁门关。”

^①孟秋江：《退守雁门关》，见长江编：《西线风云》（增订本），1937年版。

女游击队长

踏进雁门关，李林正在忧心忡忡，十分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往南走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共山西省委又派赵仲池、梁雷和老红军团长刘明声（刘华香）等前来组建党的雁北特委（公开的名义是牺盟会雁北游击司令部，梁雷任司令，赵仲池任政治部主任）。李林在阳明堡和他们相遇，简直欢欣若狂。她回忆说：“当我得到了那消息的时候，我发疯似地高兴，我兴奋着我又将步出雁门关外了！”

这个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到雁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在雁北同蒲路以西的地区，发展游击武装，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考虑到李林是没有经过战斗锻炼的女同志，特委负责同志曾经劝说她不必上前方去，还是要她回太原去参加那里的抗日工作。但她几次坚决地向雁北特委要求：请组织决定，把我留下来，和你们一块上前线。特委负责同志向她谈到敌后斗争的艰险困苦对女同志不相宜。她却坚决表示：艰苦、死都不怕，生命早已置之度外，我要亲手血刃敌寇的头颅，为雁北群众报仇。特委见她态度恳切，意志坚决，批准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他们就从阳明堡出发。一路上满目荒凉，到处看不见人烟，有些村庄里头，连只狗都看不见。开始他们还乘坐一辆破旧大轿车，后来车子也没有了，大家只得步行，身上还都带点行李，绝大多数人还背着枪弹。这对过惯城市生活的人，会感到很不方便，相当艰难。李林也和大家一样，身上背着自己一些东西，还有步枪、子弹。同志们担心她能不能挺得住，都想帮点忙，尽量减轻她的负担，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

的坚毅刚强，引起同志们的赞佩。

这支人马前进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鲁。平鲁县秦代为武川塞地，西汉置中陵县，古来就是抵御外侮的要冲。这个时候，敌人的铁蹄虽然还没有直接踏进这块土地，战争的气氛已经冲破了平静的生活，旧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旧县长等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早已逃之夭夭。在这被反动派遗弃的土地上，日军不断逼近的消息，象一块大石头压在人们的心头，城乡各处充满惶惶不安的情绪。喏大一个平鲁县，只剩下牺盟会特派员屈健等少数人坚守阵地，准备就地组织游击队。

在这里坚守阵地的牺盟特派员屈健，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在旧历八月十五日进驻平鲁城南十里的大坡村。第二天一早，村中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来了！”屈健他们跑出来一看，只见赵仲池、李林和老红军刘明声等，带领一彪人马走进村来。他们随即陪同特委一行进平鲁城，城里男女老少都涌到街头欢迎“红军”。正感大祸临头的平鲁人民，一个个好象绝处逢生，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老汉和老太太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竟然跪倒在地下叩起头来。特委的同志把他们搀扶起来，走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群众越来越多，把他们团团围住。特委趁势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身背六五步枪的李林，不顾行军的劳累，跳到群众搬来的长凳上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表达和雁北人民共生死决心。她慷慨激昂地说：“父老兄弟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的家乡来啦！蒋介石、阎锡山把咱们扔下不管啦！咱们怎么办？当亡国奴吗？不！咱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自己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

主义赶出中国去！”讲到末尾，她说：“我要打日本，我还有我手里的枪呀！”说着，她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李林热情奔放，口才出众，这番富有鼓动力量的讲演，使许多听众感动地流泪。这个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女兵”，给这几百名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李林的名声随着她在这里继续进行的英勇斗争，逐渐地在雁北群众中间传布开来。

大同下来的敌军日益逼近，离开平鲁不远的威远堡也已沦陷。特委把城里的群众疏散到乡下，就在农村里开始组织游击队。当时跟随雁北游击队司令部来到平鲁的，还有七、八个阎锡山的旧人员，他们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时候惊慌失措，公开主张全体退回太原。在平鲁西山的达达井村，特委主持开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辩论。李林在发言中坚决反对退回太原的论调。她说，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就是要打鬼子，与雁北人民共存亡，共患难，日本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我们就一天不离开雁北！其他同志也都坚决主张留在这里战斗，批判这种临阵逃走的谬论。绝大多数同志举起拳头来，表示要在雁北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只是那几个胆小鬼灰溜溜地走开了。

九月二十六日，来势汹汹的日军占领了平鲁县城。十月一日，这股敌人刚刚侵陷平鲁东南的井坪镇，就遭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的痛击，井坪当被收复；宋支队继续北进，十月四日收复平鲁县城。我军声威大震，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青年们争相参加到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和抗日救国人民团体中来。这个时候，屈健等留在平鲁，特委率雁北游击队司令部转往偏关，一面与后方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一面在偏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十一月初，牺盟雁北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鲁游击队成立起来（后来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七

支队），刘明声任队长，屈健任指导员。不久，由梁雷（在偏关旧县长逃跑后，他即兼任县长）、李林又发动群众组成了偏关游击支队（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李林亲自为八支队找定了营房，带领着他们布置厨房和营房，给战士们上课，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李林这时候担任了游击队的指挥员。但她所以得偿心愿，是费了不少口舌，经过顽强地争取的。正象她后来记述的：

在我们第二次到雁北的时候，因为敌人进攻的猖獗，武装汉奸以及清乡队活跃的厉害，加上各县政权已空虚，我们觉得要在这地区开展工作，要在这地方存在，非有自己底武装力量不可，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武装。

大家决定了我担任武装工作。不，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不让我负武装的责任，他们总以为一个女的干武装工作多少有点不合适。但我自己对这工作好象有些自信力，又有兴趣，同时觉得在这时候女的也应该有学军事的必要。我坚决的要求，大家没有办法，答应了我在偏关发展该地的游击队工作。

的确，武装工作是困难。因为没有更多的干部，一个人政治、军事都要负责；更因为过去没有军事的经验和常识，仅仅受过几月训练，所以开始虽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但已经够我忙乱了。我常整夜睡不着觉，想着他们的管理问题，计划着他们第二天的军事操，政治课以及生活各方面，真是煞费苦心了！一直到后来，到了一个军事干部，我们这一支队工作才健全些，而且以后更成了其他支

队中较有基础的主要模范支队。

这两支新生的游击队，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山阴、怀仁的洪涛山区开展军事活动，开始形成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大同敌军后官师团一万多人南下，乘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正在同蒲铁路北段痛击敌人的时机，连续侵陷晋西北山区的宁武、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诸城。三月十五日，伪军李守信部进攻偏关，梁雷带领县政府转到百家嘴村的时候被敌包围，他们奋勇突围，终因众寡悬殊，牺牲了不少同志，梁雷也壮烈牺牲。新组建的游击队遭受到严重挫折，部队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散了。李林怀着对殉难战友的深沉悲痛，对敌人的高度仇恨，把失散了的游击队员重新聚集起来。她鼓舞大家说：同志们的血不会白流，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十个人站起来。我们应该挺起胸来，向敌人讨还血债。这个时候，一二〇师主力部队星夜赶回来救援人民群众，接连夺回被敌人侵占的七座县城。游击队随同主力部队进入偏关城，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八支队的“李政委”

（支队未设政委，在有了军事指挥员后，李林的职务是政治主任，但是人们却叫她“李政委”）。

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支部队奉命北上，挺进到绥远所属的丰镇、凉城、广汉营一带，开辟绥南地区。部队行经右玉威远附近，李林曾经带领三十多名战士截击敌人，掩护主力前进。在行经田成村的时候，村口有一个土碉堡，后面的大院子，是一个伪军中队的马桩，留有伪军一个排，一百多匹马。李林率领部队利用敌人未曾察觉的机会，猛然发起进攻，给伪军以大量杀伤，残敌狼狈逃走，马匹全被我军缴获。打完仗战士们全

骑上马，步兵变成了骑兵。这时的支队长王零余，原先在东北军是骑兵军官，从此就开始酝酿成立骑兵营。

这时，晋绥边境已经形成敌我交错的形势，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对于一个女同志说来，困难是很多的。对于自幼习惯于热带气候，如今来到严寒的塞外的李林，尤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李林过去没见过马，现在却要指挥骑兵作战，学会骑马就是一大难题。可是她不甘示弱，经过短期的训练，就连最烈性的马她也能一跃而上，扬鞭奔驰了。部队常常夜间行军，有时通宵不停，有时半夜三更，碰巧遇到村落，找个老百姓家的土炕，几个同志挤在一起，勉强休息一阵。有的时候，敌情特别紧张，夜间不能进村，只得冒着塞北的严寒，在野地里露营，李林常是穿着大衣钻进干草窝里，熬过冬季漫漫的长夜。她曾长期侨居海外，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来到遥远的雁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都会遇到困难。往往到了朔风刺骨的冬天，她还没有袜子穿，一双光脚板冻得肤裂血流。李林蔑视这些困难，总是那样精神饱满，精力充沛。

在这一带地区的战斗中，李林亲手枪毙过平鲁的大汉奸李树德，在偏关砸烂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监狱，平反了一批国民党政府勾结土豪劣绅炮制的冤案，释放出许多无辜被关押的劳苦人民。她不但领导开展了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还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李林擅长作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总是带着宣传队，不知疲倦地写标语，向群众作口头宣传：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的罪行。每当讲到这些事情，她都激动万分，热泪滚滚，不少听者也感动泪下，引起共鸣。她还经常到群众家里串门，通过帮助给群众挑水做

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男女群众来看望她，问寒问暖，亲如家人。部队要走了，驻地周围的群众又都赶来欢送，祝愿部队不断取得胜利，而且盼望早日归来和他们团聚。

李林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所表现的诚挚的阶级情谊，令人十分感动。在砸开偏关旧政府的监牢时，她从死囚牢里救出一个垂死的、被人陷害的妇女张喜凤。——张喜凤被强加上“谋杀亲夫”的罪名，已经在死囚牢关了八年。这件曾经轰动偏关的案件，是地主阶级勾结旧官僚制造的大冤案。贫农女儿张喜凤，因其父亲欠葛姓地主的租子无力偿还，被迫嫁给他的半疯瘫的儿子为妻。张喜凤在新婚的夜间越窗逃走，偏逢葛财主的儿子在几天后病死了，财主诬赖张喜凤“谋杀亲夫”，买通官府，判了无期徒刑，关进死囚牢房。李林把奄奄一息的张喜凤救出以后，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关切，决心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她象对待亲姊妹一样，热情地帮助张喜凤调养异常虚弱的病体，耐心地讲解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她们两个枕靠枕地躺在一条炕上，合盖着一条被子。随后，她就介绍张喜凤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并且在她的长期帮助下，成为土生土长的，坚决抗日的妇女干部。

李林也非常关心部队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每到宿营地，就去连队找战士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在生活上和战士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一块吃饭、作游戏，教他们唱歌、学文化，编写并导演新戏，她自己也参加演出。李林对人正直和藹，她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大家，不论干部或是战士，都对她非常尊敬、热爱。有了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去找她谈，她也总能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她受到大家的敬爱，也成为大

家心目中的榜样。有些新战士打仗胆小，老战士就鼓励他们：

“嘿，你们看咱们的教导员（当部队改编成一个营的时候，她任这个营的教导员），别看人家是个女同志，年纪那么轻，打起仗来谁能比？冒着烟的手榴弹掉到跟前，她也敢拾起来扔给敌人！她常说，敌人专打胆小的，越害怕，越挨打。不信，你问问她去。”她在部队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六月，雁北的抗日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雁北第六支队。原八支队和五支队，被改编成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辖四个连），配合在这里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和汉奸。李林曾经一再表示愿意继续从事军事工作，直接和敌人作战，晋绥边特委嘉许她的壮志，分配她担任这个营的教导员。七月中旬，为了重新恢复和开辟绥南的工作，特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绥南工作团；命令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北上绥南，确保他们完成任务后返回右玉县南山区。由杨家后山到绥南的二十边村，共有一百四十里。他们经过一天行军，乘夜穿过鬼火沟，突破封锁线，把工作团送到二十边村；连夜又从二十边村东进，赶到二百里外大同口泉附近的长流水敌据点，经半小时激战，把这个据点里的敌人歼灭，马上又返回二十边村。以后护送绥南工作团在回雁北的路上，李林又率领骑兵营，顺便袭击平绥路上的红砂坝车站，把鬼子一个小队打得落花流水。但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二连连长鲁尚明不幸中弹牺牲。李林在战场上悲悼战友的牺牲，又专程到沈庄窝安抚烈士的家属。鲁尚明的妈妈姓王，是个早年守寡，在穷困中好不容易把三个孤儿拉扯大的老大娘。在李林离开那里的时候，王大娘把鲁尚明的弟弟、十六岁的鲁尚志交给她带回去参军。李林激动

地抱住大娘喊叫“妈妈”，从此王大娘待李林比亲闺女还亲，彼此形成骨肉般的深情厚谊。

大同敌人不断地调集日伪军扫荡雁北这块抗日根据地。第六支队配合兄弟部队进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有些小部队也都非常勇敢地打击敌人。晋绥边工作委员会的政卫连只有九个班，经常出动袭击敌人，打据点，抓汉奸，打得敌人非常害怕，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李林和这支部队转战雁北各地，接连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她的名声渐渐传播开来。对于这位骁勇善战的女英雄，敌人恨得咬牙切齿，曾经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李林，为她的头颅悬赏巨额的款项；可是抗日的人民却是对她无限热爱，尤其在解放区的女干部中，她的事迹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晋西北有些女同志不愿意长期作民运工作，要求到文水、交城去打游击，当她们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时候，就反驳说：“为什么李林可以？”群众中间还曾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传说。贺龙将军称誉她是“我们的女英雄”。中共中央妇委的同志说：“李林同志她不仅是牺盟会的优秀会员和有才能的领导者，而且她是中国共产党员和妇女同胞的光荣代表和模范。”国内各地的进步报刊，如象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新中华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等等，以及敌后各解放区的报刊，曾经多次宣传过她的英雄事迹。

“汉奸清乡队莫奈我们何！”

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在平鲁前榆岭村成立了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雁北、绥南

新区的工作。当时，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关怀李林，怕她长期在艰苦紧张的雁北部队中工作不相宜，提议调她到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地区工作。非常要强的李林，恳切地请求留在雁北前线。边委成立的时候，关向应又提名要她到边委工作，兼管地方武装。这次李林怀着对党组织无限感激的心情，但又带点对部队恋恋不舍的情愫，勉强同意了。九月十六日，李林来榆岭村报到，任边委宣传部部长。从此，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当中的困难更加多起来。但是在战争中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她在思想上也已经更加坚强。

来到边委工作以后，李林感到在地方上负责民运工作，远比部队工作复杂。全区所辖十几个县，有上千的村子，可是边委只有七、八个人，加以地区辽阔，敌情经常紧张，工作确实难以开展。

边委会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情况，决定马上举办干部训练班，就地解决干部问题，并认为这是巩固和发展晋绥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项重大建设。

李林被任命为干部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在敌后办训练班的困难不少，她却排除一切困难，积极筹办。从各地抽调的学员，很快赶来报到，他们中间有农民，有青年学生，有背炭的工人，大都是年轻人。李林热情地接待他们，逐个地找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和思想情况。她还亲自给他们讲授主要的政治课程，备课常常持续到深夜，有时奋笔疾书直到天亮。数九寒天，冷风刺骨，手冻僵了，停笔搓一搓，又继续写下去。

干训班没有校舍，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都要帮助房东家里生产，砍柴挑水；遇到敌情紧张的时候，还要经常转移地

方，甚至一夜转移几次，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比较紧张艰苦，大家精神愉快，都能自觉地学习，刻苦地磨炼。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干训班共举办了四期，先后培训了二百多名学员，给各县输送了一批坚决抗日的骨干，及时地充实了县、区的干部队伍。可是，谁能计算得出来，在这个时期内，李林究竟在干训班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她为备课付出了多少心血？

当时在敌后根据地，为适应战争环境，党政军民总是密切配合，统一行动。李林虽然在地方机关担任了重要职务，但她仍不脱离战斗生活，热爱着她的战马和六五步枪，热爱战斗胜似她的生命。在敌人前后对晋绥边界地区进行的九次“扫荡”中，她每次都亲临前线，使用她那只六五式步枪痛打敌人。她在平时沉默寡言，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临阵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骁勇异常。

一九三九年九月，敌人对晋绥边境地区进行的第七次“扫荡”中，调集四千多名日伪军，把洪涛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子团团包围，妄想“消灭”我党政首脑机关和六支队主力。一天傍晚，日军突然从六个据点倾巢来犯，分兵七路向洪涛山扑来，情势十分危急。这个时候，李林和边委的屈健、柏玉生等，采取突然袭击敌人后方据点的办法，调动“扫荡”根据地的敌人回援。他们率领边委政卫连，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一夜跑了八九十里路，径直杀向同蒲铁路线上的岱岳镇敌据点。他们边走边打，在拂晓时穿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来到岱岳镇西面的娘娘山。这里是“扫荡”我区敌军的后方，只见岱岳不时有敌人的火车通过，据点里为数不多的守敌还在梦中。他们突然从山顶压下去，屈健带领一部分人攻打火车站，李林和柏玉生率领

另一部队直奔岱岳镇，她用机枪掩护部队杀进敌人的驻院。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大同日军师团部求援。大同敌酋立即派铁甲车支援岱岳。但是铁路已经被我破坏，又遭我军的迎头痛击，铁甲车只好退到北周庄车站；敌人还从大同派出两架飞机，前来助威。李林等率领部队坚持战斗，直到前去“扫荡”洪涛山区的敌人掉头赶回，坦克、卡车滚滚而来的时候，李林方才下令撤出战斗，朝向东北方向急进四十多里，转到怀仁山上的陆家窑头，远远地甩开了敌人。这次战斗解除了敌人对我边区首脑机关的包围，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对于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经验教训，李林在战后及时地进行总结，写了一篇文章：《突破敌人的第七次“围剿”》。在这篇文章中，李林满怀信心地写道：“此时新阶段时期，敌人一定会挣扎着她的最后力气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不警惕着和准备着。总之，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以后，她在一九三九年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信中写道：“由于工作方针的转变，需要加强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去年七月间，我由部队来至公栖晋绥边区委员会，负一部分责任，刚到时，深觉民运工作要较武装工作复杂，而且感到生疏、棘手。但现在不同了，开办了好几期训练班，培养了不少地方干部，走到每一个村子，没有一个村子的老百姓不熟悉，拜了许多‘乾妈’，团结了不少‘乾姊妹’，因此敌人围攻是疯狂的，是厉害的，汉奸清乡队是活跃的。但是我们总能冲破敌人的围攻，汉奸清乡队是莫奈我们何。”她在信的结尾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和光荣，我今天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因为我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参加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这伟大的党的教育及领导之下，我做了一些工作，而且我还在学习，还在希望自己能为党做出一点工作成绩出来，希望你们经常领导我，站在党的组织上经常指示我的工作，教育我如何去做一个革命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九三九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日趋反动，他与日寇勾勾搭搭，对抗日人民和进步力量则极力限制、削弱。这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召开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秋林召开的，被称作“秋林会议”。这是一次反动的会议，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山西进步势力，以实现向日寇妥协投降。其主要阴谋是要取消牺盟会，夺取牺盟会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消灭决死队和一切新军武装，取消决死队的番号，取消政委制，把新军改编为和旧军一样的编制，把对新军的指挥权掌握到他们手里。为此，顽固派在会议上制造种种谣言，诬蔑共产党和牺盟会等山西新派，胡说八路军和新军“游而不击”，等等。阎锡山还在会上喊叫“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发出“天要下雨了，要及早准备雨伞”的投降反共口号。因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阎锡山准备进攻新军，消灭决死队，取消牺盟会、动委会，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策应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动员。李林曾经南下一千多里，和动委会主任续范亭将军等前往秋林，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她在会上和山西新派的同志一起，联合抗日进步力量，跟阎锡山反动派旧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对于阎锡山提出的一切反动措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针对顽固分子对山西

新派和八路军的种种造谣诬蔑，李林以她亲眼在晋绥边的见闻，论证了八路军和新军深入到最艰苦的敌后地区，长年出生入死地和敌人搏斗的事实。同时她还揭露：国民党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在日军还未来到的时候，便退却逃跑得没有踪影了。及至八路军和新军在敌后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他们又派来一些残渣败类，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敌伪汉奸，到处进行破坏。她的多次发言，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造谣诽谤。三个多月后，她从秋林返回驻地，从此山西政局继续逆转。这一年的冬天，国民党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大打出手，充当反共急先锋，发动“十二月事变”，命令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晋绥边境地区的顽固派也向我军挑衅，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李林率领边委政卫连，配合六支队奋起自卫，痛击顽固派，制止国民党的反动逆流。一九四〇年一月，边境地区人民在东短川村召开全区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屈健当选为专员，李林当选为专署的秘书长，并且负责指导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工作。月底，李林又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晋绥解放区的首府兴县参加了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她在会上当选边区行政公署的委员。二月一日，她又出席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在兴县，李林会见了敬爱的贺龙将军。贺龙亲切地问询她的战斗经历，问询她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且问她愿不愿意留在兴县工作（这是行署对于她的希望）。李林表示，在哪里工作都行，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是个人的心愿，还是愿意返回前线。贺龙支持她的心愿，边区党组织同意她仍回雁北前线。

日益巩固的洪涛山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战略地区的腹心地带。它的发展和巩固，严重威胁敌人的安全。因此，敌人

总是千方百计地前来进攻，妄图摧毁这块抗日民主地区。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敌人开始对这个地区进行第八次“扫荡”。这次“扫荡”又被我军迅速地彻底粉碎了。但是，雁北妇女救国会李桂芳等十三名妇女干部和一部分男同志，却因汉奸出卖，被围困在张碾沟的一座古煤窑里。残暴的敌人朝煤窑里施放毒气，将她们全部毒死在里面。

敌人第八次“扫荡”刚刚被我粉碎，张碾沟惨案的血迹未干，四月下旬，敌人又从同蒲、平绥铁路沿线调集大量军队，分兵三路猛扑洪涛山区，对我根据地腹地发动第九次“扫荡”。这次敌人出动八千余人，兵力的众多，来势的凶猛，都是空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晚上，设在乱道沟的专署指挥部，和六支队的领导同志举行紧急会议，共同作出反“扫荡”部署，决定二十六日拂晓向平鲁方向转移，根据情报，这个地区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计划集中优势兵力从这里突围。这天早晨五时左右开始行动，部队在群山险谷中前进。六支队走在前面，专署机关、群众团体、后勤机关和干部训练班等单位人员及笨重物资走在中间，李林带领专署政卫连担任后卫，负责掩护。

刚刚走到陶小峰和左小峰村前的沟叉路口，先头部队突然传来一阵紧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枪声越来越密，队伍中缺乏作战经验的干训班学员队形乱了。李林当即指挥学员就地卧倒，命令政卫连拉开距离，前后掩护。这时六支队已经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面部队没有及时跟上，被敌人的火力拦腰截断，与六支队失掉联系。整个队伍中有战斗力的武装，就只剩下政卫连。

李林同地委武装部部长姜胜交换意见后，果断地命令队伍掉转方向，由政卫连引导向西平台村转移。可是，北边、南边

的敌人，马上压过来了，把西平台村四面围住。情况万分危急，李林即向姜胜提出：“我带骑兵排往东大沟里冲，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姜胜还要劝阻，李林已经跨上战马，带领铁骑顺东大沟冲去。

这个时候，南北两面山上，密密麻麻布满敌军。李林毫不畏怯，决心尽快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掩护大部队突围。她一马当先，率领战士一面射击，一面向村东大沟驰去。一时杀声震天，几十匹战马掀起冲天的尘雾，敌人误认她们是突围的主力，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全力向东增援；李林率队打到距东平台村不远的马家河，东边的敌人也压过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被吸引过来，姜胜指挥机关和干训班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沿大沟南岔疾走，迅速翻过南山突围出去。

敌人发觉上了当，集中全力咬住李林不放。她们奋勇搏战，与敌反复冲杀，最后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沟沿下面，抬不起头来。李林感到形势险恶，难以突出重围，便利用战斗的间隙，从身上取下文件包，塞进岩石的裂缝里面，用土严严实实地埋住，对十四岁的通讯员二和子说道：“你还小，敌人不会注意你，快沿着这条沟出去。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的。”小鬼眼泪巴巴地望着李林，硬是不肯走，经她再三劝说，方才挥泪离去，李林嘱咐他记住这个地方，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再来取走文件交给地委机关。

李林掩护二和子沿着一条小山沟冲出去，随即跃马冲向山头，打死敌人两名机枪手，打哑了机枪。又率部队向东冲杀过去，敌人又象潮水一样涌来，她和战士且战且退，钻进一条沟岔，隐蔽在一处刀削似的土崖下。敌人很快又扑上来，李林和战士们在重围中奋勇冲杀，翻过东面的山梁，直插小郭家窑

村后沟。

李林催马正往前赶，打到距西平台村不远的马家河，突然又有一股敌人迎头从沟沿冒出，李林掉转马头，冲上小郭家窑村背后的荫凉山，奔向山顶的一座小庙。她想从这里往西冲，但是西边的敌人象一堵墙挡住去路。李林骑的马，是她在骑兵部队时缴获来的经过训练的马，善于在枪林弹雨中飞驰。这个时候，不幸这匹好战马中弹倒地死了，身边剩下的两个战士都已负伤多处，战马也都倒毙。李林和一个战士扶着重伤的战友刚到小庙跟前，这里有个洼洼，周围是高坎，她们利用这儿的有利地形顽强地抵抗。敌人从四面扑上来，围住她们嚎叫着要“抓活的”。李林和受伤的战士奋力拚战，接连打倒几个扑上来的鬼子，两名战士相继牺牲，她的右腿中弹，前胸也受了伤，仍然顽强地射击扑上来的敌人。李林坚强地忍着疼痛，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小手枪，两支枪同时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不敢靠前。最后，她把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小手枪里也只剩下一粒子弹。眼看敌人越来越近，她见突围已不可能，坚决不当俘虏。于是，她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头部。……

太阳照耀着壮丽的雁北山野，鲜血染红了民族烈士的征衣。李林死了，含着骄傲的微笑……

就是这样，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二点多钟，二十四岁的李林同志，为无产阶级的神圣事业，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敌后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她牺牲的当天夜里，刘明声带领一个小分队，冲进敌人的包围圈里，从荫凉山顶小庙下的坡地上夺回李林烈士的遗体。

李林的牺牲，引起雁北地区人民的极大悲痛。郭家窑村的

群众，怀着虔诚的心情，从五里外挑来清水，擦洗了烈士的遗体，用珍藏的白粗布包裹了烈士的身躯，严肃地盖棺入殓。李林牺牲时候的血衣，辗转送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个时候，党组织为李林的坟墓建在什么地方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建在洪涛山边东石湖村的高山脚下，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雁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便于人们经常来往经过这里瞻仰凭吊。在安葬李林遗体的那天，在地委、专署、抗联联合为她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有在雁北敌后和她共同战斗过来的数千名军民群众，淌着眼泪来和烈士告别，不少的人恸哭失声。

这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出哀悼李林烈士的唁电：“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一九三七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妇委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结尾写道：“特此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同志和全国妇女同胞更加奋起抗敌，为完成李林同志的未竟事业而奋斗，为李林同志及一切抗敌殉国的烈士们复仇而奋斗！”

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新华日报》，全国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李林烈士的英雄事迹，刊登了中共中央妇委的唁电。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发表了题为《悼李林同志》的社论。社论沉痛地说：“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虽有不少民族女英雄，然而象李林同志深入敌后，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冲锋陷阵，血肉相拼，以至坚持三年之久，创造了辉煌永远不可磨灭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尤其是此次在敌人四面包围而来，无法冲

出，终不免于一死的坚强信念下，沉着、英勇、顽强地连毙敌人六名，最后遂毅然以枪膛中最后一粒子弹打死了自己，而免于遭敌屠杀。这种伟大壮举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造成中国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李林同志遗书之一》（李林于1939年9月30日致孟庆树、张琴秋信），载《中国妇女》第2卷第1期，1940年6月15日。
2. 中共中央妇委：《悼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1940年5月26日），载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28日。
3. 亚苏：《忆李林同志》，载《中国妇女》第2卷第1期。
4. 穆欣：《一位女英雄》，载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9月28日。
5. 赵仲池：《奔驰在长城内外的女英雄》，载《中国妇女》，1960年第十三期。
6. 樊云芳、周浙平：《民族女英雄李林》，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7. 屈健的谈话记录和贾唯英回忆李林的文稿。

李 中

罗绍志

李中，原名李声霏，字印霞。李中是他在上海期间使用的名字。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李中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石牛山清水塘（今双峰县石牛公社采桑大队清水塘生产队）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父李家鸿（字俶莘），考秀才未中，在家设馆办私塾。李中自幼在父亲身边念书，不几年就遍读了“四书”、“五经”，并能诗会文，在兄弟三人中，是最得父母钟爱的一个。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四岁的李中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乡间带头剪掉了辫子。这时，湖南的各种新型学校在城乡普遍兴建，李中讨厌旧学，追求新学。但因家庭经济不宽裕，进城求学的愿望未能实现，曾一度辍学在家务农。一九一三年秋，免收学膳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立。招生的消息传到乡下时，李中很高兴，便邀同乡黄受松（字赞臣）跑出石牛山冲，到湘乡中里永丰（今双峰县城）报名应考。经过初试和复试，他与蔡林彬（和森）、黄受松、宁纯宦（柏轩）四人被录取^①。蔡与黄编入第六班，李中与宁纯宦编入第七班。

^①当时一师招生，将名额按2:1分配到各县，再由各县按2:1分配到各地。湘乡县分上、中、下三里，永丰属中里，初试取16名，在县复试取8名，最后一师复试取4名。

在一师期间，李中除与第六班的蔡和森是要好的朋友外，还结识了第八班的毛泽东、罗学瓚（荣熙）等同学。开始，他在学校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在蔡和森、毛泽东等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不仅刻苦钻研学校所规定的各门功课，是全校成绩优秀的学生之一，而且积极参与蔡和森、毛泽东等发起的社会活动。一九一五年上期，毛泽东等在一师发起的驱逐校长张干的活动，他就是参与者之一。他还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一师学友会。学友会于一九一五年由原自进会改建而成，其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长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其主要负责人及各部部长、组长、干事，均由各班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李中自一九一五年冬起至一九一八年毕业止，每学期都在班上当选，任学友会文学部图书组组长等职^①。由于学友会的经费很有限，李中所负责的图书组，一方面精打细算，挤出钱来购买当时出版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科学》、《教育研究》等各种新杂志，另一方面积极向学校教职员、同学及校外募捐各种书刊。经他的倡议，学友会还设立了阅杂志室和成绩展览处，把同学们私费订的一些杂志及毛泽东、罗学瓚、张昆弟等优秀同学的好作文，也当作图书供会友们阅读^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学友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附近的国民学校内举办了工人夜学。工人夜学分甲、乙两班，李中是乙班的管理。每周星期二、四、六晚上，他都坚持到国民学校去组织

①据1918年编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

②宁纯宦的回忆。另参见张国基：《和毛泽东同志相处的日子里》，载北京市政协编《文史资料》1979年第1期。

工人学习^①。因此，学校附近一些工厂的许多工人都熟识他，亲切地尊他“李先生”。这说明，李中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通过办工人夜学，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

一九一八年夏，李中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由于湖南“政局乱极”，“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②，蔡和森与肖子升（旭东）、毛泽东等先后去北京，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李中在一师毕业后，先在本校附小执教，不久，跟随原一师数学教师李孝仪（字希易）到了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器店帮工。这期间，他多次为店主去过浦口、南京等地收购古玩器。有一次，毛泽东同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从北京去上海，到达浦口时遇上了李中。当时毛泽东的经济很困难，还是得到李中的资助才到达上海的^③。后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很有风趣地回忆过这件往事。他说：一九一九年初，我从北京去上海。“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完成了我的

①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日志》（卷首），复制件存一师纪念馆。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③ 罗绍志：《“李中”确是李声澐》，《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

旅程。”^①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湖南来的“老朋友”、他的“救命菩萨”，正是李中。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广为传播。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在这里扩大发行，更吸引着从湖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来上海“谋出路”的许多有志爱国青年。李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就从蔡和森、毛泽东那里和学友会图书室读过《新青年》，因此早就知道陈独秀其人。《新青年》在上海扩大发行后，他不仅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而且极力追随该刊主笔陈独秀。当他从多方面打听到陈独秀的高所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二号时，便经常秘密前去拜访。陈独秀知道李中是蔡和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乡，追求革命思想的心情十分迫切，就送给他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及一些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启发他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在陈独秀的引导下，李中不仅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而且成了一名热心工人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因该厂系清朝曾国藩和李鸿章所建，来自曾国藩家乡的湖南湘乡籍（即今双峰籍）的工人最多，李中在这里可找到不少同乡工友。于是，他离开古董玩器商店，把原名李声澂改为李中，入了江南造船厂，一面当钳工，以打铁为生；一面通过同乡工友，广泛联络工人群众。他的这种行动，很得陈独秀的赏识。为了深入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邀他到渔阳里二号与自己合居。从此，李中不仅与陈独秀

^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29页。

的接触更多了，还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广泛结识了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启汉、包惠僧等人。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李中很快成长为我党建立初期的一位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利用在江南造船厂打铁的机会，积极帮助陈独秀等筹建机器工会。

关于李中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毛泽东是极力赞赏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为送别蔡和森、向警予等赴法勤工俭学，在率领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时，曾与李思安（女）等经武汉，绕道上海；翌年三月，他在北京完成请愿和宣传驱张的任务后，又复到上海。毛泽东这两次在上海期间，都在李中寓居的渔阳里二号寄居过，并在这里“再次看见了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①。李中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江南造船厂筹建工会组织的经历，畅谈了当工人的体会，并劝毛泽东入工厂。毛泽东听了深受感动，很想跟他一道入厂做工。但为了“湘事”，他不久赶回了湖南。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与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通信时，还十分留恋李中的工人生活。他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君声瀚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瀚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二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已）渐得到每月工资十二元。他现寓居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②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

^②《毛泽东给罗学瓚》（1920年11月26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陈独秀等人的酝酿发起，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于一九二〇年秋建立。为了培养党的后备队伍，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建立后，从各地来沪的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八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S·Y）正式建立，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有八个人^①，书记为党的发起人之一俞秀松。当时，李中在江南造船厂帮助陈独秀等筹建机器工会，在工人中的声望颇大；他还是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一。

“沪滨工读互助团，自湖南几个学生发起后，在七月间正式成立”^②，设于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是李中当时的通讯处^③。正因为如此，李中与任弼时、罗亦农、李启汉、邵力子、沈雁冰等，第一批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李中等又加入了共产党^④，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名“工人党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设立了团中央临时机关。为培养青年和团的干部，临时团中央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有的在复旦大学旁听，有的“或在华法教育会，夜校授课，或在外国语学社听课。该两校，一学法文，一学俄文，有兼学之者。”^⑤李中的住处（渔阳里二号）

①《李达谈1920年—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集）说：第一批入团的有20多人，李中是这一批参加的。本文说第一批入团的有8人，是根据罗征敬的考证文章：《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印《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

②《沪滨工读互助团情形》，1920年10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

③1924年10月上海《劳动界》第12册。

④《李达自白》（节录），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印《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⑤1920年10月11日《民国日报》。

与外国语学社（渔阳里六号）相距很近，他是参加外国语学社听课的一员^①。由于他原在湖南一师时的英语基础很好，学习法文比别的青年接受快，因此既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又是该社的法文教员。但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做工人运动上。开始他在江南造船厂组织机器工会，后与李启汉等到纱厂工作^②。一九二〇年秋，杨树浦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的工人，要求资方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李中与一些党的成员，抓住这个机会，一面向工人作演讲，发动工人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一面向同情工人的知识界和市民开展募捐，声援和支持纱厂工人的罢工，使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李中名为“工人党员”实是知识分子。他在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积极为《劳动界》组稿、撰稿，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启发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教育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如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他以“海军钳工”李中的署名，在《劳动界》第七册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深入浅出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

①包惠僧：《回忆渔阳里六号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大”前后》（1）第353页。

②《柯庆施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情况》（1957年3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集。

宣言一开头就说：“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呢。”接着，宣言还对“我们少数工人”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要认定我们的地位。他说：

“到了这个时候，甚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甚么地狱监牢都要破了，甚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第二要贯彻我们的联络。他提出：“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第三要奋发我们的热心。他主张：“吾们工人，最好一方面是做工，一方面是联络”。并说：“做工是各人的天职，联络是成功的手段。终其身可以不变的。——可以积极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工人所掌握和工人极端缺乏文化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代表工人撰文，喊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心声和愿望。因此，这篇宣言一直作为工人阶级觉醒的例证而被史学界广为引用。

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通过李中等一些早期团员和党员在工人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联络”的要求十分迫切。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李中受党的委托，第一个在江南造船厂发起机器工会。他与陈独秀起草了一个《机器工会章程》。这个章程共分六章、三十二条。其中第二条确定该会的目的是：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进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着

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互相的扶助事业；研究劳动市场状况；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其他关于增进本会会员福利的各种事业^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章程。章程订出以后，李中还写信告诉了沪东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并约他面谈，发动他在该厂发起工会组织。陈文焕接到李中的信后，公开复信说：“现在你想发起一个机器工会，这是我很赞成的，……你与独秀先生所订的机器工会章程，……你肯给我一份吗？”^②李中根据陈文焕的要求，立即将自己与陈独秀所订的《机器工会章程》，寄了一份去。陈文焕按照这份章程的要求，在电灯厂积极开展工会的筹建活动，亦成为机器工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党所领导的，“由电灯厂钳工陈文焕君与造船厂钳工李中君首倡发起”^③的中国第一个“大体团”——上海机器工会，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在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十一月二十一日开成立大会。据报载：发起会与成立会均“由筹备会书记李中为临时主席，报告一切”，“次由陈独秀到会演说”，并“当即请陈独秀为经募处底主任，推李杰、陈文焕、吕树仁、陆征章、李中为办事员”^④。这个工会发起时只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到正式成立时发展到三百七十多人。工会事务所设沪滨工读互助团机关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由李中常

①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1920年10月10日上海<劳动界>第9册。

②1920年9月26日上海<劳动界>第7册。

③1920年12月上海<劳动界>第19册。

④1920年10月10日上海<劳动界>第9册。

驻于此具体主持工会的事务工作。为加强机器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李中还倡议工会事务所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在李中等领导的第一个机器工会的影响下，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相继建立。当时规模最大的是印刷工会，拥有会员一千余人，并出版了《友世画报》。由于李中的活动频繁，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对他的注视。当年英帝国主义工部局的档案《警务报告》中，曾多次记载密探汇报的有关李中的情况。如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警务报告》载：“机器工会最近由一湖南学生名李中者组成，临时会址在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据说已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①

李中在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初步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为党发起建立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但由于早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团员成份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等等，李中在江南造船厂筹建机器工会的过程中，受到改良主义的合作主义思想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他于上海机器工会写给提倡合作主义的复旦大学教务长薛仙舟等三人的信中，还在建议举办合作铁工厂。信中说：“三位先生是合作社中坚，劳心殚虑，发皇合作主义于中国，我倾心已久！现在我们想采取‘生产合作主义’和三位先生发起一个机器铁工厂，资本自己出，工作自己做，所得利益，除提几成办社会事业外，归社员均分。”并说：“现在资本家凭借资本魔力使得劳工代劳，自己坐享；劳工痛苦，自己快乐；此乃人类

^①转引自任武雄：《李中并非高语罕》，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

最没有人格的事。我们工厂，应该大家工作，消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两个阶级。但各个人以身体上境遇关系，亦难于强迫。工头领班艺徒名目，一切除去，卫生教育设法讲求，工作时间减少，工钱凭营业状况增加，此则由讲合作而及于劳动解放。”^①可见，建党初期的李中，虽然最早抱着改造社会和劳动人民不受剥削压迫的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但他这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一年五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观点不同，意见分歧，加上团的书记俞秀松及大批团员陆续赴苏联开会或学习，以致暂时解散。李中也由此脱离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关系。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发起下，在上海正式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为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七月初第三次来到了上海。开始，毛泽东寄居在渔阳里二号李中寓所，当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陆续抵沪，“一大”将要召开时，才从李中家移居党所安排的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这时，李中虽然脱离了青年团，但他从发起机器铁工厂失败的实践中，在不断地抛弃改良主义的合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赞成党的政治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包惠僧曾回忆说：“我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见过李中，他确实是个湖南学生”，“他在上海是同李启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②

①李中：《致仙舟、毛飞、砥中先生》，1921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平民》第41期。

②1962年7月7日包惠僧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信，存“一大”纪念馆。

一九二五年五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李中在爱仁里“克明公司”当会计为职业，发动工人投入罢工斗争。他的妻子朱氏病逝后，也没有护送灵柩回家。至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他才转移浙江水产学校。在这里，他不幸被反动派逮捕，一个月后，经亲属求各方人士营救始得释放^①。从此，李中脱离党的组织，回到了湖南。适逢长沙邮政局招考新生，年上三十岁的李中为生活所迫，复用原名李声澥报名应考，被录取为分发报纸的邮工。但不到两年，就离开长沙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荷叶、永丰扶稼堂等处办过“求实”补习学校，并任双峰中学校长多年，所培养的“弟子数以千计”。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湖南湘乡得到了解放。第二天，李中送三儿炳麟（现名李保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还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毛泽东曾接连三次回信给李中，邀他去北京。可是不幸，在李中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农历六月初六）去京途中，病逝于湖南南县。时年五十四岁。

作者附记：本文资料来源，除已注明出处者外，笔者还先后多次访问了（包括书信调查）李中的亲属、同学王九贵、宁纯宦、王昆生、李定纲、李炳锡、李约翰和李保罗等。在写作过程中，李定纲与李炳锡兄弟，先后专程从黑龙江回到家乡，帮助收集和核实史料。

^①李中的长子李定纲的回忆。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09

定 价： 1.20 元